本館相關出版品

教育家的話



林天祐／主編　定價／新台幣180元

本書採用口述歷史訪談的方式，探討教育發展的關鍵事件，了解資深教育工作者的體驗，發掘他們的智慧結晶。本書共訪談王家通等十四位教育前輩，編輯成冊。

教育家的話II：教育改革與教育政策



林天祐／主編　定價／新台幣200元(平裝)
新台幣250元(精裝)

本書採用訪談方式，訪問毛高文、吳京、楊朝祥、曾志朗、黃榮村等五位歷任教育部長，訪談內容包括生平、個人成長背景與理念、施政理念、任內重要教育政策、回顧與展望等。

教育愛－台灣教育人物誌(含DVD光碟)



本館／主編　定價／新台幣500元

本輯共收錄林茂生、田培林、杜聰明、傅斯年、孫亢曾、江學珠、高梓、陳雪屏、辛志平、張希文等十位教育人物傳略及簡介影片，希望以圖書傳略及影片形式並陳，為台灣的經典教育人物作傳，記錄他們付出畢生心力的教育貢獻與理念。

上述三冊圖書PDF檔皆已全文登載於本館「教育論文全文索引資料庫」，歡迎免費下載運用。教育人物簡介影片亦掛載於本館「教學多媒體MOD點播」系統，提供網路隨選播放。
本館網址：http://www.nioerar.edu.tw/

國立教育資料館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79號8樓
電話：(02)2351-9090轉分機109
網址：http://www.nioerar.edu.tw
E-mail：service@mail.nioerar.edu.tw

ISBN978-986-01-0889-7
GPN：1009602477
定價：270元

教育愛 台灣教育人物誌II

國立教育資料館

教育愛

台灣教育人物誌II

Educational Love



國立教育資料館

本圖書及影片簡介

本傳略圖書及影片DVD光碟精選張福興、張雪門、趙麗蓮、林本、李梅樹、何容、劉季洪、陳有諒、許世賢、錢思亮、吳守禮、蔡保田、毛連塭等十三位對台灣教育文化有卓越貢獻者合成集錦，呈顯每位人物之教育理念、教育事蹟、學術成就、人格風範及其對後世之影響等重要內容，期能拋磚引玉，讓教育工作者及大眾領略其精髓，並以為效法與學習之典範。

牽手護台灣 加入聯合國

教育愛

台灣教育人物誌 II

Educational Love



國立教育資料館編印
96年9月出版

序

Preface

台灣在現代化的歷程中，歷經多方變遷更迭。在不同的時空環境裡，無數優秀而偉大的教育工作者，各在不同的領域中發願、發光、發熱，留下深遠的影響。

審視教育先賢們的教育實踐，最重要的共同特質是——「教育愛」。「教育愛」，不是普通的 love，而是源於希臘文中的 agape，指的是精神之愛（spiritual love）、憐憫（compassion）與慈善（charity），是一種無私的愛、創造的愛，沒有條件，沒有智愚貧賤的差別待遇，臻至我國文化教育家田培林先生（1893～1975）所謂「忘我無我的境界」。學生從無知到進入知識的殿堂、從無律到自律，乃至從不具價值到深富價值，無不是「教育愛」之功；因此，「教育愛」可說是人類最聖潔、最需要發揚的一種愛。

本館去年（2006）開始系統記錄畢生為台灣付出「教育愛」的教育先哲精心製作系列「台灣教育人物誌」短片與傳略專書，內容包含台灣民主主義教育先驅林茂生先生、前述教育學家田培林先生等十位教育家，期能揉合聲音、照片、影像與文字，真實貼近其教育精神與生命，提供當代教育工作者追隨與學習的典範。

本年（2007）賡續執行「台灣教育人物誌 II」紀錄短片製作計劃，涵括台灣本土音樂的拓荒者張福興先生、終身奉獻英語教學的趙麗蓮女士等十三位教育家，並邀請長期對該教育人物鑽研有成的學者專家們分別撰寫傳略，深度呈現他們的思想和行誼。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特別感謝協助策劃「台灣教育人物誌」記錄影片的整個團隊，以及其後辛勤審查與撰寫傳略的學者專家，他們在卓越而忙碌的教學及研究之餘，無私的奉獻，提供本館最大的協助，正繼承了台灣教育先賢的教育大愛！謹此致上最高的謝意與敬意。

館長

王世英 謹誌

2007 年 9 月

目　錄

序

1 張福興（1888～1954）
近代台灣第一位音樂家／盧佳君撰文

15 張雪門（1891～1973）
台灣幼教傳奇／翁麗芳撰文

45 林本（1898～1989）
記林本僑教授二三事／林玉体撰文

57 趙麗蓮（1899～1989）
為台灣英語教育熱心奉獻的「鵝媽媽」／余玉照撰文

83 李梅樹（1902～1983）
獨「樹」一格的美術教育家／歐素瑛撰文

95 何容（1903～1990）
何容這個人／方祖燊撰文

125 劉季洪（1904～1989）
遠見、踏實的教育家／劉焜輝撰文

Contents

137 陳有諒（1906～1998）
獻身職業教育的長工／吳文星撰文

149 許世賢（1908～1983）
長期為教育請命者／莊雅茹撰文

163 錢思亮（1908～1983）
「平淡無奇」的教育實踐者／李東華、楊宗霖撰文

175 吳守禮（1909～2005）
台灣閩南語研究的導師／歐素瑛撰文

187 蔡保田（1921～1991）
教育研究與學校建築研究的播種者／張鈿富撰文

199 毛連塭（1938～2005）
特教先驅，創造思考教學之父／吳清山撰文

（依各傳主出生年次排序）



張福興（1888～1954）

近代台灣第一位音樂家

盧佳君 撰文／美國耶魯大學音樂碩士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兼任講師



◆ 張福興是台灣近代第一位音樂家，生於清光緒年間，成長及工作於日治時期。他的一生猶如台灣早期西樂發展的的縮影，但要研究他的一生，卻有實質上的困難。他於 1954 年逝世至今已超越半世紀的時間，這中間人事多已變遷，不但先生同輩師友俱已不存，家藏資料也因歲月、天災而消損殆盡。很慶幸在 2000 年 3 月由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支持，文建會獎勵，時報文化出版的《張福興－近代台灣第一位音樂家》問世，有此基礎，本人有幸加入由文建會委託專案，《台灣音樂館－資深音樂家叢書》之撰文行列，於 2003 年 12 月，由時報出版之《張福興－情繫福爾摩莎》上市，基於以上之基礎，此次撰寫的內容皆以此兩本書為軸，加上個人幾年來之資料收集（數目很少）撰寫而成。在此，首先要感謝白鷺鷥文教基金會、陳郁秀董事長以及孫芝君女士在著作權方面的支持，同時也謝謝所有提供資料給予建言的學術界師長。

壹 生平

一、家世與幼年生活

張福興，生於西元 1888 年 2 月 1 日（清光緒 13 年 12 月 20 日），卒於 1954 年 3 月 5 日，為第一位以官費赴日，學習西洋古典音樂的台灣留學生，也是近代第一位以西式新音樂為專業的台灣音樂家。他的父親張桂曾（1843～1901）在清同治年間，由故鄉（今廣東省梅縣）乘船來台，投靠住在今苗栗頭份的鄉親張大彬，並和蘇英妹成親。蘇英妹（1852～1928）是葫蘆墩（今台中豐原）總理蘇細番的女兒，也是張桂曾來台後，接濟他的鄉親張大彬的外甥女。英妹的父親在同治年間，台灣中部發生「戴潮春之亂」時候被殺，十二歲的英妹與母親蘇張帶妹為了躲避戰禍，冒險涉過大甲溪，步行返回頭份，投靠頭份街上開設大安堂藥舖的外祖父張應俊。十五歲時，外家長輩以蘇家僅有英妹一人，恐香火不傳，作主招贅同是客家籍的同鄉張桂曾來蘇家，開始了張蘇家族在頭份發展的歷史。



張福興是張蘇家族中第五個男孩，也是最小的幼子，他上面的四位兄長，依序是旺興、財興、登興、順興。婚後，張桂曾在頭份街上經營雜貨舖生意，店名「從盛」，因經營有方，家道逐漸興旺起來。張福興從小有音樂天分，雖然家族中沒人懂得音樂，但他自小便能自己把玩胡琴，每到傍晚時候，開始咿咿呀呀地拉奏，他的母親總是笑他拉奏的聲音跟蚊子叫聲一樣；他的父親則每次聽見胡琴聲音響起，就對大嫂友妹說，煮飯的時間到了。

二、求學歷程

如同一般客家人，張蘇家是重視男子教育的家庭。1893 年，張福興六歲，就像他的兄長們一樣，被家人送進頭份街上的私塾－「儲珍書院」去修漢文，教書的陳維藻先生是位有功名的書生。1895 年，清廷因甲午戰爭失利，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一夕間，日本成為台灣島的新統治者，這一年張福興先生八歲，還是成長中的孩童。日本政府統治台灣後，實施現代化的新式殖民教育，1898 年，頭份地方獲准設立公學校，隨著「儲珍書院」的漢文先生陳維藻被聘為頭份公學校教員，張福興也結束了孩童時期的私塾求學經驗，進入公學校就讀，接受新式的學校教育。



張福興（後排右一）興在東京音樂學校本科部就讀時與器樂部同學合影。
圖：張武男先生提供

1903 年，對張福興而言，是他人生經歷的第一個重要年頭。公學校補科修完，他考取了當時台灣人所能就讀的最高學府－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就讀師範部。如無意外，三年畢業後，他將擔任公學校教師，成為地方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由於公學校教師必須擔任唱歌課的指導工作，所以師範生在校期間，必須學習彈奏風琴的技巧，以備未來擔任公

學校教師授課之所需。由於張福興從小有過人的敏銳音感，實際操作樂器的經驗，激發了他強烈的學習慾望，到了二、三年級時候，在國語學校年度「校友會音樂會」中，屢屢獲得個人上台獨奏、獨唱的特殊榮耀。在當時，若不是能力絕對出色的學生，是不可能獲得單獨上台演出的機會。

由於在日本殖民教育體制中，並未設立高等、專業的音樂學校，想要深入學習音樂的學生，只有前往日本留學一途。1906 年 3 月 29 日，國語學校舉行各部「卒業證書授予式」，亦即畢業典禮，張福興是應屆師範部之畢業生；然因在學期間音樂表現優異，深受校方肯定，有意栽培他，讓他前往東京更上一層樓，當時校長田中敬一先生乃向總督府薦請以「官費生」名義保送張福興至東京接受教育，獲總督府支持，將張福興改編入國語部第四學年，保留學籍身分接受官費之資助，並以音樂研究為理由，赴日留學，成為第一位官費赴日學習西洋古典音樂的台灣留學生，離台前，在家族的安排下，與同為頭份人的陳漢妹女士完婚，並剪去了清末以來蓄留的辮髮，隻身前往東京。

張福興初至日本先入一橋之東京音樂學校分教場，暑假內兩度參加學校講習，積極準備入學考試。1906 年 9 月 11 日順利考入東京音樂學校預科，第一學期修習科目有倫理、唱歌、洋琴（今鋼琴）、樂典、國語、音樂、英語、體操及漢文等，其中以英文一科最感艱難。隔年 1 月第二學期開始，增加了寫譜課程。東京音樂學校共分為預科、本科、研究科、師範科及選科等五科，張福興以一年的時間完成預科的學程，修畢之後，在 1907 年 4 月被編入本科器樂部一年級就讀，主修大風琴（organ）師事島崎赤太郎教授；修習之課程包括倫理、重音唱歌、器樂、樂曲、歌文、音樂史、音響學、英文、體操等項。在本科三年級時亦即 1909 年 4 月開學之後，張福興應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要求，增修對未來音樂教育有利之樂器：小提琴， 之後小提琴幾乎成為他使用最多也最重要的樂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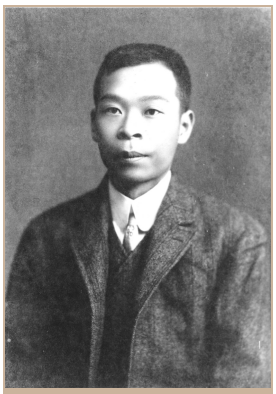
經過三年的學習，張福興在 1910 年 3 月 25 日畢業演奏會上擔任大風琴獨奏，演奏完畢後極受來賓及師長之讚美，故校方有意選派張福興前往德國繼續深造，但此意見為家族否決，成為張福興一生之憾事。回台灣之初在接受《台灣日日新報》採訪時，明確闡述他的教育觀、哲學觀及對東西音樂價值之看法。



他深覺台灣音樂長久以來只重複前人遺曲，缺乏創新，且未深入扎根，此現象非社會之福；反觀西方社會，音樂融入所有家庭及生活中，實值得我們學習。張福興殷切期盼大家共同努力、奮發向上、讓每一個人都能有機會享受藝術，建立身心健康快樂的人生。

1910 年 3 月 25 五日完成了東京音樂學校本科器樂部學業的張福興，在 4 月 1 日到 15 日至靜岡濱松山葉音樂器工廠，實際研習調律工作，16 日才獲文部省頒發「師範學院高等女學校音樂科中學校唱歌科教員免許狀」（即教師合格證），並於同年 5 月 7 日才正式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國語部，同日為國語學校任命為「教部囑託」。至此他完成完整求學過程，邁入教育志業，大展鴻圖，為台灣音樂深耕。

三、音樂教育生涯與歌謠採集研究



1910 年任國語學校音樂科助教授。
圖：張武男先生提供

1910 年 5 月，張福興回到母校國語學校（1919 年時改制為台北師範學校），擔任音樂科助教授，除了 1924 年間曾短暫兼任基隆高等女學校的音樂科囑託外，他一直在母校工作到 1926 年退休為止，前後達十六年之久。除了在課堂上教導音樂課程，課餘時間還要組織、訓練樂隊，指導學生學習樂器。1926 年他辭去師範學校教職，前往東京，1927 年暑假返台後又受聘於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擔任音樂科教職，在第一高女任教五年期間，還短暫兼任過台北第二中學校的音樂囑託。張福興除了在學校從事音樂教育工作之外，也積極參與各式社會音樂活動，從慈善音樂會、寄附音樂會、到各官、私單位舉辦的音樂活動，如 1915 年的始政紀念暨祝賀大音樂會，1921 年的艋舺共勵會音樂會等，除了負責籌劃，他還擔任小提琴、鋼琴和合唱多項表演。1916 年成立「台灣音樂會」開設音樂課程以及 1923、1925 兩年，他與塾生共組的業餘樂團「玲瓏會」兩度在台北醫專講堂舉行發表會。張福興多次舉行發表會，對當時社會影響很大。



頭份褒忠祠（義民廟）舉行己巳年慶成福醮，張福興與兄長共五人同任 「天師首」，合署「張五興」（1929 年）。

圖：張武男先生提供

1919 年，張福興奉派到花蓮港廳擔任音樂講習會講師，在花蓮講習期間，每利用假日，深入各番社巡迴。當他拉奏小提琴給原住民同胞聆賞時，原住民同胞常因優美的琴聲而不禁感動落淚，這 前往日月潭水社採集原住民的傳統音樂，回來後，將採得的樂曲整理成《水社化蕃杵の音と歌謠》一書出版。

1924 年，他自費出版台灣民間音樂工尺譜五線譜對照的樂譜《女告狀》，是「本省第一本工尺譜與五線譜對照的漢族民間樂譜」，有助漢族音樂之推廣。1929 年在頭份褒忠祠（義民廟）舉行的慶成福醮老照片，讓我們知道張福興是擔任慶成醮的「福首」，即天師首的頭人，印證他雖受新式教育，但仍參與地方慶典，致力融入本土文化的用心。

1932 年初至 1933 年初一年期間，張福興受總督府文教局委託，擔任東京高砂寮寮長職務，這才正式離開學校。在擔任教職二十多年後，張福興內心一直想要自辦一所音樂學校，畢竟深受殖民體制養成教育的張福興，內心常存有朝一日能自主的願望。辦理學校要經費，所以 1933 年，張福興在東京與友人合資從事罐頭製造事業，想要集資一圓將來回台創辦音樂學校的理想，可惜未能如願，一年後結束事業。1934 年返台出任勝利蓄音器株式會社首任在台文藝部



長，轉而致力台灣音樂唱片之製作，前後長達兩年之久。

四、晚年

1936 年張福興辭去勝利唱片文藝部長一職，當時他只有四十九歲，但是心境上卻已經步入了晚年。那年，他結束了所有的社會職務，離開台北樂壇，除定期北上於個人「音樂教授所」指導私人學生外，開始選擇閒雲野鶴的退隱生活。張福興與夫人陳英妹共育有一子一女，長子彩湘生於 1915 年，長女秀蘭於 1918 年出生。1935 年彩湘、秀蘭分別考取東京武藏野音專本科部與東京醫專；彩湘繼承張福興衣缽習樂，秀蘭則學醫。1939 年 2 月，秀蘭卻因肺病逝世，同年三月彩湘自武藏野音專畢業。女兒的過世對張福興是一大打擊，他開始在頭份永和山裡深居簡出，偶而前往台北，或有時到東京小住，探視習琴的彩湘，過著寧靜淡泊的生活。1950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不久，白色恐怖的陰影籠罩全台，這期間，長子彩湘受「呂赫若事件」牽連，被警總逮捕羈押長達一個月，經張福興四處奔走，張彩湘才安然獲釋。事件結束後，張福興對宗教的態度轉為積極，同時萌生採集佛曲音樂的念頭。



張福興（左二）全家合影。左起；妻漢妹、岳丈陳雙傳、子彩湘、女秀蘭。
圖：張武男先生提供

如果說，受女兒秀蘭過世的影響，使他的心緒遠離年輕時所經歷的繁華世界，那經歷彩湘因「呂赫若事件」牽連入獄的影響，則是他轉消極出世為積極奉獻的開始。1951 年，張福興皈依佛法，此後便時常前往苗栗南庄的獅頭山古剎廟宇間參加「打七」，或攜帶小型風琴，一邊聆聽法師誦經吟唱，一邊演奏和記譜。 也許是最後的預感，佛曲採集是張福興個人所做最龐大的音樂採集工作，也是他晚年最大的成就。佛曲採譜共計有四冊，皆以五線譜收錄，共計六十七首的梵唄佛曲。

採集佛曲兩年多後，張福興的健康狀況開始大不如前，加上他糖尿病的病史，1953 起需長住彩湘台北的住處，以方便就醫。1954 年 3 月因心臟病突發逝

世於台北，享年六十七歲，葬於苗栗縣竹南鎮崎頂之張氏家族廟。

貳 教育事蹟

二十世紀初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在殖民的文化下第一次接觸西方的現代化文明，在許多方面都處於萌芽階段，而身為近代台灣第一位音樂家，也因為這樣大環境的要求使然，無可避免地必須身兼數職。張福興透過不同的形式來表達和實踐他對音樂的熱忱，因此在許多領域中留下不可抹滅的軌跡，從教育的事蹟來看，可分為三個部份，學校音樂教育、社會音樂教育、 歌謠採集與研究 。



張福興擔任台北師範學校音樂科教諭時留影。（約 1922～1923）
圖：張武男先生提供

一、學校音樂教育

1910 年張福興自東京學成返台後，隨即投入學校教育的工作，在他二十多年的教職生涯中，一共教過國語學校、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基隆高等女學校和台北第二中學校，其中當然以他在「國語學校」（後為台北師範學校）任教時間最久，影響也最大。在教學上，除了一般音樂通識的課程，如歌唱課等，還有大風琴、鋼琴和小提琴個別樂器的指導課。他在東京音樂學校原是主修大風琴，後因大風琴造價昂貴，不易推廣的缺點，改以價格較為便宜的小提琴，作為普及推廣音樂的樂器，使小提琴儘可能成為有興趣的學生都能夠學習的樂器。另外，張福興還利用課餘的時間組織並訓練學生樂團。當時台灣西樂教學剛起步，樂譜流通不易加上教學資源缺乏，張福興必須親自編寫教材和譜寫音樂。即使教務如此繁重，他仍然秉持一貫嚴謹的教學態度，根據當時一位學生回憶，張老師對風琴的學習特別嚴格，沒有學會他所編排的兩本教材，拿到他的簽名，是無法畢業的。而為了提升校內的的文藝氣息，他還負責策劃國語學校每年的校友音樂會，並和學校其他音樂老師共同擔綱演出。1947 年，張福星與呂赫若、呂泉生、李金土等諸位音樂家，參加台灣文化協進會舉辦音樂比賽大會第一次籌備會，受台灣省立



師範學院院長李季谷之邀，短暫兼任該校音樂專科課程，並同時接受台灣省教育會主導之編寫國民學校音樂教本工作。

二、社會音樂教育

在社會音樂教育方面，張福興多元化的參與更是展現出他令人欽佩的活力與執著。當時地方各廳經常於暑期為各地區公學校教師舉辦講習會（類似今日的「學術研討會」），1911 年台中州東勢角公學校舉行為期四週的學事講習會，張福興擔任「音樂」科目主講人，另又於 1912 年由桃園、新竹二廳聯合舉辦的學事講習會上，講習「歌唱」科目。1916 年，張福興擔任「台灣音樂會」講師，該會由台北地區音樂教師組成，其宗旨為普及並提昇台灣的社會教育以及音樂教育水準，透過有系統的開設課程，每日定期授課，指導社會愛樂人士學習音樂。「台灣音樂會」課程分為普通教授和教育音樂教授兩種，教學科目有鋼琴、曼陀林、小提琴、風琴等項，堅強的師資也包括許多當時音樂界的名師，如一條慎三郎，高橋二三四、柯丁丑等人。1920 年，張福興和其私塾弟子組成「玲瓏會」，為業餘愛樂樂團，成員還包括當時台北醫專、台北師範學校學生和愛好音樂之社會人士。當時「玲瓏會」由張福興指導，每晚聚集在張老師家中二樓練習，並分別在 1923 年和 1925 年於台北醫專講堂舉行發表會，成功的演出打響了「玲瓏會」的名氣。除了音樂領域的社團，張福興與其它藝術團體亦保持友好關係，1917 年 12 月 2 日，「蛇木藝術同好會」於台北城南小學舉行音樂會，張福興與同校音樂教師皆應邀出席擔綱多組的演奏和合唱。



張福興（左起第三人，著淺色衣服，持指揮棒者）指揮玲瓏會成員在台北醫專講堂演出絃樂合奏。（1922 年 5 月 20 日）
圖：張武男先生提供

三、歌謠採集與研究

民間音樂歌謠之採譜，是張福興先生對台灣音樂最大的貢獻。1922 年初，台灣教育會以台中州新高郡管內日月潭湖畔電力工事興建，致當地水社原居民面臨社族即將他遷之命運，因恐日月潭八景之一「蕃社杵聲」不傳，遂委託張福興前往，從事音樂採集與調查。2 月 25 五日，先生由台北出發，攜小型山葉風琴一架同行。於日月潭採集調查期間，夜宿島中之湖，一位師範學校學生家中。先生每月往返水社，聽取杵歌與杵音，並作樂譜記錄。此外，在卜吉社中訪問一頭目，年約七十餘歲，得「出草」歌曲一首，並於頭社採得歌譜等共十餘篇。此次水社之行，歷時共約十五天，除南北舟車往返外，採譜時間共十天。

同年 4 月 2 日，欲研究台灣「蕃人音樂」之日本宮內省雅樂部講師理學士田邊尚雄氏抵達台北。張福興與同校教諭一條慎三郎、橫田三郎等一同參加歡迎會，晚間並赴田邊氏下榻處，告知前去番地採集音樂應注意之種種細節，4 月 3 日，田邊氏開始台灣「蕃人音樂」訪問旅行。所以張福興先生「水社之旅」是為田邊尚雄先作舖路工作，但也因此為台灣原住民音樂揭開神秘的面紗。

水社之旅成果豐碩，取得水社歌謠音樂十五首，計有單聲部歌謠十三首：＜落成式祝宴ノ歌＞，＜來遊ヲ誘フ歌＞，＜船漕ギノ歌＞，＜歡迎ノ歌＞，＜親睦歌＞，＜耕作ノ歌＞，＜鳥語ヲ聞イテ戻ル＞，＜出草歌＞，＜敵蕃追擊ノ歌＞，＜凱旋ノ歌＞，＜看護ノ歌＞，＜酬神＞，＜拔齒ノ歌＞；多聲部歌謠兩首：＜杵椿キ＞，＜杵ノ音律＞，全部列為 1922 年 12 月台灣教育會編纂發行之《蕃人的音樂第一集》，書中每首歌謠皆印製歌謠故事漫畫，十分有趣。張福興不僅是近代台灣第一位前往「蕃



張福興（第一排中間戴深色帽者）在地方官員陪同下，於日月潭水社採集原住民杵音樂曲。（1922 年 2 至 3 月間）
圖：張武男先生提供



地」採集歌謠音樂的專業音樂家，也為日本近代著名音樂家田邊尚雄的「蕃人音樂」田野之旅奠定不可或缺的前導性研究基礎。1968 年，六十四年之後許常惠、史惟亮、徐瀛州等著名學者專家、再度踏上同樣的旅程，自此更多的年青學者不斷加入行列，把這屬於口傳的天籟之聲、大地之音保存下來。



張福興（右一）率領旗下歌手及樂師在東京勝利會社灌錄流行小曲。（1934 年左右）
圖：張武男先生提供

1924 年元月，張福興編作「Chinese Music For Violin、Mandolin or Piano（為小提琴、曼陀林或鋼琴所作之中國音樂）」之《支那樂東西樂譜對照女告狀》出版。此書以近代音樂形式編纂，內分獻文、樂譜解說及樂譜三部分，其中樂譜部份為西方五線譜、數字簡譜及中國工尺譜的相互對照，張福興自行印製千冊發行，可說是將東方及西方音樂融合的一以大膽嘗試。

1935 年張福興擔任日本勝利蓄音器株式會社在台支部文會部長。勝利會社發行張福興編寫曲盤編號 F1001B 之新小曲＜路滑滑＞（顏龍光詞，賴氏碧霞演唱，勝利台灣音樂團伴奏），為勝利會社發行首張台灣曲盤；及曲盤編號 F1002A 面＜台灣日月潭杵音及蕃謠＞（張福興編曲，賴氏碧霞演唱，勝利洋樂團伴奏），B 面＜打獵歌＞，（即＜出草歌＞，張福興編曲，張福興演唱，勝利洋樂團伴奏）是水社之旅的成果。張福興在勝利會社任職期間，鼓勵旗下樂手創作流行小曲，此外，兼率歌手赴日，灌錄唱片。同年 3 月 31 日「台灣歌人協會」於台北市太平町沙龍奧稽三樓舉行成立典禮，流行樂界出席會員共五十餘人，是為盛事。而勝利所出版的兩張曲盤，是張福興為台灣近代音樂唱片錄製工作所盡的心力。

1951 年，張福興皈依佛教，晚年常攜手風琴遊訪桃園、苗栗、新竹各佛堂，聆聽課誦寫譜，留下佛曲採譜手稿四冊；第一冊一首，第二冊十四首，第三冊二十四首，第四冊二十八首，共計六十七首，為台灣音樂史留下另一份珍貴的田野採譜資產。

張福興一生，接受日式現代教育，返國後不僅在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方面展開扎根與推廣工作，他對原住民音樂、民間音樂、流行音樂及佛曲音樂的採集、創作、研究及近代化的改造，深深影響了近代台灣音樂史的發展

參 教育之貢獻與評論

張福興先生生於清光緒，成長及工作於日治時代，晚年時身處國民政府時代，政權的更迭，歷史的悲劇，使他一生中，現實社會價值觀念不斷的改變，張福興以其對音樂的執著，對台灣這塊土地強烈的鄉土情愫，走過艱難的學習經歷脫穎而出，是最傑出、最執著、最認真的全方位音樂家；他在教育、演奏、指揮、作曲及學術研究各方面均有所成。他的一生猶如台灣早期西樂發展的縮影，他是西樂傳入台灣初期最具影響力的音樂家。張福興由演奏傳統樂器到接受西式新教育，在殖民樂教政策的空間學習，返台後執教並深入社會，更體驗研究創作台灣音樂的重要。最後回歸宗教音樂，走完他傳奇的一生。

在教育方面，他因本身接受了完整的師範教育和音樂教育，所以在十六年國語學校的教學，五年左右在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以及短期於基隆高等女學校、台北第二中學校的歷程中，培育了無數正規且嚴謹的音樂老師，對近代台灣音樂發展注入堅實的競爭力，影響無遠弗屆；這段期間，張福興亦擔任台灣總督府和地方政府舉行的音樂演出會講師，透過演出及演講將近代音樂理念擴散全國。

張福興又常以身作則參與校內外各種音樂展演親自登台演出，包括小提琴獨奏、鋼琴獨奏形式不拘，並推出合唱節目或室內樂節目，又以音樂為主題舉辦各種恤災慈善音樂會，熱心公益，以音樂感動民心。張福興在那封閉的年代活躍於社會活動中是以「音樂」豐富社會，關懷社會進而導正社會善良風氣，突顯人性的真、善、美。1920 年創辦了台灣民間最早的西式樂團之一「玲瓏會」，在在都看見他在演奏方面的才能和開啟社會風氣之先的用心。

創作方面，張福興亦引領先鋒，留下一些作品，例如 1911 年為教學所需曾嘗試譜寫簡易交響曲一首，以及＜觀音靈感歌＞（1952）、＜台灣第一高等女



張福興（中坐者），蒞臨新竹「新埔音樂會」，與該會會員合影。（1918年9月8日）
圖：張武男先生提供

學校校歌＞（1929）、＜大同學校校歌＞（1948）、＜獅山聖地＞（1949~1950）、＜桃園楊梅中學校歌＞（1951）等歌曲，加上他編曲的作品也不少，為台灣西式新音樂的創作奠定了基石，爾後呂泉生、郭芝苑等人也陸續跟進。

學術研究方面，更是影響深遠；其一是 1922 年的《水社化蕃杵之音與歌謠》是台灣最早一篇原住民音樂的田野採譜。1986 年，六十四年之後著名音樂家及學者許常惠、史惟亮、徐瀛洲等再度進行田野採集，為原住民音樂研究打下基石也為台灣保留最自然的原音。其二是 1924 年發行的漢族民間音樂樂譜《女告狀》是台灣第一本工尺譜與五線譜對照之漢族民間音樂，也為二十一世紀的現在，建立台灣主體文化與音樂之際，提供最寶貴的原始資料。其三是退休之後，佛曲之採譜工程，留下四冊採譜共計六十七首，均為佛教的梵唄聲樂曲，這是他晚年對台灣音樂最大的貢獻。台灣佛曲的梵唄為口傳音樂，是一種沒有樂譜記錄以口傳授為學習方式的音樂，這樣的方式與基督教的讚美歌完全不同。基督教因有樂譜而能產生出具相對恒定的音樂風格和美學標竿。張福興的佛曲採集，提供台灣佛教音樂一些記錄的資料，由此基礎可以發展出更多的可能，以彌補口傳的缺點。

綜觀其一生，張福興由台灣傳統音樂入門、接受全盤西化的正統古典音樂教育，最終念茲在茲仍是「台灣音樂」的發展，他自認作為台灣的音樂家，對自已土地上所孕育出來的音樂在本質與形式上皆應面對近代化的衝擊，並以現代國際手法、保留本土特色萃取精華，再創新作才是根本之道。面對中國音樂與台灣音樂之密切關係，應有深切的認識，他一生勤於田野採譜，為的是嘗試將譜曲記錄與西樂結合，《女告狀》即是他將台灣支那郡傳統樂曲與西方近代音樂嘗試融合的一例。同時因為對原住民音樂之熱愛，任職勝利會社時將「蕃人」歌謠親自編曲錄製成＜台灣日月潭杵音及蕃謠＞，並率旗下歌手錄製台灣首張流行曲＜路滑滑＞，這兩張曲盤也是他的實踐。

有理想、有努力、有實踐、有成就、張福興他一生的貢獻，有目共睹，而他所打下之基礎提供我們後輩學習向上，研究探索的可能。所以我們稱他是台灣西式新音樂史上第一位專業的音樂家。

參考文獻

陳郁秀、孫芝君（2000）。**張福興－近代臺灣第一位音樂家**。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陳郁秀編（1997）。**台灣音樂閱覽**。台北：玉山社。

盧佳君（2003）。**張福興【情繫福爾摩莎】**。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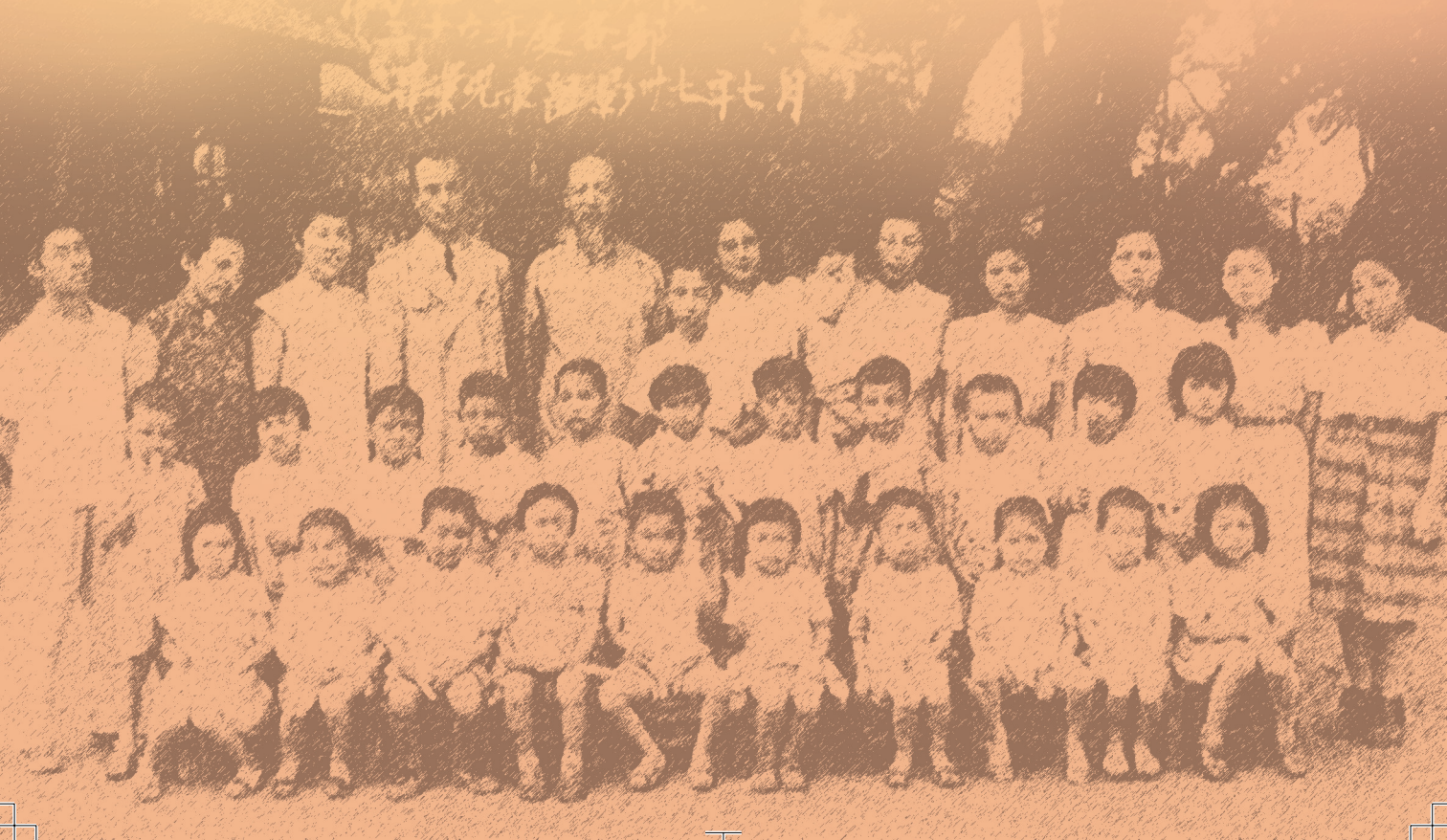
呂鈺秀（2003）。**臺灣音樂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張雪門（1891～1973）

台灣幼教傳奇

翁麗芳 撰文／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系教授



◆ 張雪門，1891（清光緒 17）年出生於浙江省寧波，1973 年逝於台北。

1967 年，張七十六歲，執筆《幼稚教育五十年》，自述二十六歲以前是家族長輩安排的人生，以後，是自己發現的人生。此時，張來台二十一年，右眼近乎失明狀態十五年，半身不遂七年。

張雪門享年八十二；借上述其自我回顧的人生切割，前二十六載在家鄉，是依著家族親長期望行動的人生；而後的二十六年上京，是擺脫家族束縛，立定研究幼兒教育之志，致力耕耘「中國的」幼稚園的人生；最後的二十六年，渡海赴台，秉建設「台灣」幼教之志，病體顫危，「隻眼隻手」撐持撰述，留史傳承。

以教育研究者臧否張雪門，可以定位其開拓中國大陸及台灣幼兒教育近代化發展之功；以師資培育角度研究張雪門，將注目其獨特的幼兒教師實習觀點與踐行；以近代中國人物論述張雪門，其一生可贊稱傳奇亦可嘆謂兩岸分隔的時代悲劇。

壹 生涯

開啟近代中國幼兒教育的張雪門，1930 年代與陳鶴琴（1892～1982）並稱「北張南陳」，二人號領中國的近代幼兒教育發展。生年僅一歲之差，二人同樣在傳統中國社會度過童年，在中年盛期活躍於中國幼教界，抗日戰爭之後，陳留居大陸，張渡海赴台，此兩岸分隔，卻演變成其後功名成就的明暗對比。陳鶴琴九十歲別世時具全國幼教研究會名譽理事長、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全國政協委員等高名，喪禮上九個兒女及數十子孫環繞之外，政教名流冠蓋雲集；早陳九年辭世的張，一女及學生淒清相送之外，未聞當朝顯貴置一言。兩人辭世二、三十年後之今日，中國大陸上「陳鶴琴教育思想研究會」以北京、南京為中心在各地積極辦理陳鶴琴教育思想研究活動，定期出版刊物，舉辦論文評選等活動，幼教工作者無不知陳鶴琴思想、事蹟者；張雪門在台灣僅一二歷史研究者繫掛，汲營奔徨於教育新潮中的幼教工作者，或知其名，罕追索其理念影響者。



然張雪門其人對於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幼教發展的影響確實不容抹滅。以下分寧波、北京[1]、抗戰、台灣四個時期追索其生涯。

一、寧波時期（1891～1920）

1891 年張雪門出生於浙江省寧波。張家是世代經營當舖的殷實人家，張雪門是五人兄弟裡的長子，年少時[2]父親過世，張雪門以長孫身分備受家族期待，延師授課，傭僕環伺，卻也親身經驗大家族裡男尊女卑，敬老卻以不合理方式教養小孩的封建遺風；這大約是張對於「二十六歲以前是老家給我安排的」生活喟嘆的由來。（張雪門，1969，[1]）

張在寧波家鄉渡過的成長時期一如明清典型仕途，先接受家塾四書五經刻板卻嚴厲的課讀訓練，再到鎮上鄮山書院就讀，再插班入讀浙江省立第四中學，畢業即受聘執教。省立第四中學畢業前後，張雪門成親，對象是鄮山書院老師的女兒，據說老師是前清貢元深喜張而許配女兒[3]。這在當時中國社會本不足奇，然而顯然張將此事列為「老家給我安排的」事件之一，才有後來又娶幼稚園老師的另一段婚姻[4]。



雪門先生早年獨照。（翻攝自「張雪門先生紀念專集」）

寧波時期傳奇

1916 年，張雪門依傳統虛歲算法二十六歲，傳奇性地邂逅了「幼稚園」，啟開其後幼稚教育人生之門。當時張之長子香山兩歲，孩子頭上長了癤子，一日，張帶孩子搭火車到慈谿的醫院去醫治。慈谿比起寧波是交通、資訊便捷的都會，文風盛，當時尤其多留學日本青年，醫院、學校，甚至當時希罕的幼稚園的設立都是開風氣之先。

---

1. 本稿地名之使用依憑史實；於 1927～1949 期間稱「北平」，餘稱「北京」；而重疊時期者以「北京（時期）」稱。
2. 據張雪門著《我的童年》，父親於十三歲時過世。
3. 張雪門著作雖偶有述及子女，但對於兩段婚姻無片紙隻字描述。此鄮山書院老師成為岳父事乃張之長子香山先生覆信翁時所述（書信日 1988 年 11 月 26 日）。
4. 同上注。

「到醫院時，本地人早已掛上號了。那時候醫生還沒有開診，我怕孩子不耐久等，便帶他出來，在醫院附近溜達。」走著走著，孩子突然在一個祠堂前佇立不動了。原來，祠堂裡是個幼稚園，「一位年輕的女教師領有八九個孩子在做遊戲。」（張雪門，1969，[2]）

偶然邂逅「幼稚園」促使張雪門開始收集幼稚園相關資料。1917 年張隨著寧波舊府屬的江蘇教育參觀團參觀上海、南京、無錫、蘇州、南通，見識最先進的各種不同的幼兒教育：有仿自日本幼稚園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操作恩物的「蒙養園」（無錫競志女學蒙養園），也有教會式的，彈琴唱平安歌，又活潑又有韻律的幼稚園（蘇州景海幼稚園）。參觀團回到旅館後屢屢針對各種型態幼兒教育優劣辯論，激發張雪門對幼兒發展、幼兒教育的興趣，開始購讀相關書誌。1917 年，張也在家鄉寧波創辦星蔭幼稚園，而後又和友人合辦培育幼稚師資的星蔭幼稚師範學校[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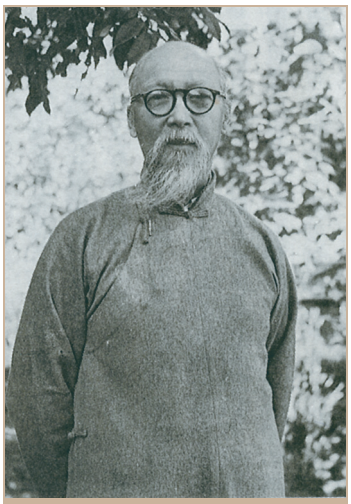
二、北京時期（1920～1937）

1920 年，29 歲，張雪門帶著朝教育之聖取幼教經典的念頭上北京：「北京原是全國首善之區，而且離天津又近，蒙養園和幼稚園比任何地方多得多」（張雪門，1969，3）。當時已經成家，在家鄉擔任過小學校長，辦過幼稚園及幼稚師範的他，先到新教育名校孔德學校（首任校長蔡元培）擔任小學部主任，1924 年進入北京大學（簡稱北大）擔任註冊課職員。台灣光復後報界聞人洪炎秋，1925 年進入北大教育系就讀，這樣形容當時的張雪門：

「每上教育功課的時候，總有一位註冊課的職員，在他點完了由他擔任點名的各個教室以後，就走進我們的教室，找個位子坐下，低下腦袋，專心一意，聽功課，記筆記。這個職員比我們學生約略大十來歲，瘦括括的一張淨白臉孔，配上他時常穿的那件灰色長掛，顯得既瀟灑，又厚重」[6]。

---

2. 據張雪門著《我的童年》，父親於十三歲時過世。
5. 有關星蔭幼稚園、星蔭幼稚師範學校資料來自張香山，推測民國初年新制學校制度初出現於中國大陸，張雪門以一己對幼稚園摸索中的興趣以及數年小學教學經驗，在鄉里仕紳的資助下試辦星蔭幼稚園及其人才的培訓機構「星蔭幼稚師範學校」；當時尚未訂有幼稚師範學校相關法規，如張雪門等有志教育者自行開辦學校者非罕；而張的著作中未有提及星蔭幼稚園、星蔭幼稚師範學校者，亦可藉為推斷張自身視此最早期的教育實踐經驗不夠成熟，不值錄述。
6. 此段文字取自於張雪門著，1970 年文化圖書公司出版的《我的童年》，洪炎秋撰寫的「序文」部分。



灰布長袍，長鬚飄髯是雪門先生的「固定形象」。
圖：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提供

長袍馬褂，瀟灑頎然的讀書人氣韻是友人、學生眼中張雪門的固定形象。北京時期、抗戰時期以至張晚年台北育幼院時期的學生及院童，回憶起「爸爸媽」、「老院長」都是灰布長袍、長鬚飄髯的描述。

北平時期傳奇

張雪門進入北京大學，以職員身分旁聽教育系課程，展開幼兒教育理論學術研究又是另一則傳奇。

在一次參觀博氏幼稚園（後來「王府大街幼兒園」）後，偶然發現包花生米的紙竟是福祿貝爾（F.W. Froebel）教育講義，張雪門從這張紙追到福祿貝爾《母親遊戲》的注解本，「我無意中得到這本書，喜歡無量，進出都隨身帶著，遇空研讀」（張雪門，1969，4），鑽研過程中得著當時北大教育系主任高仁山的鼓勵，張一方面執筆翻譯福祿貝爾原作，一方面日以繼夜整理思緒、蒐集資料，研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教育。高仁山除了提供自己遊歷日本、英國考察幼教的筆記資料，還為張借來兩本蒙台梭利原著作的英譯書，張因而在「中華教育改進社」發表「蒙台梭利及其教育」讀書報告；四十多年後，張在台北公開講演「蒙台梭利教育的影響」。

高仁山創辦道爾頓制實驗學校的藝文中學（後來的北京二十八中學），邀張雪門辦理藝文幼稚園。北平時期前期這一段接觸全中國（亦是全世界）最先進教育理論的經驗，應是影響張雪門後來（直到台灣）辦理幼稚師範教育的重要經歷。

1928 年，孔德學校開辦幼稚師範科，併設於高中部，張雪門離開北大應聘孔德幼稚師範科主任，亦有稱此為孔德幼稚師範學校，稱張為孔德幼稚師範學校校長者。這一年張和幾位朋友成立了「北平幼稚教育研究會」。

孔德幼稚師範學校經營兩年後，1930 年秋，張雪門受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長熊希齡 [7] 邀聘編輯幼稚教育叢書，同時在香山慈幼院開辦幼稚師範學校，通稱「北平幼稚師範學校(北平幼師)」或「香山幼稚師範學校（香山幼師）」，是香山慈幼院五校中的第三校 [8]。此時香山慈幼院的實際經管者是熊希齡長女熊芷，熊芷 1927 年方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修得社會福利碩士學位返國，一方面與當時同樣自美歸國的新教育學者陶行知、陳鶴琴等組織「中華教育改進社」，推動新教育，一方面接手香山慈幼院的經營，藉慈幼院當中的學校、兒童撫育、安置機構的辦理，試行理想的兒童福利制度的實踐。香山慈幼院第三校，即香山幼師，是中華教育改進社創辦的實驗學校，張雪門在高仁山引薦下加入中華教育改進社，大約也因此識得熊芷，受薦熊希齡。香山幼師創辦地點是離北平二十公里的香山靜宜園見心齋，採二年制，招生一班，21 人。張雪門稱此創辦時期的課程為「半道爾頓制」，除了「幼兒遊戲」、「美術工藝」等課程是在教室講授之外，所有科目都採自動、合作、自主學習方式：每個月發給學生課程指導書，老師按日課表時間出席教室備學生諮詢，而學生自由出入，自主安排進度。此時張到北平十年，浸淫在當時教育學術界研討熱烈的美國新教育、進步主義思潮中，也參與應用美國的設計教學法、道爾頓制於中國小、中學實務的實證研究。香山幼師之實施道爾頓制，重視幼師生行為實踐以為吸取知識、技能、習慣、正是進步主義「做中學」的主張。見心齋因為地點偏僻，除了原來慈幼院的院生/學生住校之外，任課教師們也幾乎都住校，師生相處時間長，但是第二年，香山幼師遷校到市中心的帝王廟，因為交通方便，教師們多改為通勤，依授課時間來校，主張自由式學習的「半道爾頓制」因此無法撐持繼續。

1934 年春，香山幼師改二年為三年制；張雪門聘上海工學團（陶行知創辦）戴自俺到幼師帶三年級師範生與北大農學院合作，在北平埠城門外羅道庄開辦「鄉村教育實驗區」，設農村幼稚園、兒童工學團、青年工學團、婦女工學團等。目的是要將上海工學團的「鄉村幼兒團」（簡易式幼稚園），「藝友制」（速成式幼師訓練）經驗實驗於北平；北平市裡香山幼師也實施「特約幼

7. 熊希齡乃民初財政總長、國務總理，1917 年因華北水災，熊為收留水災孤兒而創辦香山慈幼院。
8. 香山慈幼院五校：一校為嬰兒教保院和蒙養園；二校為小學；三校為幼稚師範學校；四校為工徒學校；五校為工校。



稚園」實驗：城裡的幼稚園（如藝文幼稚園）是以中上家庭為對象，只有上午活動；香山幼師則借來利用下午空檔實施以一般家庭為對象的「平民幼稚園」；又安排香山幼師三年級學生在畢業前半年到慈幼院嬰兒教保院（第一校）及天津南開小學實習。總之，張雪門網羅各種資訊，構建各種實習場域與方式，讓幼師學生印證兒童發展理論。學生們在後來回顧此時的求學生活仍謹記張「不讀死書，要念活的課本－實習」（池寶華，1974，119）的教誨，對年不到半百，灰布長袍鬍鬚飄髯的張雪門愛敬有加，呼稱「爸爸媽」（參見下文肆之一）。香山幼師的自由人文氣氛可推想而知。

香山幼師是張雪門成就其教育理論的重要時期。雖然是其幼教人生的開端，然堪稱其終身教育理論主軸的「行為課程」架構已在此時期成形，邁入實驗、踐行階段。

三、抗戰時期（1937～1946）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日益強化侵華行動，華北地區首當其衝，身在北平的張目睹街頭日人猖狂，兒童受惑模仿，逐漸孕化出「民族改造的幼稚教育」觀，1937 年 7 月蘆溝橋事變後，日軍進入北平，對於深感民族存亡危機的張而言，留居北平，聽命日人是不可忍之事。在取得慈幼院熊希齡的同意後，8 月，張雪門潛走上海。張與熊希齡商議在不受戰爭影響的南方，湖南，讓香山幼師復校，遂朝湖南長沙出發，而在長沙覓得校地正要開始復校工作時，長沙遭受日軍猛烈空襲，思考即使復校於長沙，亦招收不到學生，此時接到廣西省教育廳的邀請，張遂決定停止長沙復校計畫，改往廣西桂林。桂林雖然生活安定，卻是貧瘠之地，張再度回返長沙等候熊希齡同意桂林復校計畫，此時，卻透過報紙傳來熊希齡逝去消息。1937 年除夕，張離開長沙，由廣州搭船到香港參加熊希齡喪禮。喪禮後，張得到熊遺孀毛彥文（接任香山慈幼院長）對於香山幼師桂林復校計畫的同意，並受任香山慈幼副院長職。1938 年 2 月，在廣西省教育廳的協助下，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成立，開辦幼稚師範部（即香山幼師桂林分校），繼而 4 月在柳州開辦小學，成立香山慈幼院第二校桂林分校。

隨著戰火的延燒，1939 年張雪門帶著香山幼師由桂林移轉古宜、丹洲，1942 年 1 月再回桂林，所到之處皆致力於幼教師資培育與幼稚園事業的開拓，然於開拓的艱苦過程中，張興起經手、規劃錢財事情複雜，不符本性的感慨。此時陝西省正成立聯合河北省女子師範學院與北平師範大學之「國立西北師範學院」，擬在家政系設家庭教育實驗區，邀張雪門主持，張順勢以廣西省幼稚師範教育事業已告一段落為由，向香山慈幼院請一年假，1942 年 8 月應聘赴陝西。在西北師範學院講授「兒童保育」、指導家庭教育實驗區一年之後，在香山慈幼院復職的催促下，1944 年張赴重慶與熊芷會商。此時熊芷負責設在漢口的戰時兒童保育總會，推動以戰時孤兒為對象的「兒童保育院」工作，張因此在重慶不但負責香山幼師的復校以及協助兒童保育院的發展，同時也參與以最少經費普及幼兒教育的「幼兒團」工作。以張而言，幼師培育的「做中學」及普及幼兒教育的兩大理念再度易地實驗、踐行。

1945 年 8 月 10 日，日本敗戰。1946 年 1 月 1 日，張從重慶搭機歡喜返北平。

四、台灣時期（1946～1973）

1946 年 7 月，張雪門帶著女兒張玫搭機離開北平，經過上海，23 日搭船到了台灣。船上吟成詩：

「八年離亂渾如夢，猿鶴蟲沙自不同，投老南來多感慨，河山長在淚痕中」（張雪門，1969，72）

張之離開北平乃因香山幼師復校計畫無緒，失志之餘，接獲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兒童保育院院長之邀，遂決定赴台。1946 年 11 月 1 日，張雪門上任「兒童保育院」院長，當時此院不但人事、設備全無，連場所都還沒決定；幾經討論後，張選擇台北北投為保育院地點，興土動工的同時也定下小學、幼稚、育嬰三部的組織架構，開始人事、課程等各方面籌辦工作。此縱向發展的三部組織在 1949 年 2 月奉令改為總務、教保、衛生、社會的橫面四部組織，有違張的原來構想。1947 年 4 月，「兒童保育院」改名「台灣省育幼院」，接受全省各地孤兒。1948 年 1 月，台中、高雄成立育幼院，台灣省育幼院遂改名「台灣省立

台北育幼院」。台北育幼院於 1946 年 11 月開辦幼稚部，由香山幼師畢業的姚潤珍 [9]、袁孟英、李蟾桂負責；李蟾桂後來轉任台北師範專科學校（後來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現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實驗小學附設幼稚園主任。

1947 年 8 月，張雪門返大陸招募一同建設保育院人手，候得香山慈幼院學生池寶華、李蟾桂、華霞菱一同來台。華霞菱先追隨張在台北育幼院小學部任教，也負責導生班培訓少年幼教人才工作，1957 年隨家人搬遷新竹，轉任新竹師範專科學校（後來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現在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幼稚園主任，在竹師附幼實施張的行為課程。



1949 年張雪門院長（前排左二）與院中教職員合影。圖：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提供

「當時社會上一般人只有孤寒的注意，卻忽略了正常和特殊的應有區別」（張雪門，1969，74）。張雪門一邊募款、覓足夠辦理嬰兒至小學教保的場地，一邊要募集兒童來院，更要思考如何設辦合理的、合需求的育幼院。對於當時的台灣民眾而言不僅不知保育院、育幼院為何物，不通台語、不諳日語的張雪門儼如異國來的奇特份子。張欲在當時的北投踐行其教育主張，為台灣推動幼兒教育，協助民眾解決兒童教養問題實為難事。1946 年 12 月，張依據救濟總署台灣分署的統計報告，派一名醫師一名護士前往彰化接收中部地區估計有四十名的孤兒，「花了一個星期工夫，僅僅收到了三人，足見人民對政府疑懼的觀念尚未消除」（張雪門，1969，74）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張雪門等大陸來台、不通台語者處境艱難。北投居民知曉張之為人，安排張暫離保育院隱匿避風頭。然保育院內院童亦受風潮鼓動，小學部南部來的學生鬧回家，院內教師勸阻無效，急電張請示，「我想，從"二二八"以來，南北鐵路交通完全斷絕，到現在還沒有恢復。如果讓他們去，到了半途走不動了，勢必哭泣。路人如果知道是從本院跑出來的孩子，

9. 姚潤珍於 1 年之後，1947 年 9 月 16 日離職。由其香山幼師同學的袁孟英、李蟾桂接手。

總以為遭受虐待，那麼，本院的前途還堪設想嗎？我趕緊離開自治會館，剛走到鎮公所附近，碰見了老楊先生（本地人），他看我獨自走路，很驚訝地說，〝喂！和平了嗎？〞我只好含糊答應了一聲，仍向前行去」（張雪門，1969，75）

張返院親自與院童對談，先讓院童理解院方無攔阻之意，平服院童心緒，共同討論出由院童自己寫信給家長，請家人來帶回家的決定。過三週，諸家長推派一父親來。張指示同仁讓家長與院童共同起居生活，「一概據實答覆，不必掩飾，也不必和他說理」，結果兩天後，父親要離開了孩子全留下，那父親走前與孩子們相擁泣：「因為家裡貧窮，才送你們到院裡來受教養。院裡的衣食一切全比家裡好得多，而且還有書讀，病時還有醫藥，向這樣好的地方不會享受，還想到哪裡去呢？」（張雪門，1969，76）此二二八餘波事件對證出張的平實溫煦行政風格，張不但發揮領導人的果斷，化險為夷，更贏得人心。

光復初期的台灣，一般生活物質匱乏，出現棄養嬰兒問題，張思考「育幼院可以關起門來，當作封建時代的慈善機關，如殘留的育嬰堂孤兒院」（張雪門，1969，83），但是張認為新時代的育幼院當打開門，配合社會積極建設。當時經費拮据，申請入院者眾，又逢物價攀騰，於是 1950 年成立家長會，「會員本身，多半貧寒...家長的關心子女，何嘗會弱於我們。然而知能不同，對事對人有多少的距離」（張雪門，1969，87），張決定從家庭補助中開始實驗親職教育。換言之，張所經營的育幼院，一方面是收容無依兒童，一方面接受家庭有狀況兒童寄養，並且也開放社區接送幼兒上幼稚部，也運用做學教合一方法在院內外辦理導生班、幼兒團、兒童團，不但培養院童一技之長，也服務北投當地，成立「兒童福利協進會北投鎮分會」，台北育幼院「居然建樹起一個具體而微的兒童福利中心」（張雪門，1969，90）。

創辦育幼院之外，張雪門也受邀台北女子師範學校（後來之「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現在的「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幼稚師範科授課，參與、指導「中國幼稚教育學會」的幼教推廣活動。1950 年起張雪門以通信方式指導台南師範學校幼稚師範科進行行為課程實驗。1952 年張親赴台南師範學校三週，為暑期講習會授課。1952 年青光眼開刀。



1953 年張退休，台北育幼院及台南師範幼師科的行為課程實驗繼續進行，張雪門透過當面以及書信報告方式繼續指導，目的在：一方面訓練實際在幼教現場的工作者（台北育幼院的「導生」），另方面「對現任教員又可以作提高素質的修養」（張雪門，1966，序）。1952 年 10 月《幼稚園行為課程》在台灣初版；1966 年 8 月，《增訂幼稚園行為課程》初版。

退休後的張兩袖清風，搬離宿舍連住處都成問題。先有友人出借小房間供住，而後是王介容、李蟾桂、華霞菱等門人不忍終身奉獻教育的恩師晚年竟居無定所，集資於北投大屯山麓興建一屋贈，張稱此石頭建材之屋為「石室」，石室之小廳名「誰來堂」，約有今日此堂屬我，他日又不知此堂屬誰的無常感慨（台靜農，1973，1445）。

1953 年空軍婦女反共聯合分會在台北設辦「空軍子弟育航幼稚園」，為了照顧更多的軍人子弟，1954 年春，在劍潭成立「第一幼兒團」，其後，國防部在各眷村普設幼兒團。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妻尤祥雲委請的推廣幼兒團主事者，王介容是空軍眷屬也是香山幼師畢業生，1949 年來台後也曾投訪台北育幼院，張指命其推動台北育幼院幼兒團工作。有此淵源，張樂見國防部的幼兒團普設計畫，不但親自擔任顧問參與，並且 1954 年 10 月開始主編《幼教輔導月刊》，刊載幼兒活動教材，並且藉書面傳遞幼師教學、親師溝通技巧以及深入淺出的幼教理念；1953 年 9 月 28 日至 1954 年 6 期間，張並且在《中華日報》擔任每週一「幼教之友」專欄編輯，書寫「幼教問答」等幼教師參考文。1960 年 7 月 19 日，張正在準備《幼教輔導月刊》第 72 卷發行工作，中風昏迷，送醫急救。月刊第 72 卷 8 月號成為最終的休刊號。《幼教輔導月刊》編輯期間，張還接受僑委會邀請，執筆《函校通訊》，為華僑提供幼教理念。出院後的張半身不遂，卻重新學步，終至可以自行坐起，自行走路，精神復原，而行動卻從此不便。



雪門先生於北投大屯山石室外獨影。
圖：王靜珠女士提供

1972 年 4 月 15 日，張逝於台北和平醫院。人生最後十載歲月，出入醫院，偶有學生、客人來訪，也偶有門人故舊等合力扶帶張到溫泉旅社沐浴，然門人以足不出戶於石室形容之。

五、生涯回首

張雪門的一生，北京時期，應該是重要的轉戾點。上京之前是依家族親長期望行動的人生，北京之後是避秦禍顛沛流離生活，渡台後，又遭病恙，力不從心。下面兩段文字正可為北京時期的關鍵意義做個對證：「父母因我在本房裡是長孫，進出都派人監護，要出門先須換衣，寬和溫柔，與人無爭...直到了四十七歲，退到大後方，才遭到各種困擾」（張雪門，1982，92）四十七歲，正是 1937 年，開始抗戰流亡生活之年，除教導學生之外，肩挑慈幼院興辦等行政角色時期。

另一段初到北京時對於幼稚園教師角色的觀察文字：「教師對孩子們的態度，在南方時我只知道一種高高在上教學生的尊嚴態度，此外只有眾星拱月一般和藹態度。但在北京卻發現教室裡孩子們各玩自己的教具，教師只記自己的筆記，彼此不相過問的冷靜的態度」（張雪門，1969，3）

第一段是回溯生活處事經歷，第二段是在幼兒教育研究上的視點轉折，北平歲月，顯然成為張雪門人生關鍵。

貳 張雪門與「中國的幼稚教育」

1919 年的五四運動被視為是科學、民主的近代思潮進入中國的劃時代事件，此新思潮以美國文化為主，也包含進步主義、學生主體的「新教育」思潮。1919 年，正是張雪門定居北平的前一年，還在家鄉執教小學，正摸索幼稚園、幼稚師範教育實務。

張雪門與齊名的陳鶴琴、陶行知都是推動近代幼兒教育、學校教育扎根於中國的重要人物。中華教育改進社（主任幹事陶行知）是當時中國教育界的領導組織，以陶行知、陳鶴琴、高仁山等留美青年學者為主要成員，發行《新教



育評論》雜誌，向中國教育界介紹兼且試行美國「新教育」理論在中國實施可能性的實驗。陶行知、陳鶴琴不但引介美國「新教育」，擔任 1919 年起兩年期間美國新教育學者杜威（John Dewey）在大陸講學時的翻譯，也是後來推動「平民教育」的聞人。1927 年，陳鶴琴、陶行知等發起成立「中國幼稚教育研究會」，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幼教研究團體。留美學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的陳鶴琴投入此研究會活動對中國幼兒教育學術研究是一大刺激；此後陸續有「中華兒童教育社」等各種兒童教育研究團體的出現，呈現二戰前中國教育界熱烈兒童研究的風潮。

張雪門活躍於華北，陳、陶以華南為主要舞台；張受教高仁山，間接接受陳、陶的西潮薰陶，但幼教師資培育的踐行，以及對於鄉土的親近與專注甚於陳、陶。陳自抗戰後也重視幼教師資培育，也開辦過幼教師範學校，然在 1919 年自美歸國的前十年專注於中國兒童發展理論。張、陳、陶在同時代的中國大陸各立下豐碩輝煌的教育偉業，三人事業交集於「平民教育」、「平民幼稚園」、「鄉村幼稚園」。

試以「奠定中國本土幼教發展根基」、「研創『行為課程』」、「倡導兒童本位與民族本位幼兒教育」、「倡導重視幼教師資培育」四大貢獻論評張雪門與「中國的幼稚教育」。

一、奠定中國本土幼教發展根基

1930 年代，幼兒教育界「北張南陳」的美稱已形成，張雪門與陳鶴琴，一北一南，各領風騷。

當時大都會裡幼稚園、蒙養園已漸增多，然而內容多模倣日本或直接間接取材自西洋傳教士翻譯之作：「我常從幼稚園和小學校的遊戲中，搜求現時一切的教材，除少許自己的創造以外，大半都是由於外國翻譯出來的。這些翻譯的原料，不論感覺的、節奏的、矯正的、計數的，以及一切的表情的遊戲，可說幾乎全出於各國地方民間的流傳；…為什麼外國民間所流傳的遊戲可以充幼稚園和小學校的材料，中國的倒不可以採用呢？」（張雪門，1930a，565）

對於當時模倣日本的幼稚園，張雪門批評教師只知模仿談話遊戲等日本式之技術，不知其意義；對於直接間接效法西洋的幼稚園，張雪門指出缺陷：「㈠效法西洋，直接者較少，大多出於留華西教士之指示（我國近年來雖不乏外洋求學之士，但為數過少，其影響不在此），兼以時間過短，故僅模仿其皮毛，而未窺其原則。㈡且各種制度具有時間空間之限制；教育亦制度也，故不能離環境而獨立。模仿抄襲，自難合於國情。㈢模仿之弊易流於機械，馴致屏棄本國有用之材而惟外人之馬首自瞻。」（張雪門，1930b，112）

1927 年，陳鶴琴在《幼稚教育》月刊創刊號上提出十五條適合中國國情和兒童特點的幼稚園的具體意見「我們的主張」；同一年在《教育雜誌》上發表的〈幼稚教育之新趨勢〉中，也同樣表達對於當時幼稚園束縛於模仿，忽視周圍的自然及社會環境的不滿。

張雪門因緣際會，生逢西方的「幼稚園」教育理論傳入中國之時，幼時飽覽中國經書，及長得親近西方實驗民主、科學的教育理論機會，在其未曾輟斷的幼教推展及幼教師資的培育工作中，張氏幼兒教育、幼教師資培育理論醞釀、浮現的同時，奠定中國本土的幼教發展根基。

1994 年，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由張雪門當年舊屬戴自俺、學生金恆娟等組成編輯委員會編纂《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在編者說明中除了讚揚張「治學嚴謹、著述豐富」外，「特別是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幼兒教育事業，有重要的參考借鑑價值。」今日中國大陸的幼兒教育事業繫連於戰前張、陳、陶教育奉獻的事實無法抹滅。

二、研創「行為課程」

「行為課程」是張雪門的幼兒教育理論，研究起始於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其後又有「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主張的發表（1933 年提出於北平，見下文），而此種種思想的精進皆延伸成為後來「行為課程」的理論基礎。依張的詮釋，行為課程乃本於王陽明的「行乃知之始，知乃行之成」及杜威的「學本於做」思想，溶合儒家知行合一與西方近代經驗主義哲學形成其幼兒教育觀。



雪門先生重要著作。

張雪門主張幼稚園透過自然的生活過程幫助孩子成長，「行動」是幼稚園課程設計的唯一原則，是連結幼稚園教材與教法的主要中心；幼稚園教師必須研究幼稚園課程的內容與方法，此不僅幫助孩子成長，也是教師自身成長的主要途徑。

張雪門將幼稚園裡教師與幼兒的角色關係分為管理、教導、養育、衛護四者。養育和衛護是指教師提供安全、衛生環境、保障幼兒身心健全的發展。管理之目的在使兒童養成有規律之生活習慣。管理之方法乃由教師計畫，兒童組織（師生共同商議），然後教師以身作則和兒童一起做。教導（不同於「教學」）的目的在使兒童學習新事物，強調幼稚園教師必須在勞力上勞心。事先準備、臨時指導、事後批評與記錄是三個必要的工夫。每一行動都必須有重點有步驟。步驟分：動機、目的、計畫、實行、批評五步。前三者是教師用心又用力；實行是兒童用力，教師用心；批評教師與兒童都用心。所以教師光用心或光用力都不行，心、力太過也未必可收回成效，在勞力（實施）上勞心（應用理論）才是最理想，最有效率的。

幼稚園教師當研究幼兒的身心發展，從幼兒的生活中取材、設計、引導幼兒的行動、紀錄、評量，此循環是為「幼稚園行為課程」；而幼教師資培育也當運用行為課程，讓幼師生思考問題、試作、再思考、再討論，這就是「幼稚師範行為課程」。總之，行為課程主張有意義的行為，所以必須透過思考，這樣篩選之後的行為才有學習的價值。

三、倡導兒童本位與民族本位幼兒教育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張體悟「中華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關頭」，幼兒教育當幫助兒童成長，但不應完全以兒童為本位；當以民族的存續發展為目標，研究幼兒教材，組織幼稚園課程，以引起兒童貫徹教育目的的各種行為。促成

張民族本位幼兒教育發展的直接因素是 1933 年香山幼師帝王廟時期的幼兒遊戲事件。

一日下午，張雪門到藝文幼稚園，老師敘述當天上午幼稚園幾個小孩手持棍棒自稱「我是日本浪人」玩鬧，勸阻無效經過。張因此深思幼兒的模仿，「即使處罰或講解，以落在第二義，必須予以較高的觀念，否則下一代的前途將不堪設想」，因而提出「民族改造的幼稚教育」，目標在於：喚起民族自信心，剷除民族劣根性，培養客觀態度、團結習慣、自動能力、勞動生產的興趣，向帝國主義奮鬥。使用鄉土流傳故事與名人童年故事為教材，讓兒童產生敬仰先人之心，提升民族自信心；進行投環打球、秋千浪木的體能活動，鍛鍊/訓練幼兒眼力瞄準與四肢平衡感等技能，強健體力。

1933 年張提出「民族改造的幼稚教育」，1937 年 7 月 8 日，在北平召開的教育學會及中華兒童教育社年會中針對學前幼兒應否注意民族改造問題熱烈辯論，而其後蘆溝橋事變起，戰況愈趨激烈，更加強張改造民族以救民族的信念。

張雪門在《幼稚教育五十年》中記載了此時期他和熊芷對於香山慈幼院蒙養園實驗民族本位幼兒教育的辯論以及蘆溝橋事變後，他帶著一個小女孩在北平到天津的火車上遭遇日本憲兵的驚險經過，申張其民族本位主張的應然意義。當時熊芷結束美國留學，考察歐洲後返國。返國後一直居住南方[10]的熊芷，1937 年春，突然回到久違的北平香山慈幼院，「聽見蒙養園小朋友的〝打倒日本〞的歌聲，又從連、安兩位教師知道正在實驗民族改造的幼稚教育，見了我就說：〝現在蒙養園所施的教育，從我們大人看來，不過是提倡民族精神，但傳到孩子們，就變成了一鬼子頭當皮球，我要剖鬼子的心，抽鬼子的肚腸，未免太殘忍了。〞」（張雪門，1969，23）張雪門分析熊芷對華北情形隔閡，而有此想。

這一年 7 月，蘆溝橋事變，張雪門在教育學會及中華兒童教育社年會上提出的學前幼兒民族改造問題辯論未決，8 月，張決定離開已受敵軍監控的北平，計畫路線潛逃上海。臨走前，受託帶蒙養園當年畢業生慶寧。當天，到了車站，

10. 推測「南方」是指上海。



「日本憲兵和偽警分列兩行」，人人自危。在等火車開行時，「慶寧一個不小心，把小銀幣掉了。大家都幫著她尋覓，怎麼都沒有找到，急得慶寧直想哭。有一個日本憲兵給了她一個雙毫的日幣，她才不做聲了。憲兵叫她唱歌，她唱了。又叫她再唱，她也唱了。唱了又唱，我心裡萬分焦急…好容易等到火車開動...到得天津法租借時，是已經開燈了…我問慶寧，怎麼不唱打倒日本。她說：〝我不敢〞。」張雪門因此堅定民族本位幼兒教育的實驗是成功的：「孩子自有思考，適應環境。而且民族改造教育第三條目標，原是培養民族客觀態度，本是不斷地須用思考的...前些時，有些大人們對於兒童的種種疑猜，實在是多餘的。」（張雪門，1969，27）

張註明 1971 年 6 月 26 日執筆的「志道依仁」，文末寫下：「適應兒童、接近兒童、發現兒童、再把握兒童以求進展」（張雪門，1982，184）

四、倡導重視幼教師資培育

張雪門的幼教師資培育理念可歸結為「行動中心」與「民族改造」兩大理念。行動中心即是「行動中學習」的原則，包括：實習中心、生活教育、教學做合一的三個理念，也就是張雪門研創的行為課程的實施原則。重視幼兒教育，希望藉幼稚園教育的普及、推廣，進行「民族改造」；而欲普及幼稚園、幼兒教育，就必須培育師資人才。張雪門身體力行其追隨先哲的「知行合一」、「做中學」、「學中做」，不放棄任何培養幼教人才，推廣幼兒教育的機會。身體狀況尚好的在台前期，在繁忙的台北育幼院擘劃工作中規劃幼兒團導生班的小學畢業程度的幼教人才，也在台北女師及台南師範幼師科執教，培養專科程度的幼教人才。二者學歷上雖有軒輊之分，然張均秉實習中心原則，兼以啟發討論，諄諄善誘。1953 年張退休，張透過當面以及書信報告方式繼續指導台北育幼院及台南師範幼師科的行為課程實驗，目的在培育師資人才，一方面訓練實際在幼教現場的工作者（台北育幼院的「導生」），另方面「對現任教員又可以作提高素質的修養」（張雪門，1966，序）。這些書面對談資料便彙整成書藉以擴大為用：1952 年 10 月《幼稚園行為課程》在台灣初版，1966 年 8 月，《增訂幼稚園行為課程》初版。

1952 年 3 至 9 月，張接受社會處委託辦理「保育人員訓練班」又是別於師範幼師科與育幼院導生班的幼教師培訓。利用台北育幼院的幼稚部的「幼稚園和全托的雙重現成的環境，運用做學教合一的方法，六個月內修完了參觀、參與和支配三種步驟」（張雪門，1969，90）。張對於訓練班全員二十人除三人因調訓關係返原職之外，十七人都由台北育幼院完全介紹出去，其後甚至還有機關來函邀聘之事難掩欣喜。無論何種背景，張一秉取用當地人才，就地辦理幼兒園，做學教合一，學歷背景或許不高，然訓練顯然嚴格，藉挑培育人才重擔。

今日中國大陸上眾所稱揚的幼兒教育家陳鶴琴，歷史定位之一是 1940 年創辦中國史上第一所公立、專設的幼教師資培育機構江西省立實驗幼稚師範學校；然而早其十二年之前，張雪門不但開辦孔德幼稚師範學校，並且發展出「騎馬應從馬背上學」的半日授課半日實習的幼教師資培育理論與教材；這個重視實務實習的幼教師資培育方式，隨著張的足跡，一方面從華北播種到廣西、陝西、重慶、台灣，也因地制宜，做出鄉村幼稚園、平民幼稚園、幼兒團種種不同程度幼教師培育的對應。台靜農便稱讚張雪門具備教育家學問、理想、實踐的精神，一生「學」「行」未曾分開過，所到之處便播下幼稚教育種子，「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有一批弟子與他共甘苦」（台靜農，1973，1442）

參 張雪門與「台灣的幼稚教育」

張雪門在台的幼教生涯，可比擬為本土化、民主化，以及「兒童本位」幼稚園課程的播種、耕耘；另一方面，張逝後，1980 年代迄今台灣本土化幼兒教育的飛躍性發展，可視為萌芽後的茁壯成長。

張雪門在台灣，雖然時運不濟，正是歷經少年（寧波時期）的實際經驗、中壯年（北京時期、抗戰時期）的研讀與開創理論之後，醞釀畢生學術與實務鑽研成果時期；時運不濟，是指日治與國府交替，正逢台灣近代史上最動亂時期，社會未能理解幼兒教育，當權者無緣賞識幼教先驅張雪門。於張個人而言是未能居要職有所發揮，然台灣幼兒教育的歷史發展而言，此時期因有張的親手指導、踐行幼兒教育、親筆留述台灣幼兒教育的紀錄、批判與期許，張雪門



「批判日治時期教育」、「奠定幼兒教師專業」、「留史傳承，植根鄉土幼兒教育課程」、「強調幼兒教育目的」、「開路兒童文學」意義重大。

一、批判日治時期教育

1946 年二二八事件後，張雪門撰寫了一篇「救救台灣兒童」文章，批評日本人對台灣兒童的教育只重手技術的傳授，不重腦；「只有灌輸，沒有啟發；只求服從，不求思考」（張雪門，1969，77）；「站在教育的立場上，總應該有一項共同的認識。這認識便是怎樣肅清日人奴化政策….今日台灣應有的教育可分消極和積極兩面。消極方面，如剷除日語，糾正思想…積極方面，我覺得至少需培植起四種精神：第一是主動精神，第二是組織精神，第三是創造精神，第四是工業化精神」（張雪門 1969，78）。



1948 年月雪門先生（後排蓄鬍者）與各部畢業兒童合影。
圖：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提供

台灣的幼稚園教育起於日治時期，日治四十餘載期間也逐漸普及幼稚園、托兒所；張雪門對於此引進幼稚園之功未予置評，容或不夠公允，然其對於日本式「用手不用腦」，不容台人思考的教育批判卻也一針見血。此固由來於張的民族改造、民族本位幼兒教育信念，然不失教育學者重視兒童身心發展立場。

二、奠定幼兒教師專業

張雪門堪稱台灣第一位幼兒教育家。日治四十餘載期間日人雖然建立幼教發展雛型，然終始未嘗有幼教師資培育機構的設立，更無幼兒教育學者長期駐台；光復後，1947 年台北女子師範學校設置幼稚師範科，延請張雪門開課：教育概論、幼稚園教材教法、幼稚園行政、兒童保育和實習。此約為今日台灣幼教師培課程的濫觴。當時的十所師範學校中，除了台北女子師範外，台南、高

雄女子師範學校也開辦幼稚師範科。1950 年起張雪門也以通信方式指導台南師範學校幼稚師範科。光復前期幼稚師範科存在時間未長，1955 年台南、1956 年高雄女子師範學校停辦幼稚師範科；1965 年台北女子師範學校幼稚師範科也停辦。張雪門之前，台灣沒有專長幼兒教育的學者；張雪門去世十七年之後，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等始開辦幼兒教育學系。

稱張雪門為台灣第一位幼兒教育家，除對照其獨有的幼教理論之外，也參照其身體力行，為培育台灣幼兒教育人才憚盡心思的事實。因為張雪門，1950 年代的台灣南（台南師範幼師科）北（台北育幼院）同時發展幼稚園行為課程實驗。茲簡摘張與台南師範幼師科及台北育幼院的幼教相關討論過程如下。

1952 年暑期，張在台南師範學校幼稚師範科（以下簡稱「南師」「幼師科」）授課三週，北返一週後，先是該校幼師科主任呂達（李海琴）來信詢問「幼稚園行為課程與設計教學法的關係」，繼而是閱讀過張、呂二師往來信函內容後，學生派代表執筆再向張提問，張覆信並且褒勉有加，回顧此事時不但不提此時工作繁雜身體衰弱事實，僅記述見學生提問，與學生問答之樂。1953 年，張退休，但是當年 9 月台南師範學校幼稚師範科（以下簡稱「南師」「幼師科」）的行為課程實驗更上一層樓。當時台南師範學校校長朱匯森同意幼師科成立實驗幼稚班，請張雪門指導幼稚師範科學生進行幼稚園行為課程；目的是「加強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術的聯繫」。張因此為當年該科三年級學生編寫了十週的行為課程設計。

張雪門對於當時台灣幼教師資素質雖無直接批評，卻非無知。譬如《幼稚教育論叢》針對當時進行中的幼稚園「發現教學」的論述裡，紀錄郭多提及：「目前師資素質較差，做研究實驗工作，十分吃力」（張雪門，1982，170），顯然張掌握現場狀況。在幼稚園工作上，張主張以兒童為主體，教師必須有明晰的思想和行為思考；在培育幼教師資上，張主張以面對的各種素質、各種背景的幼師學生為主體，強調師培者必須「學思並用」，現身說法對應各種資質的幼師或學生，敲扣啟思。



三、留史傳承，植根鄉土幼兒教育課程

張雪門在其1955年前後為僑委會執筆的《幼稚教育講義》第六講中，借某華僑女士的提問描繪當時四種形態的台灣幼稚園課程的混亂現象，並提出他的看法：

「第一種幼稚園是實驗興趣中心課程：一個班級裡兩名老師。幼兒們有的看圖書，有的繞著桌子騎三輪車玩，有的畫畫，有的在地板上搭積木……。一名老師在和三個幼兒講故事，一名老師站在角落裡記筆記。

第二種是國民學校幼稚班的分科教學課程：以小學的教學方式進行範讀、合讀再拆開來唸音的教注音字母的課程，然後教師再講故事，再教唱歌。都是老師教，幼兒跟著學，但是教的注音字母或故事或唱歌，彼此之間都沒有關係。

第三種是五指活動課程：教師先講解『貓』的特徵（貓眼睛的變化、貓的趾掌和走法），最後並做總合整理。然後是休息時間戶外遊戲，教師和幼兒們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再回教室上課時，教師說的是『兩隻貓的故事』……。

第四種是單元設計課程：首先教師和幼兒們一起商量活動主題（如何招待來參觀的客人），教師引導幼兒計畫活動內容、地點（到什麼地方做送客人的禮物、畫送客人的畫、做遊戲。唱歌……），擬定計畫後，教師依照計畫分組，逐項讓幼兒進行。」

「幼教的課程，在目前（翁注：1955年前後）的台灣雖然很複雜；但重要的只有兩種：一種以行為為中心（即自然課程）……凡幼稚園裡布置教室、開會、旅行、種花、種菜、養兔……只要孩子們能夠自己做的，都應該讓他們實際去行動。……第二種是以教材為中心（即人為課程），有了教材，再來研究動機的引起，過程的安排……，但教材是固定的，絕不因兒童實際的倡發活動而有所改變」

「分科教學是以教材為中心，單元設計是以行為為中心；興趣中心說是行為而偏又分科，五指活動說是教材（中心）而偏又完整」

張又批評：「今日教材的缺乏難免濫竽充數」，而且，「究竟教材是固定

的，要想適應幼兒活潑的行為，儘管教師如何注意教法，終是把教材和方法兩者分開，究竟不如訴之於幼兒自己的思考行為，才能把材料和方法打成了一片。」

上述清楚明確的紀錄是台灣幼教發展史研究的珍貴史料。長期的學術研究與踏實的實務工作背景，張不但具備敏銳確實的觀察力，所到之處提筆留記，並且必研發最適合當地風土人情的幼兒活動課程。台灣在日治時期雖有史誌記述幼稚園、托兒所的建置與成長，卻無若上述張文對於課程的翔實記錄與分析；張雪門在台的幼教建設工作或許有驅除日本遺風還其中華民族的目的，然其珍愛眼前台灣兒童的至情至性栩栩如生。

四、強調幼兒教育目的

「民族本位的幼兒教育」成為張雪門幼教觀的顯著標記，然而張並非忽略幼兒身心的稚幼柔軟，勉強灌加國家、民族框架於幼小心靈的軍國主義或政治附從者；觀其一生，強調幼兒身心發展，強調鄉土，強調實質是其始終不變的主張，「民族本位」乃反映其所處背景的時代產物，與其批評其民族主義，毋寧注意其對應時空背景的幼兒教育目的觀。1967 年，台灣推行「文化復興運動」，張雪門針對中國幼稚教育學會響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指導，充分顯示其所主張對應幼兒身心發展的民族本位的幼兒教育目的觀。



1952 年雪門先生（第一排右五）與台北育幼院小學部第一屆畢業生合影。
圖：王鳳女士提供



1952 年台北育幼院導生班附設幼兒團第二屆畢業生合照，雪門先生為後中蓄長鬍鬚者。
圖：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提供

1967 年中國幼稚教育學會邀請張雪門專題講演「從文化復興運動講到幼稚教育今後應有的動向」，引發會員（幼教師）熱烈迴響，後續「應怎樣計劃，能把文化復興在幼稚園、托兒所實施？」；「怎樣



對幼兒講文化復興」的延伸討論源源不絕。張雪門針對「怎樣對幼兒講文化復興」提問的回答正可鑑明他之理解幼兒，尊重幼兒，茲引錄其中片段如下。

某園長批評年輕導生的教學：「文化復興的意義不夠強烈顯明」，張提出意見：「這（文化復興）本不是講的問題，而是行的問題，根本不是說話教學，而是行動的實踐（行為課程）」（張雪門，1982，120）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土地和五穀）次之，君為輕。』...在幼稚園裡應變成『兒童為貴，設備次之，老師為輕』」（張雪門，1982，124－125）

教材是教育的工具，教法是教育的方式，強調「儘管工具和方式並不一樣，但總結必須歸到國家」，「而且尤其重要的在於教師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張雪門，1982，90）

中日戰爭、亡國之痛的親身經歷，導致張雪門從幼兒本位轉向強調國家、民族的幼兒教育目的觀；然而，強調幼教師必須清楚在幼稚園裡的教育目的，轉化為課程讓幼兒透過行動達成。

五、為兒童文學開路

張雪門在來台初期擔任過國語日報兒童周刊編輯。當時張正主持從嬰兒到十一二歲小學生的台北育幼院，目睹院裡小學生對於作文不知如何下筆的苦惱，便「想給兒童周刊開一條路和兒童寫作連接起來，並特別提出從兒童行動中取材。」（張雪門，1982，94）

張雪門從浩瀚的舊詩詞、書畫中根據兒童經驗選材，編輯兒童讀物，引導兒童領略古詩畫的趣味，自喻「引路的成人」（教學者）要預為兒童安排環境「取材、造材，確定中心思想和佈局分段種種的工夫」（張雪門，1982，94），在與小學生的自然互動中開始其寫作教學的實驗。

實驗寫作教學一年多以後孩子們作文力增進，投稿受刊於國語日報兒童周刊，「從此，我就將兒童寫作連接上兒童讀物的路，同時也打通了用兒童讀物促進兒童寫作的路，更以之次激起國民學校的小學生。」（張雪門，1982，98）

在缺乏兒童讀物的四、五十年前的台灣，張將開闢兒童讀物之路喻為科學之路，欲將兒童讀物開向科學之路必須先拋棄重視形式枯燥無味的教科書，從兒童行動上引起兒童不斷的觀察實驗、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張在 1960 年代前期執筆的「石室啜拾」中敘述　這一段兒童讀物開路的思考與經過時，自喻為開路人，但是，「問題不在開路，卻在於走路的人。路是由於人走出來的；無路有人，可達太空，有路無人，荊棘叢生」（張雪門，1982，106）

台灣風土、科學、文學持續出現在張晚年的幼教論述中，除了為台灣文學開啟新路，也見證張與時俱進，不固步自封的研究者性格。

肆 願為兒童共珍攝

一、典型在夙昔

七年海外此栖遲　萬里空餘故國悲

老樹浮雲春寂寂　落花流水雨絲絲

夢回小閣三秋病　愁絕蕭齋一夕詩

願為兒童共珍攝　暫時相別莫相疑（張雪門，1969，96）

1953 年，張雪門退離台北育幼院時，作了此留別同人及家長詩作。由《幼稚教育五十年》可以窺知張的退休其實是遭人中傷，在時不我予感懷下的淒然決定。此詩作於退休惜別會後，張強掩傷感倉惶回宿舍，思及七年任內同仁及家長的合作，懊悔疏忽表達，遂書此詩留贈。雖是安慰同人傷別之作，溢顯張的敦厚性情，「願為兒童共珍攝」道盡張雪門一生幼教情懷。

「雪老平生喜飲酒，除此別無嗜好。未病以前，我們相遇時必得小飲，尤以二十年前的台北還是安靜樸質的都市，小酒館既不煩囂，公賣局的清酒也遠比後來的好。他晚上醉了回去，搭上火車就酣睡，到了北投不知下車，到了淡水還不知下車，車上人都走光了，才被車長發現」（台靜農，1973，1444）



1960 年教育部梅貽綺部長頒贈獎匾給張雪門（左）
圖：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提供

台靜農是張雪門北平結交的友人，1946 年來台，執教台灣大學，是張在台歲月中稀少的故舊之一，張罹病前還時相酒敘，病後則是台到北投訪張或是書札往還，除了上面關於張與老友怡然飲酒，歡然酣睡的描述之外，台對晚年張的觀察：「已經半身不遂，雙眼等於失明的狀況下，還寫出幾本書。別人寫作日以千百字計，雪老寫作日以數十字計，而他不以為苦，一點一滴的將他的理論與經驗寫出來，傳給下一代」（台靜農，1973，1444），張雪門矢志教育，傾力傳承幼兒教育的固執，躍然而出。

張雪門一生著述豐碩，抗戰之前的北京時期著作最豐盛，當時的《幼稚教育新論》、《幼稚園課程編制》、《幼稚園小學校故事集》等十三冊書多由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出版，也有香山慈幼院出版的英文翻譯書《幼稚園原理與實施》；而後抗戰烽火流亡之際也不停筆，台灣時期則有二十一冊書，一百二十四篇文章[11]。

張雪門先生事蹟的追尋、研究，始於 1980 年代我在東京大學研究所時期。追索台灣幼兒教育的發展當中，「張雪門」在戰後，尤其是光復初期有限的台灣幼教論述中屢屢出現。追索其人，乃抗戰前與陳鶴琴、陶行知並列的教育界知名人物；奇的是，海外研究近代中國教育、中國幼稚教育史者莫不知陳、陶，於張雪門卻是「知其人，不知其事」的模糊狀態。追究起來，當時對於清末民初中國新教育的探討研究，依憑的是中國大陸及歐美、日本的資料。陳、陶是民初的留美學人，是以尤成為海外研究中國教育的焦點對象，而張雪門 1946 年渡台，其後事蹟在中外完全空白，無怪乎難下手論述。當時東京大學恩師松崎巖教授與我對談研究時，對於張雪門深感興趣，鼓勵我深入追索，是我研究張

11.此乃張香山「傳薪哪惜山河遠」文中「據不完全統計」。戴自俺主編（1994）。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 下卷。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1449 頁。

雪門的關鍵。其後翻閱張作，穿梭在簡潔清朗，道理晰明的文字間，感動其幼教情懷之外，不由不感嘆其傳奇般的人生際遇。事實上，在我蒐集相關資料，研究張雪門期間，也有幾則奇遇。1987 年在東京看到電視報導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張香山訪日新聞，電光石火，此「香山」莫非是彼「香山」，追索而去，一年之後竟得在東京與香山先生會面而有其後張雪門戰前著作的入手；再有透過東京大學研究陳鶴琴、陶行知學伴，得與戴自俺、錢玲娟等前輩人物相見於北京，而有後來二戰前後兩岸張著作的匯聚，兩大冊《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的出版。

張雪門生涯記述主要依據張自身著作及其門人錢玲娟、金恆娟等人的追憶著述，部分材料來自 1988-1992 年間我做的人物訪談筆記。雪門先生著作以幼教論史為主，在自身及家族經歷年代部分未見明確交代，對照相關人物的著述或口述資料間偶出現不一致處；因此本文在張生涯記述部分有我直接推算者，也有在文獻對照間篩選其一使用者。1960、70 年代前兩岸處於封閉、對立關係，當時在論述間隱而不談或想當然爾之添加筆自是難免，這些小出入益顯特殊的時代感覺。


張雪門先生過壽照。（推測約 70 歲）
圖：王鳳女士提供

二十餘年前開始追索張雪門人生軌跡，在投入台灣幼教師資培育，並且參與各種幼教推廣工作的今日，重拾舊記，再探張雪門，三四十年，甚至逾半世紀前張所指陳的中國的幼教弊病，宛如指責現在台灣的幼教界。這是如何的因緣？晚生半世紀的我，該如何勾勒這樣一個幼教師資先驅者的形貌，如何論結這位前輩人物呢？

台北育幼院小五的謝富子這樣形容八十歲的張雪門：「我們的院長有很長的白鬍子，他早晨起來，先把自己的臉上擦乾淨，鬍子擦乾淨，再把他房子中的桌子、椅子、床架都擦得乾乾淨淨。...院長愛喝點酒，從前常常有老秘書陪他喝，客人來了，請客人喝，小朋友要求喝，他也讓我們舔一舔，他不喜歡別人喝醉了。…」（陳約文輯，1974，178）。



1932 年進入香山幼師的王介容在 1949 年來台後又進入台北育幼院跟隨張雪門主持幼兒團，描述幼師時期「四十歲左右，卻蓄留著長鬚」的張雪門：「是我們的校長，也是我們的班導師，而且親自教授我們幼稚教育課，照顧我們日常生活。因為校中另外尚有三位張先生，所以我們親切地尊稱雪門師為『老張先生』。老張先生訓練我們是極其嚴格的，他要我們手腦並用，會說會做，會計劃也要會行動。同時他因材施教，對我們全班十二位同學，都有不同的訓練。」（王介容，1974，112）

「雪門師老覺得我們辛苦用功，所以有時夜晚，他常會來探視我們，還帶著自市上買回的熱包子、燒餅，我們都已上床，聽到他腳步聲走近，我們會唱兒歌，學貓叫來歡迎他，他輕扣著門，並不進來，從門縫中塞進熱氣騰騰的大小紙包，大家一窩蜂從被窩中躍起爭食，雪門師這才含笑離開我們，安心去休息。他像是我們的嚴父，又是我們的慈母，我們親暱地稱他：『爸爸媽』」（王介容，1974，113）

張長子初次目擊「幼稚園」的寧波傳奇是開啟他進入幼教研究的人生重大事件。那個當年兩歲的長公子張香山在七十五年以後追憶此事：「父親帶我坐滬杭甬火車到慈溪的情景，我至今仍深記不忘，因為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坐火車，也是父親唯一的一次帶我旅行」（張香山，1994，1446），情深緣淺的父子，七十餘年歲月裡緊繫兒子心頭的是生命中唯一一次的親子出遊回憶，對於父親銘感深刻，造成家族生命轉折的「幼稚園」卻不復記憶。張香山戰後出任中日關係組織要職，1988 年以長者身分接受我晤談時，文質彬彬，無政治言語卻難掩對父親的孺慕之情。我真實痛感兩岸隔絕的時代悲傷。

二、追仰先驅，鑑思今日

張雪門將在大陸發展形成的「行為課程」、兒童本位、民族本位的幼兒教育觀、幼教師資培育理論等帶到台灣；囿於時勢，有生之年未見輝煌。試從 2007 年今日台灣觀點，以「幼教與照顧」、「幼教師資培育」論結張雪門的見地以為其幼教先驅定位。

（一）幼教與照顧

幼托機構的教育與照顧功能分野是今日幼兒教育政策的重點。六十年前，台北育幼院草創時期，為了推動幼兒教育，以孤兒為對象之外，也開放當地居民申請。

1948 年 2 月單身母親陳女士寄信台北育幼院，說明遺腹孤子即將滿月，請求育幼院托養。張回覆一以嬰兒營養費省府尚未確定，二以不符公費生收容條件，婉拒托養請求。這是在政局尚屬動盪，台北育幼院組織定位不明，經費拮据時期，身為院長必須有的處置，然此事縈繞不去：「育幼院所負的使命，本來應如陳女士所說，為職業婦女和孩子們造福，....現在社會已經有人認識了育幼院，而且已經送上門來，我們僅因為嬰兒營養費未經核定的關係，輕輕地說一時無法收容；這還成甚麼話呢！嬰兒最好的營養固然是親母的奶汁，但人生走到了欲自乳親兒而不可得時，這又是多麼沈痛的悲劇呀！」

張雪門創辦台北育幼院草創時期乃以「育幼」，以推展幼兒教育為目標；其所謂嘆協助婦女育幼使命與今日所言之幼兒托育照顧不謀而合。

（二）幼教師資 培育

台靜農稱讚張雪門具備教育家學問、理想、實踐的精神，一生「學」「行」未曾分開過，所到之處便播下幼稚教育種子，「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有一批弟子與他共甘苦」（台靜農，1973）。

1950 年，張雪門受台北女師聘，因為正是台北育幼院人力吃緊時期，張無法抽身外出兼課，遂情商同意學生到台北育幼院上課的辦法：將學生分為兩組，上下學期交替在女師及台北育幼院上課。台北育幼院的全日托兒的育嬰部及幼稚園作為幼師科學生的實習場地，張並且在其餘時間指導教育概論等課。此雖是無法分身之應變計，然此兼顧理論與實務之師資培育是台灣幼教史上絕無僅有事例。逾半個世紀，台灣幼教師資培育提升至大學階層，然理論與實務之隔閡成為重點問題。再以新創師資檢定考試制度而言，考試與人才合用意義頗見



紛爭。1970 年代台灣師資培育史上亦曾辦理過檢定考試，當時時空背景與今日大不相同，然張留下之警語卻宛若針戳今日問題：

「據聞此次辦理經過，筆試在先，試教在後，筆試不及格者不得應試教檢定...對於有些應試者望梅不足以解渴，豈能無『名存實亡』之感？...僅從文字而檢定者，豈不有庸師易得，人師南求之歎！抑更有進者，經過此次檢定，未合格之師資處置問題，也應加以考慮。按照目前一班家庭情形，幼兒父母多出外就業...不能不歸功於私人幼稚園的普遍。可是檢定之後，合格和未合格者，既難毫無軒輊，又不能處箴過嚴，影響私人辦學，怕有投鼠之忌。」（張雪門，1973，186）

雪門先生文簡質樸字字珠璣。譬如記述北京時期香山蒙養園兩個老師到北平藝文幼稚園看到孩子們進行「結婚」活動的生動活潑，「連師為充實活動內容，再參考書籍，不但記錄各項活動…幼兒方面興趣濃厚，有時竟因活動正進行熱烈，但放學時間已到，不願結束反而流淚」（張雪門，1982，108）讀來宛若今日流行之開放教學記述。站守二十一世紀台灣幼教研究、師資培育崗位一席的我，追撫先哲陳年舊記，戚然懺然。

參考文獻

王介容（1974）。永不熄滅的幼教燈塔。載於**張雪門先生紀念專集**。台北：治喪委員會編印。112～116。

北京市教育學會 陳鶴琴教育思想研究會編（2006）。**鶴琴之聲　第二十一期**。北京

台靜農（1973）。記張雪老。載於戴自俺主編（1994），**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下卷**。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1443～1445。

池寶華(1974)。追蹤恩師四十年。載於**張雪門先生紀念專集**。台北：治喪委員會編印。117～124。

李蟾桂(1974)。幼師三年恩澤長。載於**張雪門先生紀念專集**。台北：治喪委員會編印。125～130。

金恆娟（1988）。幼教工作六十年—先師張雪門生平事迹略。**幼教史話**。61～76。北京市教育局幼兒教育研究室。

翁麗芳（1992）。**近代中國における幼児教育の形成と展開——張雪門の台灣幼児教育に与えた影響について**——。東京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学位論文。（未出版）

張香山（1994）。傳薪哪惜山河遠。載於戴自俺主編（1994），**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　下卷**。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1446～1450。

張雪門（1930a）。我國手指遊戲在教育上的價值。載於戴自俺主編（1994），**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　上卷**。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565～586。

張雪門（1930b）。我國現時最需要的是何種幼稚園教育。載於戴自俺主編（1994），**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　上卷**。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110～116。

張雪門（1936）。**幼稚教育新論**。上海：中華書局。

張雪門（1952）。**幼稚園行為課程 上、下篇**。台北。

張雪門（1955？）。**幼稚教育講義**。台北：僑務委員會。

張雪門（1969）。**幼稚教育五十年**。台灣書店。收於戴自俺主編（1994），**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　下卷**。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1201～1221。

張雪門（1982）。**幼稚教育論叢**。台北：台灣開明書店。二版（初版出於 1973）

張雪門（1973）。論幼教師資考試檢定。載於**幼稚教育論叢**。台灣開明書店。185～186。

陳約文輯（1974）。院長和我們。載於**張雪門先生紀念專集**。台北：治喪委員會編印。178～180。

（張雪門二戰前發表於北京《**晨報**》、上海商務印書館《**教育雜誌**》；二戰後刊載於台北《**中華日報**》、中國幼稚教育學會《**幼教通訊**》、《**幼兒教育**》、中華民國婦女聯合空軍分會《**幼教輔導月刊**》共計一百三十七篇文章省略）



林　本（1898～1989）

記林本僑教授二三事

林玉体 撰文／考試院考試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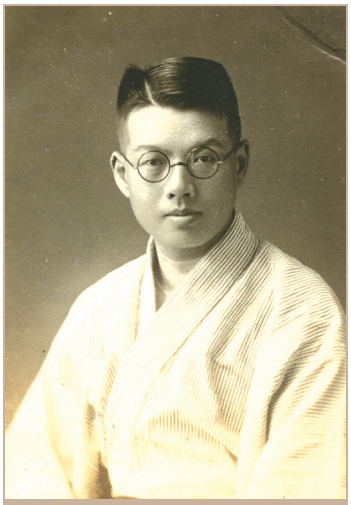


◆ 林本教授，字本僑，是師範教育出身，赴笈日本在東京文理科大學畢業（該校其後更名為東京教育大學）。返中國後不久隨即與中國國民黨的國民政府軍退守台灣，在台灣師範大學任教，除了擔任一般學校行政（教務主任）之外，還獲聘為教育系教授及系主任，在這所台灣全國最高的教育學術學府裡，論著發表之餘，更教導、啟迪、培育台灣的中小學師資。在 1960 年代台灣師大有了教育研究所碩士班之後，也任教於教育研究所。林本教授教過的門生，多人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榮獲海外名大學博士學位者有之，擔任中小學校長、教育部部長、教育廳廳長等教育行政主管者，更屈指難數。本僑教授堪稱為台灣重要的教育工作者，我個人更有天賜機緣，曾在本僑教授的課堂內聆聽獲益，在他身兼系主任時期，拔擢為助教及講師，教育部公費留美時還謝謝恩師作我的保證人，晚年他因背部脊椎受傷療養期間，更進一步了解林教授的生活起居，尤其是在他指導我撰寫碩士論文時，字斟句酌的要求，痛苦與印象歷歷在目，此種為學的謹嚴，對我其後的深造及學術研究，獲益良多！

雖然在享高壽上，林本僑教授未如他的同事也是我的業師孫亢曾教授之跨越過兩個世紀（105 歲），但本僑教授仍年逾 92 才告別人世，離今也已一、二十年光景，他的教育言行，撰述評論者不少，為免重覆，謹就我個人與本僑教授的親身經歷以及閱讀他的著作所生的主觀感受，草此短文，就教高明。

壹 教學及論文指導

1960 年我考取台灣師大教育系，註冊時對這所號稱全台師範首學也是師大第一系的教育系，實在非常陌生，由於在台南師範普通師範科念了三年，又在故鄉草地小學教了兩年書，因此課表上的「教育概論」、「教育行政」等教育科目，認為可以「應付了事」，且也不覺得有重大的學習意義。1955 年考取台南師範時，內心之高興以及家人之雀躍，加上村莊社區人士之讚美，因之在心



18 歲首次赴日留學時的林本。
圖：章林慧人女士提供

目中，自以投效教育為終身抱負；升格為大學生，尤其是師大生，又是全台灣的大學教育學門中，入學分數最高的師大教育系，因之更感光榮無比。當年台大無教育系（迄今也未有），政大雖有教育系，但政大教育系的入學最高分，還比師大教育系的入學最低分，相差一大截。入校後方知，台灣的「名星」大學，有絕大多數的師資來自中國，最享盛名的北京大學，教授轉往台大；而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則群赴師大。有「名師」自然就會有「名校」，在我四年的大學部及三年的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期間，師大的名師除了有研究莎士比亞權威的梁實秋教授任教於英語系之外，光就「教育」方面的師資陣容而言，就有田培林教授、孫亢曾教授、吳俊升教授、余書麟教授、雷國鼎教授等，而林本僑教授的輩份，與上述名教授同列。本僑教授的專攻是「中等教育」及「課程」，這兩大領域，也是師範學校級所欠缺的，且都是師大教育系的必修科。上述的師資陣容，號稱是全台最堅強者，他們有留德的、留法的、留英的、留美的，林本教授則是留日的佼佼者。



1924 年與家人攝於甬（今中國浙江鄞縣）之湖西。（上排中間戴眼鏡者為林本）
圖：章林慧人女士提供

不過平實而論，教育科目的內容以及任教者在教學法上的技巧，實在引不起我輩同學的興趣，至少在我個人的求學過程中，上了包括本僑教授所擔任的課程，不會有興致盎然或燃起高度火花的教育熱忱，只是考試拿還算不錯的分數，並非難事。本僑教授有點不苟言笑，上課認真嚴肅，對於「中等教育」及「課程」的發展史、理論演變、以及在學校教育上的應用，如數家珍，尤其對教育先進國家在這兩種領域上的研究成果，在介紹及評論上，也十分著力。至



1931 年就讀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時，與家人合影。（右一為林本）
圖：章林慧人女士提供

少在我個人的間接潛在教育裡，耳濡目染，也多多少少的進入該兩科的領域內，從而加深了我對教育學術的涵養。本僑教授原籍浙江，他的浙江口音很重，師母也是浙江人，她的家鄉腔更難入耳。或許這個緣故，因此上課或口授效果遂打了折扣，在我當大學生的時代，多數學生是不像現代大學生那般的任性翹課或打瞌睡的，當年也無參考用書或教本，除了上課勤作筆記之外，還有時能領取手刻鋼板油印的講義。上課時少有哄堂大笑的精彩氣氛及場面！

1966 年我以第一名成績考入師大教育研究所，所長由教育學院院長田培林博士兼，田教授為提升研究所素質，規定在研究所開課的教授必須獲取博士學位。不過當時要符合這種條件者不多，因此破格同意享有碩士或學士學位的孫亢曾教授及林本僑教授也在碩士班授課(當時沒有博士班課程)，可見本僑教授的教學及研究成績為田院長所首肯。我一向對學術理論較感熱衷，對教育思想家的言行比較心儀，因此打算以撰寫裴斯塔洛齊的教育愛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不意在向所長田培林教授請示時，他說：「你會德文嗎？」因為這位瑞士的教育家，著作是用德文寫的，田教授本人是德國柏林大學的哲學博士，他素來就認為全球的哲學，除了印度及中國之外，西洋哲學不是用希臘文或拉丁文所寫，就是德文著作了，因此加強我們研究生的德文學習，一天上課一小時，一週六次（當時還未實行週休二日），連上兩年，我上是上了，成績也不壞，且撥了不少時間下功夫，大學時還去上日文，到英語系旁聽法文，但老實說，外文除了英語文念了好幾年之後仍不敢自信可掌握無虞之外，其他第二外國語文要達到閱讀學術著作而不覺吃力的造詣，那又談何容易？田教授當時告誡我們這批「教育學術」的新力軍，研究學術，第一手資料無比重要。我也因此打了退堂鼓，恰好田教授推薦林本教授獲中山學術基金的講座教授，該席次規定獲獎人



可以以指導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作為資格之一，林本僑教授是國內課程權威，我又作他教育系系主任的助教，乃決定以「我國高級中學課程之研究」作為題目。在他指導之下，對文字的修飾特別注意，終於完成了學位。口試時政大一位教授當口試委員，他一直說我有這個好運氣，在「名師」指導之下，獲得教育碩士學位。

貳 風骨典範

我念碩士班一年級後，教育系助教出缺，當時系主任的本僑教授，依慣例以及他在師大的聲望，毫無疑問可以全權享有任命權。我考入碩士班時，只錄取四名研究生，我成績第一名，第一年的學業成績，我也居冠，不過如又考慮大學部成績，則我就沒有如此可以誇口或傲人的紀錄了，我自知英語較弱，因為師範生本來就無英文課，雖然我考大學的英文科成績也不弱，但一向不認輸的我，決定在教育系分組上以英語為輔系，教師是英語系的教授，評分較嚴，因之我大學部成績就沒有那麼亮麗，不過林主任透過當時的助教，也是我的學長黃昆輝兄要我去見他一面，黃昆輝兄人情世故比我精透，他還教我一撇步，林本僑教授夫婦子女不在身邊，非常喜歡孩子，要我去宿舍時，太太與孩子一起帶去，我太太也是本僑教授的學生，因為她與我同班，當時我大女兒初生不久，還只會爬而已，到林本僑教授在青田街的師大宿舍拜見時，師母笑呵呵，非常親切，老師也和藹得笑容滿面，不意我大女兒竟然在地板上小便下去，真是不好意思，還好當時老師與師母進入屋內，害得我與我太太趕緊拿起衛生紙猛擦。今日想起此事，實在深感抱憾！



1932 年攝於湖州，時任安徽省立大學教授。（中間為林本）
圖：章林慧人女士提供

學術研究是我的初衷，迄今猶然。有機會在大學任教，這種大好機會，千載難逢。我雖然普考及高考皆一次就過關，但行政工作不是

我的第一優先選擇，現在有助教缺，我是非常寄望的，因為按往例，助教可以一路升等到教授，而教授的社會階級非常崇高。本僑教授先與我聊了一下，大概不到十分鐘吧！他立即作了決定：「那麼，你明天就來上班！」啊！有這麼阿沙力的，真是大喜過望了。我去之前，買了一籃水果，老師一看，有點不悅：「帶回去，你有小孩，讓小孩吃！」我很尷尬，「老師，只是一籃水果而已啊！」，「不行，帶回去！」他有點變臉，師意不敢違，只好從命，我又把那籃水果帶回去送別人了！此一事件讓我體會到老師的人格特質，或許也是日本教育的成果吧！我大兄在日本時代當過糖廠的工程師，日本廠長非但不收屬下的禮，有次他請假回家省親，廠長還說，他工作忙，不能向我父母請安，乃從口袋掏出一些錢要我大哥替他買點禮物來感謝我大哥給他幫的忙。「無官不貪，無吏不污」的中國官場，實在與日本政風比起來，有霄壤之別了。林本橋教授給了我這個教訓，也是我日後行事的座右銘。當然在我擬求職之敏感時刻，收了水果這禮物，難免引發議論。我上班之後且升為講師時，本僑教授因背部脊椎病痛而住院，我每次去見他時，都會隨身帶點禮物或一束花去看他，他不推辭也不苛責的收了，「同事」關係嗎，此種人情，是存在的，可見本僑教授之公私分辨，是一清二楚的！

我出國深造前，在師大教育系當了兩年助教及兩年講師。身為系主任的林本僑教授大概一週來三次，每次來約一兩小時，處理公務之後，就步行回宿舍，兩地相隔，大概不到一千公尺。由於論文的指導以及公務的需要，加上他養病期的照料，言行中接受教誨的時日更多，可惜的是他的話，聽不懂的部分居多。但一件最令我肅然起敬的是 1949 年的台大及師院（即台灣師大）之四六事件，在 1987 年戒嚴未解除之前，這是禁忌，不可公開討論，不過隱約中老師或許年歲日高，常會憶及往事，每當他提起此一事件時，口吻都極為正經，卻不時暴露出一些憤懣之情。1990 年代當這兩所台灣最高學府各自組成「四六事件」小組予以研究之際，我被選為師大召集人，遍查各種檔案及資料，也訪問過當事人，顯示出當時職位為教務主任的本僑教授曾仗義直言，為學生叫屈，認為軍警單位實不應該入校園內強抓學生。據說治台最高當局陳誠一悉師院有林本僑教授不滿政府採取的鎮壓政策，曾當場呵斥，還出言恫嚇說若是林教授有異議，他可派一架飛機將林教授送回浙江。若不是台大另一與林本僑教授熟悉的戴君



仁教授出面央求台大校長傅斯年轉向陳誠求情，否則林本教授或許就入了中國共產黨的魔掌了。此種學術迫害之政治因素，在台灣是罄竹難書。多年來閱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Richard Hofstadter 及 Walter P.Metzger 合著的《美國學術自由史》（*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實在感觸良多。而稍稔台灣人命運之坎坷與悲慘後，一來為老師之未直接遭受蹂躪而感欣慰，一來也為學術界及教育界之欠缺本僑教授之風骨，反而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實在不屑與之為伍。當年老師能獨排眾議，或在時局動蕩中能秉承教育愛情操，出面保護學生，此種膽識，足堪後人學習！

桃李滿天下，是一句對教育工作者的恭維，本僑教授光在台灣師大任教就超過一代（三十年），他的學生中有人當了教育部部長，如朱匯森先生，朱部長是我念南師時的校長，但作風保守，當記者訪問林本僑教授評論他的「愛徒」時，竟然也不客氣的指陳朱部長掌全國教育大政，較欠缺「大臣之風」。此事在當時傳為美談！其實中國國民黨如敢重用有教育興革魄力之士出任大政，則台灣教育之早日起死回生，就大有展望了。如朱部長都可以當部長，則本僑教授更綽綽有餘了。

參 著作—理論與實際

本僑教授的著作，有《教育思想與教育問題》，由中華叢書委員會輯成三冊發行。其中較引起我注意且具學術自由意義的文章，是在〈新中國的師範教育〉一文中，提出「超越於政黨之上以發揮其指導性」，「保持其中性的立場（**Neutral Teaching**）以培養兒童青年之批判的態度；夫然後是是而非非」。[1] 該文發表於重慶和平日報，時為二次大戰剛剛結束，將教育尤其是「國之本」的師範教育，目標放在民主成員的培養上，這是真知灼見，也直截了當的指陳黨化教育、思想教學、政治人物的偶像崇拜、以及主義之灌輸、或政黨教條之洗腦等措施，是違離民主大道的錯誤政策。這種論斷，出之於「三級師範」生之口，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國的教育果真能實現本僑教授之所言，相信必能步上康莊大道，向民主教育先進國家看齊。

1.《教育思想與教育問題》，417-418。1961 再版，原載 1946 年 4 月 8 日渝和平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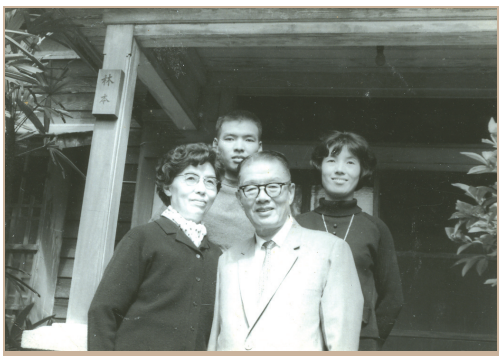
教育發展，受制於政治力之支配。林本僑教授在二次大戰後長期任職於台灣，他也經歷過二二八大屠殺慘劇，體驗長達 38 年的戒嚴，目睹白色恐怖事件之層出不窮，並且遭逢中國國民黨之一黨專政、罷逐百家、獨尊三民主義，在校園內密佈「爪耙仔」，處處打聽並偵探師生言行。當時林本僑教授觸怒了陳誠「龍顏」，雖經「貴人」相助而化了險，但也並不「為夷」，因為學生如有學業上的疑難要請教林教授「解惑」，只能在宿舍籬笆外與之交談。依中國國民黨一流的「保密防諜」技倆，恐怕本僑教授住宿四周皆有「職業學生」監視。不知是否為了保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或「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林本僑教授在 1956 年的中國教育學會年刊上又為文大談「三民主義教育」的正當性，「三民主義既是我國憲法規定的建國指導原理，那麼，做老師的必須對此有充分的認識與實踐的義務，這與美國教師對於民主主義之身體力行，並無二致。」[2] 此種說法，不客氣的說，實在不堪一評。林本僑教授當知中國國民黨一黨所奉行的三民主義是如何透過不光明磊落的程序，才在那部也遭受嚴重質疑的「中華民國憲法」中定下了「建國指導原理」。依簡單的邏輯解析及推論，既然「前提」之確定性已有重大缺陷，又那能獲得斬釘截鐵式的「結論」呢？並且，「民主」理念是普世價值，不只美國各政黨一致奉行，世界上任何地區的人民，連獨裁暴君也不得不口口聲聲的道出「堅守民主陣容」。試問「三民主義」是普世價值嗎？不只「中國」國內各政黨各有各的「主義」，更不用說，全球的各國人士，也不知三民主義的真諦何在。換句話說，林本僑教授為文要求師範生要對三民主義「有充分的認識與實踐的義務」，此種立場，與他呼籲師生之「超越黨派」之上說法，是南轅北轍的；更在鼓舞批判精神上，犯了前後不一且相互矛盾的謬誤！

此外，或許是對真相之不明所誤導，或許是大中國主義的意識型態作祟，或許更是傳統思維框框之無法衝破，林本僑教授對於二二八事變後所產生的不幸，在〈台灣教育者應有的認識〉一文中，態度實在明顯的偏倚，未有他堅持的「中立性」要求，對「台灣教育者」是不公平的。雖然文中仍有一些言人所不敢言之處，如台灣之「光復」，台人認為「前門驅狼，後門進虎，只是變換

2. 同上，447。



1955年元旦林本先生全家福。（中間坐著戴眼鏡者為林本）
圖：章林慧人女士提供



1962 年左右在青田街舊居與家人合影。（前排右一為林本）
圖：章林慧人女士提供

了一個統治者」，中國是「無官不貪，無吏不污」，「日人時代有飯吃，國人時代無衣穿」，「今日中國，一部份不肖官吏為非作歹，貧民殃民，確亦不免，其另一方面，則因循敷衍，得過且過，行政效率低劣。」「二二八事件雖說是由於少數不良分子的煽動與鼓惑（應是「蠱惑」之筆誤），但事出有因，絕非偶然，我們萬不可諱莫如深，而忽視其基本原因之所在。」但卻怪罪「本省同胞羈困於帝國主義者之心理的桎梏之中一時無法解脫。正如纏足的女人會忘記纏足的痛苦，而反對放足一樣。」[3]此說實在言重了，且更加深對台灣人民的雙重傷害。當然，吾人也不必太過苛責林本僑教授對二二八事件之觀察失去其學者應有的客觀、超然立場；但知識份子如在如此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中，未經深一層的細心研究，且又欠缺可資依賴的史料作為佐證，則最好暫時「懸疑」，勿輕易或任性的突下斷語，因為歷史的檢驗是極為嚴峻無情的！林本僑教授如能長壽至今，在二二八事件的面貌較能見天日之際，或許他也會秉持其原有的道德勇氣，一來為先前的不當言論致歉，二來為元兇定罪，三來還埋怨者清白！然後盼「教育者」給下一代一種新型的再教育，化干戈為玉帛，族群融合，共奏美妙的交響樂章，台灣美麗島之國際名聲再現；如能揚棄大中國的優越意識，認同台灣主體價值，與台灣住民共同努力建造名符其實的民主共和國，這才是「打開心內的窗」，排除心鎖的不二法門！

3. 同上，561-566。

肆 教師專業問題之爭議



1954 年在台灣省立師院留影。
圖：章林慧人女士提供

本僑教授師範科班出身，此種身份，恰與我完全相同，但他堅持師範學校應單獨招生，這一點卻與我相反。

「知識階級人盡可師，教育原理原無秘訣。」[4] 這句口號，不只是本僑教授的同鄉浙江人所提出的「名言」，且也是全國人的普遍「共識」，甚至是歷史上及世界各國人士的多數人看法。因之師範學校不應設置，如非設置不可，也不必單獨成為一種特有的學制系統，而應納入一般學校系統中。師範學校旨在培養師資，性質與職業學校之訓練技工、家事、紡織、土木等，甚至專業學校之造就醫生、律師、神職人員相同。過去單獨存在的醫校、農校、漁校、工校、或醫學院、法學院、神學院，既已成歷史，則師範學校、師範專科學校、師範學院、或師範大學等名堂也應消失。理由無他，一來因為凡屬「知識階級」，就「人盡可師」；「知識階級」也者，即受過高等教育者；這些人不必上什麼「中等教育」或「課程」等諸如本僑教授最拿手的學科，就可以上講堂「授業」或「解惑」了。何必又多餘的廣設師範學校來「栽培」師資呢？二來教育原理並無什麼秘訣可言，史上多少名教育家或名師，又有那一位是師範院校畢業的，他（她）們之教育見解，反而變成教育工作者努力學習的教材。本僑教授本諸於他的師範「專業」素養，在《教育思想與教育問題》三輯中，為文多篇反駁上述謬誤。記得我於 1974 年返國任教後，有一次教育部的會也討論此事，與會者中除了我之外，另三人皆是我的老師，我獨排眾議，希望師校不應單獨招生，也不應單獨設置。會後他送我一文，但迄今我仍未改變初衷。單獨設校容或有歷史因素，但以教師人格特質來作為辯解，理由也太牽強！當然，我若非師範科班出身，也不會口出「知識階級人盡可師，教育原理原無秘訣」，這種不合學術專業研究常理的話。若改換成「知識階級並非人盡可師，教育原理有些秘訣」，或許才合乎研究及觀察的結果！「教育國之本，師範尤尊崇」，這是台灣師大校歌中的首句，「建國君民，教育為先」，這是古聖先賢的警語。但以師校單獨招

4. 引自同上註，379。



生或單獨設校，就以為能達成「健全師資」的地步，這是天方夜譚。我到如今為止，還十分埋怨台南師範、師大教育系、及師大教育研究所所給我造成的教育成果。這種議題，我已為文數十萬言，不在此贅述。目前任職於考試院，這猶如如何以「考試」來甄選全國優秀公務員的措施一般。仔細分辨之，「考試」其實是二事，一是「考」，一是「試」，傳統上只重「考」，而未及「試」。「試」即「試用」意，英文稱為probation，「試一試看看」；二者併用且同時併重，或許是改善素質的良方。「考」頂多一兩天，「試」則需較長時間，「人格特質」，不管是教師或公務員，甚至其他一切行業，是用「考」考不出來的，也非短時測驗可以奏效。因此應該有種規劃，利用平時作較長期的客觀考查，如此，一個人的底細及真正面目，就顯露出來了。此時才予以信任之、尊重之，把「國之本」的教育重責大任委託在這種人的肩膀上，這才是正本清源之策吧！可惜的是師校只憑單獨招生，但入學註冊者的「人格特質」，不適合於教學者，比比皆是。在一向保守又人情味濃的傳統風氣裡，又不敢斷然的採取嚴格的淘汰制度，只一味迷戀於「考」的功能，試問這是萬靈丹嗎？支那行之千餘年的官吏科舉考選，弊病叢生，這難道不是一大警訓嗎？

師大及師校是「教育的公賣店」，這句負面的評價，帶給師範院校多大的傷害！「公賣店」是壟斷獨門生意，因為缺乏競爭，因之品質日差，這才是最大的隱憂。本僑教授以及一大群師範出身者竭力維護師範院校本有的「特權」，但時潮擋不住，1990年代之後，各大學院校普設教育方面的科系，而教育學程幾乎廣設於所有高等學府中。但不管是單獨招生、單獨設校、或納入一般學制中，若「考」與「試」不分開處理，則原有久存令人詬病之處，不但未能清除，反而有變本加厲之嫌。本僑教授的初衷是無人有異議的，但在實行措施上，可供商榷之處頗多。令我比較過意不去的是他在知悉我發言及為文主張之際，並不怪罪，反而以一種學理探討應廣納眾議之心態送給我數文供參考，此種長者兼民主風範，實在令我佩服！



林本夫妻合照。
圖：章林慧人女士提供

結語

林本僑教授，常引用希臘三哲之教育理論，那也是我迄今研究的興趣焦點。亞里士多德常與其業師柏拉圖的見解有出入，甚至指陳其缺失。柏拉圖說，這隻小馬未離開母馬之前，就踢起母馬來了！亞里士多德回應以「吾愛吾師甚於一切，但吾愛真理，尤勝過吾愛吾師。」我近出版一本《中國教育史》，對支那傳統文化教育持有較多的批判，顏元及李塨之「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在「不違如愚」的「孔」門家訓中，是石破天驚的，但顏李兩人未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加上另一句：「必破一分孔孟，始入一分真理」。讀書人只能在真理面前彎腰，絕不向權勢低頭。本人受業於林本僑教授，碩士論文也由他指導；堅守「真理」超越一切的基本原則，或許對林本僑教授的某些言論持有批判，就如同他與主政者看法不一一樣，或許這也可作為延續林本僑教授師訓的另一種闡釋吧！

有緣份跟隨在林本僑教授身邊多年，當年公費出國，依規定要有夠身份的人出面保證，保證期間，限制很多，如保證人不可出國，且要負責被保者言行，說穿了，如被保人有「背叛」政府政策，則保證人是要負連坐責任的。我個人在學成歸國後，一再指斥黨化教育之毒害，甚至在留美期間，也漸彰顯台灣主體意識，幸運的沒連累到林本僑教授。不過不管如何，我對林本僑教授的教學、研究、及言行，內心還是充滿敬意及感激之情的！尤其憶起老師晚年強忍背脊之痛，近日又見其親筆致送我及內人之書及文章，也百感交集。睹物思情，林本僑教授夫婦雖已辭世，但音容宛在；老師及師母雖因戰亂而來台，此種天意安排，若也含有玄機，或造化弄人，著實也可平填追憶中較引為話題的部分！



林本（中間坐者）八十大壽與眾人合照，左三為許水德。
圖：章林慧人女士提供



趙麗蓮（1899～1989）

為台灣英語教育熱心奉獻的「鵝媽媽」

余玉照 撰文／國立嘉義大學名譽教授



◆ 趙麗蓮教授（1899. 12.9～1989. 6. 12）出生於美國紐約州一個中德聯姻的書香世家，幼時因其「混血兒」背景而受到不少岐視。1915 年獲得「萊比錫音樂學院」碩士學位。1920 年與唐榮祚結婚，至 1930 年離婚，育有一女三子。她的教書生涯先期以教音樂為主，後來改教英語和西洋文學等課程。自 1948 年來台後，主要專職為台大外文系教授，並先後主持中廣公司、教育電台及中華電視台所闢設的英語教學節目，成為我國教育史上，開啟電台與電視英語教學的第一人。作為台灣英語教育的先鋒，她辛勤打拼整整四十個年頭。由於「鵝媽媽教室」叫好叫座，「鵝媽媽」變成她極受歡迎的綽號。

趙教授始終抱持一種「語言與文化交融」及「語言技能與人文素養並重」的教育宏觀，而此一宏觀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她所以能夠將「經師人師集於一身」的根本原因。1964 年她為台大選修「西洋文學名著」的畢業班學生發表一篇著名的「臨別贈言」演說，期勉學生務須自立自強，熱愛國家，盡力服務社會，切勿因迷失在金錢與權勢的追逐中而毀了一生的幸福。這篇膾炙人口的演說題旨廣受國人的認同與讚賞，充分展現出她既是英語大師又是人生導師的風範。

1989 年初夏，趙教授逝世於台北榮總醫院，享壽九十一歲。詩人余光中教授為她親撰墓誌銘，尊稱她是「一個美麗的靈魂」。次年，她的門生故舊運用各界捐款聯手創立了「財團法人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以便遵照她的遺志，繼續推展英語教育的工作，不斷傳揚她對無數學子的無限愛心。

壹 前言：趙麗蓮教授送給學生的處世諍言

自從 1964 年畢業於台大外文系以來，我常在種種不同場合-例如參加大學生畢業典禮時-回想起趙麗蓮教授當年送給我們畢業班的「臨別贈言」。

我還清楚地記得那是個初夏的晴朗的上午，趙教授在「普三」階梯教室為我們畢業前上「西洋文學名著」的最後一堂課，當時我坐在第四排靠近門口的



一個位子上，突然間她停頓了一會兒，接著微笑地以她慣常優雅悅耳的音調和簡潔流暢的英語說：「My dear students：....」這句話立刻引起我加倍的注意，於是我聽得更仔細了。



1949 年趙麗蓮女士在中廣錄音室留影。
圖：中國廣播公司提供

原來，她那時發表的就是後來經媒體廣為報導而被稱頌不已的「臨別贈言」演說。我很慶幸當時把握住那個關鍵時刻將她珍貴的叮嚀記下來，但美中不足的是當時無法留下該篇演講的任何影音紀錄。

當天下課後，同班的蕭蘭男學長來我宿舍參閱我做的筆記，並於幾天內完成中譯稿就投寄給報社發表了。這篇寓意深遠、對青年學子寄望殷切的演說公諸於世後，立即獲得了廣大讀者的共鳴。

1989 年初，趙老師因血癌病重住進榮民總醫院，她欠缺醫療費與生活費的報導，引起了各界極大的關懷。我專程去拜望她，站在她床前曾提到這篇永誌不忘的演說。我輕聲問她要不要向許多無法前來探望的學生說什麼，她以低緩但仍清晰的聲音說：「要努力為國家社會做事，不要只關心賺錢。人死了一分錢一毛錢也帶不走，但是你為社會所做的事情大家會永遠記得。」（余玉照，1989/6/15）這句話讓我內心感動不已，從醫院回來的途中，我靈機一動，決意再找出這篇演說並交請報社重新刊登出來，好讓更多讀者瞭解趙教授對她的學生一直有著多麼大的期許，和多麼深的愛心。

這篇演講在臺灣師大圖書館的協助下找到了，於 1989 年 3 月 2 日的中央日報副刊以「贈言」為題再度刊出後，與當年初次見報時同樣廣獲社會的認同與讚賞。後來，我和孫震校長、許森貴理事長、溫文昭董事長、朱炎院長、戴瑞明大使、林耀福主任、尤英夫律師等多位師長先進在台大校友會及台大校友文化基金會全力支持下所發起的募款活動，得到眾多關心人士非常熱烈的響應，充分顯示了各界對趙教授的諄諄教誨與殷殷期許都滿懷著欽佩和感激之忱。

趙教授時時刻刻都以幫助學生為念，甚至在病榻上仍然不忘勉勵學生要好好為國家社會做事。她以身作則，始終積極實踐她這種深植於心的服務人生觀。她一生以全副心力投入教育志業，不僅傳授書本上的知識，而且教導學生許多做人處世的道理—而這篇演說便是極具代表性的見證。

有鑑於此，我想今天這篇文章最好能以刊載趙教授的「臨別贈言」作為開場，我相信唯有這麼做，才足以突顯她身為一位經師人師的獨特丰采與崇高地位。由於她這篇演說純以英語發表，故特別在此刊出英文講辭，而蕭蘭男學長意譯的中文講辭則請參閱本文附錄二。以下就是這篇膾炙人口的英文演說全文：

My dear students: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you today which I feel would not be appropriate to say at tomorrow's dinner that you are going to give in honor of us teachers. Today's words are not congratulatory, but words of advice and warning.

The time has come for me to retire, not only because I have come to the age of retirement, but also, after forty-five years of teaching, I am physically, mentally, and spiritually exhausted. You are probably the last class I shall ever teach. My hopes for you are high, and it is my fervent prayer that you will not disappoint me. During the past years, I have been deeply unhappy to see many of my students forget the warmth and enthusiasm of their student days only a few years after leaving school. They have become immersed in the sloughs of society and have lost the values and ideals of their youth. What has done this? The pursuit of money and power which has taken hold of their minds and souls.

Truly, money is important, but it does not deserve to be pursued with the best of your abilities. From the history of mankind, we well know that selfish wealth is something which ruins all that is good and beautiful in life. The pursuit of money for yourself will never satisfy you. The more you get, the more you will want. You will never get enough, and you won't stop pursuing money to the day you draw your last breath.



Experience has taught me that money brings vice and bitterness, not contentment and happiness. Take myself for instance. I was born in a rich family, and when I grew up, I married into an even richer family. But unfortunately, it was wealth that divided my family and lengthened the distance between me and those near and dear to me. Money deprived me of all the happiness in my life. Money brought me nothing but sorrow and bitter regrets. That is why I hope not one of you will become a millionaire, and lose the true blessings of life, for money can easily bring you misfortune.

Money is usually accompanied by power and can buy power. Power is often a great temptation to young people. Perhaps you are still too young to realize how terrible power is. I have seen many promising youths who sought power and were destroyed by power.

It is my hope that each one of you will carry out his own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obligations of his own work to the best of his abilities. Our nation is now going through a life and death struggle; it is the duty of each one of us to do the work best fitted for us, and do it to the utmost of our ability. Each one of you must do your very best for our country and our people. There is an old proverb which says, "A great river is made up of myriads of drops of water." Each one of you is like a drop of water. Alone you are nothing, together you can form a mighty body of water that will be strong enough to turn the wheels of time and circumstance.

Like young birds, you are soon to leave this nest and fly alone. My hope is that you will not fly too dangerously high, but will fly smoothly and safely through all the storms of life.

The last point I wish to impress upon you is never to depend upon anyone but yourself. Never be lax or careless because you have kind parents, loving friends or powerful relatives to depend upon. Experience has taught me that all

these will pass away. In this world of change and uncertainty, what have you to depend on? Nothing, nothing but yourself. You must have strong confidence in yourself, bred from what you have studied and from the experiences gained from your teachers. No one can be by your side always throughout your life. Even though you have a strong family background and influential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y cannot add to or detract from what is truly you. Drink always from the fountain of knowledge, and never be afraid to learn.

Remember that all love is sacrifice. Your life is not your own, but belongs to your country. If you love your country, you must devote yourself to it.

Again I repeat, never rely upon anyone for anything. Remember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You are the master of your fate. It is a poor excuse to say that Fate is your master.

My sight becomes more and more blurred as I go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the center of this world, but you are now approaching that which I am now leaving. I do not feel downhearted or unhappy, for what is taking place is a law of great, mysterious nature. There is always some life growing old and fading away while new life is coming into being and growing and becom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I have no gift to give you for your graduation. But my little store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 now pass on to you. There is one parting thought I wish to leave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and whatever you do, act as a true Chinese should, and be very proud of being a Chinese. Being a Chinese and acting as a true Chinese have been the mainsprings of my life.

I am proud, not of my meager knowledge, but of the chance that I have had to pass it on, small as it is to you, the younger generation. Please make the best use of what I have taught you. I desire that you should devote all your knowledge and ability to your country throughout your lives.



Maybe we shall never meet again in the future, but even so, let whatever I have given you during your school years be used by you in your lives, and thus we will never be parted. A part of me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and the generations that follow you.

趙教授一生淡泊名利，所以特別告誡學生切莫過度迷戀金錢與權勢之追求，因為她觀察到許多人都因狂熱地追權逐利而迷失了自己，甚至毀滅了自己。她並不否認金錢的重要性，但她堅信財富與權位絕不值得以快樂或生命去換取。她鄭重要求每個學生都必須發揮獨立自主的精神，盡量充實自我，並且敬業樂業，忠於職守，誠誠懇懇地服務國家社會。她在演說中揭示了既遠大又務實的人生理想，她以簡明有力的語言，藉著平實溫和的音調，傳達出充滿睿智的哲理，自然令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這篇演說早已引起了普遍的研讀興趣。例如林茂竹教授將它譯成中文並且深入分析，指出它的特色包括「文字簡單，結構井然，言近旨遠」，同時趙老師以「個人的經驗為例，深具說服力，可謂字字珠璣，句句肺腑之言。」（2001/12/22） 我相信這篇演說未來受歡迎的程度將有增無減，因為在這功利主義甚囂塵上的今天，趙教授這些發人深省的提示，猶如暮鼓晨鐘，確實具有宏大的警世價值。

貳 生平事略：趙教授為教育志業奮鬥一輩子！

1899 年農曆 12 月 9 日，趙麗蓮出生於美國紐約州洛克威爾鎮的一個中德聯姻的富裕家庭。父親趙士北，廣東新會人，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是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元老，曾任國民政府參議院議長。母親白薇熙是德裔美國人，通曉九種語言，獲有康乃爾大學醫學博士，其父親為德國外交官。

中德混血的身分帶給幼年時代的趙麗蓮許多被歧視的遭遇。她於 1907 年回到中國，就讀於上海美國學校。她受到中國和外國同儕排斥的不愉快經驗，激發了她堅貞的愛國心，同時培養了她對不同文化的敏感與包容。

她從小非常好學，流露出語言及音樂方面的過人秉賦。1909 年，她的外公送她到德國「萊比錫音樂學院」就讀，兩年後因中國革命成功而休學回國，至 1915 年再回校完成學業，獲得音樂碩士學位。她獲聘為北平女子高等師院（女師大前身）的音樂教師後，便正式展開了她漫長出色的教學生涯。

趙教授生逢亂世，立志從事教育工作，以培育優秀人才，可謂適才適性的最佳選擇。儘管她的生活比較而言是安定規律的，但她卻也曾經歷災難與挫折。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她曾因愛國抗日行動而被日軍監禁達半年之久，此一不尋常的遭遇，顯示出她性格上剛正英勇的一面。

趙教授才華出眾，教學認真，極受同仁學生愛戴。她教過多所大學院校，在北師大及北平大學開始改教英語課程後，名聲更行遠播，但她在英語教育方面的功力，則是到 1948 年來台之後才發揮得淋漓盡致。

1920 年，趙教授與唐榮祚（前內閣總裡唐紹儀之姪子）結婚，由於兩人個性、理念與生活習慣諸多不合，這段婚姻於 1930 年宣告結束，共育有一女三子（唐楣、唐鴻光、唐鴻柱、唐鴻濱）。她曾在「臨別贈言」演說中以她親身經驗為例，以相當感慨的口吻指出金錢帶給她的只是家人之間的疏離、怨恨與痛苦，而非和諧、喜樂與幸福。婚姻家庭方面的失衡對她打擊之深，似乎在這段話中流露無遺。


趙麗蓮女士在教育電台留影。
圖：教育電台提供

1949 年，她應中廣公司之聘開始主持「空中英語教室」節目並發行《學生英語文摘》（The Student's English Digest）；這項大受歡迎且歷時多年的廣播節目，可以說為她確立了台灣英語教育界的先驅地位。1960 年，她由中廣轉往教育電台開闢「趙麗蓮英語時間」；1972 年，她在中華電視台開闢以教導兒童英語為主旨的「鵝媽媽教室」。這些工作具有明顯的歷史性意義，因為在我國英語教育史上，她開啟了電台及電視英語教學的一個新紀元，「鵝媽媽」三個字甚至變成她極受歡迎的綽號。



趙麗蓮女士與中央警官學校學生合照。
圖：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提供

1965 年 2 月，她自台大外文系退休，此後仍先後在政大、清大、交大、輔大、中央警官學校等校兼課。她從未真正「退休」，甚至在罹患血癌約二十年間，她依然繼續抱病教書，她一心一意奉獻教育工作長達七十寒暑，徹底發揮了誨人不倦、助人最樂的精神。

趙教授抱病教書的堅強表現，確實會令所有聞者為之動容。她自罹患血癌之後，一面接受醫療，一面仍舊繼續教課，似乎完全看不出有什麼病容或任何憂戚的神色。她所以能在病魔威脅下仍毅然展現「勝利者」的姿態，首先恐怕應歸因於她「樂在工作」與「愛人尤勝愛己」的人生態度。1983 年，她以八十五歲高齡應邀參加「亞洲婦女協會」在新加坡舉辦的盛會時，非常光榮地以「她的智慧、精神和風采，贏得優雅婦女選拔賽的冠軍。」當她被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問到她如何面對血癌的挑戰時，她輕鬆地答道：「心情開朗些，不要老記掛著年齡與病痛。」（〈耄耋之年與癌奮戰的趙麗蓮博士〉）。這段感人的故事顯示出她的「養生秘訣」就是保持熱愛服務的仁者情操與豁達樂觀的勇者作風！

1989 年 6 月 12 日，趙教授因血癌併發肺衰竭，不幸逝世，享壽九十一歲。次年二月，在多位同仁門生的努力合作下，「財團法人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順利獲准創立。多年來，這個以「推廣英語教育，促進文化交流」為宗旨的基金會，一直積極辦理有關促進英語教學的各種工作。[1] 無疑地，隨著這個基金會的永續發展，趙教授的教育愛將使越來越多的人們同受感召，同蒙福澤。

1. 本基金會現有十一位董事，即（依姓氏筆劃序）：尤英夫、朱炎、余玉照、李震山、林耀福、柳萬成、孫震、許森貴、温文昭（董事長）、彭鏡禧、戴瑞明;原王亞權及王藹芬兩位董事請辭。在他們積極策劃下，本基金會雖無豐足資金，仍盡力舉辦英教推廣與研究活動-包括「學習英語」、「國小英語教學」、「全民學英語」、「英語與我」、「我愛英語」等系列學術演講，並出版有關英教之書刊—包括《國中生如何學好英語》、《趙麗蓮教授贈言》、《十分精采—名家談如何學英語》、《兒童英語教學面面觀》等書。此外，温文昭、繆立中、吳孟修、戴瑞明等人為使趙教授的名言廣為傳播，特捐資助印《趙麗蓮教授嘉言錄》，亦由本基金會發行。

參 教育事蹟：趙教授是我國英語教育的先鋒！

趙教授的教育生涯大致可以分作音樂教學和英語教學兩大部份，前者從她任教於北平女子高等師院起算，共計約二十年；後者從她任教於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英文系起算，長達五十年。 固然她在前者的表現已相當亮眼，但後者顯然更加輝煌，而其影響也就更為可觀。

在音樂教育方面，趙教授不僅努力引進西樂，而且願為促進國樂之創新研究盡一分心力。例如她任教於「北大附設音樂傳習所」期間，成立「管弦小樂隊」，以期有助於青年音樂素養之提昇。後來，她任教於北平國立藝術專門學校，與劉天華、蔡元培、蕭友梅、劉半農等多位名師成立「國樂改進社」，便是有意藉助西樂來探究國樂改進的可行性。

自 1936 年秋季起，趙教授開始將工作重心從音樂教育轉向英語教育，她先後在燕京大學、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學院等多所大學校院教授英文，至 1948 年 10 月來到台灣，便早已在大陸建立了英語名師的口碑。 尤其在 1946 年她在北平廣播電台開闢「英語講座」節目後，成為國內利用廣播從事英語教學的第一人，不啻為她後來在台灣持續從事英語廣播教學推出了引人的前奏曲。

到了台灣後，以她優越的學驗資歷等條件，自然在日益興盛的英語熱潮中高舉著一個名師旗號，尤其先後主持中廣、教育電台及華視的叫好又叫座的空中英教節目，使她一躍而為家喻戶曉的英語權威教授。在那整個英語教學環境頗不理想的年代，無緣升學的廣大民眾普遍對學習英語抱著濃厚的興趣，以致她主持的節目對眾多熱心求知的人們來說，簡直有如久旱甘霖一般親切甜美。

在〈祝福偉大的廣播老師！趙麗蓮博士〉一文中，作者這樣刻劃趙教授講課時的聲音：「每天清晨或夜晚，開了收音機，你將會聽到一位老婦人的聲音，她的英文優美無疵，她的國語流利親切，她的解釋澈底、清晰而扼要。這個誠懇、堅定而具有感動力的聲調，就是桃李遍天下的趙博士的聲音。」（春馥，p. 7） 這段真實細膩的描寫，我相信一定會強烈地勾起當年無數學生內心深處許多溫馨的聽課回憶！



上趙教授的課，真是一種愉快的享受。我相信所有她的學生都深有同感，覺得她講的英語帶有一種清新脫俗的魅力，不只是字正腔圓，文詞自然優雅，而且她的聲音溫潤柔和，語調高低有致，加上她慈藹的眼神和永遠洋溢在臉上的親切的微笑，總會予人以非常獨特愉悅的印象。她的英語魅力除了源自她深諳九種語言的母親遺傳外，想必也從她個人專精的音樂造詣裡也應該汲取了豐富的滋養。朱炎學長曾在談學習外語經驗的演講中說：「趙麗蓮老師的英文比一般歐美人士都純正悅耳。西洋文學名著經她詮釋，就讓人覺得意味無窮。」（2000, p. 149）的確，我認為「如沐春風」這個老成語實不足以透徹描寫上她的英語課的感受，因為她已經把講課帶進一種語言與文學貫通、感性與知性交織的藝術境界了。



趙麗蓮在交通大學講堂授課時留影。
圖：國立交通大學提供

她主持「空中英語教室」節目並發行《學生英語文摘》的十二年間，也許是她一生中工作量最繁重、而工作成果也稱得上最豐碩的一個時期。這份為配合廣播節目而編印的月刊見證了她無數的汗水與深厚的才學，隨著它的發行量從兩千冊不斷攀升至上萬冊，它不但是學生們的良伴，而且是趙教授的驕傲。當時英語教學界重量級人物都紛紛挺身相助，例如梁實秋教授與英千里教授擔任該刊顧問，曾約農、吳炳鐘、夏濟安和侯健等多位教授都應邀加入撰稿行列，使該刊的內容更為多元引人。因此，這份雜誌在我國英語教育史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拓荒角色，在那人力物力相當欠缺的年頭，它排除了許多困難，終於在台灣的英語田地上茁長成為一朵嬌豔芬芳的奇葩！[2]

趙教授當時除了編寫教材和上課外，還熱心處理來自學生請益的大量信函。阮日宣先生在《趙麗蓮傳》中曾就趙老師的辛勞備嘗著墨甚多：「在這一項廣大的社會教育中，她真的做到了『有教無類』。她獲得了青年們的尊敬，

2. 這份雜誌的亮麗業績在 1950 年代十分難能可貴，以致有人質疑其背後可能獲得政府或美國的資助。有位記者報導指出，這些純屬臆測。他說這份刊物的唯一贊助者是趙教授的「親戚王哲夫先生，而文摘能締造萬份的銷售佳績，必須歸功於趙博士的努力。」（〈背後有神秘贊助者？《學生英語文摘》發行破萬的秘辛〉，p.41）

因此，也更使她在精神上永遠年青，於是更鼓勵著她在工作上的熱情，在這循環交替影響下，她給自由中國的讀書界，掀起了一片蓬勃的氣象。」（頁 2）秦賢次先生也指出趙教授教學非常賣力，對學生充滿熱誠與愛心，同時對她意志力之堅強與責任心之重也極表讚佩：「六十多年來，在學校任教或在電台從事英語廣播教學工作時，其間不論颳大風下大雨、生產、出國訪問，甚或罹患人人談之色變的血癌，她也從來沒有間斷過她的教學工作，這幾幾乎可說沒有幾個人會做得到。」（1989/6/13） 誠然，正因為懷著對學生無限的愛心與熱忱，趙教授才可能全力投入工作，絲毫不以為苦。

戴瑞明學長在〈眾人師眾人母〉一文中也舉述實例說明她對學生的關愛：「趙先生要退休時，恰好我由台大畢業。嘉新水泥送給她二十萬元臺幣，她決定一文不取地贈予社會，其中十萬元用來買錄音機贈送給偏遠地區的中學，做為英語教學的工具；另外十萬元要送給學生，我是她資助出國留學的對象，她已經資助了四、五十位學生，完成他們深造的心願。」戴學長還提到趙老師親自到機場為他送行，並送他印著國旗的領帶、領夾及袖扣，而且勉勵他學成要回國工作，報效國家。他寫道：「我是帶著她的愛、她的忠，出去又回來。」（1989/3/2） 這些故事將趙教授一心一意為國家為學生而奉獻一切的風範平實動人地描繪出來。

1981 年，她以 83 歲的高齡，榮獲行政院新聞局頒發的優良電視節目金鐘獎「特別獎」，她領獎致詞時說：「我的學生遍及全世界，這些成就使我非常快樂。雖然我已是一個老太婆，但身為一個中國老師，身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很快樂、很驕傲。」（秦賢次, 1989）是的，她最大的快樂來自桃李滿天下，她最大的功績就是幫助台灣開闢了一片欣欣向榮的英語教學新天地。她直到 86 歲才正式結束空中英語的教學工作，然而，一股永遠濃郁的教育愛始終支持著她繼續工作下去！

她在家裡為小朋友開班抱病授課，直到 1989 年病重入院，她才終於把教鞭給整個放下來，正式告別杏壇，真正樹立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不朽典範。她逝世後，以「資稟貞純，志行堅卓，畢生致力英語教學，敦進中西文化交流，都講文武院校，並藉廣播施教，嘉惠青年，貢獻卓著」榮獲李前總統登


總統令

趙麗蓮教授，資稟貞純，志行堅卓，畢生致力英語教學，敦進中西文化交流，都講文武院校，並藉廣播施教，嘉惠青年，貢獻卓著。晚嬰痼疾，猶能人前奉公，臺座教育，彌足矜式。茲聞溘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資遺徽。

總統 李登輝

行政院長 李煥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七日

典璽官 劉庠

畢生致力於推廣英語教學的趙麗蓮教授貢獻卓著，獲李登輝總統頒予褒揚令肯定其成就。
圖：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提供

輝先生的褒揚，這言簡意賅的讚辭，尤顯適切精實，毫無誇飾溢美之嫌。

以往有關趙教授的傳記文章大都提到她曾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我為了找出其頒授讚辭及日期，特請我國駐紐約文化組郭秋義組長就近向哥大查詢相關資訊，不料該校負責承辦部門回報謂：經查趙教授不曾獲得此一榮譽學位。我為此意外的答覆深覺困惑；究竟當初何以會出現有關此一榮譽學位之傳聞，尚有待查明釐清。[3]

趙教授一生堅守教育崗位，對我國英語教育的推展，作出了卓著的貢獻。臺大前校長孫震先生在《十分精采—名家談如何學英語》的〈序言〉中分析趙教授所以能贏得社會大眾尊敬的原因時寫道：「她不僅是一位一等一的經師，而且是一位偉大的人師，她以素直的心，坦率的語言，簡樸的生活，活出我們這個日趨功利的社會最缺乏、最需要的正正當當做人的典範。」（p. ix）這句話可以說為趙教授的教育生涯作了一個精簡生動的評註。

肆 教育貢獻：趙教授為台灣英語教育全力打拼四十年！

趙教授推展台灣的英語教育，確實是勞苦功高，成果豐美。正當台灣經濟開始起飛，國際化的腳步日益加快，英語人才的需求隨之越來越殷切之際，學驗俱豐且又正值盛年的她適時加入了台灣英教的行列，立即成為各方爭相請益的對象，而且很快就以優異的教學表現贏得了歷久不歇的掌聲。她除了堅守在

3. 郭秋義組長於 2007/4/26 將哥大文理研究院校友關係室助理主任 Dr. Laura Brown 的正式答覆電子信轉寄給我，她寫道："Dear Mr. Kuo, I just heard back from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who has been searching Lilian Chao. She spoke to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and was informed that Dr. Chao did not receive any honorary degrees from any branch of Columbia." 謹向郭組長及其他所有參與協查此案的哥大友人致上謝忱。尚盼國內曾撰文指出趙教授獲頒哥大榮譽博士學位的先進朋友能幫忙釐清此項傳聞之原委真相。

大學的崗位外，又盡心盡力做好電台與電視的英教工作，幫助無數社會人士得到了學習此一國際語言的寶貴機會。她的指引與鼓勵，為台灣英教基礎之建立，提供了宏大的助力。如今，回顧我國英教的發展歷程，每論及早期披荊斬棘的先進功臣，人們總會異口同聲提到趙教授，她能擁有如此關鍵的歷史地位，實屬實至名歸，並無倖致。更可貴的是，她盡心盡力地利用了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兩個大舞台，將她語言、文學和文化等領域的才華與知能，毫無保留地貢獻出來。

趙教授在台灣度過了四十年孑然一身的歲月，沒有子女或親人的陪伴，沒有一般人享有的家庭生活，然而，在同事學生面前她似乎從未因此露出愁苦的神情，她把全副的精力與時間投入她所熱愛的教學工作上，一股強烈的服務熱誠導源於她內心最深處的愛心，使她辛勤奔波於幾個工作崗位與簡樸的宿舍之間，那種忙碌付出、拼命奉獻的情狀，似乎只能用「無私無我」或「服務狂熱」之類的字眼來形容吧！她徹頭徹尾體現了「誨不倦、教不厭」的精神，她以教育無數莘莘學子為畢生最莊嚴的使命，並以七十年從不間斷的奮鬥與堅持，成就了一幅人間罕見的教育家形象！



趙麗蓮女士晚年獨照。
圖：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提供

對於英教推展的大方向，趙教授持有明確的看法。1949 年 5 月，她應邀在中廣公司舉辦的空中學術講座上，以「怎樣學習英語」為題，發表了一篇廣受好評的演說。這篇演說至今仍然具有參考價值。為此，特抄錄其中一段如下：

學習一種外國的語言，首先應該明白學習的目的，時下若干青年，往往以實利為要，這是很低的一種志趣。不要以辦洋務，充當買辦式翻譯就算成功。這種學習的目的，即使能夠獲致一點成就，也是非常有限。確定自己學習的目標以後，自然成就也就不同。因此在學習過程中，發音還是最要緊的第一步。發音有根基，拼字就能正確，聽覺就有進步，假以時日，說話當然也就不會困難。許多外籍教授們對於中國人的學習英語，往往不主張多講文法與結構。我個人的意見，對於這種教授法不能苟同。一個外國人去學英語，要辦別兩國文

字組成，非得瞭解文法，才能分別異同。因此，文法似乎是幫助我們瞭解的一個橋樑，不要太輕視它。學習英語，要記字，要準確的記明白。開始不要貪多，但要瞭解每個字的多種用法。讀書要從最容易的讀起，能澈底明白，才能致用。當然，學習一種語言，不該只限於語言以內的事，對於西方文學的背景、歷史、地理、乃至生活習慣都該注意，這樣才能發生興趣而增加學習的效率。（阮日宣，頁 103）

趙教授強調國人學英語必須抱持健康的目的並運用正確的方法。除了上面所引的不少忠告之外，她經常宣示其他相關的建議或期許。例如阮日宣便歸納了幾點說明：「一、希望在讀書中，培育道德的修養，因此在教材裏面，她選擇了許多西洋作家有關品格的修養。二、增加對西洋文化及社會的瞭解。」（頁 107） 此外，趙教授也很重視英文寫作能力之加強，因為她認為學習英語不應僅以能說能譯為滿足，而應盡可能用英文將本國文化介紹給外國人。凡此種種與英教有關的見解或理念，就導正我國英語教育的健全發展而言，都是不容忽視的基本原則或方針。



趙麗蓮教授的學生們齊聚一堂為趙麗蓮教授開心慶生。
圖：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提供

當我們深入理解趙教授就學習英語之目的與方法所發表的言論後，我們就不難發現她基本上是從文化與人文的雙重角度去觀照英語或其他外語教學的終極意義與價值。我認為這層認知是凡欲對她終生的教育貢獻取得公允評價者所不能缺少的，因為她之所以畢生都對英語教學表現了無比堅定的執著和毅力，同時從異常勤奮的教學工作中取得了極大的滿足與慰藉，顯然是由於她對這樁教育工作的本質，始終堅持一種「語言與文化交融」及「語言技能與人文素養並重」的教育宏觀，而此一宏觀，引申言之，也可以進一步引導我們就她何以能將「經師人師集於一身」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作為一位英語通儒，這個強力塑造她的教育風格的一種宏觀，應該就是導致她高超成就的一個關鍵因素。

這個宏觀之形成，與她「混血兒」之出身背景應該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為她基於對中英語言和文化異同問題之特殊敏感與長期琢磨，自然能夠洞見語文一體的重要意涵。此一宏觀可能促使她創作了以她個人「混血兒」經驗為主軸的英文小說“*Half Caste*”（中譯為：一個混血兒的遭遇）[4]。此外，這種宏觀可能也決定了她在「怎樣學習英語」那篇演說的核心主題，並主導了她編採《學生英語文摘》多元內容的方針，同時匡定了她編著的英語教科書中所展現的人文向度，更進而賦與了她的「經師」崗位以神聖的「人師」使命感。

伍 教育影響：「鵝媽媽」是滿懷愛心並積極追求全人教育理想的英語教育大師！

趙教授經歷了多采多姿的教育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綜觀上面所述，她的影響可以分下列五點來加以總結性的闡釋。

一、由於她身受許多「混血兒」出生背景所引起的不愉快經驗，故經常提示人們要在學習外國語言時格外用心瞭解語言背後複雜的文化現象及問題，以期促進不同文化背景人士之間的相互瞭解。這種開明通達的理念，應用於英語學習上，能使學習者格外重視語言與文化的相關課題，從而有助於有效學好語言的多元技能。

二、趙教授對一些僅以「辦洋務」為學習目的相當不以為然，她建議學習者應該用更寬闊的胸襟與視野去面對英語學習這件事，因為狹隘的功利動機必然會侷限學習的成果。 此外，她勉勵學習者必須重視英文文法與作文的學習，因為這樣做非但可以實確瞭解中英語文的異同，而且能培養適當的能力以期能將本國文化多多介紹給外國人。

三、趙教授認為在研讀英文時應同時兼顧品格的修養，所以她編選英文教材時刻意選用有助於個人修養的篇章。她這種做法不啻賦予英語之學習以人文

4. 阮日宣先生在《趙麗蓮傳》中指出這是一篇七萬多字的英文小說，他寫道：「趙以此文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博士名譽學位，後來在大西洋月刊發表，問世以後頗受美國讀書界的重視。」我請求國內外幾位友人幫忙找尋此文，由於欠缺相關卷期年月的線索，到 2007/5/10 脫稿為止，尚未找到，謹在此向所有參與協查的朋友們致謝。



晚年趙麗蓮女士與學生合照。
圖：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提供

教化的功能，說明了她並不滿足於語文純粹歸語文的做法。這種見解也可以進一步證明她一直懷著「經師人師」的自我期許。

四、所有這些理念或建言都直接間接反映在趙教授的演講與教材中，對她的眾多學生產生了耳濡目染的薰陶作用。這種難以量化的微妙影響，在談及趙教授的教育風格與整體功績時，確實具有特殊的意涵，因為她既以身為一位經師暨人師自居，她當然也指望學生們不會辜負她在語言技能之外有關提昇文化交流、品格陶冶及人文素養等方面的多重期望。她在〈臨別贈言〉演說中明白表示她對許多學生違背她的教誨竟至沉迷於金錢與權勢之追逐而感到失望，便是一個明證。可見，她是十分重視當今世人所樂道的「全人教育」理想的一位英語教育家。

五、倘若純就可以量化的或偏向英語能力層面的影響力來說，當然更容易看出趙教授所帶來的深遠的教育影響。林素娥教授在《兒童英語教學面面觀》的〈序言〉中便指出她何以能為「國小英語教學」系列演講很順利地邀請到堅強的講師陣容：「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都是當年『空中英文』的聽眾、《空中英語雜誌》的讀者，也是趙麗蓮教授當年為台灣英語教育播種而有現今豐碩成果的具體代表。」（頁v.）程建人部長也從趙教授「桃李滿天下」的事實來

反映出她的巨大影響。他在題為〈如何學好外國語文〉的演講中說道：「像我們那個時代，所有的學生大概都收聽過中廣的空中英語教室，也看過當年的英語學生文摘，多多少少都受到她的影響。尤其我們在報章雜誌常看到她發表的一些言論，大家對她都非常欽佩。她不但是一個了不起的英文教授，更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頁 184）

此外，前頭已提過，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的持續運作也代表著她的教育影響仍在不斷地延伸擴大之中。透過有關英教的多樣化活動，這個基金會將為台灣英教水準的提升，同時為趙教授的教育愛之傳揚，發揮一定的功能。

陸 結語：趙麗蓮教授是萬千學子永遠敬愛和感激的恩師！

一位善心人士葛鑽先生，為表達他對趙教授的景仰之情，捐出了二十坪土地，作為她永久安息之所。這個墓園位於台北縣金山鄉雲台樂園上方，依山面海，風景秀麗。尤其可貴的是，詩人余光中教授親筆為趙教授寫了一則十分親切感人的墓誌銘，拜讀再三，深深覺得這是對趙教授一生志業與功蹟所作的最優美也最中肯的一段總評，爰特轉錄於下：



趙麗蓮女士墓園，牆上有李登輝總統題字「徽流道弘」。
圖：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提供

安息在此的是一個美麗的靈魂。生前她具有智者的頭腦，仁者的心腸，健美的体格，清澈的語音。她是趙士北與白慧熙的女兒，唐榮祚的妻子，唐鴻光、唐鴻濱、唐楣的母親，但是對於無數的學生、讀者、聽眾，她永遠是眾所敬愛的趙麗蓮老師。無論在教室的內外，無論在退休的前後，無論氣候是晴是陰，無論身體有病無病，這位有教無類的老師永遠娓娓而教，諄諄而誨。她口頭教的雖是國



際的英語，身上流的雖有一半是西方的血液，但她的遺言，她的榜樣卻恆在提醒我們：莫忘愛國，莫忘做自尊自豪的中國人。在樂山樂水的福島福地，我們為她建造這安息的墓園，以表最高的崇仰，最深的懷念。（《財團法人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簡介》封面及《趙麗蓮教授嘉言錄》）

余教授評人論事，素以嚴謹公正著稱，如今他以詩人之筆，為同事多年且瞭解深刻的趙教授之終生功業，毫不含糊地打了「A+」的總成績，趙教授泉下有知，想必會欣然接納，無從謙辭吧！

總之，終身熱愛教育事業的趙教授，絕對是「一個美麗的靈魂」，是不折不扣的智者、仁者與勇者，是道道地地的人師經師的典範，更重要的，是萬千學子永遠敬愛和感激的恩師！

參考文獻

一、趙麗蓮教授著作部分

趙麗蓮編（1946）。**實用英文會話新編**。上卷。北平：麗蓮英文叢刊社。
趙麗蓮著（1946）。**高級英語講座**。北平：麗蓮英文叢刊社。
趙麗蓮編著（1946）。**日用會話**（英漢對照）。北平：麗蓮英文叢刊社。
趙麗蓮編著（1947）。**高級英語文法讀本合編**（上、下冊）。北平：麗蓮英文叢刊社。
趙麗蓮編（1951）。G. B. Shaw 著。**英文名著三十篇**。台北市：文星。
趙麗蓮撰（1952）。**英文法練習**。台北市：學生英語文摘社。
趙麗蓮編著（1955）。**英國會話（English conversation）**。台北市：正聲廣播。
趙麗蓮編著（1956）。**英語會話：今日美國新編**。台北市：正聲廣播。
趙麗蓮編著（1957）。**英文法作業手冊（Practical English grammar workbook）**。台北市：文星。
趙麗蓮選編，朱瑾章譯（1958）。**美國兒童文學名著選集**。香港：今日世界。
趙麗蓮著（1959）。**發音練習（Pronunciation exercises）**。台北市：學生英語文摘社。

趙麗蓮著（1959）。英語術法（**Skill & drill in English**）。台北市：學生英語文摘社。
趙麗蓮（1960）。〈怎樣學習英語〉。演講。發表於中國廣播公司。
趙麗蓮編著（1960）。高級中學英語。台北市：正中書局。
趙麗蓮著（1961）。英語詞解（**A guide to usage**）。台北市：學生英語文摘社。
趙麗蓮編（1962）。英文名著三十篇。台北市：文星。
趙麗蓮編著（1962）。初級實用英語。台北市：光復書局。
吳奚真撰；趙麗蓮校（1963）。初中標準英語。台北市：環球。
趙麗蓮撰（1963）。初級中學英語。台北市：正中。
趙麗蓮撰（1964）。高級中學英語。台北市：正中。
趙麗蓮演講; 蕭蘭男紀錄（1964/6/5）。臨別贈言。聯合報副刊。
正中書局編審委員會編；趙麗蓮校訂（1964）。初級中學英語。台北市：正中。
趙麗蓮編（1964）。高級中學英文：自然科組。台北市：正中。
林詩閣、趙麗蓮撰（1965）。高級中學英文教學手冊。台北市：正中。
趙麗蓮選；悠悠編註（1965）。英語幽默文選。台中市：美眾出版社。
趙麗蓮選；悠悠編註（1965）。英文短篇小說精選。台中市：美眾出版社。
趙麗蓮精選；陳虹編註（1965）。幽默文選：西洋笑話三百則。台北市：大眾。
趙麗蓮編（1966）。高級中學英文：社會科組。台北市：正中。
趙麗蓮編；中華電視台教學部主編（1972）。視聽英語講座。台北市：中華電視。
趙麗蓮、李燦然同編（1974）。英語入門。台北市：中國學生報。
趙麗蓮（1978/3/23）。東自東・西自西：一個混血兒的遭遇。聯合報，12 版，聯合副刊。
趙麗蓮（1988/1/3）。初見萬花筒：一個混血兒的遭遇 第一章。聯合報，23 版，聯合副刊。
趙麗蓮（1989/3/2）。贈言。中央日報，第十六版。
趙麗蓮、李燦然編著；中華電視台教學部主編（1984）。英語入門（**English abc**）。台中市：中國學生文摘。
趙麗蓮、吳奚真同編（出版年不詳）。實用英文法。台北市：光復。
趙麗蓮、吳奚真同編（出版年不詳）。實用高級英文法。台北市：光復。



Chao, Lilian （1964）. ***Farewell address***. Delivered in May, 1964, to the graduating class of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printed in Professor Lilian Chao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An Introduction. Taipei: Professor Lilian Chao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1990。

Chao, Li-lian （1976）. ***Chines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Taipei: Youth Cultural Enterprises Co.

Chao, Li-lian. "***Half Caste***." Atlantic Monthly （出版卷期年代不明）。

二、 有關趙麗蓮教授之著作部分

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主編（1990）。**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簡介**。台北市：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

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主編（1990）。**趙麗蓮教授贈言**。台北市：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

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編（1995）。**國中生如何學好英語**。台北市：書林。

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主編（2000）。**十分精采—名家談如何學英語**。台北市：書林。

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主編（2003）。**兒童英語教學面面觀**。台北市：書林。

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主編（2006）。**趙麗蓮教授嘉言錄**。台北市：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

阮日宣著（1957）**趙麗蓮傳**。台北市：文會。

台視文化公司製作（出版年不詳）。**面對當代人物**。臺北市：台視文化公司。

羊汝德（1964/6/6）。趙麗蓮杏壇悲歡。**聯合報**，03 版。

春馥（1964/6/27）。祝福偉大的廣播老師！趙麗蓮博士。**聯合報**，07 版，聯合副刊，新藝。

余光中（1990）。趙麗蓮教授墓誌銘。轉載於**財團法人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簡介**及**趙麗蓮教授嘉言錄**。

余玉照（1989/3/2）。趙麗蓮教授的「贈言」。**中央日報**副刊，第十六版。轉載於**財團法人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簡介**。

余玉照（1989/6/15）。她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中央日報**副刊，第十六版。

戴瑞明；林黛嫚整理（1989/6/13）。眾人師　眾人母。**中央日報**副刊，第十六版。轉載於**財團法人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簡介**。

秦賢次（1989/6/13）。〈全世界都有她的學生—一生熱愛中國的趙麗蓮博士〉。**聯合報**副刊。轉載於**財團法人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簡介**。

（作者不詳）（1990/9/25）。總統褒揚趙麗蓮。**聯合報**，14 版/大台北新聞。

林滿秋等（2000）。終生奉獻英語教育的鵝媽媽—趙麗蓮。載於**台灣心女人**。頁 39～40。

林滿秋等（2000）。背後有神秘贊助者？《學生英語文摘》發行破萬的秘辛。載於**台灣心女人**。頁 41～43。

（作者不詳）（日期不詳）。耄耋之年與癌奮戰的趙麗蓮博士。**健康通訊雜誌社**。http://www.ganoderma.org/health/vop/vop-005.htm

孫震（2000）。序言。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編（2000）。**十分精采—名家談如何學英語**。台北市：書林。xi～xiv.

程建人（2000）。如何學好外國語。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編（2000）。**十分精采—名家談如何學英語**。台北市：書林。183-193.

朱炎（2000）。一種外國語文，一個新奇世界—我學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經驗。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編（2000）。**十分精采—名家談如何學英語**。台北市：書林。143～155。

林茂竹（2001/12/21）。趙麗蓮退休前的臨別贈言。**中央日報**，全民英語專刊，第十六版。

林素娥（2003）。序言。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主編（2003）。**兒童英語教學面面觀**。台北市：書林。v～ix.



附錄一

趙麗蓮教授（1899.12.9～1989.6.12）年表

1907 年　9 歲	隨父母到上海進入一所美國學校。
1909 年 11 歲	赴德國就讀萊比錫音樂學院。
1911 年 13 歲	中國革命成功，休學返國。
1913 年 15 歲	舉家遷居北平。
1915 年 17 歲	回萊比錫音樂學院復學，獲音樂碩士學位。
1919 年 21 歲	任教北平女子高等師院（後升格為女師大），教音樂與家政，正式開啟了教書生涯。
1920 年 22 歲	與唐榮祚（前內閣總裡唐紹儀之姪子，伊利諾州大學土木工程學士）結婚。
1921 年 23 歲	任教北平中國大學，開設英語會話等課程。
1922 年 24 歲	任教國立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
1925 年 27 歲	任教北平國立藝術專門學校（該校於 1928 年改名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
1927 年 29 歲	與劉天華、蔡元培、蕭友梅、劉半農等三十五人創立「國樂改
1928 年 30 歲	任教國立北平大學女子學院（1931 年改名女子文理學院）及女
1930 年 32 歲	與唐榮祚離婚，在這段十年婚姻中育有一女三子（唐楣、唐鴻光、唐鴻柱、唐鴻濱）。
1931 年 33 歲	任教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體育系，教舞蹈操琴課程。
1936 年 38 歲	任教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教英文系課程。
1937 年 39 歲	任教國立北京大學。
1936～1941 年	任教私立燕京大學。
1942 年 44 歲	因愛國抗日行為遭日軍囚禁於集中營半年，備受酷刑。
1946 年起 48 歲	在北平廣播電台開啟「英語講座」節目，成為我國從事空中英語教學的第一位教師；編著《實用英語會話新編》（上卷）及《日用會話》（英漢對照）等書。
1948 年 50 歲	於 10 月 13 日來到台灣；任教台灣師範學院。

1949 年 51 歲	在中國廣播公司演講「怎樣學習英語」，甚受好評，旋即受聘主持「空中英語教室」節目；發行《學生英語文摘》（The Student's English Digest）。
1950 年 52 歲	兼任台大外文系教授。
1952 年 54 歲	轉任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仍兼任師院教職（直至 1955 年始辭）。
1960 年 62 歲	由中廣轉往教育電台開闢「趙麗蓮英語時間」。
1965 年 67 歲	自台大外文系退休。此後仍先後在政大、清大、交大、輔大、中央警官學校等校兼課。
1972 年 74 歲	在中華電視台開闢「鵝媽媽教室」，致力兒童英語教育，成為第一位從事電視英語教學的本國教師。
1981 年 83 歲	榮獲新聞局優良電視節目金鐘獎「特別獎」。
1984 年 86 歲	結束空中英語教學工作，此後仍在家裡開班教兒童英語。
1989 年 91 歲	6 月 12 日因血癌併發肺衰竭，病逝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壽九十一歲;榮獲總統褒揚；次年 2 月，「財團法人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獲准成立，以「推廣英語教育，促進文化交流」為宗旨。

附錄二

贈　言

趙麗蓮 演講
蕭蘭男 翻譯

孩子們：

我想把要在明天「謝師宴」贈給你們的一段話，提前在今天給予你們，因為我要說的一些個東西中警惕你們的話要遠比祝福你們的話為多。

今年我決定告別杏壇了，一方面由於我發現我真的已經老得該退休了，另一方面這將近四十五年的教書生涯，也委實使我的身心很倦乏了；所以你們將是我教的最後一班學生，我對你們每個人的期望都很高，我真的不希望你們再讓我失望了。在以往數十年的教書生涯裡，我對大部份我



教過的那些孩子們很失望，他們出了校門沒幾年，就把我平日教誨他們的道理拋得遠遠的。你們要知道是什麼毀了他們嗎？對「金錢」與「權勢」的追求，控制了他們整個的身心。

金錢是重要的，但是它絕不值得我們以整個生命去尋求；由歷史裡我們可以得知，「錢財」似乎很少不會破壞了一切美的事物與美的德性，原因很簡單，每當你得到了一筆巨額的錢財，你會希求得到比這更多的錢財，這樣沒有終止的追尋下去，直到生命旅途的終站，你仍舊不會滿足的。我總以為「錢財」所帶給我們的罪惡，要遠比它能帶給我們的幸福為多。就以我本身來作個例證吧，我生長在一個很富有的家庭，長大以後，我嫁到一個更富裕的人家，可是正因為這「錢財」，分散了我自己的家，拉長了我與親朋間的距離，和剝奪了我幸福的一生；除此之外，似乎它什麼也沒有帶給我過。所以孩子們:我永不會希望你們中間能出幾個著名的大富翁，因為它能很輕易的奪去你們一生的幸福。

其次是「權勢」，這也是對青年人誘惑力很大的東西。你們現在還太年輕，也許不會懂「權勢」是多麼的可怕。我曾親眼見過多少有為的青年，因為追求權勢而反為權勢所毀。為什麼不讓我們每個人，只希望好好的盡到自己崗位上的職責呢?在這國家多難之秋，我們每個人應該努力的目標，該是力求把份內的工作做得盡善盡美。西諺說得好:「長江大河是由無數滴小的水珠匯聚而成的。」孩子們：還有一個多月，你們都要單獨起飛了，我不希望你們飛得太高，我只希望你們都能飛得很平穩就好了。在往後的歲月裡，如果你們只知一味的追求「權勢」，到末了你會發現，你在這世界上一無所有；正因為我不希望你們老年再為此而遺憾，所以我誠摯地希望你們牢牢的記住這一點。

最後我要告訴你們的是：不要依賴任何人。不要因為有父母，有知心的好友，有權勢的親戚可靠，就自由鬆懈了下來。在這一切都在變動的世界上，一切都會很快過去的；如果有那麼一天，你們再去依賴誰呢？孩子們：對自己一定要有堅強的信念，因為在這世界上沒有人可以陪伴你一生

的，即使你有了太太，你終究有孤獨的一天；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可能多多充實自己，並且也要盡可能養成自己的獨立性；你們知道嗎？友誼是一種犧牲，正如同愛也是一種犧牲一樣；千萬不能養成依靠別人的心理，上帝不也只幫助那自己肯幫助自己的人嗎？孩子們：記牢你們自己的命運是由你們自己來掌握和主宰的，相信命運，只不過是弱者的託辭罷了！

人生的視野對於我是越來越模糊了，而你們卻剛要跨入人生這大舞台的中央；孩子們，我並不傷感，因為生命必然是有些在成長、在茁壯；有些在衰退，在慢慢凋謝的。我的這一點點的人生經驗，是我唯一能給予你們每一位的畢業禮物：將來不論你們漂泊到何方，也不論你們做那一項的工作，我希望你們的一舉一動，做得像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並且你們更應該以能做一個中國人為榮。我一點不為個人得到的一點點知識而自豪，我唯一覺得驕傲的是，我能有機會把我所知道的這麼一點點，完完全全的給予你們這年青的一代。你們還有一段不算短促的歲月，我也希望你們都能有機會把你們自己的一點點知識，完完全全的貢獻給多難的國家。我不敢確信我們是否還能再見面，不過，孩子們：只要你們能以我的話，作為你們待人處世的準則，我們不就等於天天見面一樣了嗎？

蕭蘭男紀錄

在今天上「西洋文學名著」的時間裡，趙麗蓮教授提前給我們同學一份畢業禮物—她的臨別贈言。這是她離開教書生涯前，特為我們而發表的最後一篇演說。當她告訴我們，她決定今年暑假告別她守了快四十五年的教職時，我心裡也因為太多的感觸和難受，情緒激動得很厲害：由於男孩子的自尊心，使我強忍住了行將奪眶而出的淚珠。我們真幸運，也真不幸，幸運的是，趙教授在臺大的最後一年教了我們；但也由於她的告別杏壇，為我們平添了在畢業前有了太多的感傷。為了這是趙教授在講台上的最後一次講演，我以最謹慎與虔敬的態度，用意譯的方式兢兢業業地把她的講詞譯了出來；我謹以此文來表達出她最後一班學生所能給予她的最大敬意。



李梅樹（1902～1983）

獨「樹」一格的美術教育家

歐素瑛 撰文／國史館協修



壹 家世與求學

李梅樹，1902 年 3 月 13 日出生於今台北縣三峽鎮，在家中排行第二，上有一兄及姐妹二人。父親李金印，從事糧食、米及日常用品的買賣，日積月累，成為三峽數一數二的大家族。母親李劉水，長兄劉清港（1885～1930），長李梅樹十七歲，因父親入贅劉家而從母姓，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先後在總督府基隆醫院、三井合名會社台灣出張所大豹派出員附屬醫院服務，之後，返鄉行醫，在三峽鎮上開設「保和醫院」，為三峽地區第一位公醫，歷任三峽第一至五屆庄協議會議員，對地方事務頗為關切。由於家庭環境的薰陶，李梅樹從小就對音樂、美術產生濃厚的興趣，尤其對繪畫最為醉心。1910 年入三角湧公學校，五年級時，正值祖師廟第二次修建，他時常在廟前嬉遊，廟宇建築及各種忠孝節義的裝飾題材，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六年級時，受業於日籍教師遠山巖，開始接觸西洋繪畫，初習鉛筆畫及水彩畫。公學校畢業後，就讀公學校實業科農業課程。

1918 年，考進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開始接觸較正式之美術教育，接受安東豐作和田林壽美兩位老師的指導，學習基礎的圖案描繪，且接觸水彩、油畫等創作素材後，對繪畫更加著迷，矢志以繪畫為業，並自日本郵購訂閱有關美術方面之雜誌《講義錄》，自修研習美術知識及技巧。翌年，領導發起舉辦全校學生美展。1922 年自國語學校畢業後，原擬赴日入東京美術學校進修，惜因父親不允而不克成行，不得已乃返鄉任教，並奉父親之命於是年與林粒女士結婚，希望藉此打消其赴日求學的念頭。婚後林氏除了相夫教子外，始終默默支持李梅樹的畫業及其他的一切作為。

然而，李梅樹不但未因此平息其追求藝術的熱情，反而更加殷切盼望早日實現衷心嚮往的理想。1924 年，李梅樹調至三峽公學校任教，課餘之暇，更加專心致力研究畫藝，並利用暑假返回母校，參加石川欽一郎（1871～1945）組織之「暑期美術講習會」，同期會員有陳植棋、李石樵、李澤藩、葉火城、楊啟東、陳英聲、倪蔣懷、藍蔭鼎等。1925 年，其父李金印過世。1926 年，調至

鶯歌庄尖山公學校任教。1927 年，作品入選於台北州國語（案：指日語）日海報展募集；同年，油畫作品「靜物」入選第一屆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次年，油畫作品「三峽的町裡」入選第二屆台展。這兩次入選，不但使李梅樹漸在畫壇嶄露頭角，也使家人確信他的稟賦和志向，不再堅持其往政治方面發展，終於 1928 年 11 月與陳澄波一同前往日本，終日奔波於川端畫學校、新宿同舟舍、本鄉繪畫研究所等處，日以繼夜，勤練素描，積極準備東京美術學校的入學考試。



日本東京美術學校時期（1929～1934）與同學合照。（右二為李梅樹）
圖：李梅樹紀念館提供

1929 年 3 月，李梅樹通過東京美術學校西畫科入學考試，師事日本畫壇大師長原孝太郎（1864～1930），並以「台北醫院之庭」入選第三屆台展。二年級時，從小林萬吾（1870～1947）學習人體素描，奠定了其後寫實風格的深厚根基。三、四、五年級時，在岡田三郎助教室研究油畫，並以「秋色」、「織物」，分別入選光風會展、第五屆台展。由於長兄的鼓勵及經濟無虞，使李梅樹得以毫無顧慮地投身於藝術之中。不料二年級第一學期行將結束之際，長兄突然因病過世，家中重責頓時落在李梅樹的肩上，不得已休學一學期，暫留台灣。但他並未因此放棄習畫，仍以作品「朝」入選第四屆台展。之後，不顧母親和親友的勸告，於 1931 年再度束裝赴日，繼續未完成的學業。期間，李梅樹對美術活動頗為積極熱心，曾參與「光風畫會」、「赤島杜」等畫會。其中，「赤島杜」係 1927 年由東京美術學校的留學生與校友，如顏水龍、陳澄波、楊三郎、廖繼春等人在台成立的美術團體，他們每年趁寒暑假返台推動展覽，以促進台灣新美術活動，提高同好之藝術水準，李梅樹於 1930 年亦加入該社，並數度參與該社舉辦之畫展，進而成為主要推動者之一。

貳 畫展模範生



李梅樹作畫的神情。
圖：李梅樹紀念館提供

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李梅樹積極參與美術展覽的競賽。由台灣教育會舉辦的十屆「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競賽，到台灣總督府主辦的六屆「府展」競賽，李梅樹從未缺席，每年均有作品參展，可以說是美術展覽的模範生，也為台灣美術史留下許多精彩的畫作。

1927 年「靜物」、1928 年「三峽後街」先後入選第一、二屆台展。1933 年，以一幅「自畫像」入選第七屆台展特選獎。同年，完成東京美術學校畢業作。1934 年，以作品「水牛」、「切蕃薯之女」入選第八屆台展，作品並為台灣總督府購藏。同年，東京美術學校畢業，返台後被任為三峽庄協議員。11 月 12 日，與畫友廖繼春、楊三郎、陳澄波、顏水龍、李石樵、陳清汾及立石鐵臣等七人，於台北鐵道旅館共同創立「台陽美術協會」，為日治時期由台灣畫家所主導的最大民間美術團體。會員幾乎網羅島內第一流的的中堅畫家和雕刻家，加上原先發起的八位核心成員，成為台灣民間新美術運動的主流。除了會員互相切磋琢磨外，並鼓勵培養美術人才，定期舉辦美展更成為美術界矚目的焦點，逐漸成為官方的台展之外最大的美術盛事，帶動另一個美術季的高潮。

1935 年，李梅樹以「小憩之女」獲第九屆台展特選第一席，並榮獲台灣總督獎。11 月，招待日本著名畫家梅原龍三郎、藤島武二及鹽月桃甫等遊歷三峽。1936 年，李梅樹作品「黃昏時」獲第十屆台展入選，並再度以「睡覺的女人」獲第十屆台展特選，同時被推薦為「免審查」資格，這在地方父老的心中乃是無上的榮耀。1937 年，獲「台日文化獎」，並以「安平風景」等七件作品參加第三屆台陽展。然而，李梅樹為進一步印證自己的畫藝，乃決定重返日本試驗自己的繪畫能力，挑戰以日本天皇之名舉辦的最高等級美術展覽「新文展」的競賽。1939 再度赴日，租了一間畫室，專心準備參加日本東京帝國美術學院



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同年以「紅衣」入選第三屆文部省美術展覽會（簡稱文展，即原帝展）。1940 年，李梅樹再度赴日參展，又以作品「花與女」入選與帝展同性質的「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展」，自此奠定其為台灣傑出西洋美術家的歷史地位。1941 年，他滿懷信心再度赴日，欲突破三次入選帝展，以取得無鑑查資格。然而，此時因太平洋戰事爆發，不得不取消赴日計畫，因而失去進階「無鑑查」資格的機會。

戰後初期，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委託繪製孫逸仙先生和蔣介石總統的肖像。同時，由於省展開辦及台陽展恢復展出，刺激美術家們再度奮起的雄心。戰前的美術運動風潮又再度重現，李梅樹當然也不落人後。在現實主義的鼓舞下，創作出企圖心旺盛的幾幅大場景、大尺幅的巨構，如 1946 年參加省展的「星期日」，此圖因被省政府購呈蔣介石總統而聲名大噪，其後以「黃昏」（1948）與「郊遊」（1948）參展第三屆省展，更被視為李梅樹創作中的代表性作品。其中「黃昏」一件，成功地將米勒的田園風格，融入自己的畫風中，借用西方的形式來描繪本土的素材，長久以來被視為李梅樹一生的代表作。畫中的農婦既樸拙又高貴，壯碩卻又優雅，在她們的身上含有兩種不同的文化品味。從學院的美學觀之，此一時期可以說是李梅樹在畫壇聲譽最為隆盛的時期。

參 畫作風格的演變

在台灣繪畫史的研究中，一般將李梅樹的創作風格分成早、中、晚三個時期。早期係指 1924 年至 1948 年的創作，稱為外光派時期；中期為戰後初年至 1977 年生病住院前的創作，稱為台灣本土時期；晚期為生病痊癒後到 1983 年過世前的創作，稱為回歸自然時期。在這三期中，以中期的風格最受爭議，藝術評價也呈現兩極化看法。

首先，為外光派時期。在日本求學期間，正值野獸主義等繪畫思潮風行日本畫壇之際，李梅樹課餘時也經常去聽野獸派畫家演講，並觀賞其畫展，但並未因此動搖，仍堅決走自己所喜好的外光寫實風格，並選擇進入岡田三郎助教室學習。岡田三郎助是西歐風情日本化的倡導者，以典雅、細膩的外光寫實著

稱，也是帝展和東京美術學校最主要的風格，李梅樹受其影響，返台後，仍繼承此一風格，以自然客觀的寫實風格，描繪故鄉的風土人情，但技法和品味仍不脫西歐風情，將西洋藝術和台灣本土間取得相當的協調，因而獲致好評。代表畫作有「切蕃薯之女」、「編物」、「小憩之女」、「黃昏」等。

其次，為台灣本土時期。戰後，李梅樹自出任三峽街代理街長開始，之後一連串的公職，使李梅樹的心力逐漸由繪畫轉移至地方事務，尤其 1940 年代後期出任長福巖清水祖師廟重建主持人後，更集三峽政治、文化、宗教事務於一身，幾無暇專心從事繪畫，只有在省展、台陽展等大美展來臨時才看得到他的作品。在畫風上，由於沒有時間在構圖上思索，也沒有精力再去研究西方大師的風格，李梅樹只有就地取材，逐漸告別西洋觀念的詮釋時代，回到充滿深情的台灣本土。然而，由於他的畫中全是台灣社會的寫真，缺乏西洋美術的景象，明顯違反學院派的美術創作風格，以致備受冷落，甚至被視為退步、保守，深受外界的批評與貶抑。另一方面，憑著他對藝術的熱愛及寫實畫風的堅持，在繪畫藝術方面著有成就，並贏得「台灣寫實美術巨擘」的美譽。此一時期的代表畫作有「露台」、「採茶少女」、「佛門少女」、「窩邊斜陽」、「端莊佳人」、「晴朗」等。

接著，為回歸自然時期。1977 年，李梅樹因嚴重胃出血而入院，在醫生已宣告無救的狀況下竟然醒轉，死而復生，使其心境有很大的轉變，特別是病後曾兩度由子女陪同赴日本休養，得以暫時拋棄長福巖祖師廟等繁瑣的地方事務，在國外的悠閒時光，李梅樹隨心所欲地描寫大自然的豐富變化，一種怡然自得的體悟洋溢在他的作品中，這樣的情緒彌漫在他晚年的作品中，一直到 1983 年過世為止。此一時期的作品，以大自然的風景描寫為最常見的主題，特別強調人與大自然在光線的交融下所產生的感動。其晚年的創作重點已不在人物的身上，而是在光線的捕捉，代表畫作有「三峽春曉」、「戲水」、「清溪浣衣」、「秋到樹梢」、「秋色」等。



肆 長福巖祖師廟的修建



擔任台北縣議員時留影。（右為李梅樹）
圖：李梅樹紀念館提供

在台灣本土畫家中，李梅樹是唯一同時活躍於政壇和藝壇的人物。由於其父兄早年參與地方事務，且甚獲人望，加上李梅樹本身卓越的領導才能及其學養與藝術上的成就，因而步上仕途。1934 年 10 月，李梅樹被任命為三峽庄第八屆庄協議會議員。1935、1938 年，再度當選為民選三峽庄(街)協議會議員。1942 年，出任三峽街茶業組合長，任內大力推動合作生產事業，將三峽地區各茶葉工廠合併，開創製茶業的企業化管理，大幅提升茶葉的品質和產量；1943 年 4 月，任三峽街警防團長，領導地方青年義務擔負起維持地方秩序和安全的工作。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投降，在政權轉移之際，李梅樹被推選為三峽街代理街長，維持地方治安。1946 年，三峽街改制為三峽鎮，成立鎮民代表會，李梅樹當選為第一屆鎮民代表，進而被推舉為鎮民代表大會主席。1947 年二二八事件期間，三峽民眾群聚在三峽舊戲院召開人民大會，決議聲援台北的行動，但李梅樹呼籲民眾冷靜，千萬不可輕舉妄動，如此才免除一場災禍。然而，李梅樹最好的畫家朋友—陳澄波卻於嘉義三二事件中被槍殺，令他十分難過，且因擔心受牽連，燒掉許多陳澄波寫給他的信。1948 年，李梅樹就任三峽鎮農會理事長兼合作社理事主席。接手之初，農會虧損達 130 餘萬元，經李梅樹的認真經營，半年內即將虧空填足，並購買 4 甲餘土地及卡車，逐次建設，至 1952 年時，成為全台農會第一名。1950 年，台灣開始實施地方自治，李梅樹參加台北縣第一屆縣議員選舉，順利當選，之後，又連任兩屆。在縣議員任內，曾參加台北縣長的選舉，雖未能如意，但他在建設地方的自我期許之下，更專注於長福巖祖師廟的建廟工程之上。

長福巖祖師廟創建於 1769 年，歷經三度重建。第一次因大地震原廟被毀，經於 1833 年重建；第二次因 1895 年甲午戰爭失敗，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三峽地方民眾不願受異族統治，乃以祖師廟作為反抗大本營，事敗後，廟堂遭日軍焚毀，直到 1899 年才再度重建。第三次重建，始自 1947 年春。由於舊廟年久失修，早已殘破不堪，地方士紳遂起議集資重修祖師廟，加以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徵調赴海外作戰的三峽青年因帶有祖師廟的香火包而能平安歸來，因此聯合請願修廟。陳炳俊、李梅樹及劉鉅篆等在鄉人的請託下發起組織重修委員會，並推選李梅樹為委員會主席，擔負起三峽祖師廟的重修、擴建工程，前後三十六年，直到 1983 年過世為止。最初，地方人士打算在兩、三年內修建完畢，並舉辦慶成建醮，但李梅樹獨排眾議，主張有計畫的整建，從設計、考證到監工、用料都親自規劃，耗盡心思，不計個人的奉獻。同時，投入祖師廟的重建工程，也使李梅樹對台灣民間藝術有了更深切了解，從而對周遭環境的一切產生微妙深刻的感情，村人們樂天知命、溫良純樸、勤儉克苦的天性，予人非常親切的形象，一直推動著他揮舞彩筆，將自己衷心喜愛的一切事務展現在畫布上。

長福巖祖師廟重建的細緻、考究，其成就都是由李梅樹所促成。重建期間，由於施工期的緩慢而招致諸多批評，甚至有藉神明附身傳達神意者，但李梅樹皆不為所動，繼續執著於遠大的理想，他的目標是既要使它具有一般廟宇所擁有的宗教信仰的功能，又要融入台灣的歷史、倫理、文化、藝術，使它兼



李梅樹在祖師廟工作時留影。
圖：李梅樹紀念館提供



清水祖師廟整建中舉行的慶典。
圖：李梅樹紀念館提供



具教化和審美的效果，成為一座博采眾家的「東方雕刻藝術殿堂」。



李梅樹（右二）指導清水祖師廟畫師作畫。
圖：李梅樹紀念館提供

為了達成此一目標，李梅樹帶著許多委員遍尋全台手藝精巧的工匠藝師，並邀請當時台灣建廟的一代宗師陳應彬及其團隊前來主持祖師廟的大木結構。又根據祖師廟以石為基身，以木為頂蓋的特點，請來蔣銀墻、施天福、陳英宏、簡芳雄、黃龜理、李松林、郭來福、林松等石雕、木雕名師進行雕飾。在李梅樹的督導下，每件雕刻都必須依照設計圖樣分別製作，不論石柱、石珠或是陰刻浮雕，在動工之前，李梅樹都先審定原稿，定稿之後，再由匠師描定，透過手鑿，一斧一鑿地將筆意呈現出來，因此完成後的浮雕、陰刻如同原作般流暢。另外，李梅樹也邀請王逸雲、林玉山、郭雪湖、陳進、傅狷夫、歐豪年等名書法家、畫家提供其作品，再請匠師雕刻在廟中的石柱和牆壁上。全廟以雕刻代替彩繪，從壁面、樑柱、藻井、斗拱、雀替，無一不雕、無一不鑿，從木雕到石雕，充分運用圓雕、浮雕、透雕、陰刻等多樣技法，有著極高的藝術價值。

伍 美術教育的推動與落實

1960 年代以後，李梅樹也同時擔任美術教學工作，將他對繪畫藝術的熱情投注在教育崗位上作育英才。1962 年，應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之邀，擔任藝術研究所教授。1964 年又應聘在大學部美術系上課。同年 7 月，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校長鄧昌國在美工科主任施翠峰推介下，力邀他出任美術科教授兼主任，至 1972 年 7 月屆齡退休為止。李梅樹就任後，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進，除增設美術科夜間部，分國畫組和西畫組外，1968 年起，引用建教合作的方式，將長福巖祖師廟重建的部分雕塑工程，提供給學生作為實習之用，例如前殿內壁兩側的銅浮雕、中殿左右側擺置的八尊銅像，以及正殿的龍頭等，將學院專業技藝應用於傳統寺廟建築中，可說是台灣藝術教育之一大創舉。1967 年，創辦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雕塑科，並兼主任，從事美術教學和行政工作，以其豐富的經驗培育專業人才，迄今仍是國內深研雕塑藝術的專門科系之一。



李梅樹晚年在清水祖師廟前與自己親手刻的石獅合照。
圖：李梅樹紀念館提供

1969 年，李梅樹首創台灣國內美術科系巡迴全省舉行畢業美展。當時只有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舉辦巡迴全省的畢業美展，李梅樹規定學生畢業時所完成的畫作規格必須大於其他學校，且每逢畢業美展前夕，總是不辭辛勞、挨家挨戶地到學生家裡幫忙改畫，改到半夜兩、三點是常有的事，而且，為了籌措學生畢業巡迴展的經費，還曾義賣其油畫作品兩幅。1970 年，李梅樹創立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美術科研究室，募集專款二十萬元，充實圖書資料，可見他對美術教育無私的奉獻。然而，1960 年代台灣的學院美術籠罩在印象派和野獸

派的世界中，而學院外的世界則是抽象畫風起雲湧之際，李梅樹的寫實創作風格因而被視為退步、保守、甚至俗氣，飽受藝壇譏評，只有初入學者才會也才敢站在李梅樹的畫作前欣賞，而學生亦認為他趕不上抽象主義的思潮而有所質疑，即使如此，李梅樹仍自信地朝著寫實主義的道路昂然前進，並希望學生能接受多元文化的薰陶，進而認識台灣鄉土文化。1972 年，李梅樹獲聘為文化學院終身職的華崗教授。1975 年，應聘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為美術界作育英才無數。

此外，李梅樹自 1946 年應聘擔任第一屆台灣省美展審查委員，並連任至 1973 年第二十七屆省展審查委員，對於美術的推動盡心盡力。1971 年 12 月，當選全國好人好事代表，榮獲嚴家淦副總統頒贈「德藝兼修」匾額。1974 年 3 月 25 日，與畫友共同創立中華民國油畫學會，並任常務理事。同年，獲聘為第七屆全國美展審查委員、省展評議員。1976 年，被推為中華民國油畫學會第二屆理事長。翌年，被推為台灣中國美術協會理事長。1979 年 11 月代表美術界參加國建會，建議籌建現代美術館、緩徵畫家售畫所得稅、政府或民間基金會典藏參加競獎之優秀作品、各階段美術教育課程應延聘專家審慎研擬等。1981 年，被推為中華民國油畫學會榮譽理事長。1982 年 12 月 25 日起，應國立歷史博物館之邀，舉辦「八十回顧展」，並出版《李梅樹油畫集》。1983 年 2 月 6 日，李梅樹因慢性阻塞性肺炎病逝台大醫院，享年 82 歲。同年 12 月 24 日，李梅樹倡議成立之台北市立美術館開館，為台灣首座現代美術館，並舉辦「李梅樹遺作展」。



1969 年李梅樹擔任全國美展審查委員。
圖：李梅樹紀念館提供

李梅樹是台灣美術史上相當重要的本土畫家，一生堅持以東京美術學校所習得的寫實路線，擁抱台灣鄉土之美。綜觀其一生，不僅在藝術上有不凡的成就，並且以藝術家身份投入建廟工作，將畢生歲月完全奉獻在故鄉的藝術創作與民間的公共事務上。由於他的藝術創作，在人們的心中三峽、祖師廟、李梅樹已畫上等號，在台灣美術史上寫下燦爛傳奇的一頁。

參考文獻

林玉娟、邱桂香編輯（1993）。**李梅樹畫集：李梅樹紀念館籌備基金展**。台北市：亞洲藝術，初版。

湯皇珍（1995）。**三峽・寫實・李梅樹**。台北市：雄獅，二版。

李梅樹紀念館著作編輯（1995）。**李梅樹與三峽祖師廟**。台北縣板橋市：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倪再沁著（1996）。**茲土有情：李梅樹和他的藝術**。台中市：台灣省立美術館。

李玉玲總編輯（1997）。**風土民情：李梅樹作品展**。台北市：台北市立美術館。

蘇振明編著（2001）。**人親土親：李梅樹百年紀念特展專輯**。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吳立萍（2002）。**三峽：李梅樹藝術步道**。台北市：貓頭鷹出版。

王淑津（2001）。三峽地方文化的美術實踐者—李梅樹。收入莊永明總策劃，**美術台灣人**。台北市：遠流，頁 72～79。

李梅樹教授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2001）。**李梅樹教授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北大學人文學院。

喻蓉蓉（2001）。畫家以外的李梅樹～熱心公益與從政生涯。**歷史月刊**，第 167 期，頁 22～30。

喻蓉蓉（2002）。一手彩筆一手政治的縣議員畫家～李梅樹。**傳記文學**，第 80 卷第 2 期，頁 4～23。

喻蓉蓉（2002）。畫家以外的李梅樹～三峽祖師廟重建的靈魂人物。**歷史月刊**，第 170 期，頁 4～12。

喻蓉蓉（2003）。李梅樹的畫與畫背後的故事。**歷史月刊**，第 185 期，頁 4～12。



何　容（1903～1990）

何容這個人

方祖燊 撰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退休教授



◆ 何容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品文作家、語言學者、文法專家、國語運動的大師，為臺灣國語文教育奉獻了一生的偉大教育家。

何兆熊先生（1903-1990），字子祥，號談易，筆名老談、何容；遂以「何容」名世。河南深澤人。國立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參加革命軍北伐，腿部中彈受傷；為政治指導員，撰有《政治工作大綱》，一舉成名，成為林語堂《論語》派的作家，與老舍、老向，並稱「幽默三老」。進入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為編輯，是他參與「國語教育」與「國語運動」的開始。為北京大學兼任講師教「中國文法」，是他研究「語言結構」與「圖解文法」的開始。

抗戰期間，在武漢主編《抗到底》，寫鼓兒詞、相聲等宣傳抗日。在重慶主編《抗建畫刊》以輔導傷兵。後轉入「國語推行委員會」為專門委員，擬訂推行國語政策，開辦國語訓練班，並出任四川社會教育學院國語專修科主任。

抗戰勝利，和魏建功一起來臺，設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魏為主任委員，何為副主任委員。臺灣一般人在日本佔領五十一年之後，只會日語日文，連閩南話、客家話、原住民語都幾乎消滅，更不懂漢字國文。在這樣困難之極的時空下，他們擬訂推行國語的綱領，策畫推行國語的辦法，恢復臺語來推行國語。但不久，魏建功回北大任教。何容繼任主任委員，遂一肩扛起「在臺灣推行國語的重擔」，從各學校各階層各機構各地方去教授標準國語，去散播語文教育，並邀集國語文教育的工作者創辦《國語日報》，為副董事長、董事長、發行人。《國語日報》出版了上千種「字字注音」的兒童讀物、書籍、字典與辭典。

在他領導之下，大家經過三十多年努力，現在我們都會講國語，讀古書，寫白話文，理解傳統文化，吸收最新知識。他的著作有《何容文集》甲乙丙編四冊，還有《中國文法論》、《簡明國語文法》等。



壹 前言

洪炎秋等著的《何容這個人》[1]，收有 60 篇有關描寫「何容先生事蹟」的文章。最後兩篇：〈何容傳略〉與〈何容年譜〉應該是何欣先生所寫的。其他作者有的是何容先生的同學、朋友、同事，還有他的部屬、學生。他們從各個角度，各寫一篇與何容先生交往、相處、共事時候的印象與觀感。

「人物傳記」要有資料的根據，才能寫得真實。如司馬遷寫〈晏嬰傳〉，就從《晏子春秋》中抄兩三則軼事構成，而且一字不改；寫〈仲尼弟子列傳〉就從《論語》中，摘錄一些資料寫成。我寫《何容這個人》，是以〈何容傳略〉與〈何容年譜〉兩篇做主幹，再從其他作者的文章裏，摘取一些相關的資料插入，最後濃縮剪裁改寫成這一篇「編年中紀事體」的傳記。其年代有錯誤的，加以糾正。不夠的，另據其他資料補充。有些地方，略加描述，以增加讀趣。

「傳」取名《何容這個人》，係因想不出比「這」更好的名稱。有訂正與補充的地方，才加「注腳」；出於傳略與年譜的則從略。

貳 何容先生的生平事蹟

一、何容的誕生與家世

何容先生，原名兆熊，字子祥，號談易。於 1903 年農曆 6 月 1 日，生於河北省深澤縣小堡村。祖父用翔，字曉山。父親自勤，字所安，曾經營錢莊失敗，轉往石家莊煤礦及六河溝煤礦任職。母親李氏，世居東焦家莊。兄兆瑞，字玉豐，在家種田。妹嫁安平縣馬營村馬僧推，早逝。

二、何容受教育的歷程

何容先生，在 1916 年小學畢業，進入深澤縣立師範講習所，在附屬小學實習教學，很有一套。次年，他出天花，在臉上留下一些麻子[2]。1918 年，前往

1.《何容這個人》，民 81 年（1992 年）7 月，國語日報社出版，25 開本 296 頁，約 21 萬字。
2.見《何容這個人》頁 87，司重三〈何容的一段事〉。

天津，考入直隸省立甲種水產學校，學水產製造。——1920 年，他 17 歲，娶鄰近安國縣南鄉北馬村邢氏為妻。——1921 年，水產學校畢業，學校有意留他當助教；他沒有接受。1922 年農曆 3 月 20 日，長子何欣出生，19 歲當上了父親。

這年暑假，他從天津到北平，報考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的前身），沒有考上。搬到順治門內悅賓公寓，進補習班惡補，在寒冬夜裏，披着棉被背書。苦讀了一年，到 1923 年暑假，先考取高等師範學校，又考取北京大學預科乙組 B 班；他選擇了北大，跟白滌洲（鎮瀛）、王向辰（煥斗，老向）、洪炎秋（楙）為同學。讀完了預科，進入英國文學系，跟系主任陳源（西瀅）學西洋文學，劉半農學語言學、黎錦熙（劭西）學文法，林語堂學英語語音學，也修了不少國學課程。他最感興趣的是國語跟文法研究。[3] 這年，次子庚出生。

三、何容參加北伐與《政治工作大綱》

1926 年 7 月 9 日，蔣中正先生率領革命軍北伐。這時，張作霖從東北入關，控制了北方政府，局勢動亂之極。何容先生讀完了二年級，和王向辰一起休學，南下湖北武昌。他參加國民革命軍第十師第三十團，為連政治指導員，身穿二尺半，官拜上尉，自題一聯：「革命上尉成功，同志仍須努力！」[4]。1927 年春，他隨軍北伐，沿平漢鐵路東側前進，進攻汝南，包圍上蔡，進抵河南開封後，回師武漢。在作戰中，他腿部中彈受傷。不久，他轉往江西南昌，為第九軍第二十七師第七十九團政治指導員，駐防臨川、吉安、永新等地。調升為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革命軍攻下上海、南京。4 月發生「寧漢分裂」，國共合作因路線不同，遂宣告瓦解。

1928 年 6 月，北伐軍進入北京。秋天，軍中政治部因裁軍而解散。何容先生在南昌等待遣散時，開始撰寫《政治工作大綱》，把在軍中做政治宣傳工作的經驗寫下來。10 月，前往南京；王向辰在司法部當科長；他也進入司法部當錄事，月薪 20 元。白天上班，夜裏寫《政治工作大綱》。

3. 據《何容這個人》頁 166-168，梁容若〈一個榮軍的故事〉及《何容文集》甲編，頁 275，〈我的老師林語堂〉。
4. 據《何容這個人》頁 1，吳延環〈何容外傳〉補充。上尉與「尚未」諧音。



1929 年春，何容的父親，因他參加革命一年多沒音訊，積憂成疾過世。他乃離職，直奔河南六河溝扶柩回鄉。辦完了父親喪事，又回北大復學，為賺些學費，到中學兼課。《政治工作大綱》到 1930 年，才全部完稿。這年，北京大學畢業，他前往定縣，擔任河北省立第九中學教務主任。

因為新月書店對討論政治的書不感興趣，他只好把《政治工作大綱》交給京城印書局，自費印了一千冊；書擺滿一屋子，只好貼郵費送人。送了一本給周豈明（作人）先生。周先生在《駱駝草》上寫文章介紹，稱作者為標語學（Posterology）專家。劉半農也寫了一封回信，說：「精當之論斷，洵為佳構。」一部分寄給上海時代書店代售。金克木說：「讀者一讀這書，不由得就要發笑。」何容頓時成為幽默作家。又說：「幽默」是帶着同情的微笑，或是含着眼淚的微笑，或毋寧說是引起思考的微笑[5]，因為是在清黨鬥爭的時代寫的，他只好出之「幽默」。

四、何容進入「國語會」做編輯，開始做與國語有關的工作

何容先生做河北第九中學的教務主任，只做了一年；在 1931 年，就辭職回北平，進入教育部留駐北平的「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當編輯，跟魏建功、白滌洲、蕭迪忱一起工作。當時，會裏的領導人物有吳稚暉、胡適之、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劉半農諸前輩。他也在「國語大辭典編纂處」工作；這時，他是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西四所「大辭典編纂處」的宿舍，環境幽美，花木扶疏。錢玄同先生常常在下班後，跟我們幾個年輕人談天兒[6]。《國語大辭典》在 1936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33 年，何容先生的長子何欣到北平讀書，住在王向辰的家裏。半年後，邢夫人帶着次子何庚到北平，也住進王家。何容仍住在中南海。

這時，何容同白滌洲主編《世界日報・國語周刊》，以「老談」、「老圃」筆名，寫「國語漫談」，筆調很幽默，但也發表一些研究國語文法的文章[7]。黎

5. 據《何容文集》甲編，頁 173，〈我的《政治工作大綱》〉補充。
6. 「居仁堂西四所」，據《何容文集》甲編頁 273，〈對「卯」字號前輩的一些回憶〉定。訂正《何容這個人》頁 182，大方〈「談何容易」何談易〉和頁 254，《何容傳略》所作的「東四所」。
7. 按《世界日報》是成舍我所創辦的；《國語周刊》是錢玄同、汪一庵、趙元任等所發起的。

錦熙和何容、白滌洲、王向辰，為商務印書館合編《復興說話教本》，至 1933 年出版了 8 冊。大方說：何容先生到「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當編輯，是他「從事國語推行工作的開始」；他就因這種淵源，和「國語會」結下了不解之緣，由北平而重慶，由重慶而臺灣，終而成為「推行國語教育」的領導人。

1935 年 5 月，中央政府緊縮，裁撤「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8 月，成立「只做工作，不支薪給」的「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仍是舊人；何先生成為無給職的兼任編輯，只好到私立大同中學和國立中山中學教英文。大方說：

> 推行國語是一件任重道遠、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也不能混出飯來，何容既然選擇了推行國語這條路，也就注定了窮困一輩子。[8]



何容先生的眼鏡及印章「何所不容」。
圖：曹英芬女士提供

五、何容成為三十年代幽默小品的作家

1932 年起，林語堂在上海，先後創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提倡「幽默」、「閒適」，產生了《論語》派[9]。韓慕孫在《論語》第一期「書報春秋」欄，評介何容的《政治工作大綱》，引起大家注意。於是，何容先生以「何容」的筆名，在這三個雜誌上發表小品文，成了《論語》派的班底。

陳紀瀅說：「老舍、老向（王向辰）和老談（何容）三位，被稱做「幽默三老」。在抗戰以前就已騰揚全國。」老舍（原名舒慶春，字舍予）的《趙子曰》、《老張的哲學》等書，早已風行一時。老向的《庶務日記》及何容的許多作品，都刊登於《論語》與《人間世》上[10]。李方桂說：

8. 見《何容這個人》182 頁，大方〈「談何容易」何談易〉。大方，東海大學教授方師鐸的筆名。
9. 事見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新文學鑒賞文庫・散文卷第三卷》頁 61，林語堂。
10.《何容這個人》頁 36，陳紀瀅〈記何容〉。





羅莘田（常培）說何容有一個圖章是「何容談易」，橫着唸就變成「談何容易」；他有一個別號，就叫「談易」[11]。大方說：

何容喜歡文字遊戲，大概和他編辭典有關；因為經常查閱辭典，肚子裏記下了不少稀奇古怪的字、詞和成語，所以能出口成章，語帶幽默，諧音借意，一語雙關。例如：把「青年十二守則」中的「助人為快樂之本」改為「助人為煩惱之本」，這的確是對做好事捐錢者的一大寫照。把「服從為負責之本」加了一個字，改為「服從為不負責之本」，這又道盡了一些公務員的病根[12]。

「文如其人」，何先生不只文章寫得幽默，說話也很幽默。陳紀瀅說[13]：

他們三人的文章，無論立意、措辭大都以「俏皮」為主，都能說出一句話來教人「醒脾」。何容說話不須多，三五句就可以顯露「幽默感」。

其實，何容老師研究「詞組、修辭與成語」深有所得，所以能把一些「字」隨便一拼湊更改，就構成了新意，像「濫竽充數」一改就成「濫魚充數」；他許多說理的文章，隨便一引證舉例，成語、諺語、歇後語、俏皮話、譬喻和典故，就連串地脫口而出，像「昨夜燈花落地，必有喜事臨門」，「灶王爺打筋斗，——砸鍋」之類都是。現在《何容文集》甲編中，仍可讀到他發表在《論語》等雜誌上的小品。這裏摘錄一則，可見他套用「文言」的筆調：

友朋相聚而談女人，每以太太為主題，此大謬也。夫太太者，丈母所生也；談太太而不談丈母，豈非舍本而談末乎？丈母也者，其女人之本與！[14]

所以，王炬說：何容給人的印象，好像是一個玩世不恭、舞文弄墨的作家[15]。

11.據《何容這個人》頁 64，李方桂〈獻給何容先生〉補充。
12.《何容這個人》頁 182～183，大方〈「談何容易」何談易〉。
13.說見《何容這個人》頁 35～36，陳紀瀅的〈記何容〉。
14.〈談丈母〉，收於《何容文集》甲編頁 76，民 22 年 10 月 1 日載於《論語》第 26 期。
15.王炬的評語，見《何容這個人》頁 215，〈抗戰時期我在重慶所見的何容〉。

六、何容進入北京大學教「中國文法」

1934 年[16]，何容先生進入北京大學教中國文法。大方說：

> 當時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師陣容，可說極一時之選：胡適教文學史，聞一多教詩經、楚辭，羅庸教詩詞，唐蘭教古文字，錢玄同教聲韻，沈兼士教訓詁，羅常培教語言學。這時，容肇祖、魏建功為專任講師，何容為兼任講師，講授中國文法。——何容到北大上課，倒也博得個全場爆滿。他一臉碎麻子，一付黑框大眼鏡，小平頭，穿一件皺巴巴短橛橛的藏青西服，袖子短得出奇。我們猜想：這套西服準是向別人借來的。他第一堂文法課，講了些什麼，誰也沒注意到[17]。

閻崇璩是日本東京大東文化大學教授。他在〈追憶五十五年前何老師，在北京大學授課的情況〉中[18]，說：

> 民國 23 年（1934 年），我清華大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研究院。專業論文是《探討宋元的白話語匯》，導師胡適之先生建議：我選修何先生的文法。上課之後，覺得何先生講的內容，不但聞所未聞，而且一環扣一環，步步深入。後來出版的何容先生的「中國文法論」，就是他當時在北大講課時發的講義改寫成的，不過更充實，更系統化。何先生教文法，主要依據美國結構學派大師 Bloomfield 的「Language」和文法理論家 Jesperson 的「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而融會貫通了這兩部書中的理論，吸取到自己的教學內容中，深入淺出地表達出來。從問題談理論，由馬建忠《文通》、黎錦熙《國語文法》、劉復《中國文法講話》提出一些問題，加以分析批評，有褒有貶，並做出合理的論斷，很有獨到的見解。何先生的隨筆小品輕鬆活潑；講文法也很瀟灑自如，聽來津津有味。

16.《何容這個人》頁 255,《何容傳略》作「民 24 年」（1935 年）。但大方與閻崇璩兩人都是北大學生；他們文章都作「在民 23 年」（1934 年）聽何先生講授中國文法。此據二人文章「改正」。
17.據《何容這個人》頁 180～186，大方的〈「談何容易」何談易〉濃縮。
18.閻崇璩的文章，見《何容這個人》頁 235～237。此加濃縮改動。



1936 年夏，何容先生應馮玉祥的邀請，去山東泰山做短期的講學。

七、何容先生在抗戰時期的事蹟

（一）何容在武漢參加抗日工作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軍閥製造蘆溝橋事變，挑起戰爭；7 月 29 日，佔領北平。8 月 13 日，進一步攻擊上海。11 月，何容先生逃離北平，到達南京。11 月 19 日，政府決定遷都四川重慶。他隨政府到達了湖北漢口。

12 月 12 日，日軍進入南京城，大肆燒掠姦淫，並屠殺了我國軍民至少 20 萬人，被掠奪、被放火的民居約為南京市的三分之一[19]。

何容先生到漢口後，先住黃土坡；後來前往武昌，住進千家街馮玉祥的官邸，馮時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何容與台大教授毛子水合照。
圖：國語日報提供

1938 年 3 月 27 日，我國文藝作家在漢口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推選郭沫若、茅盾、巴金、郁達夫、老舍、何容等 45 人為理事，老舍當選總幹事，創辦《抗戰文藝》，提出「文藝下鄉、文章入伍」。何容先生在馮玉祥將軍支持下，與老舍、老向、趙望雲等主編《抗到底》、《人人看》等刊物，響應中華文協，撰寫「鼓兒詞」與「相聲」，暴露日本侵略戰爭的罪惡。——現從《何容文集》甲編 322 頁至 364 頁，尚可看到：當時，他所寫的〈戰壕小調〉、〈棄家從軍〉、〈抗日報國〉、〈王得勝放步哨〉、〈日皇愁〉等鼓兒詞。

19. 此據「東京戰犯軍事法庭判決」，見《蔣總統秘錄》第 11 冊 66～67 頁。《蔣總統秘錄》，日本「產經新聞」連載，我國「中央日報」譯印。

9 月，教育部成立「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分做中小學、青年讀物、民眾讀物、戲劇等四組。何先生被聘為特約編輯。

（二）何容到重慶為傷兵服務

1938 年 10 月 25 日，國民政府撤出武漢，遷往重慶。1939 年 4 月，何容先生到了重慶。後勤政治部主任段承澤（繩武）將軍，在部中成立「傷兵教育委員會」，在各地設立「傷兵招待所」，提出「殘而不廢」口號，為榮譽軍人服務，請專家為傷兵撰寫讀物，提高傷兵的教育程度。聘請何容先生擔任「傷兵教育委員會」委員兼代科長。他為會刊《協導》寫短論，並主編《抗建畫刊》，輔導在軍醫院的傷兵，內容有歌曲、插圖、連環漫畫、文化活動、教育實施等，協調各單位工作。至 1940 年 7 月 13 日，段繩武將軍因盲腸炎去世，「傷兵教育委員會」結束。這年底，他辦理了結束事務，才離開傷兵教育委員會。[20]

何容先生在《協導》寫了一篇〈悲痛的想念〉說：段繩武先生招農民到綏遠開墾是要建設理想的新社會，辦傷兵教育是要使傷兵有生產的能力。在結尾說：

> 有理想，有辦法，但是沒有成功
> 沒有成功而死，更令人想念而生悲[21]

這一年，他的長子何欣逃離北平，至陝西城固讀書。

（三）何容在重慶為國語會專門委員時的工作、教學、生活與寫作

1941 年，教育部恢復「國語推行委員會」，吳稚暉為主任委員，何容先生遞補許地山的遺缺，被聘為專門委員，再度參加推行國語的工作。他常跟蕭迪忱研擬全國性國語的推行與興革，各省市與邊疆地區的推行國語教育的辦法，經常舉辦國語教育師資訓練班、編寫讀物，編印《民眾小報》。

這時，教育部本部設在青木關溫泉寺，距重慶市約 100 里；並在重慶市川東師範學校裏，設了一個「駐渝辦事處」。春天，中央政治學校設立國語訓練

20. 事見《何容這個人》頁 217，王炬〈抗戰時期我在重慶所見的何容〉。
21. 〈悲痛的想念〉見《何容文集》甲編頁 282～284，載於民 33 年 7 月 13 日《協導》周刊。



班，班址設在青木關的彭家院子，魏建功主講音韻學、國際音標，王玉川主講國語教材教法，李劍南擔任標準國語示範，王炬擔任國語分組練習，何容先生主講國語文法、詞類研究。學員由四川等八省市、教育廳局保送督學、督察及中小學教員及師範學校優秀的學生參加集訓[22]。他還到復旦大學中文系教國語文法。他分析句子的成分與結構，用「圖解」方法；所以，有一個學員在學習日記中，說：「何老師講文法，在黑板上橫一條、豎一條的直『畫線』。」

當時，教育部在溫泉寺外的山坡上，蓋了幾排茅屋做辦公廳和宿舍。國語推行委員會就設在山坡上最高一層的三間茅舍內。何先生住的宿舍很小，吃飯要下山到職員大飯廳，四人一桌，粗飯淡菜。下班後，何先生也會到街上的小茶館，泡一碗茶，和高教司的趙賡颺、中教司的朱匯森、歷史委員會的鄒湘喬，擺龍門陣。鄒善說歷史的人物的評論，何常談「寧漢分裂」的掌故。聊夠了，各提紙燈籠，回宿舍[23]。他有時進城辦事，住在《新蜀報》姚蓬子處。陳紀瀅說：

> 「在新蜀報的周欽岳的酒席中，何容兄與老舍扮演喝四川大麯的主角，起初是小飲，慢慢大飲，划拳、唱戲、唱歌一起來。老舍愛唱「吊金龜」，子祥愛唱民國初年軍歌：「黃族應享黃海權，亞人應種亞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種自相殘。」

這時，何容先生寫了很多文章，在各種雜誌上發表。為了加強抗戰宣傳的效能，他和老舍、老向提倡：「通俗文藝」。他給在渝市唱滑稽大鼓的富少舫（藝名山藥旦）、董蓮枝編寫鼓兒詞，有〈八仙捉妖〉[24] 等；給歐少久、小地梨編寫相聲腳本，有〈漢奸作壽〉等，把抗戰精神寓於詞內。[25]

何容先生在〈漢奸作壽〉[26] 中，把「相聲」這種俗文學的特色，借甲、乙兩人的對話，把它闡說得很簡要明白：

---

22. 事詳《何容這個人》頁 220，王炬〈抗戰時期我在重慶所見的何容〉。
23. 事見《何容這個人》頁 220～224，王炬〈抗戰時期我在重慶所見的何容〉。
24.〈八仙捉妖〉，民 29 年 5 月 15 日刊載於《抗戰文藝》第 6 卷第 2 期。
25. 此段文字據《何容這個人》頁 40～41，陳紀瀅〈記何容〉。
26.〈漢奸作壽〉，民 31 年 12 月 15 日載於《宇宙風》第 129 期。

甲：相聲這種玩藝兒，就是一種簡單的戲劇。
乙：不錯，簡單省事，輕而易舉。
甲：像我們這兩個人，也不用化裝，也不用佈景，可是對話、表演，全都有了，還得讓諸位先生聽着有趣兒。
乙：不錯，滑稽有趣，是一種笑劇。
甲：好比說咱們兩個，要學甚麼人，就得像甚麼人。

何容先生認為相聲含有「低級趣味」，也含有「高妙智慧」。他有一篇〈舊瓶釋疑〉[27]，主張用民間原有的文藝體裁，寫通俗新文藝，通俗新讀物。像董連枝用鼓兒詞來宣傳抗戰，那就是「舊瓶裝新酒」，「舊形式寫新內容」，而不必只讓他們唱〈黛玉焚稿〉啊。

他的夫人、次子何庚逃離北平，至陝西城固。

（四）何容為四川社會教育學院國語專修科主任

1944 年，「中國語言文字學會」成立，在大後方的許多語文權威教育專家都到了重慶；他們建議政府設置培養國語師資的機構。八月，教育部在甘肅蘭州的西北師範學院，在四川白沙的女子師範學院，在四川璧山的社會教育學院都設立了「國語專修科」，分別由黎錦熙、魏建功、何容三人擔任科主任。璧山距離青木關，約七十華里；每星期有三天，何先生要搭車前往璧山。

1945 年，抗戰勝利後，這三所專修科畢業的同學，來臺灣參加推行國語工作的很多。

八、抗戰勝利後，何容先生來臺灣推行國語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國的第一枚原子彈，投擲日本廣島；八日，第二枚投擲長琦。原子彈爆炸的巨型火柱，直衝上六萬英呎的同溫層，柱頂射出一個熾亮的白色菌狀物，泡沫滾滾，噴射沸騰，一瞬間這兩個城市完全燬滅，震撼了全世界。10 日晚上 7、8 點鐘，重慶市的空襲警報臺，響起了一聲無比長的「解

27. 見《何容文集》甲編，頁 22～26。



除警報」！人如潮湧入了街上，到處擠滿人，歡呼聲震天動地，爆竹聲徹夜不停。無線電不斷地廣播：「日本無條件投降」！10 月 25 日，臺灣光復了，重歸祖國的懷抱！追想 1894 年（甲午年），滿清與日本一戰大敗，將臺灣割讓給了日本；臺灣的學人洪炎秋說：

> 日本在 1895 年佔領了臺灣，6 月 18 日台灣總督府成立，次日就成立學務部，大力推行日語教育。台灣在日本統治 51 年，所以到了 1945 年，台灣光復的當初，臺灣少數知識份子，只會講日語，甚至三十歲以下的社會人士，連閩南話、客家話，也幾乎不會講了。臺灣光復後，臺灣省長官公署發現這個事實，認為推行國語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於是向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請求派遣專家來臺協助推行國語教育。[28]

這年 9 月底，教育部選派國語會常務委員魏建功、專門委員何容兩位去臺灣負責推行國語的工作。魏建功先搭機走了。張宣忱有一篇〈我與何容先生同行萬里路〉[29]，描述他們由重慶前往臺灣的情形。他說：

> 1945 年 10 月間，魏、何兩位邀請王潔宇，王炬、秦志學伉儷、張宣忱四位一同前往。11 月 30 日，帶着國語法令、書籍、器材，從重慶出發，搭川湘公路聯運木炭車。車爬山而行，時時拋錨。何容有打油詩說：「一去二三里，拋錨四五回，下車六七次，八九十人推！」經湖南沅江至桃源，改搭汽船，有時擱淺，有時遇風。過長沙，泊岳陽，經洞庭湖，入長江。12 月 22 日晚，抵漢口。23 日住進飯店，等候船期。所經城市都是：處處頹垣廢墟，受戰火浩劫，令人不勝唏噓！其實戰爭，無論戰勝戰敗，都是滿目瘡痍，只有「瘋子」才會挑釁起「戰爭」！12 月 30 日王炬突然病了。
>
> 1946 年 1 月 3 日，我們拿到船票。何容先生要我和王潔宇先搭輪前往上海，他一人要留下照顧王炬夫婦。4 日，我們搭「大達」輪船，經九江、安慶、蕪湖，9 日抵南京。11 日搭火車，12 日天亮到上海。13

28. 說見洪炎秋〈推行國語三十年〉。
29. 見《何容這個人》頁 228～234。下據張文濃縮增補。

日到上海廣西路來薰閣，會見魏建功先生。接着，何容先生和王炬夫婦也來到上海。（1 月 16 日），魏、何兩人搭機飛臺灣[30]。我和王炬夫婦，在 3 月 15 日登上「海宇號」輪船；21 日到達基隆，搭火車至台北市，住進泉州街二巷 1 號，何容的住宅。

何容先生的夫人同兩個兒子，到這年 8 月 7 日才到達臺灣，住進泉州街二巷 1 號。

九、何容先生到臺灣後推行國語的事蹟

（一）設立臺灣國語推行委員會

魏建功先生跟臺灣長官公署接洽，終於在 1946 年 4 月 2 日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會址設在南海路女子專門學校（後為國語實驗小學），魏建功為主任委員，何容為副主任委員，先後聘請齊鐵恨、王壽康、梁容若、洪炎秋、王玉川、李劍南、夏承楹、方師鐸為委員，下設四組：一編審組董長志擔任；二調查研究組朱兆祥擔任；三宣傳訓練組王炬擔任；四總務組張宣忱擔任。每組下又設幹事數人，並在各縣市設立國語推行所或推行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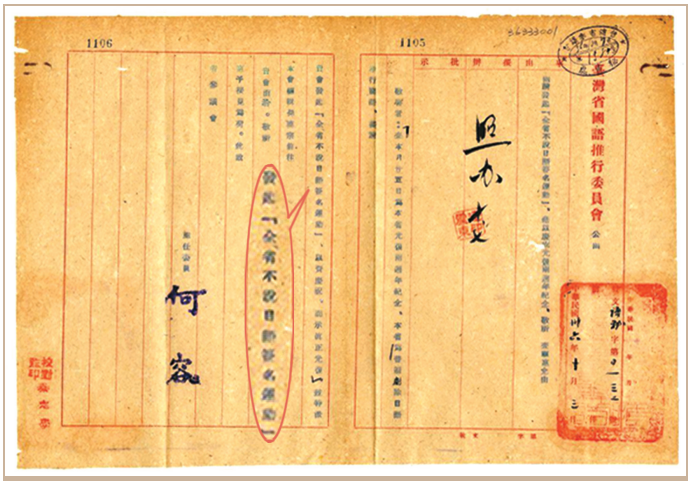
1948 年，國語會遷往對面植物園內的「建功神社」。魏建功是在 1949 年初，回北京大學任教，後來做到北大副校長[31]。這時，何容先生繼任為國語會主任委員，洪炎秋先生為副主任委員。一直到 1959 年 6 月裁撤，另在教育廳內設置「國語推行委員會」，前後十三年三個月。

（二）領導國語會推行國語

當臺灣光復的時節，臺灣同胞心喜回到祖國的懷抱，見到從各省派來臺灣工作的同胞，無法用同一語言說話，也不認得漢字，非常不便痛苦。學校機關社會仍說日語用日文。臺胞都渴望着要學習國語國文。於是，舊私塾恢復；有

30.《何容這個人》頁 264，〈何容傳略〉說：何容是在 1 月 16 日到臺灣。「魏建功和孫培良，早在民 34 年（1945 年）底，乘飛機來臺」，與張宣忱文章有很大出入。此據張宣忱說訂定。

31. 魏建功西歸年代訂在「1949 年初」，係據東海大學教授王天昌（臺大國語科魏建功的學生）之說；改正《何容這個人》頁 267〈何容傳略〉與頁 289〈何容先生年譜〉所作「民 36 年（1947）」的錯誤。



1947年何容擔任國語推行委員會主委，發起「全省不說日語簽名活動」。圖：臺灣省諮議會提供

些會說國語的人，在簷下牆角掛個小黑板，收費教幾句國語；本省的教師也是邊學邊教。當日的國語，南腔北調，沒有標準。何容先生在這樣迫切的需求學習國語的時代背景之下，他們如何把國語推行到臺灣各學校各機構各縣市去？這是何等艱巨的工作！我在〈臺灣推行國語教育的經驗〉[32]中，論述到當時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工作：

1. 用注音符號幫助大家認字讀書。
2. 從恢復臺語教臺胞講國語：臺語和國語同屬漢語系的語言，語法用詞大同小異，只要把一部分發音不同之點指出，加以糾正，就很容易學會「標準的國語」。
3. 在 1946 年 5 月 30 日公佈《國音標準彙編》，做教學國語的標準。
4. 訂定六條「臺灣省國語運動綱領」，作推行國語的大方針。
5. 大量訓練與培養國語的師資，設立各種國語講習班、研究會、補習學校。協助師範大學、師範學校增設國語課程。1948 年 2 月，在國立臺灣大學設立「國語專修科」，培育推廣國語的專業人才；8 月改由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接辦。只辦了兩屆停辦。協助省秘書、統計、人事、民政、交通等廳處，臺灣省銀行、石油、糖業、玻璃、紙業、產物保險等公司工廠，醫院、婦工、民眾、山地等，舉辦師資班或補習班。國語會的人員工作越來越重，幾乎每天都是午前教一班，午後教一班，晚上還要再教一班。
6. 國語會對各地方的國語教育的輔導工作：在各縣市舉辦國語的競賽活動，包括注音、作文、演說、朗讀等項目，有學生、教師、社會等組，何容先生為總裁判長，參加人數常在一千人以上。教育當局在 1948 年 3 月，

32.文見《方祖燊全集》第二冊，頁 221～231，〈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一節。



1951 年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合照，第一排左七為何容。
圖：國語日報提供

組織「中等學校國語文教學輔導委員會」，先後在臺北市女子師範等學校舉辦。派員前往各地舉行國語文教學的座談會與討論會。

7. 出版輔導刊物：國語會在 1946 年 5 月 21 日，在「新生報」創辦《國語周刊》，由何容主編。在《何容文集》乙編中，約 400 頁所收關於「國語運動、教育、教學法、讀音語音、句式句意、寫作修辭、語法詞類」等文章，大抵都是何容先生主編《國語周刊》時所寫的。停刊後，國語會另出《國語通訊》，解答各種問題。
8. 從廣播教學來示範讀音：國語會起先播放趙元任發音的國語留聲機片，統一「注音符號」的讀音。1946 年 5 月 1 日開始，由國語會委員齊鐵恨先生，每天上午 6 點半，下午 6 點半，在臺灣廣播電臺教國語，由注音符號開始，作國語讀音示範，由淺入深，然後教民眾國語課本、國語會話、國民學校的國語、常識、歷史各種課本；後來又播講中學國文課本和國語日報發行的《古今文選》。他並在星期六，解答聽眾提問的國語問題。齊先生示範教學的工作，直到 1954 年 5 月結束。僻遠地區，沒有收音設備，國語會購買留聲機片，分贈各國民學校。
9. 國語會認為要推行國語，必須有大量的國語讀物，由國語會編印或審查書局出版了許多有關國語的專書。
10. 從 1954 年起，國民小學一年級第一學期前 12 週，先教「注音符號及說話」，奠定了學生拼音的基礎。



11.國語會在 1946 年 8 月，設立「國語實驗小學」，實驗改進語文的教學法。

國語會在 1955 年搬到木柵馬明潭；在 1959 年 6 月併入教育廳。

（三）創辦「國語日報」推行國語文教育

1948 年 1 月，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來臺灣視察，看到當時臺灣同胞熱心學習國語的情況，想把北平的三日刊的「國語小報」移來臺灣，改為「國語日報」，出版一份標準的注音報紙，供台灣學習國語文的人士閱讀，幫助小學生認識新字，讀出正確字音，來加強國語的推行。命令魏建功與何容負責籌辦，並答應給一筆開辦的經費。在籌備初期，由魏建功擔任社長，聘請北平「國語小報」社長王壽康先生為副社長、北平「平明日報」總主筆梁容若先生為總編輯。他們在北平討論過經營「國語日報」的方針：要辦一份：以「國語」為主，全報教材化，深入淺出，純教育性的小型報，文字力求精鍊，.初以學齡兒童為主要對象，逐漸增加成人閱讀資料與學術性的程度。

不意，這時政局惡化，北平國語小報，不肯把所有設備交出，只給了一架破舊的四開印刷機，交給王壽康帶來臺灣，向教育部借來一副殘缺不全的五號注音國字銅模。在植物園國語推行委員會內的一邊小廂房內，勉強拼湊準備出版。總編輯梁容若先生在 10 月 6 日由北平起程來臺。就在這樣人力與物力均極艱難的情況下，《國語日報》在 1948 年 10 月 25 日光復節，印出了「創刊號」；因器材不足，至 11 月 13 日才出第 2 號。

梁容若在〈南海路雜記〉[33] 中說：這時，魏建功以個人友誼，在臺灣當地作家中，請求義務主編《國語日報》的周刊。10 月 28 日，與予聯名宴請各副刊主編，共 7 人：黃得時主編「鄉土」，夏德儀主編「史地」，張雪門主編「兒童」，曹瑞群主編「家常」，齊鐵恨主編「國語研究周刊」，朱兆祥主編「臺語研究」，何容主編「周末」。

1949 年，大陸情勢大變，戰局失利，金元券貶值，教育部答應支援的經費都成泡影。《國語日報》只好自己艱苦支撐，但又打不開銷路，報紙時出時停。

33.文見梁容若的《藍天白雲集》頁 190～198。

這年初，魏建功回北平之後，何容先生決定由國語會的工作人員支援報社出報，報社以注音報紙幫助國語會推行國語。吳稚暉先生對何容等人，說：「你們應該把辦報當做一種服務社會的事業來做。」也就是要結合社會力量，自力更生。

1949 年 3 月 12 日，國語日報成立董事會，羅致了許多從事國語教育的工作者和臺灣提倡國語教育的名流來當董事，國語會有何容、齊鐵恨、梁容若、王壽康、洪炎秋、方師鐸、王玉川、李劍南、祁致賢、汪怡、陳懋治，社會人士有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台灣文獻會主任委員黃純青、台灣省教育會會長游彌堅、公論報社長李萬居、臺大醫學院院長杜聰明都加入國語日報的董事會，推選吳稚暉為名譽董事長，傅斯年為董事長，何容為副董事長，洪炎秋為社長。第二年，傅斯年因校務太忙辭職，推選游彌堅為董事長。後來又增聘羅家倫、田培林、黃啟瑞、夏承楹、黃得時為董事。游彌堅在 1971 年心臟病突發逝世，何容繼任為國語日報社董事長。


50 年代 何容（坐者，左二）於國語日報董事會議留影。
圖：國語日報提供

正當國語日報難以維持之際，臺灣省政府委託報社翻印有關「三民主義」的注音讀物 30 萬冊；這才解救了國語日報的財務危機。

梁容若先生請夏承楹（何凡）為副總編輯，負責新聞、繪畫兩版。他自己專辦副刊，請國語會魏廉、魏訥兩位主編「少年版」，王玉川主編「看圖識字」和三百字「故事」，這一版面是天天出的。另外一版，分做七個周刊，略為調整，「家常」改為「科學」，由臺大教授林朝棨主編，「國語研究周刊」和「臺語研究」改稱「國語甲刊」和「國語乙刊」，仍分別齊鐵恨和朱兆祥主編；其他「鄉土」、「史地」、「兒童」、「周末」各版及主編者，照舊不變。一個四開小報，得到這麼多人的義務支持，沒有編輯費、車馬費，稿費也少到不能再少。他們都是基於傳播國語教育的信念，無條件貢獻精力與時間。



1951 年 9 月 26 日，國語日報為提高讀者語文程度，幫助讀者自修，編印《古今文選》，每星期一出版，隨報免費附送。專門選注古今名家的傑作，給予題解、分段、標點、注音、解釋與語譯，介紹作者事蹟與文章背景，附錄其他參考比較資料。由梁容若、齊鐵恨主編。1952 年 2 月，聘鍾露昇、方祖燊為專任編輯。這個刊物對臺灣國語文教育的提升有極大的影響，而且風行各國漢學界。

這年，文化教育界毛子水、劉真、趙友培、丁治磐、何容等為普及語文教育，促進語文統一，發起組織「中國語文學會」。

國語日報在穩定中增加報份。1955 年 7 月 4 日，遷往臺北市長沙街二段 113 號。8 月 29 日，設立「國語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1960 年 2 月 17 日，成為財團法人國語日報。1963 年遷入福州街 10 號新建大樓。1964 年設立出版部，編印各種注音讀物，至今將近一千種，包括《國語辭典》、《古今文選》、《書和人》、論著、會話、語文教材、歷史、藝術、家庭、兒童各種書籍。其中以兒童讀物最多，約 700 種左右。對臺灣國語的推行，學生和民眾各種知識的充實，寫作能力的提高，都有極大的貢獻。在 1973 年 3 月 1 日設立語文中心，有國語正音班、兒童班、文學創作班，華語班、華語師資訓練班等。還有演說、美術、舞蹈、科學各班。由於受國語日報出版注音讀物的影響，其他出版社和書局也紛紛出版許多注音的書籍，當在一萬種以上。[34]

（四）何容在臺灣推行國語，愈挫愈勇愈努力

何容先生在臺灣推行國語，曾遇到許多困難與打擊，但為着要把國語教育推行到臺灣的每一角落，他不管遇到甚麼嚴重的挫折，都能堅忍地面對，毫不退縮，去解決種種問題。現將他所遭遇重大的挫折介紹如下：

1. 二二八事件：1947 年，公賣局專員葉得根緝煙，拿手槍敲傷女販林江邁的頭的小事，沒想到引發了 2 月 28 日的排外與打人，演變成武裝奪權與武裝鎮

34. 此據《方祖燊全集》第十二冊頁 275～277，〈梁容若老師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編印的《燃燈錄》頁 104～105，方祖燊〈我所知道的王莆青（壽康）老師〉；《方祖燊全集》第二冊頁 232～234，〈臺灣推行國語教育的經驗〉以及《國語日報的故事》頁 15～48，洪炎秋〈國語日報的簡介〉等資料寫成。

壓，有外省人和本省人無辜地冤死。當然也產生了許多本省同胞救護外省同胞的感人故事發生。何容先生有一篇〈呼冤〉[35]的文章，說：

> 我並不是要為我自己呼冤：就是我被人打了，我也不呼冤；儘管冤，我也不呼；誰叫我出生在臺灣以外的任何一省，而又要來臺灣做事呢！我同我周圍的朋友，不是像有些報紙說的到臺灣「挖金」，我們是來「賣命」的！真的，我們的夥伴已經（為國語文教育）累死了四個。

〈呼冤〉是寫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隱隱含着沉痛的眼淚。——當時國語會人員少，工作忙，每個人要頂兩三個人用，為國語文教育，甚至犧牲了生命。何容在〈哭陳君天齊〉[36] 中，提到：「幾個月以來（累死的），就有龔書熾、陳士駿，陳天齊三位先生；還有吳永元、吳永亨兩位同學。」——陳天齊出身於四川社會教育學院，是何容的學生，在颱風雨天，去士林教國語，在外頭隨便吃東西，感染了傷寒而病逝。陳士駿，西南聯大畢業，幫忙何容先生編《國語周刊》，白天工作忙，深夜還要去「新生報」校對審稿，終而過勞死。[37] 他在「哭陳天齊」的結尾說：

> 我們一定能把臺灣的『祖國語文』的幼苗培植得繁榮茂盛。你在大直山麓等着看吧！我們決不會使你失望！

2. 國語會的裁撤：1959 年 6 月，教育廳命令國語會併入教育廳，主任委員由廳長兼任，何容先生被聘為沒有薪給的副主任委員。這對國語會那些為推行國語的工作人員自然是一大打擊，對推行國語工作的本身也是重大的挫折。但何容先生卻無怨無慍地辦理移交，並為同仁安置工作，大部分到國語日報繼續做推行國語的工作。——這年 8 月，由梁實秋推薦，他自己到臺灣師範大學為專任教授，拿一份糊口養家的薪水。這時，何容先生對推行國語文教育的工作，並未因此停止，而是更加忙碌。洪炎秋說：

> 何容做了國語官，從中央降到地方，從實缺降到虛銜，從有俸給降到

35. 文見《何容文集》甲編頁 118～123，民 36 年 4 月 16 日載於《論語》第 127 期。
36. 見《何容文集》甲編頁 290～291。
37. 「傷寒」這種傳染病，是桿狀菌侵入腸部潰瘍、腸出血穿孔而死亡。



無俸給，從汽車（三輪車）階級降到步行階級。他的官越做越小，而他的事卻越做越多。他在國語界已經成了一個箭垛子，只要有關國語的事情，都集中到他身上來。教育部修訂《國語辭典》要找他商量，（擔任總編輯，做總校對）；國防部發給士兵看的書籍，要找他淺白化；教育廳編給國小學生看的「中華兒童叢書」，要找他審定注音、修改文字；書商出版的字典、辭書，要找他校閱。除了這些，他還要僕僕風塵，定期到霧峰出席教育廳國語指導委員的工作會議。其他凡是有關國語教育的雞零狗碎的事情，本來不必找他，只因他好央求，也都找到他身上來。例如國語教法的研究，要找他參加；國語學力的測驗，要找他設計；在職教師的再教育，要找他講演；甚至於稍為大規模的國語文比賽，也要找他主評，聘請評判委員，他都親自負責，並主持開幕閉幕頒獎。凡是有關國語教育的活動，都找到他門上來。幾乎是有求必應，一年到頭忙得他團團轉。何容雖只是教育界的一個小兵，他對於國語教育，不為名，不為利，不管是官家的，民間的只要找上他，他無不全力以赴，方面很多，效果很大。[38]

在 1962 年 1 月，何容先生應中國廣播公司「早晨公園」之請，每天五分鐘，播講中國字的用法，持續了三年。中廣把他講過的字，印成一本小冊子，叫做「每日一字」。1963 年 12 月 3 日起，每周二去教育廣播電臺，講授「國語文」，也持續了一年。1973 年，國立編譯館，請他主持高中、初中的國文和小學的國語教科書的編輯工作。當時，中學國文教科書備受各界批評。他還是一肩扛下這個工作，約人編纂。編譯館成立「中國語文補充讀物編輯委員會」，要編輯一套專供外國學生的中文讀物，又請他擔任主任委員。1976 年，教育部要重編《國語大辭典》，又請何先生為總編輯，參與審核工作。

他為朋友、學生出書寫序的也很多。還有他每天校對國語日報各個副刊，並且把出現的錯字錯音、用詞不當的都抄了下來，再寫出正確的，甚至說明為什麼這樣的改動，再交給編者。他重新標點《兒女英雄傳》、《儒林外史》、

38.上面的這些文字，是從《何容這個人》洪炎秋〈序〉與頁 3～4，洪炎秋〈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的何容〉節錄下來，並略加補充。

《紅樓夢》、《水滸傳》等幾部舊小說，還用紅筆勾出許多詞句。

總而言之，國語會雖遭到裁撤，何容先生仍繼續做着推行國語的各種工作。

十、何容先生的晚景與過世



60 年代，何容在辦公時留影。
圖：國語日報提供

1963 年，何容先生的邢夫人病逝於福州街郵政醫院。

1976 年 2 月 20 日，國語日報為慶祝何容先生，來臺推行國語三十周年舉辦盛大茶會，有政府首長、文化界人士、語文專家五百多人參加。

1977 年，何先生的次子庚病逝於蘇州。1946 年夏，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由四川璧山遷到蘇州拙政園；這年，何庚在社會教育學院攻讀，隨母親邢夫人來臺渡暑假，後又回蘇州。1983 年，何先生八十華誕，國語日報在 7 月 2 日假「自由之家」，為他舉行祝壽茶會。

從 1984 至 1988 年，何容先生老病叢生，耳朵重聽，白內障，攝護腺腫大，癡呆。1989 年脊椎痛到無法躺床，徹夜不眠，精神更加萎靡。1990 年，三度住院治療。7 月 5 日清晨 5 時 55 分，病逝於中華醫院，享年八十七歲。長子何欣政治大學教授，孫兒去非、長孫女穎、次孫女怡，隨侍在側。他沒有留下一坪房屋，一張股票。

參 何容先生的為人

一、何容是一位有理想的有原則的人

老舍說：「人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為掙錢養家，生兒養女而生存；第二類是為追求夢想、實現理想而生存。何容先生屬於後者[39]。」我為什麼這樣

39. 此取《何容這個人》頁 157，老舍〈何容何許人也〉的意思，改寫。



說呢？從何先生的一生事蹟和朋友的紀念文字，可以歸結出來。何容在〈我的老師林語堂〉中說：

> 林先生早年那「嫉惡如仇」的態度，令人敬佩；如某人的「意見」是他「看不起」的，他甚至不願意跟他打招呼。到了《論語》時代，林先生好像是很能容忍了。到了老年，他已經做到「不理那些罵我的人」。[40]

他在〈悲痛的想念〉中，認為段繩武將軍是有理想、有辦法的人。[41]

何老師在臺灣推行國語，堅持理想；待人做事，堅持容忍；我認為這應該是受段繩武和林語堂兩先生的影響吧。老舍說：

> 何容兄的見解永遠不落在時代後面，行為卻比提倡尊孔的還更古樸。他沒有一點新氣，更提不到洋氣。說衛生比誰都曉；但生活最沒規律，能和友人一談談到天亮。可有一點，他要是看不順眼，連一分鐘也不肯花費。他的古道，使他柔順像個羊，同時使他硬如鐵。當硬的時候，不要說巴結人，就是敷衍一下也不肯。他承認怎樣的人？第一要光明磊落，能捨己從人，不為什麼利益與必期效果。光明磊落，不能低三下四求人，使他窮。他寫文章非改到極滿意不肯寄走。做什麼都出全力，為是對得起人。他思索時候，心細如髮；他喝酒就是喝酒，不管什麼。他的心思，忽細忽粗，正如其人，忽柔忽硬。這種矛盾的現象使他「闊」不起來。對自己物質的享受，甚麼都能將就；對於擇業擇友，一點也不將就。他用安貧去平衡他所不屑的發展。他所以幽默是含有這種苦味。他只交幾個好朋友，大家一塊兒，有的說便說，沒的說愣着也好。他也教書，也編書，月進幾十塊錢就可以過，不講究穿吃住，外表平靜沉默，心裏大概老有些人看不見的風浪。真喝醉了，也會放聲的哭，也許是哭自己，也許是哭別人！他對好朋友，才肯說出自己的毛病：「起居無時，飲食無節，衣冠不整，禮貌不周，思而

40. 據《何容文集》甲編，頁 275～277，濃縮。
41. 語見《何容文集》甲編，頁 282～284。

不學，好求甚解而不讀書。」他的態度老是安安穩穩，不慌不忙，不多說話，但說出來就讓聽者想那麼一會兒。香煙不離口，酒不常喝，喝多了在兩天之後才有醉象。[42]

老舍這一篇文字活生生地描寫出三十多歲的何容先生。何容自己說：他原來的脾氣並不很好，後來逐漸改變，改名為「容」，意思就是要有容人之量，要有忍辱的耐力。[43]

二、何容是一位「樂於幫助人」的人

1928 年，何容先生的朋友送給他一個瓷匾，上有「和藹可親」四字。在他的同學白滌洲的孩子白川的心目中，他也是一位「和藹可親」的父執。白滌洲是他北京大學的同學、國語會的同事。1934 年 6 月，白滌洲跟劉半農去綏遠調查方音，傳染了傷寒，回北平後過逝，留下老母和幼兒；何容為辦理後事，為籌募教育基金。白川說：「父親去世時，我只四歲，家裏一切事情都是由何伯父安排的。[44]」

何容先生對錢財看得很淡，常拿錢接濟親友與部屬，自己生活卻過得十分儉樸。他把歷年擔任國語日報的社長、發行人、副董事長、董事長的一些待遇，及其他的審查費、稿費、開會出席費，一律記在一項「暫收款」內。這不是做私房儲蓄，而是做貸款金庫。同事婚喪、生病及購屋，都可以由這筆存款免息借貸；還不了也可以不還。我在結婚的前夕，就由他這筆存款裏暫借了 2000 元。師大的噴泉詩社與語文學社，在藝術館舉辦大規模的詩歌朗誦會，經費不大夠，我去找何先生，他津貼了 1000 元，就由這「暫收款」內撥出。何凡說：


國語日報數十年榮景，何容功不可沒。

42. 節自《何容這個人》頁 157～161，老舍〈何容何許人也〉（原載 1935 年 12 月《人間世》第 41 期。）
43. 見《何容這個人》頁 120，陳炳麟〈何容先生的寫真〉。
44. 事見《何容這個人》頁 49，李劍南〈我所認識的何容〉與頁 164，白川〈「和藹可親」的何伯父〉。



他的長子夏祖焯留學，也就是這樣「融資」一番，才能成行。洪炎秋沒錢，要競選立法委員，但是印宣傳單不能不花錢；何容的這一筆「專款」就派上用場。這是「為人者多」的具體表現。[45]

政大教授祁致賢在〈從我與何容之間的事看何容〉中說：

1950 年，調查局破了一個共諜案，于非逃走，但被牽連的有一百多人。于非在國語日報編過副刊，國語日報被牽連進去有三個人。祁致賢說：他是其中之一，因為他擔任過一段國語日報副社長，因此在 6 月 8 日，被逮捕偵訊，雖認為他毫無罪嫌，但要等全案結束，才能釋放。到 1951 年 4 月 19 日，他才重獲自由。在這段拘留期間，祁致賢依法停職，他一家四口的生活陷入困境。誰也不知道審判的結果？這時，只有何容這個人，挺身而出，不怕「近火燒身」，按月把他自己在夜間教課的鐘點費，送給祁夫人。他在文章裏說：「我的妻子兒女，才得免於餓死！」出來後，何先生又為他的復職，向各方面奔走，尋求「公平合理」；經過六次努力，到 8 月 31 日，他才獲准復職。

還有為推行國語，印刷與國語有關的書，公家沒有錢，也一律由何容的暫收款開支。祁致賢又說：

我奉命選出小學生《李愛梅的日記》；我編寫《國語課本》，要作為國語教材革新實驗的課本；還有我要把幾年來，大家致力「改進國語教育的經驗與建議」寫出來。後來才知道：這些書的印刷費，也都是由何容先生的「暫收款」支付。何容先生把他應得的錢，都用之於推行國語。我發現了這個事實之後，不知是由於敬佩，還是感激，還是由於自愧不如，不由自主地流出了兩行清淚！[46]

1977 年 7 月 15 日，齊鐵恨先生病逝；卒後，大家想設置「齊鐵恨先生獎學金」。當時，大家待遇低，湊不出甚麼錢。後來何容先生從教育部拿到「重

45. 見《何容這個人》頁 136，何凡的〈「何所不容」的人〉。「何凡」是夏承楹的筆名。
46. 上述兩段文字，均節自《何容這個人》頁 82～86，祁致賢的〈從我與何容之間的事看何容〉。

編《國語辭典》」一筆四十萬元的總編輯費，他就悉數繳還教育部，作為設置「齊鐵恨先生獎學金」之用。[47]



何容擔任國語文競賽評判長時做講評。
圖：國語日報提供

三、何容在大家心目中的畫像

何容先生，寬額頭，八字眉，大耳朵，長方形臉上，密布着一些淺淡的麻子，戴着一副黑框的深度眼鏡，蓬髮短髭，眼細長，皺紋深，神情嚴謹卻含蘊着一絲和藹的笑影。平日多半穿中山裝，或藍布長袍，黑皮鞋。上班總是步行或趕公車，手提着一個小袋子。夏天在辦公室裏，常穿直條紋的襯衫。主持會議，上課教書，接見嘉賓，偶而也繫領帶穿西裝，質料普普通通；從新穿到舊到破，皮鞋從來不擦。何欣替他準備新西裝，他也不穿。吃的方面，從不挑剔，有什麼吃什麼；弄到了營養不良。他工作餘暇，沒有任何的娛樂消遣，不看電影，不打麻將，也很少看電視，甚至連帶小孫子去植物園散散步也都沒有過。他像清教徒一樣的過活！他惟一活動，是旁晚到院子裏拔拔草、撿撿枯葉。晚上又開始工作。平日在家，圓領短袖衫；偶而朋友來，小酌兩三杯；微醺說笑話，意趣盎然。屈萬里說他：「才足以成其幽默，學足以濟其風趣。」[48] 他處事冷靜，宅心寬厚，對人誠懇，從無疾言厲色。梁容若說：

> 要學何容也談何容易。他除了工作，不懂得私生活，已經超脫了名利的關，能不繫心於世俗毀譽，人間是非。
>
> 1956 年 4 月 18 日，他到新竹替軍方設計推行國語的方案，回程發生車禍，吉普車翻進一條枯乾的大水溝裏，摔得遍體鱗傷，第二天住進臺大醫院。出院之後，又馬上去上班了。
>
> 何容不可救藥的毛病是：無所不容。他把一切人估計太高，以為自己可以忍受的環境，可以過的生活，旁人一定也可以忍受。他過慣了枯槁的墨家生活，其生也勤，其養也薄，其為人者多，其為己者少，使

47. 事見劉真珍存、方祖燊編注《當代名人書札》（正中書局出版），頁 227～228，所收何容在民 68 年（1979 年）6 月 28 日〈致劉白如〉的一封信。
48. 見《何容這個人》頁 71，屈萬里〈何容這個人〉。屈萬里，臺灣大學教授。



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他希望他的朋友，永遠寫不拿稿費的文章，作沒有旅費的出差。誰和他交誼深，他多給誰無代價的工作。[49]

吳延環說：

何容先生是夜貓子，常在夜裏寫稿，每至凌晨四點半，才上床睡覺。他自己也說：「非更深人靜，便寫不出稿來。」他的生活雖晨昏顛倒，身體卻很健康。他樂天知命，能隨遇而安，性情修養已到佛家《法華經・提婆品上》：所說「了達」境地，所以能「老而彌健」！[50]

劉真說：

何容先生工作時，態度嚴肅認真，絲毫不苟；在各種會議，他對問題的討論，都能堅持原則，明辨是非；為人是非常方正的，但與人相處卻又表現出灑脫風趣，言談幽默。[51]

高明說：

被日本佔領五十年的臺灣，到處都是說日本話，自從何容帶來了國語，大力推行，現在除少數老年人以外，人人都會說國語，由青年和兒童說得十分標準。這要歸功於這些推行國語人員的集體努力，而最重要的則應歸功於何子祥嚴肅的領導。[52]

肆 何容先生的著作

在林語堂辦《論語》時代，何容先生寫過不少小品雜文，可惜有些已經散佚。國語日報社為他蒐集而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何容文集》甲編、乙編、丙編上下共四冊（25 開本）。甲編，民 81 年出版，397 頁；乙編，民 82 年，517 頁；丙編上下，民 85 年，1259 頁：共約一百五十萬字。

---

49. 節自《何容這個人》頁 75，梁容若〈作了甚麼，該作甚麼〉及頁 166～168，梁容若〈一個榮軍的故事〉。梁容若，曾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主任。
50. 見《何容這個人》頁 2，吳延環（何容外傳）。吳延環，為何容先生鄰居。
51. 見《何容這個人》頁 21～22，劉真〈向「國語老兵致敬」〉。劉真，曾任師大校長、臺灣省教育廳長、政大教育研究所所長、總統府資政等職。
52. 見《何容這個人》頁 7～8，高明〈子祥，這個人！〉。高明，曾任師大、政大國文系主任。

甲編大部分收錄何先生來臺之前所寫的小品、鼓兒詞和相聲之類，大都發表於《國語周刊》、《論語》、《人間世》、《宇宙風》、《文藝月刊》、《抗戰文藝》、《抗到底》、《協導》、《婦女新運》等刊物。少數刊於來臺之後，《時與潮副刊》與《傳記文學》。他在〈語言的創造者〉[53]中說：

> 文學家是語言的創造者。創造豐富的語言，要採取實際語言、各種「方言」，還有別種語言，古語也不應完全屏棄。

何容先生的幽默小品，就是這樣的構成的，有極俚俗洗鍊的北平話，又有故弄改造的古語。他在文章中偶而還攙進些外國的新詞兒，如「漂亮密司」；有時「洋文」、「文言」和「口語」混用一通。如〈談丈母〉：

> 陸克有影片焉，其名為 Hot Water，華譯「為婿難」，亦有譯「丈母娘」者。竊以為音義兼顧，應譯為「好泰水」焉。那位丈母，好傢伙！真夠難伺候的。怪不得《詩經》上說：「娶妻如之何？必無丈母！」.....故鄉諺云：「修下個好丈母，吃個好菜碟兒」。[54]

他幽默的他諷世的小品雜文，大概就是用這樣的筆調寫成的。

何容先生來臺之後，吳稚暉向他說：「文藝不死，大禍不止！要作國語運動的健將，不要作幽默作家的尾巴！」以後，他就不寫雜文了。《何容文集》乙編所收的，都是跟國語運動與國語，語言文字與教育，讀音語法與教學，修辭詞句與寫作，書序與評介之類有關的文章，說理清晰，文字平白。



何容早年於國語日報會議討論時留影（立者左一）。
圖：國語日報提供

四十年以來，何容先生未嘗一日或忘研究文法，一有空就寫「結合詞式的四字成語」。《何容文集》丙編上下兩冊所收錄的，就是他研究文法的論著。上冊談

53. 文見《何容文集》甲編頁 1～3。
54. 見《何容文集》甲編頁 76。



「字、詞和詞組」，談論「詞」的分類、含義、構成、用法與變化，比喻，特殊字的用例，讀音、又讀與變調，別字，查字典等等。下冊談「四字成語」、「國字用例」、「詞與詞組」；這三部分都是從「語言的結構」去分析的，跟何容先生所研究的，給學生講授的「圖解文法」、「中國文法」的理論是一致的。研究「詞彙構成」、「詞組與句型」，屬於現代「實用文法學」的範疇。

何容先生的著作，還有《簡明國語文法》（正中書局出版），他說這是根據黎錦熙的《國語文法》編成的一本更簡明的書。《中國文法論》（有 1942 年重慶獨立出版社初版；1954 年臺北開明書店重印；1957 年大陸新知識出版社重印等版本），這本書是他在北大教文法學的一部分講義，刪去他認為見解還不大成熟的部分，文字則全部改寫過。

翻譯有兒童讀物《白白的雪・亮亮的雪》、《老鼠變老虎》、《愛幻想的珊珊》、《皮杜妮學唱歌》，這些譯作都已絕版。主編有《國語日報破音字典》、《國語日報字典》（普及本）。1974 年，他校閱的《國語日報辭典》完成，歷時四年又十一個月。1951 年與鄭嬰先生，為開明書店合編《開明初中國文》八冊。

伍 結語

何容先生在〈通俗文藝的用語問題〉中[55]，問：為甚麼方言作品那麼少？答案是：方言的許多語詞「有音無字」，沒法寫下來。那我們造一些「新字」去配搭方言吧；能打出來嗎？印出來嗎？印出來讀得懂嗎？「蘇白」小說：「故歇阿是來請倪哉」；你知道寫的是甚麼？

何容先生認為：語文教育是教人學習國語與國文的；因為語言能夠相通，文字能夠統一，才能團結國民，才能推行政令，才能辦理各種事情。他在〈國語運動的意義和目標〉中，說：

55.見《何容文集》甲編頁 27～28。

> 從國語運動的產生和發展，可以得到四點：一要推行全國通用的標準語。二要提倡言文一致的白話文。三要實行國字注音解決國字難學的問題。四要使本省同胞都能說、聽、讀、寫國語國文，都能用我國的語言文字表情達意，吸取知識。所以我們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向這個理想的目標前進，總有達到的一天。[56]

何容先生在臺灣三、四十年都是為着這個理想而奮鬥、而努力、而工作，直到他病倒、死亡才停止！有人說：臺灣光復之後，各方面都有極神速的進步，但進步最大的是「民主政治」與「國語教育」。沒幾年，大部分的人民都會說標準的國語，讀我國的文學，用漢字寫流暢有內容的文章。這種成果就是何先生所領導的國語專家，各縣市政府及國語推行人員，各地國民學校的語文教師的貢獻，學生及人民共同努力學習國語國文的成果。

現在，我們臺灣人應該共同珍惜、維護與堅持：這一份經過無數人心血、幾十年努力，才獲得的臺灣國語運動的成果！這自不是大陸所推行的「普通話」，所能夠媲美的！

參考文獻

洪炎秋等著（1992）。**何容這個人**。台北市：國語日報社出版。
何容著（1992）。**何容文集甲編**。台北市：國語日報社出版。
何容著（1993）。**何容文集乙編**。台北市：國語日報社出版。
何容著（1996）。**何容文集丙編**。台北市：國語日報社出版。
方祖燊著（1996）。臺灣推行國語教育的經驗。載於**方祖燊全集**，第二冊，頁219～240。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56. 說見《何容文集》乙編頁 1～5。



劉季洪（1904～1989）

遠見、踏實的教育家

劉焜輝 撰文／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系特聘教授



壹 前言

劉季洪先生自 1959 年 8 月到 1973 年 10 月主持政治大學校務，長達 14 年之久，對於政大在台復校後的發展，功不可沒。他的一生，就讀師範學校，又讀高等師範，出國研究教育，是名符其實的三級師範生，對於教育的體認特別深刻。他的一生也是清末民初以來數十年教育的寫照，尤其政治大學校長任內的建樹是台灣教育史重要的一頁。

貳 生平與求學過程

一、出生書香家庭，單親撫養長大

劉季洪先生本名鐘，字季洪，1904 年生於人傑地靈的江蘇省徐州豐縣，該地黃河水患頻仍，直到 1856 年水患才消失。先生祖父溪山公為廩生，終身以讀書自娛；父親峻川公為秀才，後亦補廩。先生兄弟四人，排行第四，兩歲時父親去世，由母親撫養長大，六歲時入私塾，後轉入小學，為該縣高小第一屆畢業生。先生身歷過渡時期新舊教育，認為私塾教育有其優點：「一是個別教學，可以增加教育效果；貳是注重文史，能多陶冶學生德性。——現行制度一方面小學均為班級教學，班級人數眾多，兒童個性常被忽視；另一方面現有課程偏重一般知識，文史重量減輕，人格發展缺少鼓勵。」（劉季洪 1986）先生為人處事的風格，充分反映幼小時候的家教、尤其是母親重視子女教育的深遠的影響。婚姻大事順從慈命，結婚以後，數十年和睦相處，十分美滿。

二、三級師範教育決定生涯方向

1915 年先生自高等小學畢業，因為中學在省城南京，相距千里，不僅路程遙遠，而且學費昂貴，家裡無法負擔，於是投考徐州城的江蘇省立第七師範，報考二百餘人，錄取五十名，先生名列前茅，開始與師範教育結緣。剛入學時有一則小故事：因為先生年僅十二歲，門房見先生身體矮小，不准進校，經說明後才准其進入。當時江蘇開辦省立師範九所，女子師範三所，培養不少教育

人才。師範教育是公費制，食宿講義均由學校供應，學生生活節儉。先生入學後作文成績優異，屢獲師長嘉勉。上課一月後，甄別考試名列前茅，因為入學後功課順利，以後並不用功。

先生在江蘇第七師範就讀是 1916 年到 1921 年，畢業後報考國立北京高師。當時北高師的招生是採取各省分配名額，初試被錄取複試也順利過關。毫無疑問的，進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是先生生涯上重要的里程碑。先生選讀理化部，教科書或參考書多用英文本，不得不全力以赴。先生對於北大師長的推崇尊敬，從日後發表的文章可見。例如北高從陳寶泉校長之後，先後由鄧翠英先生、李建勛先生、范源廉先生接任，校長數次易人，校務運作不受影響，先生歸功於陳校長主持校務，以碩德領導，實事求是，奠定良好基礎所致，此乃日後先生主持政大校務的風格。尤其是高師被認為是注重系主任制，也反映在先生主持的校務上，非常重視系主任的意見。

1925 年先生自高師畢業之後，一直從事教育工作，1937 年起兼任黨務工作。1929 年曾赴日考察教育，激起出國進修的念頭。1930 年 8 月終於如願以償，啟程赴美，先在華盛頓州立大學就讀，專攻教育，一年後順利取得碩士學位。當時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是美國著名的教育研究學府，先生在哥大師範學院註冊聽講，選修克伯屈（W.H.Kilpatrick）所授的教育哲學。克氏是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J.Dewey）的弟子，杜威退休後由克氏接棒，其上課方式受到肯定。

先生在美國求學期間，深受兩位教育家的影響，一為杜威，一為克伯屈。杜威針對就教育提出批評，倡導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1919 年成立進步教育聯合會，大力推行。但是對於杜威的貢獻及其矯枉過正，先生則冷靜評估，贊成國內杜威哲學權威吳俊升先生的評斷，例如「教育無目的，教育本身就是目的」論點的商榷性，「從做中學」的先決條件等都有中肯的見解而



1972 年劉季洪 （中）赴美接受聖若望大學名譽法學博士。
圖：國立政治大學提供

未隨聲附和。對於克伯屈則推崇他在附學習及設計教學法的貢獻，並且翻譯介紹，給我國小學教育帶來深遠的影響。

先生一生的求學過程都離不開師範，對於教育的瞭解特別深，踏入社會之後，大部分都獻身教育事業，貢獻非凡，可謂其來有致。

參 服務教育事蹟

一、主持三所大學校務

從 1933 年到 1973 年，先生的工作都與大學有關，且多半負責學校行政工作，包括主持河南大學、西北大學、政治大學三所大學的學校行政工作或負責大學院、系、所及其他教育文化工作。

㈠河南大學：1935 年，先生奉派接掌河南大學，針對冗員太多、校規蕩然無存，採取斷然措施，先生到任後大量裁員、調整人事，並整頓學校風氣、倡導恢復敬師傳統。因 1937 年發生七七事變，學校被迫南遷，因遷川主張未獲支持，辭去校長職務。1939 年 3 月，先生應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之邀，到教育部助理部內行政工作。1942 年至 1944 年出任社教司長後，設立國立禮樂館、創辦敦煌藝術研究所，都是具有前瞻性措施。

㈡西北大學：1944 年七月接任國立西北大學校長職務，因為是戰時，維持師生生活不易，因為新來教師租住有困難，先生把校長宿舍分給新來教師合住，自己只留下一間，且只有一面有窗。由此往事，可窺先生內心之仁慈。此段時間，正值戰時，先生主持校務特別強調振奮精神、推展教學研究，鼓勵學生自願從軍。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戰爭結束，西北大學遷校西安，之所以能夠在短短一年於遷校完成，固然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先生不分晝夜、多方奔跑，是最大的因素。由於操勞過度，胃病加重。乃於 1947 年辭去西北大學校長職務。

㈢政治大學：先生於 1959 年在台灣接掌國立政治大學，事實上，在大陸時，多年來先生與政治大學的關係一直都很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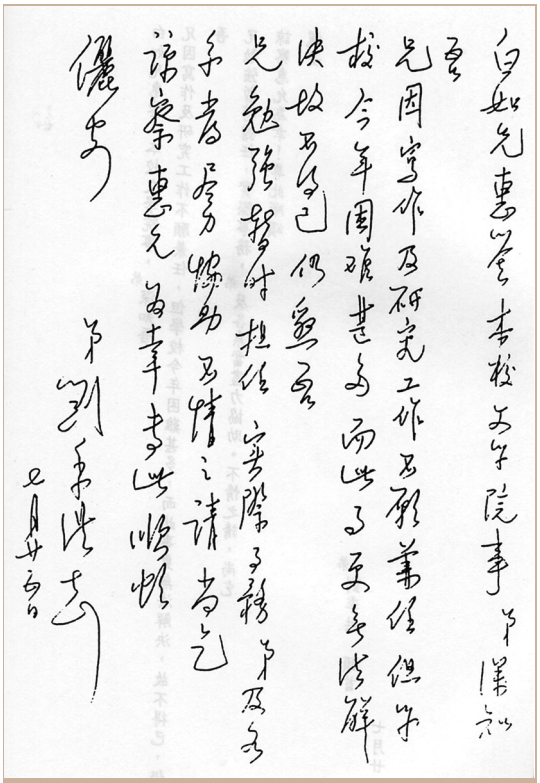
政治大學的前身是中央黨務學校，1927 年成立，旨在培養青年幹部，後來改制為中央政校，再改制為政治大學。1929 年 6 月，中央黨務學校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校，因為過去我國大學都是抄襲歐洲舊制，中央政治學校被認為能打破傳統，採取各種新的設施。1935 年先生應程天放先生之邀，負責教育部門工作。這是先生與政治大學首次發生關係。因為是年六月被任命為河南大學校長，沒能真正加入政校行列。1937 年，政校因日本進侵，奉命西遷，1938 年 9 月到達重慶，雖然有陳果夫先生邀請擔任政校訓導工作，因剛卸下行政工作，只答應授課，教教育行政及社會教育等科。1939 年 3 月先生到教育部任職，1944 年轉任西北大學校長，這段期間，仍然繼續不斷為政校做部分的服務。1945 年，戰爭結束，1947 年實施憲政，中央政校與中央幹校合併為國立政治大學，隸屬教育部。1947 年，先生辭去西北大學職務，十月回政大任教，並兼教育系所主任及文學院院長等職務。此後政府遷台，政大自大陸淪陷，停頓五年，於 1954 年在台復校，由陳大齊先生出任校長，先生又回政大任教，容後詳述。



劉校長任內，積極延攬優秀師資人才，圖為 1962 年政大教授大合照。
圖：蔡保田教授夫人蔡袁潤秋女士提供

二、擔任教學工作

先生遊學歐美三年，回國後最先任教的學校是江蘇省立教育學院。該校於 1928 年設立，原名省立民眾教育學院，1930 年改稱教育學院。設置旨趣是培養民眾教育人才。先生擔任的課程有教育行政、民眾教育專題研究、統計學及教育研究法等科。當時教課多用講義，編寫講義相當忙碌第二段教學工作是在重慶政校任教。因戰火吃緊，中央政治學校遷至四川，乃應邀到校講授教育系的教育行政及社會教育等課程。



1969 年劉季洪邀請劉真先生到政大擔任文學院院長的信件。
圖：劉真先生提供

先生一生幾乎都在行政部門工作，但是他個人興趣還是在學校教書。1948 年來台後，當時的省立師範學院院長劉真先生邀請在師院教育系任教，後來兼任系主任。日後先生擔任政治大學校長時，聘請劉真先生擔任教育研究所所長，兩度共處，先生非常珍惜此機緣。

三、擔任教育行政工作

先生一生除了教學工作之外，也擔任許多行政工作。如 1927 年充任江蘇省教育廳督學，接辦省力南京通俗教育館，考察日本、美國、法國、德國、丹麥等國之後對於社會教育與民眾教育有深入的瞭解。以先生見聞之廣，思慮之周密，無論從事哪一種領域的工作，都有卓越的成就。



肆 奠定政大在台復校的良基

1949 年中央政府遷台，到了 1954 年政大才在台復校，由陳大齊先生擔任校長。劉先生於 1949 年 5 月自滬來台，政大復校後，應陳校長之邀回校任教。政大在台復校之初，因為經費短缺，校舍簡陋，校地低窪，每有颱風來襲，水患頻仍。陳校長以德領導，校務迅速發展。1954 年設置公民教育、行政、國際關係及新聞研究所，1955 年恢復大學部教育、政治、外交、新聞、邊政等五學系，可見在陳校長領導之下，政大復校工作進展順利。工作繁重，陳校長因高齡思退，政府派先生接任校長職務。當時先生在政大任課之外，兼任正中書局董事長職務，且深知校長責任重大，未立即答應，直到 1959 年 8 月才接下此重擔。先生擔任政大校長一直到 1973 年 10 月調職考試院才卸任，長達十四年，乃是政大在台復校後發展的關鍵時期。國立政治大學史稿以「傳承校風與開展校務」表示先生主持政大校務十四年的成就，非常適當。

先生主持政大校務，大刀闊斧，績效斐然。茲分數項加以說明：

一、重視學校傳統，把握時代潮流

政大設置的目的是培養建國所需政治社會幹部人才，因此特別重視人文及社會學科的研究。早在 1928 年中央政治學校時代，就設置地政、計政、合作、新聞、外交等系，這在我國大學教育上是一項創舉。這種傳統一直保持下來。先生在此基礎上，傳承校風，發展校務，十四年內十二個研究所，包括財政研究所、中國文學研究所、公共行政研究所、企業管理研究所、統計研究所、東亞研究所、法律研究所、地政研究所、會計研究所、邊政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所，與原來設置的教育、政治、外交、新



1965 年 韓國教育部長權五柄（前一）來訪，左一劉季洪。
圖：國立政治大學提供

聞研究所合計為十六個研究所。復校後的大學部有三個學院二十二學系，包括文理學院：中國文學系、東方語文學系、西洋語文學系、教育學系、新聞學系、歷史學系、哲學系、數學系、心理學系；法學院：法律學系、外交學系、政治學系、民族社會學系、財稅學系、公共行政學系、地政學系、經濟學系；商學院：國際貿易學系、銀行系、會計學系、統計學系等。其中如商學院的成立就是配合時代潮流的實例。事實上，國內經濟發展，需才孔急，商學院遂成為最熱門的科系。至於哲學、史學、心理學、數學等科的設置，就是為了加強基本學科基礎，延攬專任教授；將文學院改為文理學院就是為了日後增設理學院鋪路。有此可見，先生辦學，高瞻遠矚，有一幅完整的藍圖。



1960 年政大新聞館完工，為劉校長任內重要貢獻之一。

圖：國立政治大學提供

二、注重品德教育，陶冶健全人格

先生強調，政大數十年來培育青年，將發展健全人格列為首要。說：「於以有效之教育方法，陶冶健全人格，始能立身治事，有守有為，以達成為國家優秀幹部之目的。」

在此目標下，先生領導的政大有若干措施是走在前端，具有啟發作用。

㈠建立導師制度，輔導健全人格的發展：政大在台復校以後，逾 1963 年實施導師制，每週邀請專家作道德休養及心理衛生方面的演講，增進學生對於人生意義與價值的瞭解。最令人敬佩的是先生強調「輔導」的積極功能，取代傳統的訓導。說：「『輔導』一門，為現代行為科學中一種新興之學問。目的在促進青年『自我瞭解』，使其自覺而自發自動、自立自強。循此途徑，不但青年之人格得以檢全發展，品修得利，而其天賦之潛在能力亦因之得以表現。故本校今後之導師制度，擬配合輔導技術，加強實施，以發展青年之健全人格，成為國家有用之才。」（劉季

洪，1967）。筆者相信，當時的大學校長有此先進見解者，為數不多。

㈡設置心理衛生中心，防止偏差行為的發生：身心健康是青年期發展中最重要的一環，政大於 1965 年起設置心理衛生中心，聘請專家，實施心理衛生教育，藉以防止青年之偏差行為。當時由我國心理衛生界先進吳南軒先生主持其事，成為國內各大學學習的榜樣。日後教育部推行大專學生輔導工作，政大模式成為重要指標之一。先生說：「經常用測驗方法明瞭學生心理傾向，並設個別輔導室，聘請輔導專家，接受導師介紹或學生請求，舉行輔導會談，以解決學生個人特殊遭遇的困難問題。」（劉季洪，1967b）

㈢重視社團活動，增進四育均衡發展。政大向來重視生活教育，從日常生活習慣的養成著手，培養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為旨趣。因此，政大校內各種社團為數甚多，校方積極鼓勵學生參加社團活動，以增進其事應團體生活能力，在實際活動中發展其優良德性。



1966 年政大足球隊榮膺「大專體聯 55 年足球錦標賽」冠軍，與劉校長合影。（第二排右三為劉季洪）

圖：國立政治大學提供

三、增強師資陣容，積極改進教學

政大在台復校之初，專任教師不易求，先生為了解決師資問題，採取若干措施：其一為培養青年教師；其二為恰聘客座教授；其三是遴選人員出國進修。

其一為鼓勵政大復校後研究所畢業者留校任教，解決了若干困難。其二是根據學校需要聘請客座教授，其來源包括與國外大學合作交換教授，自 1962 年起，政大先後與美國密西根大學、大韓民國成均館大學、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及學院合作，交換教授或研究人員，對於政大師資的補充有很大的幫助。除此之外，國際教育社團的協助也發生很大的效果，如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的幫助很大。至於選送人員出國進修方面，政大與美國密西根大學合作，先後送年輕教師 11 人赴美研究，另派教授三人赴美考察，回國後在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所任教。歐、美、非洲及日本等國也有派遣大學教師前往進修。

總而言之，政大在台復校後，校務能夠蒸蒸日上，教學能維持水準，師資的培養與儲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改進教學方面，政大採取下列措施：

㈠充實設備，佈置學習環境：如圖書、教育器材、研究場所等，積極充實，尤其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新聞館、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都是有口皆碑的。

㈡改進教學方法，鼓勵學習興趣：各學院及研究所研究如何改進教學，培養學習興趣。

㈢注重實習方法，充實致用能力：如畢業前之實習，根據各學系之性質，加強實施，使其具備實用能力。



1973 年政大社資中心落成典禮，由劉季洪校長（前排左三）主持啟鑰。
圖：國立政治大學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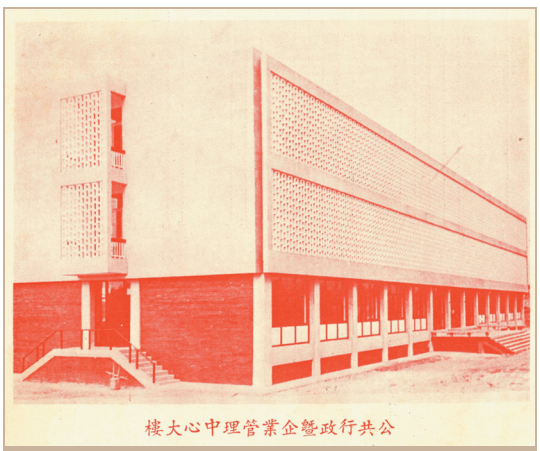


四、鼓勵研究工作，提升學術水準

政大復校後，研究所已擴充到十六所，研究生人數達五百餘人。如何鼓勵研究，提升學術水準，刻不容緩，為此，政大曾經提出「成立大學研究院建議書」，一旦實現，能夠統籌規劃各研究所之研究發展計畫，可以領導學術研究。政大的另一個特色是注重大陸問題研究，多年來已經有具體成果。

五、加強推廣教育，弘揚大學功能

推廣教育的重視是近年來大學經營的特徵之一。政大在這一方面也有具體的成果。早在 1962 年，政大就和美國密西根大學合作，發展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訓練事宜。1962 年教育部與密西根大學簽訂合約，政大成立公共行政暨企業管理教育中心，其合作目標如次：



1963 年政大公企中心於劉季洪校長任內落成。
圖：國立政治大學提供

㈠協調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之學術教育適宜，並就有關此兩方面之課程及教學方法，提供改進意見。

㈡協助我國政府機構策劃及推行在職訓練事宜。

㈢從事並促進有關我國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方面問題之研究。

㈣編譯適合我國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兩方面需要之教材與參考書籍。

㈤籌設一所圖書館，專供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兩方面參考研究之用。

㈥鼓勵並協助我國其他大學及有關機構，改進公共行政及其業管理方面之教育、訓練及研究事宜。

㈦與國際學術團體合作事宜

政大公企中心馳名全國，除培養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人才之外，並做在職人員之訓練。在該中心接受訓練的學員已逾四千人，影響之大，可以想像。

伍 教育家的風範

凡是在政大服務過的教職員，對於「劉季洪校長」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先生居住在政大教職員宿舍，與其他教職員並無二致。起居生活有規律，對待教師，關愛有加。有一次，先生獲悉校車座位不夠，馬上請總務長設法解決，說：「只要有一位老師站著，我當校長就心裡不安」，先生屢次推崇前校長陳大齊先生以德領導，先生主持三所大學校務，屢次擔任行政要職，莫不以德服人。尤其政大在台復校，一切循序以進，樹立政大在國內外之校譽，其貢獻將與政大的校史永存不滅。

參考文獻

劉季洪（1967）。本校的新使命（政大四十年）。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劉季洪（1967）。政大之現況及其展望（國立政治大學四十週年校慶專刊）。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劉季洪（1973）。本校在台復校後校務發展之回顧（國立政治大學在台復校後校務發展之回顧）。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劉季洪（1977）。政治大學回憶記略（國立政治大學建校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國立政治大學。

劉季洪（1986）。教育生涯漫談。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

國立政治大學主編（1989）。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第八章　傳承校風與開展校務。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陳有諒（1906～1998）

獻身職業教育的長工

吳文星 撰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壹 家世與早年經歷

陳有諒，1906 年 12 月 18 日出生於臺北艋舺（今萬華）望族。父陳其春，早年習漢學，有「文秀才」之稱；日治之初入學國語傳習所，遂通曉日語，先後任職臺北辨務署、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以及擔任總督府覆審法院囑託，歷任警察官練習所、警察本署等之講師。為人溫厚恭謙，熱心公益，捐建公學校教室；捐輸救災及慈善事業常不落人後，因而不時獲總督府當局表揚。1920 年地方制度改革後，被選任為臺北市協議會員。除擔任公職外，頗善於理財而富甲一方，贏得「理財家」之稱號。萬華信用組合成立後，遂被推舉為專務理事。

有諒兄弟姊妹甚多，上有一兄四姐，下有一弟三妹。兄有輝，先後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日本大學法文學部法律科，日本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及格，在臺北開設律師事務所。弟有猷，先後畢業於日本京都私立兩洋中學、九州齒科醫學專門學校，為齒科開業醫。有諒自老松公學校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考入私立臺灣商工學校（今開南商工）商科，1923 年畢業，即任職臺灣總督府內務局雇員；因感到學歷不足，1925 年秋，毅然辭職，赴日升學，入學京都私立兩洋中學四年級，1927 年畢業，順利考入臺北高等學校文科甲類，1931



1927 年兩洋中學臺灣留學生紀念合影，前排左二為中根正親校長、前排左三為陳有諒。
圖：陳美芬女士提供



陳有諒（後排中）22 歲時就讀京都帝國大學與其他台灣留學生合影。
圖：陳美芬女士提供

年畢業；接著，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英文學科深造，1934 年 3 月畢業，繼續升入該校大學院（即研究所）研究一年。

1931 年起，應聘為兩洋中學教諭，其後，兼任兩洋高等學院教授。1946 年初返臺，應聘國立臺灣大學先修班教授，並兼任延平學院教授，擔任英文課程。1947 年 8 月，轉任臺灣大學文學院外文系副教授，1948 年 2 月，辭臺大教職，轉任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長，為有諒回饋母校之始，亦是有諒長期獻身職業教育之契機。



任兩洋中學英文教師時期與學生合照，黑西裝未戴帽者為陳有諒。
圖：陳美芬女士提供



1947 年陳有諒（前排左一）擔任臺大先修班教授時留影。
圖：陳美芬女士提供

貳 長年主持開南商工、奠定開南商工發展宏基

有諒的母校臺灣商工於日治時期是一所聞名全臺的職業教育重鎮，該校成立 1917 年，分商、工兩科，修業年限三年，1939 年另開辦五年制工、商業學校，由於畢業生出路甚佳，長期入學競爭始終相當激烈，能考上者素質均十分

優秀，至 1945 年畢業生 6,281 人，其中，臺灣人 4,681 人，可說是當時臺灣最主要的商工基礎人才之搖籃。戰後，該校校友決議將該校易名為私立開南商工職業學校，並改制設初、高級兩部，各為三年制，推校友周延壽為校長。1948 年 2 月，周延壽校長因擔任臺北市參議會議長，無暇兼顧校務，請辭校長職務，董事會乃延聘有諒繼任校長。有諒上任之初，鑑於開南雖規模粗具，但戰後初年學校財政拮据，教職員工薪津經常未能按時發放，校舍年久失修破舊不堪，於是南北奔波拜訪事業有成之校友及社會賢達，或勸募、或借貸，籌措經費以紓解財務之困難，並隨即於同年 8 月將原木造學生宿舍改建為教室，以配合增班之需求；翌年冬，進而整修破舊校舍，使學生能安心求學。

有諒校長首重適當師資之延攬，並且知人善任，上任後即先後延聘黃金穗（京都帝國大學英文科畢）、劉鼎嶽（臺北帝國大學工學部畢、其後轉任臺大機械工程系教授）、郭藻梹（化學科教師）、蔡江來（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政經系畢、後轉任屏榮商工職校校長、省議員）、陳萬君（省立師範學院理化系畢、後擔任開南商工校長）等擔任教務主任，負責擘劃適切的課程，積極推展教學措施，並充實各項教學設備。任用洪清秋（新加坡萊佛士學院畢、公民科教師）為訓導主任，訂定「嚴格管教」的訓導原則，不輕易開除一個學生，但對犯規學生絕不寬貸，要求學生服裝儀容養成節儉、樸素、乾淨之習慣，其結果，開南學生頭髮光、皮帶頭光、皮鞋頭光等所謂「三光」聞名全國，同時，學生在校外不輕易違紀犯規。另一方面，擴大課外活動組織，誘導該校多數學生均參加社團活動，使學生將多餘的精力發揮在正當的途徑，以避免學生參加不良組織。

開南商工原僅有班主任（即今班導師）之設置，而無科主管之編制。有諒上任後，鑑於各科性質不同，各具專業特性，因此創設各分科辦公室，遴聘學有專精且具領導能力之教師擔任科長（後改稱科實習主任，現稱科主任），負責綜理該科專業事務。不少教師均為一時之選，例如黃振榮（化學科教師）、呂雲麟（建築科教師）、廖德政（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畢、美術科教師）、蔡炘爐（土木科教師）、陳炳東（土木科教師）、黃文章（理化科教師）等均是。



有諒推動校務的基本原則為「在安定中求進步」，1950 年代初年，當學校營運步入坦途後，即著手擴充各項設備，先後增建打字教室、製圖教室、圖書館，以及購置各科實習儀器、圖書及教學媒體，使開南的教學設備更加充實。1955 年底起，積極籌措經費，向校友及家長募款四百餘萬元，分兩期增建樓高四層的鋼筋水泥教室 31 間、特別教室 2 間、特別會議室 1 間、教職員宿舍 20 間、實習銀行、實習商店、餐廳等。其間，1956、1959 年兩度被教育廳遴選為辦學優良職業學校，而獲頒高額獎助金。接著，募款兩百餘萬元，展開第三期工程，改建物理化學實驗室、機械科實習工廠、大禮堂、木工實習工廠，以及學校紅磚舊大樓教室。其結果，1960 年代中期，開南商工校舍美侖美奐，各項設施已具備相當之規模，校貌煥然一新，校園環境優美，十餘年間有諒已為開南商工長期發展奠定紮實的基礎，並成為許多私立學校之典範。1960 年代初年，進而致力於申請升格為專科學校。



陳有諒服務開南商工三十年，堪稱職業教育的長工。
圖：開南商工提供

1948 年，有諒上任之初，全校學生約 1,000 人，初、高級部各半；1956 年，增為 1,600 餘人，初中部 700 人、高中部 900 人，已是全國規模最大的私立學校；1962 年，學生數增為 2,100 餘人；1965 年夏，初、高級部商科首次招收女生各一班；迨至 1978 年，已發展成為學生多達 3,000 餘人的高級職業學校。

1950 年 7 月，為了讓社會失學青年有就學的機會，於是創設附設商工職業補習學校，分中級、高級二部，中級部設機械、土木、建築三科各一班，高級部設商業、機械、土木、建築四科各一班，入學未有年齡限制，學生大多數半工半讀，中、高級部均修業三年，課程與日間部相同，結業後經教育主管機關資格考試及格者，可取得與職業學校同等的資格，開啟職業進修教育的新途徑。翌年，中級部增設商科、土木科，1954 年 8 月，商科首次招收女生。1958 年，

補校已有學生近八百人。歷年畢業生參加省教育廳及臺北市教育局舉辦的資格考試均能獲得及格，甚至有不少畢業生考上大專院校繼續深造，儼然在補校界中居翹楚之地位。顯然的，補校不僅造福許多一時失學的有志青年，並為社會造就許多優秀的工商人才。

由於有諒校長辦學成效卓著，1965 年 5 月省教育廳指示臺北市政府予以獎勵。函文中略謂：「據視導人員查報，貴市私立開南商工職校董事會組織健全，設校基金充裕，校長陳有諒認真負責，努力充實設備，尤以工科設備齊全，實習指導切實，教職員福利辦理完善等情。茲為鼓勵辦理成績優良之私立學校起見，該私立開南商工職業學校，應由貴府酌予獎勵。」由上顯示，開南商工在有諒校長盡心盡力辛勤耕耘十餘年間，其辦學成績不僅有目共睹，且獲得政府給予肯定，視之為私立學校之模範。

1967 年開南商工創立五十週年時，有校友談及該校辦學成績優異，許多校友在社會各界表現傑出，特別指出：「若論功行賞，陳校長該是開南的最大功臣」。

參 延續傳統、發揚光大

日治時期，臺灣商工之商科珠算教學成績輝煌，每年全臺珠算競賽大會在該校舉辦，該校學生無不大顯身手，經常囊括各項比賽之一、二名，或贏得團體競賽冠軍。臺灣商工以珠算聞名全臺，珠算成為該校之招牌，一提到珠算就讓人聯想到該校。有諒上任後，繼承此一輝煌傳統，先後延聘陳民杰、楊夢龍、郭復聯、方賢德、周基鐘、葉茂盛等擔任珠算教師；除了正課之外，並利用課外活動，成立珠算部。自 1950 年起，每年定期舉辦校內珠算能力檢定測驗，使多數開南商科學生在學中均能檢定及格，甚至於部分學生成為珠算高手，1950～60 年代在臺北市或全國珠算比賽大會中表現優異，無論團體或個人，均常名列前茅，珠算名師葉茂盛、周金塗、劉福壽、林保財、林天來、周慶安、李武男、楊光太、徐德旺、許全慶等均是此一時期該校畢業生。1958 年，開南商工發行第一本珠算期刊《珠算教育》；翌年 11 月，中華民國珠算學會成立，



開南校慶留影，左三著黑西裝者為陳有諒。
圖：開南商工提供

會址設在該校，開南商工儼然成為全國珠算中心；1963 年，出版珠算教材唱片，並於台視開播珠算教學，開啟珠算教學的新紀元。迨至 1960 年代中期，開南商工已設有珠算部、珠算教學研究會、珠算檢定委員會、珠算特別輔導班、珠算訓練班等。除了每學期舉行一次全校珠算編輯檢定測驗及班級珠算對抗比賽外，每月並發行一份珠算月報，報導珠算動態；同時，設有獎學金及榮譽紀念章，發放給品學兼優且是珠算一級以上高手之同學。由於以上種種加強珠算教學之措施，使得開南商工得以繼續維繫傳統精神，珠算始終是開南商工享譽全國的金字招牌。儘管近年來隨著電子計算機、電腦之使用和普及，珠算教學漸次沒落，影響所及，開南商工的珠算教學亦不例外。儘管如此，有諒校長任內振興開南珠算而再度締造開南珠算輝煌的紀錄，可說居功甚偉。

日治時期，臺灣商工即以運動風氣興盛而聞名，尤其是網球運動更是中等學校之翹楚。有諒校長頗能因材施教，五育並重，不僅僅要求學生努力課業，並且重視體育、音樂、美術等藝能科，致力於發掘學生藝能方面的興趣和能力，讓學生能充分發揮藝能潛能。上任之初即大力提倡體育運動，善用課外活動時間，分別成立棒球隊、軍樂隊、排球隊、桌球隊、拳擊隊、柔道隊、儀隊、足

球隊、網球隊、籃球隊、橄欖球隊、田徑隊、游泳隊、機械操隊、文藝部等，藉以誘導學生抒發過剩的精力，並在社團活動中找到精神寄託，充分發揮其潛能。其結果，開南商工課外活動組織數量之多、行動力之強，堪稱全國之冠。

就體育社團觀之，1947 年成立棒球隊，開啟戰後職業學校棒球隊的先鋒。在棒球教練陳樹木、陳尊信的訓練下，1949 年一舉成名，獲得臺北市市長盃青棒冠軍，翌年，勇奪臺灣省第一屆中等學校棒球賽冠軍。其後，在每年臺北市、臺灣省中等學校棒球賽，連續蟬聯冠軍或亞軍，稱霸國內高中棒球長達 20 年之久。期間培養出國內許多優秀球員，例如：高泉榮、周賢德、邱換信、官大全、陳秀雄、謝明勇、張昭雄、林家祥等即是。1968 年九年國教實施後，開南停辦初中部，隊員來源發生問題，而不得不於 1971 年解散。排球隊亦聞名全國，1961 年，獲日本全國排球聯盟邀請，前往日本各地訪問比賽。

1953 年成立拳擊隊，為全臺中等學校首創之拳藝搖籃，有諒校長聘請「亞洲之虎」李基鴻為教練，於歷年臺北市、全國大專中學拳擊比賽，總是所向無敵，曾連續獲得 13 年的全國總冠軍，創下空前絕後的紀錄，造就許多拳壇名將，開南拳擊隊聞名全國，不少隊員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比賽。1954 年成立柔道



陳有諒（左）與學生同樂。
圖：開南商工提供



隊，在五段名手卓萬欉指導下，秉持「開南精神」及追求「永遠第一」之傳統，連續十餘年勇奪全國錦標賽前三名之佳績，締造許多輝煌的紀錄，培養許多優秀的柔道選手、國際級教練及裁判等，贏得「臺灣的柔道在開南」之美譽。其他網球、足球、桌球、田徑等項目，運動員亦經常在臺北市、全國中等學校運動競賽中表現傑出，勇奪錦標。要之，由於有諒校長重視體育，並投入心力訓練和培養，二十餘年間，開南健兒囊括全國性、綜合性比賽優勝獎座不計其數，該校運動風氣鼎盛，成為全國聞名的體育選手之搖籃，奠定在臺灣體壇舉足輕重之地位。

就音樂社團觀之，1950 年初，成立軍樂隊，發起「一人一矸（空瓶子）」運動，以販賣空瓶所得購買樂器，有諒校長請音樂老師蔡金發負責指導，經過數月集訓，同年 10 月，在全省童子軍大會擔任演奏，一鳴驚人。其後，定期公開演奏或應邀至各駐地勞軍演奏，所到之處頗獲好評。1955 年，參加暑期青年戰鬥訓練營軍樂比賽，榮獲冠軍，應邀環島勞軍演出。翌年春，應軍人之友社之邀請，前往各空軍基地巡迴演奏，被稱譽為全省第一軍樂隊。1957 年 10 月，奉救國團派遣，並應旅居泰國華僑團體之邀請，前往泰國各大城市訪問表演，除慰問當地僑胞之外，並與泰國第一流的陸軍軍樂隊同臺演出，博得各國使節讚譽有加，完成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同年，又榮獲臺北市中等學校軍樂隊比賽冠軍。開南軍樂隊從最初只有 8 人組的樂器，短短七年間樂器已增加至 40 餘件，已成為聞名全國陣容最雄厚的中等學校軍樂隊。其後，年年在北市中學軍樂競賽中蟬聯冠軍，1960 年，應香港德明中學之邀，有諒親自帶領軍樂隊前往訪問演奏，並宣慰僑胞。1968 年 6 月，應日本文化界及僑團之邀請，軍樂隊、國樂隊及女生合唱團前往日本訪問表演 3 週。1974 年 7 月，有諒親自率領軍樂隊、女生歌舞隊及珠算部選手，前往新加坡、泰國、香港、東京等地巡迴訪問 3 週。要之，開南軍樂隊聞名國內外，並不時扮演文化外交的角色，有諒校長實功不可沒。

肆 辦學優良、迭獲肯定

由於有諒校長辦學績效良好，1956 年 9 月，獲選為教育部優良教師，接受表揚；1958 年 9 月，又因辦學成績特優，榮獲教育廳特別優良教師獎；同年 11 月，榮獲臺北市頒「推動社會教育有功人員獎」；1972 年 8 月，因推行生活教育成績優良，獲臺北市教育局頒贈績優獎牌；1973 年 10 月，榮膺臺北市暨全國特殊優良教師，為臺北市私立學校中唯一榮獲表揚者。其特優事蹟為：「一、熱心教育、致力興學、協助政府普及教育、成績優良。二、遵照總統訓示，倡導復興中華文化，示範推行生活教育成績優異，曾獲教育部核列優等。三、曾督導該校樂隊出國參加僑胞慶祝國慶演出，對國內外青年團結聯誼具有貢獻。」有人贈詩祝賀，云道：「開南校譽滿全臺，教育英才亦快哉。洙泗遺風今再睹，商工企業向兼栽。循循善誘歲時雨，默默化成梁棟才。以校為家三十載，榮頒殊獎笑顏開。」此詩內容可說相當傳神地呈現有諒校長長年獻身職業教育、辛勤耕耘終獲肯定之寫照。

有諒校長抱持「親愛精誠」之治校理念，以校為家，早到遲退，以愛施教，以禮待人，以德服眾，凡有利於教育或開南商工之事，莫不全力以赴，不計個人得失；對學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誘，抱持寬宏仁慈之胸懷，以讓頑石點頭的精神從事教育；對老師則照顧備至；其做事奉公守法、腳踏實地，經常勉勵師生守法、守時、守分，並且公正分明，在 30 餘年的領導中，開南商工校務安定、政通人和，學校呈現進步祥和的氣氛，奠定紮實的基礎。有諒被譽之為熱心的教育家，且是忠厚仁慈的長者。1978 年 7 月有諒以七十之齡退休，計服務開南商工長達 30 年。校友贈詩祝賀，云道：「獻身開南三十年，半生耕耘歎苦艱。繼往功勞稱不滅，功成身退樂年年。」有諒校長一生功在開南商工，正式劃上完美的句點。謂其為職業教育的長工，洵不為過。

有諒以畢生在學校作育英才為職志，將心血均投注在學校和學生，對其他行政職務毫不動心，據聞周百鍊、黃啟瑞等市長為了辦好臺北市的教育，曾力請有諒出任教育局長一職，但均為其婉拒。其清高之人格令人感佩。



伍 家庭與晚年生活



86 歲的陳有諒（右五）和友人合影。
圖：陳美芬女士提供

1931 年 8 月，有諒與金礦業主周鴻城之長女素玉結為連理，素玉畢業於天津廣東會館女中，性情溫純，善理家事，且樂善好施。1949 年 8 月因惡性瘧疾去世，享年 40 歲。育有五子四女。長子宗堯，畢業於臺北市大同中學，臺灣中小企銀襄理退休；次子宗文，畢業海事專科學校（今海洋大學），商船二副退休；三子宗元，先後畢業於開南商工、京都橿原大學，經營日本商社代理店；四子宗信，先後畢業於開南商工、體專，為開南商工教師；五子宗平，建國中學畢業後，獲美國州立威斯康辛大學碩士，美國IBM公司工程師退休；長女美芬，先後畢業於北一女、日本兩洋高等學院，曾任銘傳商專日文講師；次女美秋，畢業於銘傳商專，曾任銘傳商專副教授；三女美惠，畢業於美國紐約大學；四女美貴，畢業於銘傳商專，經營貿易公司。

有諒個性溫和，待人和藹可親，平素沈默寡言，澹泊名利，為虔誠的佛教徒。退休後，過著平靜的獨居生活，或看書、欣賞音樂，或時而與舊友聚敘，或前往臺灣各地及海外旅行，如閒雲野鶴，貽養天年。1998 年 2 月 28 日以 93 歲高齡去世。

參考文獻

開南校友通訊（1978/11/1～8/1），創刊號～252 期。
古元二（1940）。大眾人事錄。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
林進發（1934）。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
原幹洲（1935）。自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志。臺北。
陳有諒（1982）。陳氏家譜。未刊稿。
章子惠（1947）。臺灣時人誌。臺北：國光出版社。
新高新報社（1937）。臺灣紳士名鑑。臺北：該社。
葉茂盛（1992）。開南珠算史（民國 38 年～民國 74 年）。臺北：臺北市私立開南商工職業學校珠算部校友會。
臺北市私立開南商工職業學校（1957）。四十週年校慶特刊。臺北：該校。
臺北市私立開南商工職業學校（2004）。開南校史。臺北：該校。
臺北市私立開南商工職業學校（1987）。開南商工七十周年慶祝特刊。臺北：該校。



許世賢（1908～1983）

長期為教育請命者

莊雅茹 撰文／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歷史科教師



◆ 許世賢（1908-1983）為嘉義政界之聞人，現今之嘉義市有「世賢路」、「世賢國小」、「世賢圖書館」、「張進通、許世賢文教基金會」，且市歌中亦有「人人世賢冠全台」一詞，足見其對嘉義市之深刻影響。在許氏長達 30 餘年的政治生涯中，其正直敢言、清廉勤政的形象，實深植人心，不僅如此，世賢亦為 1950、60 年代「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之核心人物，其於政壇之活躍與影響力自不待言。

本文除簡介其生平與政治經歷外，主要由教育層面切入，呈現其戰後初期奉命接收嘉義女中之概況，再者，爬梳其問政記錄，分析其所關注之教育議題及相關主張，諸如「充實教育經費、暢通升學管道、為女性發聲、為役男請命」等，並嘗試由其見解中反映出我國早期教育發展之困境。最後，透過對其地方首長任內之觀察，論述其所規劃之教育藍圖、施政瓶頸與貢獻等。

壹 家世、求學與行醫


許世賢年輕獨照。
圖：張博雅女士、張文英女士提供

許世賢，1908 年 4 月 1 日生於台南廳（今台南市），父許煥章為前清秀才、母陳富，育有一子二女，世賢為次女。

世賢自幼即隨父及同鄉望族連城璧先生（連雅堂胞兄）研習漢文典籍，凡東萊博議、資治通鑑等均有涉獵，因而奠定其漢學根基。1914 年，入學台南女子公學校，畢業後考取台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在校期間不但學業成績優異，且曾於校刊中發表文章，又為網球及桌球校隊選手，實為校內風雲人物。1925 年，世賢負笈東瀛，入東京女子醫專就讀，在繁重的課業之餘，仍不時趕場聆聽各種選舉之政見發表會，或謂此為許氏之政治啟蒙，惟據各方資料，其求學期間並未參與任何形式之社會運動。1930 年，醫專畢業後，世賢



許世賢看診時留影。
圖：張博雅女士、張文英女士提供

隨即回台，先後服務於台南州立醫院、德泰及世賢醫院等。

1933年，世賢與嘉義張進通醫師結為連理，婚後兩人同赴張氏之母校九州帝大深造，進通鑽研內科，1938年獲博士學位後，曾任南滿鐵道株式會社鐵嶺醫院內科醫長。世賢則入婦人科，於1939年獲博士學位，期間並生育貴英、博英、博彥（1936～1339）、文英等四名子女，其辛勞、毅力不言可喻。1941年，兩人返台，於嘉義開設順天堂醫院，施藥、施醫活人無數，並曾赴災區義診，「鴛鴦博士」之仁心仁術至今仍為老一輩的嘉義人所稱頌。

貳 治校與主持婦女會

1945年11月，嘉義市地方人士組成「地方自治協會」，以協助政府辦理接收。當時省立中等學校校長、國校校長及教導主任等，均由協會推薦人選，再送請政府參考、聘任。是年12月世賢獲派為省立嘉義女中校長，然而，戰後初期接收工作並不容易，除設備、經費不足外，日籍教師遣返所造成的師資短缺問題，更考驗治校者之能力與智慧。此一時期，世賢一則致力於延攬地方人才，一則透過分班，確立嘉義女中初中、高中部的基本格局。根據1946年5月完成的移交名冊，世賢任內所聘任的教員如下：

姓名	籍貫	學歷	經歷及說明
張信明	臺灣嘉義	上海滬江大學經濟碩士	上海滬江大學商學院講師
施寶樹	台灣台中	台中中學	檢察局書記十二年；北平日本中學教員
陳碧月	台灣嘉義	日本東京東洋音樂學校	
許壬癸	台灣台南	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	台南長榮女學校教員；為世賢胞姐

林六拾	台灣嘉義	台南高等工業學校電氣科	台灣電燈技手、嘉義專修工業學校
郭重九	台灣嘉義		1946 年因任嘉義農業職業學校教務主任而去職
盧鈳欽	台灣嘉義	日本京北齒科	開業醫；1946 年因當選嘉義市參議員而去職，1947 年，不幸於二二八事件中遭公開槍決


光復後第一屆嘉女畢業生合照。（第一排右六為許世賢校長）
圖：張博雅女士、張文英女士提供

由上顯示，其所聘用之人員，不論學、經歷皆為地方一時之選。世賢於 1982 年再度當選嘉義市長時曾表示：「光復初，我被任命接收學校，當時沒有經費，我請來免費教師義務教學，現在這些學生都是社會的中堅分子，他們也發揮了力量，幫我不少忙。」儘管世賢於 1946 年 4 月因當選嘉義市參議員而去職，然而，在短暫任期及資源缺乏的情況下表現突出，更可見其行政能力卓越。

值得一提的是，其後世賢於民代任內亦持續關心嘉義女中之發展。例如要求省教育廳應全面補發早期之畢業證書，而非以畢業生多婚嫁、遷徙為由，僅被動地補發予申請者。而 1950 年起，嘉女與師大附中被指定試辦「四二制實驗班」後（初中四年，高中二年，文、理提早分流，以別於傳統之三三制），世賢即持續關心此一學制之成效，當嘉女學生選讀理組者相當有限以致無法成班之際，於省議會中提出「准予無條件轉學附中」之議，而此一建言獲得省主席當面首肯。

治校之外，世賢於戰後初期即籌劃、參與婦女運動。1946 年 2 月，創立嘉義市婦女會，並出任理事長一職。同年 5 月，台灣省婦女會成立，其亦為主要



1952 年參加婦女會軍中服務活動。（第一位縫衣者為許世賢）
圖：張博雅女士、張文英女士提供

領導人之一，並曾於國共內戰方殷之際，以臺灣省婦女會代表之身分赴中國大陸勞軍。1950 年，嘉義市降格為縣轄市後，世賢繼而任嘉義縣婦女會會長至 1957 年止。當時婦女會之活動以舉辦講習班、勞軍、調解家庭糾紛等為主，雖因經費有限而不甚活躍，然透過活動之舉辦、觀念之宣導，亦為家庭及社會教育盡一份心力。

擔任省議員後，世賢更與林蔡素女、梁許春菊、游蘇鴦等女性同仁共同為爭取婦女會經費而努力，除批判政府過於關照農會、漁會等團體，而漠視婦女權益外，更直言：「主婦一人做四、五項工作，煮飯、洗衣、看小孩、服侍先生、招待客人，這不是小事，婦女為家庭真正犧牲，太太等於是高級女傭一樣，我以為應提高婦女社會活動。」此外，1977 年，擔任立委的世賢更於國會殿堂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為前提，質疑民法中夫妻財產制之不當。由上可知，世賢對婦女議題的關注可謂終生不懈，而其言論與行動力均可謂開風氣之先。

參 政治經歷

日治時期，世賢致力於醫務本業，並未參與政治活動。光復後，世賢即擔任省立嘉義女中校長、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幹事，且催生「嘉義市婦女會」，顯示戰後之初世賢即為嘉義市婦女界之聞人，並於 1946 年當選嘉義市參議員後，展開個人之問政生涯，接著，先後投入省參議員、制憲國大代表、嘉義縣長及首屆臨時省議員的選舉，惟皆落選，至 1954 年始當選省議員，並數度連任。

1968 年結束省級民代生涯後，世賢轉而經營地方，其中，「拓寬中山路」及「七彩噴泉工程」為其第六屆嘉義市長任內最為人所稱道的政績，前者使嘉義市的主要幹道煥然一新，後者則被視為世賢不畏強權的表徵。而市代會更於


嘉義市第六屆市長就職典禮合影。（左八為許世賢市長）
圖：張博雅女士、張文英女士提供

其任期結束後通過「嘉義市長許世賢在任職其間致力於建設，建議給予榮譽市民，以資表揚」乙案。對照當時之政治氛圍，黨外市長能獲此一殊榮，實為難得。

1971 年，省府公佈「地方首長年齡不得高於 61 歲」的選舉法令，世賢因而無法爭取連任。然此一限制並未使其淡出政壇，反而讓她「由地方到中央」，創造政治生涯的另一高峰。1972 年立委競選期間，媒體均預測世賢可望當選，開票結果，其以 190001 票的成績躋身全國立委得票之首，並於 1975 年再度獲得連任。

而「嘉義市即將升格為省轄市」的消息確定後，世賢決定再披戰袍，1982 年，其以 75 歲之高齡當選嘉義市長，此役許氏囊括約 8 成之選票，尤其，在全市 121 個投開票所中，其票數領先者高達 116 個，可謂壓倒性勝利。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個人之問政與施政外，世賢亦曾積極參與 1950、60 年代之民主運動，一面於省議會中大聲疾呼「尊重憲法、保障人權、落實地方自治、改善選舉弊端」，一面與雷震、高玉樹、李萬居、吳三連、郭雨新等共同籌組「中國民主黨」，惟組黨一事於 1960 年 9 月雷震被補後胎死腹中。

茲將許世賢參選之經歷列表如下：

年別及職稱	教育政見	結果	說明
1946 年 **嘉義市參議員**		當選	與謝娥、邱鴛鴦並列為全台首位女性市參議員
1946 年 **臺灣省參議員**		落選	1. 世賢夫婿張進通醫師亦登記參選。 2. 嘉義市一席由劉傳來當選，黃文陶為第一候補，兩人



1946 年 制憲國大代表		落選	婦女保障名額一席由謝娥當選，世賢則為第一候補。
1951 年 嘉義縣長		落選	全台首位女性縣長候選人
1951 年 省議員	1. 確立婦女地位，實施教育職業地位相等 2. 整理交通，起用女警 3. 建築簡易民房，收容軍眷，廢止二部制	落選	1. 本屆省議員係由嘉義縣議員間接選舉，婦女保障名額一席由嘉義女界聞人張李德和當選。
1954 年 省議員	1. 教育普遍化，爭取全盤性教育均等 2. 公設托兒所 3. 公設婦女習藝所	當選	1. 幼教、國教、社教均提及。 2. 本屆起省議員採直接民選。 3. 於省議會中質詢「嘉義縣長李茂松停職案」，遭國民黨縣黨部同仁批判，於是自動聲明退黨，時為 1956 年。
1957 年 省議員	1. 義務教育應延長到中學，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2. 續辦女警，以利治安，以策交通安全	當選	1. 倡議「九年國教」。 2. 國民黨於 1958 年正式開除世賢黨籍。
1960 年 省議員	1. 減少中央協助款，以利興學 2. 廢止國校二部制，經費由中央或省負擔 3. 改善社會風氣應確立教學處分制度、設立特種學校，以培養國民道德	當選	1. 為「教育經費」發聲，並主張學校應強化輔導、訓導功能。 2. 參與中國民主黨之籌組，為常委之一。
1963 年 省議員	1. 確立教育制度，勿一人一策	當選	
1968 年 省議員	1.執行免試升學，提高國民教育水準	當選	全臺首位女性縣轄市長

1968 年 嘉義縣長	1. 辦好國民中學及充實國校教育設施 2. 多設新社區，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落選	1. 加強義務教育，並提出社區教育的構想。 2. 甫於 1968 年 3 月 1 日就職嘉義市長，僅月餘，即投入縣長選戰，對手大力抨擊此轉換跑道的舉動，然世賢於嘉義市的得票數仍高於縣長當選人
1972 年 增額立委	1. 確立教育政策，留學政策應符合潮流	當選	以第四選區第一高票當選，亦為全台得票數最高者。
1975 年 增額立委		當選	面對 1970 年代以來，我國日益困窘之外交情勢，世賢的政見以外交、內政及民生問題為主。早期著重之婦女、
1982 年 嘉義市長		當選	1. 囊括近八成之選票。 2. 嘉義市於 1982 年 7 月 1 日升格為省轄市，世賢因此為全台首位女性省轄市長。 3. 世賢於 1983 年 6 月 30 日病逝。

肆 以教育作為問政焦點

在世賢長達 20 餘年的省級及中央民代任內，其積極問政之形象深植人心，尤其，1950、60 年代，其與李萬居、吳三連、郭雨新、郭國基、李源棧等男性省議員，因對時局有深刻之批判，時人譽之為「五龍一鳳」。以下茲就其教育類之提案與質詢記錄，分析其問政焦點：

一、充實教育經費

自 1951 年參選省議員起，世賢即提出「廢止二部制教學」之政見，惟至 1980 年代初期出任嘉義市長，此一訴求仍為其施政目標之一。足見長期以來國



教始終面臨資源、設備缺乏之困境。對此，世賢一則懇切陳詞：「國民既有納稅之義務，國家亦應在國教上全力以赴。」一則建議「合理劃分預算、增加教育經費。」關於後者，其更具體地提出諸多方案，如降低省府預算中「中央協助款」之比例、增建教室之經費勿劃入縣市預算，應由中央或省全數負擔、檢討「配合款制度」，以免貧縣愈貧。甚至當 1964 年政府欲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的消息傳出時，世賢即於議場上力陳：事有輕重緩急，若真有此筆龐大預算，應優先增建教室才是！

再者，1950 年代實施「省辦高中、縣市辦國中」政策後，世賢亦再三指出「縣市預算吃緊，難以負擔驟增之教育經費」、「與省立中學相較，縣市立學校因資源不足，而缺乏競爭力」等問題。此外，1966 年台北市升格議題於省議會發酵時，世賢與多數同僚共同以「北市升格將對台省之歲入形成去菁存蕪之衝擊」為由，冀中央緩議此案，然未被接納。當升格乙事已成定局後，世賢乃進一步薦請政府應做好合理的財產劃分，並關心原北市境內之省立學校歸屬問題。足見世賢深明教育之要，數度於議場中力陳地方教育經費、設備之失，冀上級能予以正視和解決。惟面對世賢之質詢，省府僅承諾會盡力辦好教育，而未進一步採納其相關建言。

二、暢通升學管道

自 1950 年代起，省議會即針對「惡補歪風」進行諸多討論。惟儘管教育廳三申五令，嚴禁教師補習，此一現象卻方興未艾，為此，當局一度欲以「刑法」論處違規之教育人員。針對此一問題，世賢一則主張「延長國教，以確保學子健康」，一則建議「提高教師待遇」，以期雙管齊下，治標又治本。至於行政單位欲「亂世用重典」，一向譴責惡補的世賢，則站在法律與人權的立場直言「目前刑法既無此規範，不宜貿然施行」。足見，在痛陳為人師表者從事補習實損及尊嚴且有礙學子健康的同時，世賢亦留心、關懷基層教師之生計問題。其次，當「九年國教」計劃施行時，世賢則提醒相關單位應慎選校地，以利學童就讀及安全，並冀政府能統籌基金、協助貧困者順利就學，以真正落實國教理想。此外，世賢亦提出「鼓勵青年留學」之建言，蓋友邦既有足夠之教育資源，並願納我方之人才，則我國不宜再畫地自限，尤其相關法規應早日確立、

勿朝令夕改，徒增學子之困擾。而在 1970 年代我國外交處境日益困窘之際，世賢進而以「留學生有助國民外交」為由，冀政府廣開留學之門。

再者，世賢亦曾要求當局取消「限制高職生升學科系」一策，除「應尊重學子志趣」外，更力言「志趣常因環境變化而有所調整，限制升學，徒使學子陷入失學、失業之困境」，尤其一般家庭或因經濟能力不足，只得令子弟選讀職校，而今卻面臨畢業即失業，又無力繼續升學之挑戰，其處境無異是雪上加霜。為此，世賢進而提議「政府應事先調查社會需要之人才，始准職校招收相當之學生數，以免青少年學不致用。」

由上可知，世賢對於教育問題的觀察頗為廣泛，且多能務實地由「經濟面」出發，再進而論及理想。

三、為女性發聲、為役男請命

論者有謂：女警之招設由混沌不明、停滯期、進而走向蛻變期，主要是依賴少數中國大陸來台之高階女警官不斷奔走請命，以及女民意代表許世賢、胡克柔等肯定女警貢獻，為女性爭取從警之工作機會，而終使女警獲得支持。的確，世賢自首屆省議員任內，即十分關切女警招訓、任用之情形，其以為女性之能力足以承擔警務，且於婦幼領域更能發揮。因此，當警務處屢次以「延議中」答覆其質詢時，世賢則強硬地表示：「世界各國均有女警制度，為何我國對成績甚佳之女警招生尚需考慮，反之，卻加強公娼之登記，是否欲以公娼來補救婦女失業！」除表達其憤怒外，並以此批判當局處理婦女問題之不善。

再者，有感於女性於高等教育缺席之憾，世賢亦主張增設女子專科及大學，並以「國防醫學院護理系既招收女生」為由，提出其醫學系招生自不宜有性別限制之見解。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1956 年世賢即曾為文指出：個體可比之為人體之細胞，而細胞實無性別之分！惟受傳統觀念之影響，多數女性仍謹守「女子無才便是德」、「賢妻良母」之？分，以致男尊女卑至今猶為不爭之事實。而「教育」實為女性突破此一困境之鑰！此外，世賢亦倡議「男女合校」，其以為共學實可提供兩性良性競爭及互動之平台。在民風保守的 50 年代其言論可謂開風氣之先。



1954 年嘉義女中校友會籌備座談會留影。（坐著第一排左九為許世賢）
圖：張博雅女士、張文英女士提供

此外，在凡事以國防、軍事為要的時期，世賢仍稟持「教育優先」的信念，多次為在學生請命，冀中央給予緩召，並進而質疑：核武時代，理應以科學取代人海戰術，而我國擴大增兵之舉，不僅反乎時代潮流，亦徒增教育之憾，蓋學業一旦中斷，日後勢必衍生更多的銜接、適應問題。而此一理念，亦於省議會中引發共鳴，相關提案均獲得議會同仁之支持。

四、學制、課程與校園人事問題

1950 年代，省府曾於師大附中及嘉義女中試辦「四二制」教學，若以升學結果論之，此一辦學成效甚佳，惟教育當局傾向停辦，世賢於是數度針對此一問題進行提問，一面力陳四二制課程有助於適性發展，亦能減輕學子負擔，一面批判教育常一人一策，學子徒被犧牲。並進而提議「將師大附中改制為男女兼收之四二制中學，以培養更多人才」，然世賢以適性發展為出發點之建議，並未被當局採納。而在「結束四二制實驗班」乙事已成定局後，世賢仍持續發聲，冀望最後幾屆亦應用心教學，不可草率！

世賢不僅精通中、日、英、德文，亦深明語言文字為進學之基礎，因此提議將英文列為國中必修課程，並增加時數。其立論點有二，其一是數理等相關學科之學習均需具備英文常識，否則徒增學習困難。況且，我之友邦多為英語系國家，理應使國民具備基本之英文素養，以利交流。其二為相較於經濟能力富厚者可另聘家教授課，多數清寒者除了國教外，即無力再升學，若於初中階

段未能授予英文課程，則將使其終生不識此一國際語言，至為可惜。總之，世賢由務實的、國際的、關懷弱勢等諸多層面，切入討論英語教學之必要，其觀點既全面，且具說服力。

針對縣市長就任後，即大幅調動校園人事之情狀，世賢亦請省府嚴加監督，並調查其中是否涉及利益輸送等不法情事，甚至提出「各縣市長就任一年內不得調動國校人事」之主張，以免地方首長恃法規之保障而妄為（縣市長當選六個月內依法不得罷免）。足見其對私相授受之深惡痛絕！

五、關心私校發展

鑒於私校之教學設備多未達指定標準，早於 1950 年代世賢即與胡克柔、梁許春菊等多位省議員，共同為私校爭取額外補助經費。其指出學校之設立雖有公私立之分，然培養人才之目的則一，當前私校之困境實不容坐視！冀省府比照工商貸款辦法，予以協助。而當部分私校有商業化之動機時，其亦提醒當局嚴加注意，並輔導其正常發展，同時建議應鼓勵教育界名流優先設校。此外，私立學校草案於立院審查時，世賢亦發言強調：當前「學店」充斥，應嚴格規範私校董事之資格，務必剔除犯有貪污舞弊罪行者。立法院同仁亦認同此一見解，而依其審查意見通過此案。

伍、施政重心、瓶頸與突破

1968 年，世賢當選第六屆嘉義市長，隨即配合預算，著手規劃施政藍圖，並將「興建市區國校不足之教室」列為重點市政之一。惟因財政匱乏，此一施政目標於執行過程中一再延宕，且完工後之校舍亦未臻完善。例如建設課長曾於答詢時表示：「新建之崇文國小教室，因限於經費不足，而無法兩旁均設計樓梯，俟經費有著落時再予增建。」再者，儘管市代會不斷要求公所早日改建危險教室及興建廁所，世賢亦僅能承諾：「本公所相當重視校舍問題，然而財政拮据，只能局部儘量解決。」財源無著之境可見一斑。



嘉義市中正公園的紀念銅像，象徵著嘉義鄉親對許世賢的感念。



嘉義市市長期間許世賢辦理市政公務時留影。
圖：張博雅女士、張文英女士提供

誠如論者所言，我國鄉鎮財政枯竭，嚴重影響地方自治事業之發展，而嘉義市既屬縣轄市層級，必得面臨此一挑戰。對此，世賢於整頓稅收、爭取上級補助、出售公產、向銀行貸款以籌措經費的同時，亦審慎評估各項工程之輕重緩急及其可行性。凡此在在考驗主政者之智慧，而世賢能於困乏中開創新局，應是其深受肯定與支持之因。

1982 年 1 月，世賢再度當選為市長，同年 7 月，嘉義市升格為省轄市。其於升格後首次施政報告中提出「充實師資、設備、教材，改建危險教室，取消二部制教學，加強特殊教育」等目標，並於學校教育外，致力於提倡社教活動，諸如整建名勝古蹟、加強文藝活動、編纂嘉義市文獻等，更於是年底舉辦

「嘉義市第一屆文藝季活動」，內容包括影劇、美術、音樂、文學、舞蹈、民俗藝術等六大類，共 24 場次。對於嘉義市民而言，此一大型活動不僅空前，亦為全新之文化饗宴。與前期相較，其此時之施政計劃顯然更為宏觀，除硬體設備外，亦重視市民之休閒生活，並嘗試藉由文獻編纂、古蹟整建等將文化向下紮根。然而，原期待升格後能有更多施政空間與資源，惟世賢於 1983 年 6 月 30 日因病去世。嘉義市府之「市旗」降半旗以感念其貢獻，並舉行市葬。同年底，張博雅繼母志而當選市長，且至 2000 年張博雅入主內政部並兼任省主席前，嘉義市分別由她與張文英相繼主政。此外，2001 年的嘉義市長選舉，陳麗貞在張博雅及各方強力輔選下勝出，競選期間其以「許世賢第四代傳人」自詡，足見，世賢在嘉義市之耕耘及政績，不僅為其女執政初期之重要憑藉，其廉能的形象更為嘉義政壇之佳話與指標。

「嘉義媽祖婆」、「五龍一鳳」、「許家班」等乃媒體或論者題及許世賢時最常使用的稱號。自 1946 年 3 月起即當選嘉義市參議員，直至 1983 年 6 月於嘉義市長任內病逝為止，世賢政治生命幾無中斷，這些稱號除了反映其在嘉

義市所締造的群眾基礎、政績及影響力外，亦顯示其以「女性」及「無黨無派」身份，卻能長期立於政壇的特殊性。而世賢一生曾締造多項紀錄，諸如日治時期少數之女性醫學博士、戰後首位女性「省中校長、市參議員、縣長候選人、縣轄市長、省轄市長」、以黨外女性參選人於立委選舉中脫穎而出等。儘管世賢於教育界之淵源、影響力，不若其政治表現之深刻，然而，考察其問政焦點與施政重心，則見其對教育議題關切與用心，藉由其主張與訴求，並可窺見1950~80 年代我國教育之困境與發展。

參考文獻

許世賢檔案。政論、演說手稿，各類證書與文件等。

立法院公報（1973～1980）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公報（1954～1959）

臺灣省議會公報（1959～1968）

嘉義市市民代表大會議事錄（1968～1972）

嘉義市議會議事錄（1982～1983）

嘉義市政府編（1983）。**嘉義市文獻**，第 1 期。嘉義：編者。

嘉義市政府編（1984）。**嘉義市文獻**，第 2 期。嘉義：編者。

潘立夫（1982）。嘉義市長當選人許世賢訪問記。**政治家**，第 22 期，頁 1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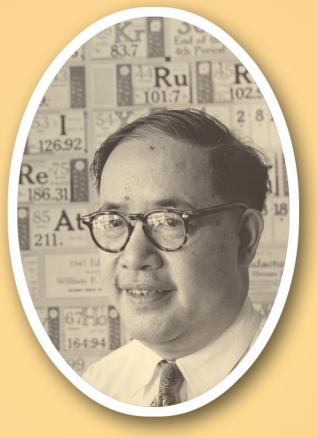
黃維正（1983）。嘉義媽祖婆許世賢蓋棺論定：她的從政、政績與政治思想。**前進週刊**，第 1 期，頁 4～13。

黃嬰（1992）。許故市長懷思錄。**嘉義市文獻**，第 6 期。嘉義：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玉山文化協會（1997）。**許世賢博士紀念集**。嘉義：張進通、許世賢文教基金會。

嘉義市政府（2003）。**嘉義市志.卷六，教育志（上）（下）**。嘉義：姜添輝編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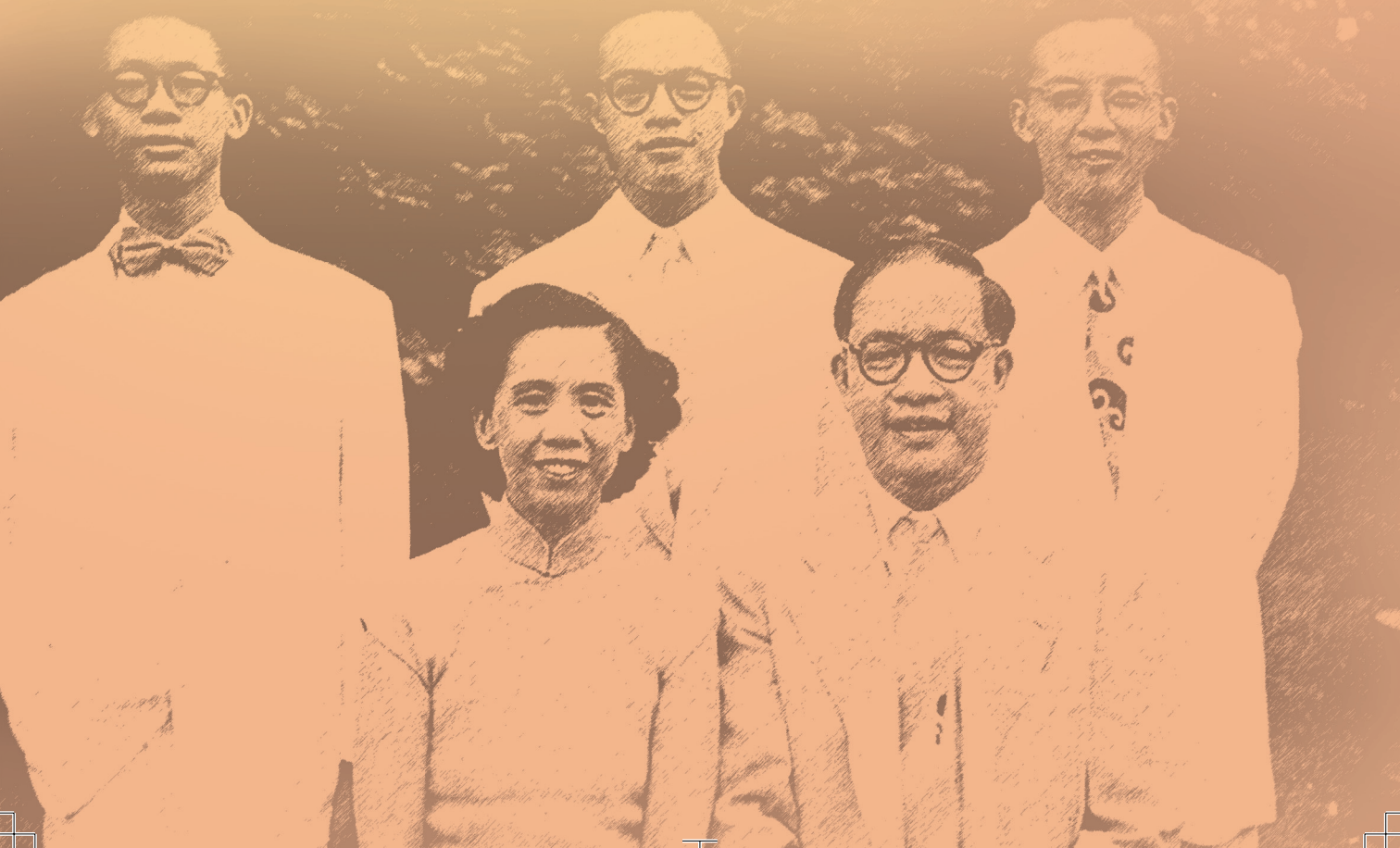
莊雅茹（2003）。**戰後臺灣女性參政之先驅：許世賢（1908～1983）的政治生涯**。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錢思亮（1908～1983）

「平淡無奇」的教育實踐者

李東華 撰文／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楊宗霖 撰文／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壹 前言



1939 年錢思亮（後排右）與父親、妻子及三子於上海合影。
圖：錢復先生提供

錢思亮，字惠疇，浙江杭縣人，生於民前四年（1908）。思亮先生一生大半投身教育界、學術圈，雖位居顯要，但經歷卻很單純。自 27 歲留美歸來後，歷任北大教授（抗戰時曾執教於西南聯大）、臺大教務長及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歿於中研院院長任內，始終在教育及學術界服務。思亮先生一生際遇比較特殊之處在於每個位置上都能久任其職，成為當代高等教育界中少見的異數。

最初層峰之所以拔擢思亮先生，重用一位與當代中國學術界淵源不深的歸國學人，固然是由於胡適的力薦（錢思亮夫人是胡夫人江冬秀女士的乾女兒），但思亮先生是忠良之後（抗戰時期其父卒於上海，為日寇所害）；北京圍城時，有幸搭上搶救學人的專機，得舉家脫身來臺。加以其家世背景（思亮先生的妻舅張茲闓先生，曾任經濟部長）、個人學歷（伊利諾大學化學博士）、人格特質（忍辱負重）等，對執政當局而言，誠屬適當人選，因此思亮先生得以四十四歲之齡接掌台大，入主「自由中國」地區當時唯一的大學，相較於後傅斯年時代，喧囂塵上「擁胡」（胡適）繼任的聲浪，這項派令是頗出各界意料之外的。

思亮先生順利出線的另一考量，或許是對美窗口（美援）的因素。國府遷台初期，喘息方定而百廢待舉，韓戰爆發後，美援頓時成為各項建設的重要倚賴，思亮先生本身有留美背景，透過胡適的牽線，即可與美國政、學界網絡有所互動，思亮先生的臺大校長一當十九年（1951.3~1970.5），也正好見證了「中美關係」的蜜月期。由於美援是多多益善，因此外間流傳有關於思亮先生爭取美援的一則軼事：



「在一個有記者在座的會議場合，當錢先生一再提到美援，有一位記者寫了打油詩給同學們傳閱，詩句是：「張口美援，閉口美援；問是何故？此人姓錢」。

其後外界對思亮先生印象最為深刻處，往往是主持大考、巡視闈場等側影，這十九年中，教育部長歷經程天放、張其昀、梅貽琦、黃季陸、閻振興，到鍾皎光前後六任，而思亮先生始終擔任臺大校長，因此好一段時間，錢思亮之名幾與臺大校長畫上等號。

以下將思亮先生生平，概分為早歲經歷、出掌臺大及主持中央研究院等三時期，分別論次如下：

貳 早歲經歷

仁和（後改杭縣）錢氏，書香門第。思亮先生高高祖（即祖之曾祖），名灄，清乾隆 45 年（庚子）進士，歷官兵馬司正指揮、廣西桂林府同知，嘉慶 7 年（1802）6 月任台灣府海防同知，10 年（1805）因討蔡牽軍功，升候補府加道銜。11 年（1806）並署（代理）臺灣知府四月餘。14 年（1809）卒於任所。是時臺灣僅置一府，錢灄為三巨頭之一，曾有功於臺灣。

思亮先生本人於清光緒 33 年（1908，其生日為 12 月 6 日，於舊曆仍屬丁未年，但以陽曆計已為 1908 年 1 月 9 日）生於河南淅川，其父錢鴻業（字謹庵）時任官於該地。之後長於平、津，因此不會講家鄉話，致使思亮先生完全沒有省籍及地域觀念，待人處事頗得其益。思亮先生幼年罹患腿疾（骨髓炎），不能下床行走，只好延師在家學習，直至十歲時才插班就讀小學三年級，也因此造就了錢氏耐磨的性子，有著過人的毅力和韌性。十四歲起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前後六年，期間與知名物理學家吳大猷同窗，進而成為一輩子的知己。二十歲以父母之命與張婉度女士結褵，婚後張氏相夫教子，所育三子錢純、錢煦、錢復各有所成，一門俊彥，在家庭教育上，思亮先生是名符其實的大教育家。

影響思亮先生攸關重大的人生轉捩點是 1931 年清華畢業後，獲得庚子賠款獎學金，赴美深造。據其美國同學回憶，在美修業的錢思亮，一心想儘早完成學業，因此做實驗時不眠不休，拚勁過人。為加強美語，當思亮先生忙裡偷閒前往戲院觀賞電影時，往往趁著戲院不清場，同一部電影連看三次，回來後猶自模擬劇中人物的對白。

憑藉著這股奮發不懈的志氣，短短三年內，思亮先生接連取得碩、博士學位，以二十七之齡學成歸國，回國後即受聘為北大教授。抗戰軍興，思亮先生隨北大先遷長沙、再移昆明，直至 1941 年其父遇害，方返回上海奔喪。因受阻於交通，無法再返大後方，因而就聘於上海化學藥物研究所，擔任研究員。


錢思亮於臺大時期使用之舊書桌及文具。

1946 年北大復校，思亮先生重返北大任教，並兼化學系主任。1948 年 12 月 15 日是思亮先生另一人生的重大轉折，他與胡適、劉崇鈜、毛子水等教授搭上國府營救北平學人的專機，得以安抵南京，隨後接受傅斯年校長邀請來臺，應聘為臺灣大學教授兼教務長。關於傅與錢的互動，臺靜農先生如此回憶：

> 傅先生既忙於處理校內外許多棘手問題，而教學大計則付之於錢先生。……錢先生……慎思明辨，從容擘劃，除舊與建新，使之漸入正軌。……以傅先生的魄力與遠見，錢先生的縝密與寬厚，兩者契合為同一的目標而努力，這是非常難得的。

擔任教授時期的思亮先生並非口才便給的教授，但思亮先生在北大及西南聯大的授課，深獲學生好評，尤其在西南聯大時曾被學生視為是全校最好的七位教授之一。除了專業領域精闢的講解，思亮先生教學的敬業精神一直為學生所津津樂道。在臺大授課時期，許倬雲教授對其敬業精神有親身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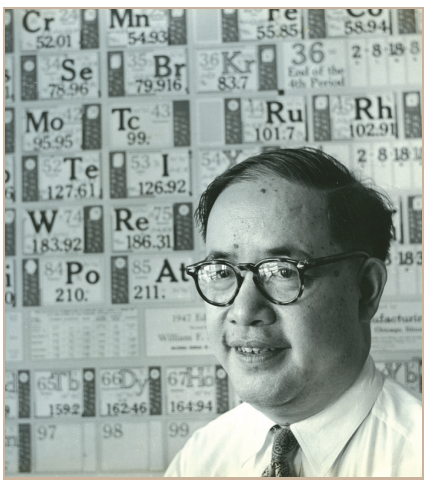
不久我注意到錢先生總是在上課前三分鐘就到了課室門邊。手裡抱著分子模型，他靜靜的站在課室門外，等到鈴聲一響才跨進課室。多年以後，我也在臺大工作了。有一回我提起舊事，問他怎麼算得如此準時，總是早到三分鐘，不多也不少。他說他算好了由教務長辦公室到課室的步數。有此準備就不難準時了。

舉家遷臺的思亮先生，當時雖是臺大教授兼教務長，但微薄的薪水仍難以支應飛漲的物價，尤其家中有三個尚在就學的小孩，不得已只好每月透支薪水。其間的窘迫情狀，據與錢思亮曾在臺大共事二十二年的朱仲輝回憶：

當時臺大校長傅斯年就跟他說：「你這樣子借薪水，開了例，別人也要借，怎行呢！」錢思亮則據實答說：「不借，我就不能生活。」傅斯年去世後，由錢思亮當校長，校長的薪水只比教務長的多一點，還是不夠一家開銷，但當了校長卻「不好意思」再透支薪水，只好向外舉債。因此朋友都知道錢思亮「窮得出名」，雖然他身居臺灣最高學府之長。

參 出掌台大（1951～1970）

人生的造化難料，前任傅斯年校長竟如他的讖言：「歸骨於田橫之島」，猝逝於省參議會議場，哲人其萎，思亮先生接棒，壓力著實不小。按思亮先生個性幾與傅斯年校長互補，他沒有傅校長的霸氣和魄力，更沒有直通黨政高層的關係。但不刻意、不主動拉幫結派的思亮先生，反倒因為沒有包袱，得以從眾多繼任校長人選中脫穎而出，循序展開其建校的工作。



初任台大校長時留影，背後為化學元素符號。
圖：錢復先生提供

思亮先生主理下的臺大，雖然沒有傅斯年校長開風氣之先的恢弘氣象，但大體上，思亮先生仍依循著傅校長對臺大的擘畫，「傅規錢隨」。由於個性的不同，兩人治校風格亦截然不同，思亮先生雖然少了份活力，但多了份和氣。

以和為貴的錢校長，尊重既有的成規，「穩定壓倒一切」，因而扁舟輕渡，履險為夷，平順的做完十九年的任期。

臺大前身為日治時期的臺北帝大，是以研究為取向的大學（講座制）。原本傅斯年校長有意重振台大的研究風氣，但錢校長比較著眼於教學品質的改進。由於當時臺大招生日多（原因之一為僑教政策的考量，使臺大僑生數目逐年攀高），但既有的師資、設備卻無法同步提昇。在研究經費上，亦宥於時局的緊迫而無法寬列。其他諸如圖書、儀器的添置，乃至於新大樓、實驗室的增建等，幾乎全須仰賴美援，因此思亮先生初長臺大時期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外援」（美援）的積極爭取，以便建設臺大。

初掌臺大的思亮先生，依學界的輩份及倫理而言，理應難以大動作的進行人事整頓，但 1953 年 6 月底，思亮先生卻未續聘法學院盛成、鄭學稼兩位教授，法學院院長薩孟武以事前未獲知會，憤而辭職（後接受慰留續任）。翌年（1954）暑期，思亮先生擬聘任甫卸任之教育部長程天放（與錢氏為兒女親家）及省府秘書長浦薛鳳為教授，遭到校「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以程、浦兩先生「五年內無專門著作」為由拒聘。思亮先生尊重該項決議（其時「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以教務長為主席，各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各院教授各推派二名為委員。二名委員中一名由該院出席校務會議之教授互選產生，另一名則由校長推薦。但思亮先生每將各院教授互選之次高票者為其推薦人選。之後亦未因此事而有任何改變）。此為師生對錢



與同仁赴臺大林地勘查，坐立者為錢思亮。
圖：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提供



錢思亮親題臺大校訓。
圖：國立臺灣大學提供

校長任內印象最為深刻之兩件事。其後擔任校長的虞兆中教授（1981~84 治校）認為後者顯示思亮先生自願放棄其聘任教授之權力，是臺大「教授治校」的濫觴。

思亮先生無疑是最常出國的校長，時常必須接受高層的委派，出席國際會議（如 1964 和 1965 年舉辦的兩屆中美科學合作會議，1955 年的國際大學會議等），一方面推動國民外交，在國際場合爭取中華民國的能見度，另一方面則在任何可以發聲的國際舞台，嚴詞斥責「匪幫竊國」。又由於思亮先生身為自由中國台灣地區最高學府的龍頭，即使不出國洽公，也片刻不得閒，除了長期參與中國化學會、自然科學促進會等社團事務外，思亮先生還必須陪同訪華的外賓、學者晉見中央要員，他頻繁的出席各項集會活動，儼然是學界的當然代表。甚至亞盟（後來的世盟）、聯合國中國同志會、孔孟學會、公費留考遴選、電台廣播、報社家庭生活專欄等都不時邀約他參與致辭、撰稿等活動。習化學出身的他，還曾應邀參加中樞紀念孔子誕辰，在蔣總統面前，主講「孔子和我們現代的教育」（1963 年）。但其實思亮先生是拙於言辭的（思亮先生的校慶賀辭和畢業訓辭每年底稿幾近雷同，尤其運動會之開場白總是「各位同學，今天天氣很好」，更為臺大同學們所熟悉。當思亮先生晚年赴美國紐約與臺大校友歡宴時，開場白仍是「我以前常說今天天氣很好」，大家哄堂大笑。思亮先生接著說「可是今天天氣實在太好了，不能不說。」大家更是大笑），只是他不擅拒絕的個性，不忍拂逆對方的好意，即使再忙都儘量滿足邀訪單位的需求。因而逼使他只得不辭辛勞，風塵僕僕的趕場。

思亮先生個性溫婉，待人謙和，不愛搶鏡頭，不願坐前排。擔任主席必讓參加者充分表示意見。這樣的個性，傅孟真校長以「粹然儒者」稱之。思亮先生嘗引傅校長「平淡無奇的教育」訓勉同學，他在臺大的作為證明了他正是「平淡無奇」教育的實踐者。



錢校長於台大第四屆運動會留影。
圖：錢復先生提供

以當時的臺大而言，一切建設剛要起步，校務繁劇可以想見，傅斯年校長的猝逝，即與臺大校務工作的千頭萬緒有關。而「壯歲躊躇」正是思亮先生最大的優勢，錢校長的秘書、司機們回憶錢校長任內事蹟時，校內案牘繁重是他們共同的記憶。

思亮先生任內曾有兩件事涉敏感的政治事件，一為彭明敏、謝聰敏兩位的「臺灣自救宣言」事（1964.9），一為殷海光教授被迫停止授課事件（1966.8），此二事均屬政治勢力介入校園事件。當事件曝光後，思亮先生無力抵拒，難以有所作為。其實這也難求備於他，畢竟思亮先生本人一直以「潔身自好」自期，本無意捲入政治的權鬥，在他而言，只是聽命行事的執行者，戮力從公謹守本份，這也是思亮先生一貫的作風。



肆 主持中央研究院（1970～1983）

1964 年思亮先生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1970 年 6 月，繼王世杰院長之後，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直到 1983 年 9 月去世為止，先後任職十三年。

思亮先生由複雜的臺灣第一高等學府，轉而主持較為單純的研究機構，似乎更符合他的性格。在其任內，思亮先生對中研院硬體的建設，成效卓著。例如增設十個研究單位；擴建院址十三甲（原廿三甲）；預算由初到任之一千八百萬元，擴增至八億元；人員由一百六十人增至近千人；尤其在任期尾聲（1980 年）時更執行五年發展計畫。這些都是中研院關鍵的轉變發展。對外方面，思亮先生首開赴美召開分區院士會議的創舉（1971 年，於舊金山、華盛頓分別舉辦。1973 年，更於檀香山、洛杉磯、華府、費城、紐約、波士頓及芝加哥等八地召開），思亮先生不惜風塵僕僕移樽就教，聆聽教言，爭取旅美院士返國任職或協助促進國內的學術發展。

思亮先生任內另一貢獻，是放寬院士選舉辦法（1973 年），將之修改為：「候選人得三組（即數理、生物、人文）綜合票數達投票人數三分之二（原四分之三）者當選」，此舉得以網羅更多的旅外菁英，並肯定較易被忽略的國內學者。

至於與政府的關係，思亮先生仍延續臺大時期的態度。譬如前任王世杰院長全力抵制的三民主義研究所，在思亮先生任內終於定案設所。論者多謂思亮先生不像前任王院長之力拒，轉而屈從於政治壓力之下，接受妥協。但其實思亮先生另有應變之道。思亮先生延聘了時任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的陳昭南先生擔任三研所籌備主任，陳先生是專業經濟學者，而非「三民主義專家」。思亮先生不任命外界所推薦之諸多三民主義專家，而由陳昭南先生出線擔任籌備主任，因此三研所設所之後，該所專研之各類主題，舉凡政治、社會、經濟、歷史等問題都有，就是獨缺研究三民主義之學者。這或許是思亮先生刻意之擘畫，既不杵逆政府當局，又能堅持學術理念，這應是思亮先生個性之具體表現。

思亮先生主政下的中研院，受益於臺灣經濟產業轉型成功，經費條件比遷臺初期富裕許多，因而院內若干建設亦能按步就班逐漸啟動。儘管院務推動大抵順利，但在 1977 年，思亮先生卻因故兩度請辭中研院院長職務。一為中研院人員「兼職」案（時監察院接獲檢舉，謂中研院人員「兼職」嚴重。經中研院向監院提出詳細說明後，監院方決定不進行調查。其實所謂中研院「兼職」人員，多為中央方面徵調，祇是「借調」，且「留職停薪」，並非「兼職」。另中研院為國家最高學術機構，經常需派研究人員出國進修或交換訪問講學，故其研究人員多予留職；又中研院為促進各大學學術交流，有與各大學合聘研究人員之制度。外界均將之視為「兼職」）；一為親共院士爭議案（報載若干旅美院士，在美國報章刊登廣告，主張美國政府應承認中共，此一舉動顯已違反國策，行同「叛國」，應予除名。數位院士此舉確屬不當，但中研院組織法明文規定院士為終身名譽職，思亮先生為此曾召集四次評議會欲處理而未果），兩者均為思亮先生帶來相當困擾，最後決定請辭負責。但均經嚴家淦總統強力慰留。

任職院長期間，思亮先生亦有若干兼職，如出任原子能委員會主委的兼職（1971~81），一方面證明台灣對此一領域的重視（核電的開發），另一方面藉由思亮先生的學術地位及本身對原子能的專業認識，向美國人背書，保證臺灣的原子科技是用在發電等和平用途，而非武器方面。



60 年代與家人合照。前排左為妻張婉度女士，後排右起錢純、錢煦、錢復等三子各有所成。
圖：錢復先生提供



伍 結論

評價思亮先生，必須回歸到 1950 至 1980 年代的時空環境，才能客觀符實。以其身任的臺大校長而言，面對有限的校務預算，思亮先生必須不斷的爭取美援，以建設臺大，他在硬體建設上的成效，至為明顯。至於臺大校務，思亮先生大體上是無為而治、分層負責，對人事的派任力求穩定，只要找到了他認為適當的院系負責人，就不輕言更替。

思亮先生清廉高潔、不忮不求的個性，就其自身而言，使他能行穩致遠。就臺大而言，在其主政臺大的 19 年間，臺大學風平靜淳厚、在風雨中逐步立穩腳跟。

在思亮先生身上還有一點與他人不同之處，便是長期擔任校長，卻絲毫不見「官味」。思亮先生主掌臺大期間，凡新聘教授的聘書思亮先生都堅持親自遞送，在尊嚴師道上，他不但以身作則，且始終如一。他的尊師重道亦可由幾件小事中看出端倪。思亮先生為第五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事實上 1962 年第四屆院士選舉時，思亮先生便以主持學術機構成績卓著被推薦為院士候選人。不料選舉期間，思亮先生突然藉故推辭推薦，退出候選人行列。多年後思亮先生始道出真相，原來當年清華母校老校長梅貽琦先生亦名列候選人當中，故思亮先生退出。又據曾擔任中研院秘書主任、與思亮先生共事兩年的陶英惠先生曾提到：

> 記得他告訴我，他的英文名字 Chien Shih-Liang 中『Shih』字的拼法是錯的，正確的拼法應該是『Ssu』。我問為什麼不改一下呢？他說，這是他的英文老師給他拼的，不便更改，這位老師是南方人，對於『思』和『師』二字的字音是不分的。我聽後肅然起敬，其尊師重道之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思亮先生的缺點或在於治校作風保守、缺乏積極開創的企圖與宏遠的抱負，以致於臺大未能因著既有的雄厚基礎，躋身世界級學府之林。但不同的時代環境有不同的需求考量，很難求全於一人。

思亮先生終其一生不乏社會參與，身後也得享令名（臺大和中研院各有思亮館為之紀念）。思亮先生生前每遇有機會，或不吝獎掖後進，如劉慶瑞教授等；或提拔優秀學生，如許倬雲院士等。思亮先生將其個人的黃金歲月奉獻給臺大，之後更將餘生貢獻給中央研究院。在政府遷臺後的三十年間，思亮先生一直是政府倚重的學術科技人才，對科學教育的推動、普及，有其一定的貢獻。或許在越混亂的年代，人們將越懷念他，一個少有聲音，少有主張，卻孜孜矻矻，埋首於案牘、奔波於校內外事務的校長。思亮先生廉潔的操守，為自己贏得「錢思亮，不思金錢思亮節」的佳評。

參考文獻

錢思亮（1970）。**我在美國的時候**。台北：雲天。

錢思亮先生治喪委員會編（1985）。**錢思亮先生紀念集**。台北：錢思亮先生治喪委員會。

項潔主編（2005）。**國立台灣大學校史稿**。台北：臺大。

錢復（2005）。**錢復回憶錄（卷一、卷二）**。台北：天下遠見。

聯合報（1951.10.6～2007～2.16），1655 則相關新聞檢索。

傳記文學（1962.9～1998.5），124 篇相關文章。



吳守禮（1909～2005）

台灣閩南語研究的導師

歐素瑛 撰文／國史館協修



壹 家世與求學

吳守禮，字從宜，台南人，1909 年 3 月 17 日生於文風鼎盛的台南府城，為台南市資產家、文人吳筱霞之次子，尚有一兄、二姊、一弟。父親筱霞公酷愛詩文、好交友，生前曾周遊中國、日本，曾受教於進士許南英門下，並將台南故居「吳園」的嘯霞樓提供許南英作為寓居之所。因家中經常詩人聚集，吳守禮耳濡目染，自小便習漢文、吟童詩，培養出對漢詩文的喜好。長兄吳守權八歲時至日求學，年長後為日本三井會社的高級人員，因熟悉南洋事務，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帶領公司人員前往南洋出差時，所搭船隻遭美軍潛艇擊沈而喪生於琉球附近海中。大姐吳湘蘋適醫師翁俊明，戰前翁氏曾前往中國創立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為首任省黨部主任委員，戰爭結束前在中國去世；二姐吳楚蘋適台南縣柳營名紳劉明哲，劉氏為台南光華女中首任董事長。么弟吳守經九歲時至中國上海求學至大學畢業，戰後始返台，服務於中國廣播公司至退休。

相較於長兄和么弟分別前往日本和中國求學，吳守禮求學時家道已中落，無法到日本留學，只好留在台灣，自幼跟著父親學習《文學初階》、《唐詩三百首》、《尺牘如面談》等啟蒙書，深受父親之薰陶和喜愛。1919 年，吳守禮 10 歲時喪母，父親調至台中擔任支店長，舉家遷至台中，最後定居員林郡坡心庄（今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新館郡山館，吳守禮進入台中公學校就讀，四年級時轉入台中州員林郡坡心庄舊館公學校。1922 年，考入台中州立第一中學校。畢業後，於 1927 年考入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由於吳守禮患有輕度紅綠色盲，無法讀理科，基於個人自幼對文學之喜好，遂選讀文科乙組，以德語為第一外國語、英語為第二外國語，同年考入之台籍生僅有 3 人。1929 年，20 歲時，奉父母之命與黃梅治女士結婚。

1930 年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直升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主修東洋文學（即中國文學），是該校第三屆學生。講座教授久保得二（1875～1934）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畢業，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代聞名的詩翁，以元曲研究獲得博士學位，專研詩集、戲曲；助教授神田喜一郎（1897～1984）



1932 年 3 月與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同學合影。（右一吳守禮）
圖：吳昭婉女士提供

為京都帝國大學支那史學專攻畢業，博學多才，兼及經學、文學、藝術等，尤擅長考證學，兩人各有所長，但因吳守禮聽不慣久保教授的東京腔，所以不敢碰他的詩文，乃跟隨有著一口標準日語發音及諄諄善導的神田教授學習，養成「以經證經」、「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嚴謹治學態度，從此與考證學結下不解之緣。期間，亦曾受業於著名的漢語、閩南語、南島語學者小川尚義，學習語言學，接受完整的語言學訓練。課後，經常前往神田教授位於中山北路的宿舍，聽其談論京都學界現況、學習研究方法等，獲益匪淺。

1933 年，吳守禮完成〈詩經の文法的研究—主とに一二虛詞つい—〉之畢業論文，自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畢業。當時吳守禮雖擁有日本文部省頒給之中學教員資格，卻因差別待遇而無法任教職。1934 年 6 月，久保教授因腦溢血去世，同年 11 月，神田教授升任講座教授，12 月以台灣總督府在外研究員之身份赴法、英兩國留學，而吳守禮則為神田教授留任副手，1938 年赴日。大學期間，以延陵、從宜、吳芳雲、吳守樸為筆名，經常在《台灣新民報》、《南方土俗》、《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研究年報》、《台北愛書》等報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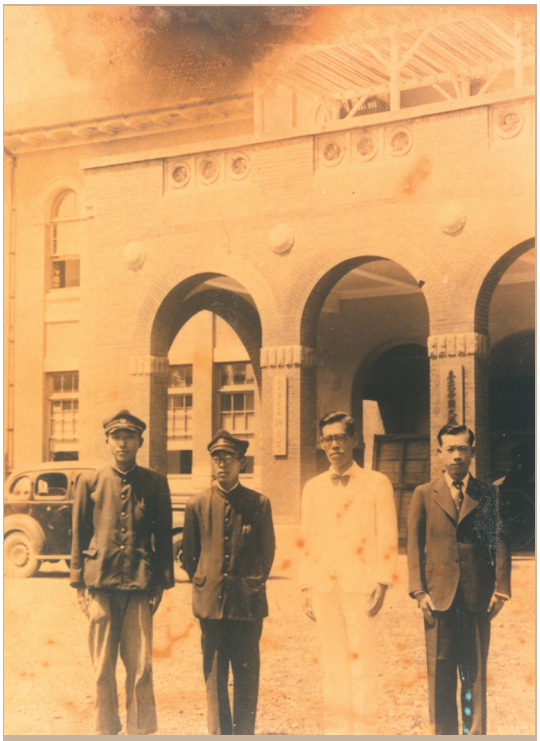
雜誌發表論著，如〈從宜諺曼筆〉、〈關於中國劇的演出〉、〈古籍保存管見〉、〈唐代以後之福建廣東人詩文集目錄〉、〈從宜綴學〉、〈布袋戲與傀儡戲〉、〈陳恭甫先生父子年譜附著述考略〉、〈王靜安先生的學問及其影響〉等文即是。

貳 東渡日本及戰後協助接收台灣大學

1938 年 10 月，因受日人差別待遇遲遲無法升任正式教職，經恩師神田喜一郎教授推介，東渡日本，轉赴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今京都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任囑託。期間，一面學習北京話，一面參與京都大學中國語文學教授倉石武四郎主持之中國話辭典資料的翻譯工作，1940 年 8 月翻譯林蘭原著《閩粵民間故事》之〈雷賣的董仙人〉（頁 1～174，日本創元社出版）；1941、1942 年間受託協助翻譯標準語辭典、國語辭典及王雲五《國語大辭典》；1942 年翻譯林蘭原著《動植物故事》之〈紅芯的人參（紅蘿蔔）〉（頁 1～264，日本筑摩書房出版），皆署名神島倉吉，開啟其日後研究閩南語的契機。

京都公餘，吳守禮亦積極進修，前往日本目的在學習標準國語，當時適值中國國語運動初期，國音常用字彙剛頒布不久，研究所內有位旗人戲曲專家傅芸子開授北京話，遂和圖書館主任兩人聯袂請益，每週上課兩次；此外，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和歷史學研究室的教授、助教授及助手們每週舉辦一次讀書會，名為「共同研究」，當時「經學文學共同研究」正在研究元曲，校戡《尚書》，之後曾出版元曲選注兩集，吳守禮也去旁聽，並研讀中國國語學相關文獻，為日後的研究工作奠定良好的根基。1942 年，朝日新聞社籌劃出版《亞細亞語學叢刊》，邀請一批語言學者分別以各自所熟悉的語言撰稿，吳守禮受日本中國文學權威、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教授吉川幸次郎之推薦，撰寫「廈門話」部分，當時雖自覺力有未逮，但因不懂推辭，仍勉力為之。後來因為返台就任新職，計畫乃暫告中止。

1943 年 4 月返台，擔任台北帝國大學南方人文研究所囑託，負責中文日譯工作。當時台灣總督府決定編纂《南方大系》叢書，以台北帝國大學教授為主



於南方人文研究所當助教（右一）與老師合影。
圖：吳昭婉女士提供

要研究人員，吳守禮負責的子題為有關福建、廣東地方誌目錄的調查，包括台灣總督府附屬圖書館接受福州東瀛書院委託保管之福建省地志雜誌及其他學校機關之保存狀況等，使得吳守禮開始對閩南語言研究產生濃厚興趣，在讀了客家研究開山祖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客家的方言》等著作後，有感於閩南人始終沒有一部研究自己母語歷史的著作，於是趁著收集翻譯資料之便，查遍台大及總督府圖書館所有關於閩南語的資料，以期日後能夠著手研究著述。期間，陸續於《民俗台灣》發表〈廈門的地理的環境及沿革〉、〈語言和習俗〉、〈評「支那民族的形成」〉、〈台灣羅馬字和基督教宣教師〉等文。

1945 年 2 月，為避開美軍轟炸，吳守禮乃攜眷疏散至景尾（今景美），後因景尾也遭到轟炸，再疏散回彰化埔心舊館老家。疏散期間，仍潛心著述，完成〈福建語研究導論—語言與民族〉的日文稿，就在準備將完稿寄回台北的前一天，即 8 月 15 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這一篇以日文撰述的有關閩南語史的論文乃暫時束之高閣，至 1949 年始完成以中文撰述的〈福建語研究導論—語言與民族〉。9 月，吳守禮返回台北，見戰爭期間台北帝國大學因嚴重轟炸而殘破不已，整排的研究室、圖書室的門戶洞開，舊書店出現公私的藏書。同時隨著日本的戰敗，大學面臨接收和改組的命運。接收期間，吳守禮身兼兩種身分，既是被接收者，又是新大學聘任之代理接收委員，協助接收校本部和法、醫學院圖書館清冊，計接收圖書 474,289 冊。圖書館、文學院、醫學院等單位之校產，亦皆由吳守禮清點移交、保管守護，接收工作才得以順利完成。

嗣後，獲聘為中文系副教授，講授國語。最初因為會說國語，一時成為熱門人物，不出兩、三年，大家都學會國語，但是吳守禮還是繼續教國語，只是對象變成僑生。教學上既無法突破，遂專心閩南語研究，因不懂奉承巴結，以致備受歧視和壓制，屈居副教授職位長達 18 年之久，至 1963 年 8 月才升任教授。期間，校長傅斯年（1896～1950）認為教授有兩種典型，一類為專任研究工作的研究型教授，另一類為專任上課的教學型教授，兩者各有所長，缺一不可，也因此吳守禮才能只教國語、國文課程，並維持研究工作不間斷。他經常自嘲說，教國語賺生活費，以維持台灣閩南語的研究。



二戰後於台大中文系留影的吳守禮。
圖：吳昭婉女士提供

吳守禮的北京話是到日本京都之後才學的，但是字正腔圓，發音標準，加上曾參與國語辭典的翻譯工作，對中國話有深入的研究，是教授中國話的最佳人選。1949 年底，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推行國語為首要之務，吳守禮除在大學講授國語外，也參與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工作，曾於該會雜誌《國語通訊》發表〈殘廢（三幕劇）〉，為翻譯自安得森原著，坪內逍遙改編之醜小鴨故事。當時國語推行委員會為輔助台灣推行國語，曾邀請著名的音韻學專家朱兆祥為方言組組長，負責設計台灣方音符號。台灣方音符號係延續國語注音符號而來，僅增加台語音所用之聲母、韻母、入聲記號和聲調符號而構成，是最簡便的音標法，並於 1946 年頒行，當時主任委員為古韻學專家魏建功。而吳守禮對此亦多有貢獻，其所發表之〈注音符號溯源〉一文，由國語推行委員會提出於 1948 年舉辦之台灣博覽會中展覽，並收入《綜合閩南台灣語與基礎字典》初稿。之後，吳守禮又陸續於《國語日報》、《大陸雜誌》、《文星雜誌》、《台灣風物》等發表〈談「怒」、「喜」、「哀」、「愛」、「懼」〉、〈國語與台語〉、〈國語辭典未收辭彙〉、〈釋「掞」～閩南方言研究札記之一〉、〈「事



情」本字考〉等文，致力於透過官方所頒訂的方音符號來拼注台灣方言，使兩者相輔相成，並藉以保留閩南語言及文化。

參 潛心閩南語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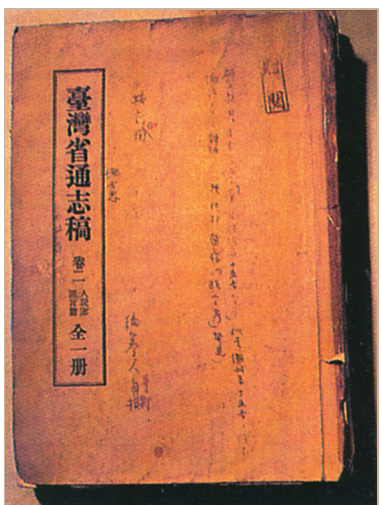
閩南語研究是吳守禮一生最專注、投入最深之工作，為閩南語文獻、古典戲文及詞彙研究之先驅。其自台北帝國大學求學期間即立定閩南語研究之志向，之後，將近一甲子時間持續研究閩南語詞彙，直至去世為止，畢生研究不輟，其中，尤以對閩南語詞素之研究用力最深，為繼小川尚義之後對閩南語研究貢獻最大之學者。在閩南語文獻、閩南語古典戲文及閩南語詞彙等之研究上，均具有開拓性之貢獻。

首先，在閩南語文獻方面。吳守禮是閩南語文獻學家，所收藏之閩南語文獻資料十分豐富。1944 年，在台北帝國大學南方人文研究所擔任囑託期間，曾於《民俗台灣》發表〈台灣羅馬字與基督教宣教師〉一文，為其有關閩南語文獻的開筆之作，討論閩南語羅馬字文獻史料；同年，依據台灣總督府附屬圖書館、台北帝大國語國文研究室、語言研究室小川文庫的藏書，撰成〈中國語言學論著年表〉一文，所謂「中國語言」，即指漢語之意，但文中的漢語著重在閩南語相關的文獻。之後，又多次編纂閩南語研究文獻目錄，如〈閩南方言的文獻〉（1949）、〈福建語的文獻〉（1953）及補遺、〈福客方言綜志目錄〉（1955）、〈台灣方言研究文獻目錄〉（1963）、〈閩南語研究近況〉（1967）二篇、〈福建語的文獻簡介〉（1968）、〈從宜先生編著年表〉（1968）、〈台灣方言研究文獻目錄續篇〉（1969）、〈台灣方言文獻目錄〉（1970），共計 11 篇，對閩南語文獻資料之熟悉實無人能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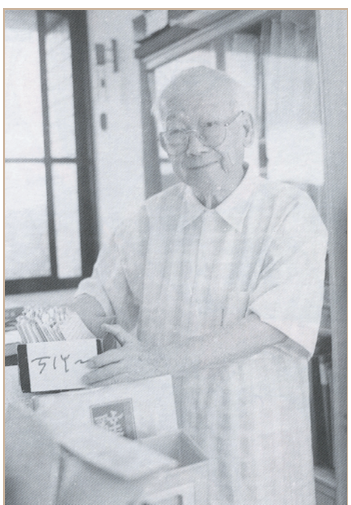
吳守禮第一篇有關閩南語史的論文是〈福建語研究導論—語言與民族〉。該文係 1945 年戰爭期間的研究成果，原以日文撰述，迨至 1949 年 2 月始改為中文，內容包括福建的人文地理、唐以前關於福建文化的記錄與遺跡、福建民族的來源與構成、福建語有什麼特點、從研究史上看福建語、福建語與唐以前的關聯、歷代關於福建方言的記錄、福建省內小方言鳥瞰等，全文長達 10 萬

字。同時，吳守禮也是最先完成台灣語言誌—《台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卷二—語言篇》（1954）的人。該書分為序論、音系、語法、方言羅馬字列述四章，是日治時期日本學者研究台灣閩南語的集大成，也是一部最好的台語研究入門書，其中〈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一文更是全書精華所在，不過，因台灣省文獻會的審查委員認為「纂述日人著作過多，且研究台灣方言豈須參考日人著作」，而有一大部分被刪除，於是吳守禮乃決定自行出資油印，重新編輯出版《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1955）一書。這兩本書廣受學術界和圖書館的重視，成為台灣語言研究重要參考資料之一。1997 年，這兩本書終於併為一書，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出版，易名為《福客方言綜誌》，恢復了它應有的完整面貌，並成為該方面最具系統性的著作，深獲國內、外相關人士的重視。

1973 年，吳守禮自台灣大學退休。至退休之前，共計發表百餘篇論文、數十本有關語言溯源及正源的書。之後，蟄居美國東岸巴爾的摩，收集閩南方言有關資料，並著手展開台語字典的編纂工作，完成《綜合閩南台灣語與基礎字典》上、下兩巨冊，厚達 1,664 頁，兼納漳泉文白之音，蒐羅豐富，並且於用字細加考證，務使音字關係無誤，此書於 1987 年出版，轟動一時，對學界影響極大。1986 年吳守禮返台後，仍繼續台灣閩南語的研究工作，一直至其去世為止，未曾間斷。然而，1988 年 12 月 7 日凌晨，位於潮州街台灣大學宿舍的一場大火，導致吳守禮數十年來四處蒐集的閩南語文獻資料、研究手稿，幾乎全數付之一炬，但吳守禮並不為所困，以 80 高齡毅然從瓦礫堆中站起來，繼續埋首研究，終於在十餘年後，即 2000 年 7



吳守禮著作之一：台灣省通志稿。
圖：吳昭婉女士提供


正在整理研究書卡的吳守禮。
圖：吳昭婉女士提供



潮州街宿舍大火後吳守禮搶救剩下的珍貴研究文件。
圖：吳昭婉女士提供

月，在家人同心協力編纂之下，完成《國台對照活用辭典》鉅著，前後約花費 22 年時間。

《國台對照活用辭典》全書計收字 12,956 字，收錄國語詞彙約 60,000 餘條詞，（內單字詞約 13,000 條、多音節詞約 47,000 條）、收錄台語詞彙約 60,000 餘條詞，總字數約為 516 萬字，上、下兩巨冊，總頁數為 2,863 頁。較之 1932 年小川尚義教授編輯、出版的《台日大辭典》上、下兩冊，1,887 頁，約 90,000 條詞，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台日大辭典》以日本話標台語音，號稱是七十年來收詞最多的第一大台語辭典，但七十年後，吳守禮編輯完成的《國台對照活用辭典》取代《台日大辭典》，以台灣話為主，為台語研究立下一個重要的里程埤。同時，《國台對照活用辭典》採教育部認定的台語方言符號，使學過國語注音的人都能很快掌握發音要訣，並且追本溯源，詳細註解廈、漳、泉音差異，參考資料涵蓋台灣、日本、美國、英國及中國大陸等之研究成果，只要學過注音符號的人，都能看得懂，是一種最容易學習台語的途徑。

其次，在閩南語古典戲文方面，吳守禮由明清閩南戲曲劇本，包括《荔枝記》、《荔鏡記》、《金花女》、《蘇六娘》、《同窗琴書》、《什音全書》、《宣講戲文》、《閩南語歌仔冊》等的校勘和詞源研究，開啟閩南語古典文學研究的先河，其中以《荔鏡記》的研究最為重要。《荔鏡記》或稱《荔枝記》，內容是閩南潮州最膾炙人口的陳三五娘故事，直至今日「南管」仍傳唱不絕。之後，在師友同好積極相助下，吳守禮陸續由英國、奧地利、日本等國，蒐集到許多善本戲文資料，並逐一校理研究。從 1957 年 9 月起，吳守禮開始發表一系列有關《荔鏡記》的研究論文，最重要者如〈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荔


於書房翻閱研究資料的吳守禮。
圖：吳昭婉女士提供

鏡記戲文研究－校勘篇〉（1961）、〈荔鏡記戲文研究－韻字篇〉（1962）、〈順治本荔鏡記校研〉（1966）、〈新刊增補全像鄉談荔枝記研究－校勘篇〉（1967）、〈順治本荔枝記研究－校勘篇〉（1968）、〈荔鏡記研究〉（1970）、〈清乾隆間刊同窗琴書記校理〉、〈明清閩南戲曲四種〉（1975）及其研究七種（1957～1978）、〈清光緒間刊荔枝記校理〉（1978）等，證明早在四百年前，閩南人就以漢字撰寫閩南語戲本，進而推翻過去認為閩南語「有音無字」之說，因而受到學界矚目。1995 年，這些資料由台北南天書局重新排印，分年陸續出版，輯為《閩台方言史資料研究叢刊》十四種，除追溯閩南語古典文學的研究外，也開啟閩南古典文學研究的先河，深獲國際同行之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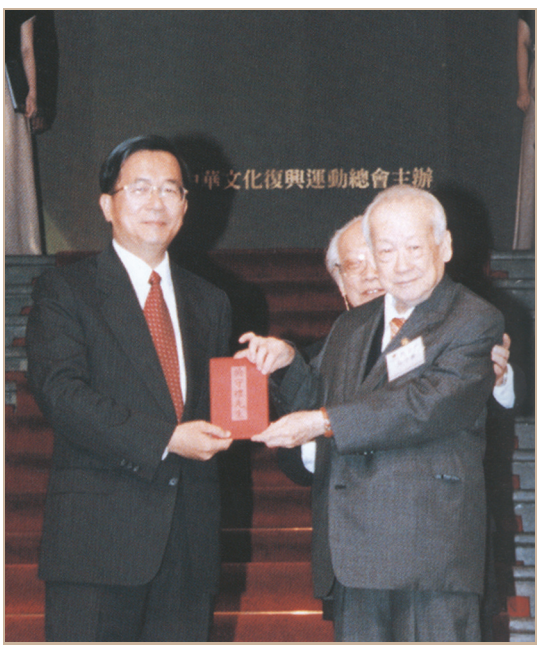
再者，是閩南詞源研究，主要論文收入《閩台方言研究集》（1994）二巨冊，其以上述明清閩南劇本為藍本，深入探討一些較具爭議性或習焉不察的語詞，追究其歷史淵源，並直指疑義。台語文向來有「無一字無來歷」、「有音無字」兩種極端的論辯，而吳守禮則提出一合理論證和客觀探求的路徑，且獲致相當成績。



肆 實至名歸—榮獲總統文化獎

戰後以來，閩南語研究在「中國化」政策下，成為一門最冷門的學問，受到政府和學校當局有意的忽視或壓抑，而吳守禮卻始終甘之如飴，為了讓母語～台灣話（閩南語）能夠脫離有音無字，讓人們活用，默默以超過半世紀的光陰與青春，投入學術領域中最冷門的語音學研究，考證傳統歌仔戲劇本、傳播文本、歷史文獻中的台語運字，尋找台語最可能的注音方式、發音與文字化書寫，默默地走他自認為應該走的路，其毅力、人格風範均堪為社會各界的典範。1996年，吳守禮榮獲教育部獎助漢語方言研究著作的特殊貢獻獎；2001年，《國台對照活用辭典》榮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圖書主編金鼎獎個人獎，同年 10月，榮獲首屆總統文化獎—百合獎的殊榮，使得長期被視為地方話的台語有了學術地位，為台灣文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吳守禮賦性忠厚，謙恭有禮，一生奉獻閩南語方言研究，在台語辭典、台閩戲劇語言、台閩詞彙、台語研究文獻等方面的研究，在台灣語言和文學研究上有許多開創之功，且獲致海內外專業人士的高度推崇。在閩南語研究史上，他擔負了由清代、日治至戰後承先啟後的工作，也是戰後排斥方言研究的時代唯一閩南語學術研究的傳人，後來的閩南語研究者許成章、王育德、村上嘉英、鄭良偉、洪惟仁等人無不受其指導支援。他的文獻學研究照亮了終戰前的閩南語研究史，也開拓了現代閩南語學者的歷史視野，堪稱為「台灣語言文獻編纂第一人」、「台灣古典語言文獻研究開創



2001年，獲陳水扁總統頒發總統文化獎－百合獎。
圖：國家文化總會提供

者」。2004 年 3 月，吳守禮因心臟衰竭住進醫院，之後病況時好時壞，數度出入加護病房及接受手術。2005 年 10 月 14 日，與世長辭，享年 97 歲。

參考文獻

洪惟仁（1988）。吳守禮教授的閩南語古典研究。**自立晚報**，本土副刊。

林秀美（1988）。為學問而學問的吳守禮教授。**台大校友季刊**，第 6 期。

吳守禮（2000）。台北帝國大學與東洋文學講座。**台大校友雙月刊**，第 18 期。

吳守禮（2002）。我與台灣語研究。收入陳奇祿等編。**從帝大到台大**。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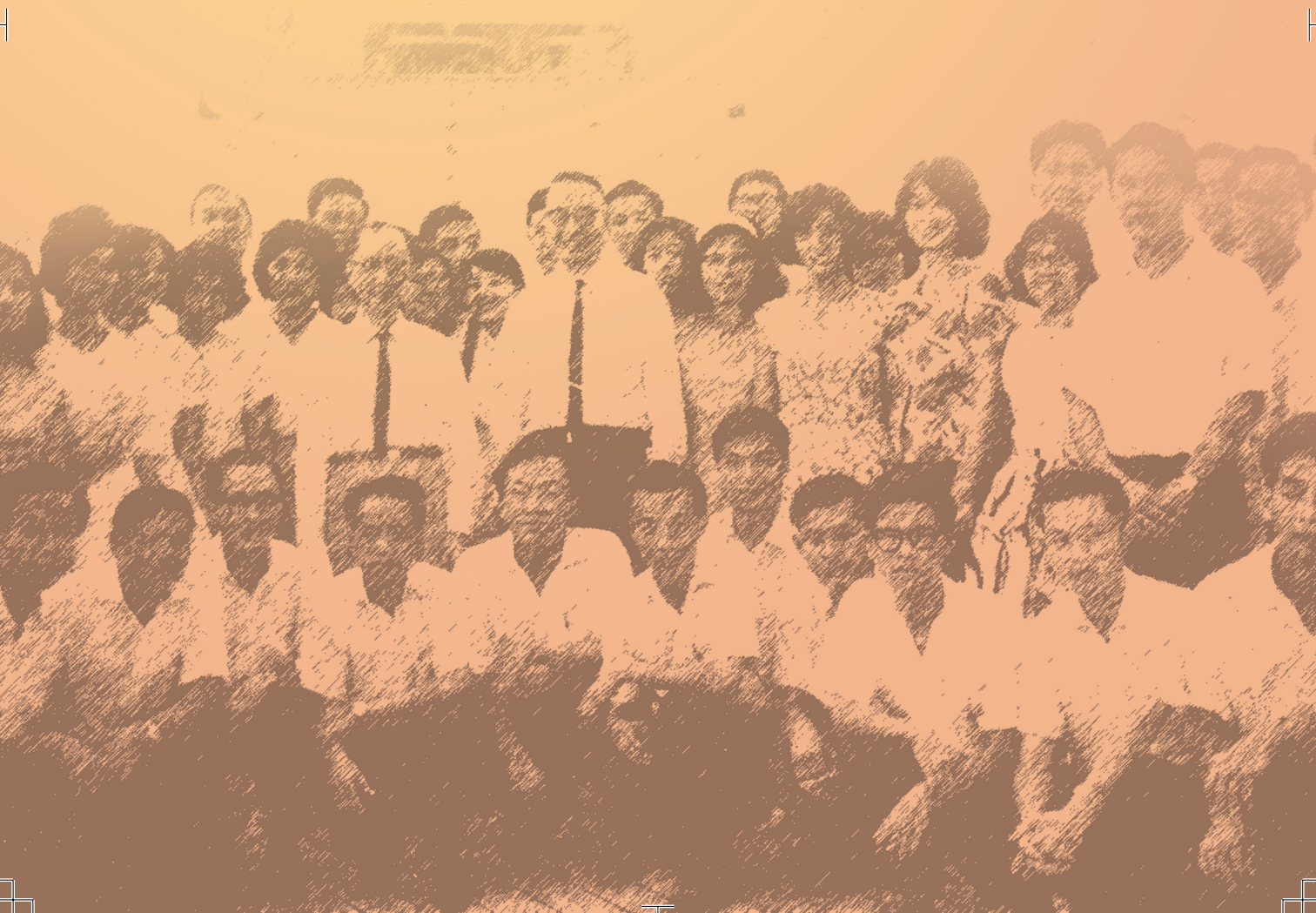
楊秀芳（2006）。典型在夙昔—吳守禮教授與台灣大學。**台大校友雙月刊**，第 43 期。



蔡保田（1921～1991）

教育研究與學校建築研究的播種者

張鈿富 撰文／
國立暨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兼院長



◆ 本文主要目的在敘述蔡公保田教授一生從事教育工作的主要經歷與成果，以及一生所展現的教育家風範。傳略的敘述包括蔡公在變動時代中的成長歷程、求學奮鬥的過程、社會服務、教育理念與實踐的傳承、教育的弘揚等部分。從這些點點滴滴的敘述，可以看出一位教育家的理想與實踐，以及對當前台灣教育界的影響。本文期望勾畫一位可敬的教育家所走過的路，做為從事教育工作及有志於從事教育工作者的典範。

2006 年冬的一個上午，國立教育資料館王世英館長打電話到我辦公室，談起出版近代台灣的教育家傳略書籍與數位典藏事宜。當下表示這是一件好事，但是談著談著，王館長即邀約要我撰寫有關蔡公保田恩師的傳略，以便進一步拍成短片做為典藏。自忖，我並非蔡老師的大弟子，論輩份由師兄他們來寫會更好，但是思緒很快讓我回到 1985 年認識蔡恩師之後的點點滴滴。說實在的，蔡恩師對我的偏愛，讓我找不到推託的理由！1991 年 4 月 17 日蔡恩師辭世，之後在教育研究（雙月刊）有專輯報導，逝世一週年、三週年在台灣書店的協助下曾發行專書紀念。或許這些紀念性的專輯、專書出版的推動工作都有我參與主其事的身影，如今再由我來整理這些文件也比較方便一些。除了永誌師恩之外，更可以檢視這十多年來，我們這些弟子們的所作所為是否偏離了恩師的教育理念。

本文以追憶、惕勵的心情，敘述蔡公保田恩師一生參與教育工作的事蹟。期盼教育家走過的路，能指引我們走入社會、積極服務人群。

壹 動盪中的淬練

蔡公保田，字舜耕，山東省滋陽縣人（兗州），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1921 年 3 月 24 日生，1991 年 4 月 17 日蒙主恩召。其先祖父三餘公為前清舉人，曾任河南洛陽、汝南等縣主事（相當於縣長）。尊翁用霖公服務警政數十年，政績斐然。蔡公秉持家訓，自幼習文，有志教育工作。但是生不逢時，在多事戰



亂的年代，蔡公年輕時多半於流亡中度過。直到 1949 年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之後，才算暫時安定下來。

公之德配袁潤秋女士，出身名門，曾任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教授。伉儷乃北平師範大學同窗，被譽為「鴛鴦同學」，「烽火鴛鴦」，結褵數十年，恩愛情篤。育有一女惠如，繼志父母專攻幼教，畢業於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執教於台北市復興國小。

由於早年艱困的生活，養成其勤儉樸實、清心寡欲的性格。蔡公唯一嗜好應該可算是讀書了，據聞蔡公愛書成性，平日幾乎是手不釋卷。居家生活中就連與師母閒談，也多半與教書、書本上的點點滴滴有關，教書、讀書可說是蔡公一生中的最愛與益友。

貳 邁向專業的準備



赴美國留學前夕與妻蔡袁潤秋女士合影。
圖：蔡袁潤秋女士提供

蔡公求學過程中正處於國家非常時期，十六歲投筆從戎之後又返校就讀，之後一直未再離開學校以及教育界的工作。自四年制的簡易鄉村師範畢業而經普師、北師大，並在 1955 年考取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獲碩士學位後即赴美深造，獲鮑爾師範學院（BallState Teachers College）教育專士及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教育博士。求學期間之艱辛，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公致力於教育專業的準備，由簡師、師範、師大、研究所碩士、博士，五級師範出身，國內教育史上堪稱第一人。一路走來，心無旁騖，終能在美國知名大學完成最高學位，做好教育專業的準備。

從蔡公的專業準備過程中，可以看出其邁向目標始終不放棄的毅力，實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尤其是學校建築方面的研究，並終身從事教育研究與實踐工作，這正是他最令人敬佩的地方。

參 社會服務



1949 年和台北空軍子弟學校校長合照。（左邊為蔡保田）
圖：蔡袁潤秋女士提供

抗戰軍興，蔡公曾一度投筆從戎，參加軍護工作，這是第一次踏入社會的服務。北平師範大學畢業後應聘為北平空軍子弟學校校長。1949 年大陸變色，播遷來台，復奉命創設台東空軍子弟學校兼仁愛中心國小校長，先後調任東港、岡山等空軍子弟學校校長長達七年。辦學認真，榮獲空總甲種獎章七座之多。在戰亂的時期，連服務對象的選擇也充滿著時代的特徵。蔡公總是把自己推向最前線，也充分顯現他的愛國情操。

完成博士學業之後，蔡公為新加坡南洋大學禮聘為副教授兼先修班主任。四年後返回母校國立政治大學任教，先後擔任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主任、教育系主任、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人員進修班主任等職。

政大服務期間，蔡公對政大的課程、教學、研究及中等學校教師進修等規劃，貢獻非常多的心力。從設立博士班的推動、擴展推廣教育辦理進修班，至與美國鮑爾師範學院簽約交換教授、學生，舉辦社會教育等大型學術研討會都不遺餘力，創辦「教育與心理研究」期刊提昇教育研究所的學術地位。為提昇研究所的學術研究風氣，每學期均舉辦演講、座談會多次，其辦學認真、治學嚴謹，對學生愛之深、責之切，誠為教育楷模，足堪式範。

肆 教育理念與傳承

蔡公生前一再強調研究的重要，公說只有看書才會發現「開卷有益」，只有不斷研究才能「與時俱進」，更進而領導社會。正因為蔡公把教育當做事業看待，所以他敬謹此業，樂道此業。蔡公曾說「尊師重道」的前提是教師先有「敬業」的精神，因為敬業而後道重，道重而後師尊。做教師的不要老是這山看那山高，自己尊敬自己的工作，就是「敬業」。對所從事的工作心甘情願，毫不埋怨，就是「樂業」。



1955 年 政大教研所迎新會留影。（三排左四為蔡保田，前排右二為劉季洪，右三為陳雪屏）
圖：蔡袁潤秋女士提供

蔡公一生抱持敬業樂業的情操，身體力行，乃能豐富其研究精神，而在學術的領域開創出一片新天地，特別是在「教育研究」和「學校建築學」方面，分別創辦了「教育研究」雙月刊和創立了「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且傳承至今，廣為教育界所推崇。

蔡公在籌備學校建築研究學會時曾書寫了一份文稿，其標題為「我的志願：服務青年，造福社會」，從這分文件可以看出公對學校建築、教育事業的理念，文稿的主要內容摘述如下：

我的志願：服務青年，造福社會

蔡保田

一、前言

凡是青年需要我服務的地方，只要是合法、合情、合理，我都樂意去做。我也願意盡心、盡力、盡份的竭誠為社會福祉而奉獻。

二、動機

自從民國五十六年，本人應母校之聘，在教育研究所開設「學校建築理論與實際」科目以來，一方面由於實施延長九年國民教育的客觀環境上需要，另一方面也因當時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力倡導，邀請學者專家到各國講演，協助規劃；於是對於學校建築的認識，逐漸有了改變。近十數年來，不但已有十幾篇頗有價值的論文完成，而且在本所的進修班中，很多青年朋友們，對於學校建築與設備研究的重要性，亦深表同感。在多次的閒談聚會中，建議應當將這門學問引進

國內，並使其落實生根，再經年輕一輩的努力開墾、灌溉，逐漸開花結果，以加強教育成長，促進社會正常發展。

三、今年工作（民 75 年）

從去年（民 74 年）六月起，經過三十二位熱心朋友的發起，向內政部申請籌組本學會，至今年一月十七日方獲內政部以七十五台內社字第三六八二三〇號函同意籌組。遂在很多熱心青年朋友們的協助下，依據政府法令，一步步的向前推進。期能集思廣益，誠心合作，共同研究這門學問，造福社會，貢獻國家。今年（民 75 年）預計完成下列三事：

1. 出版學校建築叢書：約五至十冊，以已完成之論文為主要內容。
2. 出版年刊：以本年內各會員平時研究專著為主要內容。
3. 辦理全國性專題研討會：凡本學會會員及有關單位主管，均將被邀請共同研討。

四、未來計畫

將來一定依據法定手續，經過研討詳加計畫。初步構想如下：

1. 短程方面：在三年內於集腋成裘理想下，購置本學會會所，並設置專業性「學校建築圖書室」，以利研究。
2. 中程方面：在三至十年內，集合本學會專門人才，在建築與設備上，規劃「財團法人中華教育研究院」，內設學校建築所、大陸教育研究所、工商教育研究所、學前教育研究所與成人教育研究所，以應青年需要。
3. 長程方面：在十年至十五年內，在建築與設備上，規劃一所符合國際水準綜合型大學，提供熱心教育事業的社會人士去籌辦，以利社會發展。這些計畫的研討、執行與評鑑工作，只要本學會會員熱心奉獻與支援，必能順利成功。



五、結語

教育事業的成長與發展，和學校建築與設備有密切關係，急需大家共同合作，研討其理論與實際問題，方能促進教育理想，共謀世界大同的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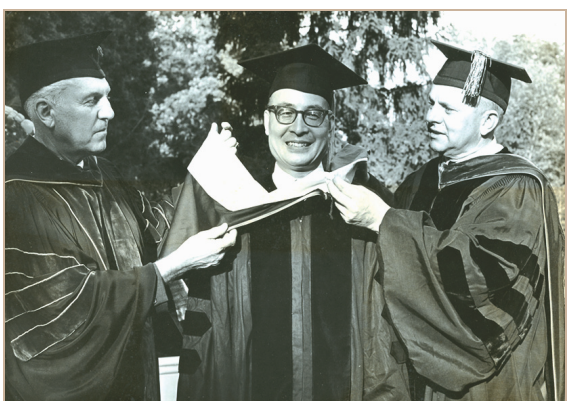
在蔡公的理想中，學校建築方面的專書出版並沒有終輟，每年中華民國學校建築學會舉辦年會時都有專刊出版。但是「學校建築圖書室」，至今尚未具體落實，期望將來在哪位弟子所領導的學校中，落實此一遺志。

在規劃「財團法人中華教育研究院」方面：為了長期從事教育研究，促使教育能蓬勃發展，蔡老師生平一直希望能成立一個教育的學術研究機構（以民間力量為主）及基金會來推動。目前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的工作與此有關，籌備處主任何福田教授主其事，也正好秉承蔡公的遺志。

至於國際水準綜合型大學的發展，在現階段的發展態勢裡恐非易事。但是筆者自從離開政大教育研究所教職之後，一股莫名的力量讓我也糊里糊塗的來到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任教，並且與這所全新的學校結下不解之緣。這是國內



蔡保田在美國留學期間表演太極拳。
圖：蔡袁潤秋女士提供



蔡保田（中）於美國博士學位畢業典禮上留影。
圖：蔡袁潤秋女士提供



蔡保田（中間站立戴眼鏡者）與學生合照。
圖：蔡袁潤秋女士提供

唯一掛上「國際」的大學，這所從無到有的學校，許多教育類系所的誕生都有我參與的影子。這些年來的打拼，至少在中區已建立了起碼的口碑。期盼在蔡公的加持下，全新的教育類系所、國際型的大學將來或許可以在暨大加以發揚光大。

蔡公指導過許多碩士、博士班研究生，碩士班指導的學生包括：林美吟、林萬義、詹美英、葉于釧、吳順發、金美英、程良雄、柳麗珍、陳素秋、周美齡、尹玫君、顏火龍、任晟蓀、劉咪咪、周鍾琰、井敏珠、鍾娟兒、蔡芸、林勤敏、湯志民、張鈿富、王世英、蕭驚鴻、黃秀霜、王慧敏、林啟峰、董青峰、顏玉雲、楊淑妃、陳雪玉、黃月麗、李彥儀、黃素惠、紀淑和、林適湖、王惠如。

博士班指導的學生包括：何福田、崔榮杓、蔡培村、陳照雄、林萬義、邱錦昌、湯志民等。



蔡公把「教育」當做一生的「事業」。公曾說「事業」是一個人的理想抱負，終其一生的追求，而「職業」所圖者僅是一個人的溫飽。能把「教育」當做「事業」，所以無怨無悔的付出。公認為教育目的能否達成，身為教師應多檢討自己施教的措施，而不可動輒歸責學校或歸罪學生。公的一生可說是「為教育而生，為教育而死」，他不但是一位坐而言的理論家，更是一位起而行的實踐者!

伍 教育專業的弘揚

蔡公是我國教育學者研究學校建築的第一人，不僅在學校建築方面有很多專著，且促使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教育研究所開設學校建築課程。因此研究生中亦有專門研究學校建築者，替國家造就了不少人才。1964 年台灣省教育廳開始研究志願就學方案時，也曾訂定「學校建築研究計畫」，成立「學校建築研究小組」。指導人便是由蔡公擔任，其研究成果應用於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校舍之興建。從學校建築研究、學會成立到期刊的建立，公的專業理念已發展為實踐的力量。教育專業弘揚方面，以下數端可以看出公的理念堅持與前瞻性眼光。

一、中國學校建築研究社的成立

1968 年蔡公創立了「中國學校建築研究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洲區學校建築研究中心承認該社為其駐在我國的發展小組，因而取得了我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學校建築方面的地位，此為我國教育史上值得記載的一件事。

二、教育與心理研究期刊的創立

蔡公為鼓勵政大同仁研究風氣，發表論著，聯合教育系所與心理系於 1977 年 5 月 20 日出版「教育與心理研究」創刊號，該期刊稿件採外審制度，具有相當的學術水準。經過多年的持續努力，目前（2007 年）該期刊已發行 29 卷，每年四期。成為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蒐集的重要期刊之一（TSSCI）。

三、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的成立

1986 年蔡公創辦「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蔡公以其在教育界的人脈，企圖在台灣結合教育界學校教育的理念與建築師建築的專才，來發展理想的學校建築，提供學子優質的學習環境。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成立大會真是冠蓋雲集，筆者當時是政大教育研究所的碩士生，恭逢其盛，學習與體驗甚深。蔡公亦秉持其理念，讓學會的組織發展與工作推動逐步落實，尤其是學校建築的相關理念，嘉惠不少國內的學校建築。學會所出版的書籍、所發表的論文都成了許多校長、主任們必讀的資訊。尤其是新學校籌建以及老學校修建，這些學校建築的理念可說是一盞指引的明燈。

學會的成立雖然辛苦，但是薪傳也是不易。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歷經了高明敏、張鈿富、吳清山、湯志民、劉春榮、林海清等位理事長的努力，至今運作仍相當順暢。蔡公所捐贈的 50 萬新台幣獎學金，每年學會的年會都選出兩位國內相關的研究論文予以頒獎，讓學校建築研究的薪火不斷。

四、國教研究與教育研究的發行

在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推展「境教」理想下，並為感念蔣中正總統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二十週年之德政，於 1988 年四月創辦「國教研究」雜誌社（「教育研究」雜誌社前身），發行「國教研究」雙月刊。籌備期間，結合了政大教育研究所博、碩士班研究生，利用課餘時間進行籌備工作，從登記申請、社址的租借、辦公室內設備的購置、印刷廠、郵寄商的接洽等。在蔡公率領下，於 1988 年 6 月 5 日順利發行了創刊號。由於經費有限，蔡公本著「犧牲奉獻」精神，以發行人兼社長身分率領編輯群利用上班、上課之餘，每週兩個晚上，一次開編輯會議，一晚開社務會議。所有成員在蔡老師的感召下，亦本著「犧牲奉獻」精神，風雨無阻，每週二次會議，蔡公亦未曾缺席過。為了節省支出，每月僅編列些微的車馬補助費，然而蔡公未曾領取分文，並將社長部分的馬車補助費捐出成立雜誌社的福利基金。蔡公常說辦理教育類雜誌，是為服務教師，提供教師進修資料，以提昇師資素質。蔡公也常強調一點：「教育研究是教育



發展的原動力」，沒有教育研究的工作，談不上教育發展、教育的改進。

我國自古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人生三不朽。公以一個教育工作者的奉獻、執著和悲慈，一一實現了。再加上「教育英才」的第四個不朽，蔡公的一生，可謂無缺無憾矣。



蔡保田教授（右二）晚年全家福。
圖：蔡袁潤秋女士提供

陸 教育家走過的路

一、主要學歷

1. 滋陽簡易師範
2. 國立六中師範部
3. 四川大學教育系
4. 北平師大教育系畢業
5.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6. 美國鮑爾師院教育專士
7.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教育博士

二、主要經歷

1. 北平空軍子弟學校校長
2. 台東空軍子弟學校校長
3. 東港空軍子弟學校校長
4. 岡山空軍子弟學校校長
5. 新加坡南洋大學副教授兼先修班主任
6. 政大教育系教授兼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主任
7. 政大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
8. 政大教研所所長兼進修班主任

三、主要著作

1. 中外私立教育制度比較研究
2. 學校調查
3. 學校建築學
4. 學校建築理論與實際
5. 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6. 專題研究或其他委託主持之專案
7. 期刊雜誌所發表的文章

四、推廣服務

1. 1968 年創立中國學校建築研究社。
2. 1977 年 5 月 20 日出版教育與心理研究。
3. 1986 年 3 月創立中國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
4. 1988 年 6 月創辦國教研究雙月刊（13 期以後更名為教育研究雙月刊）。

五、教育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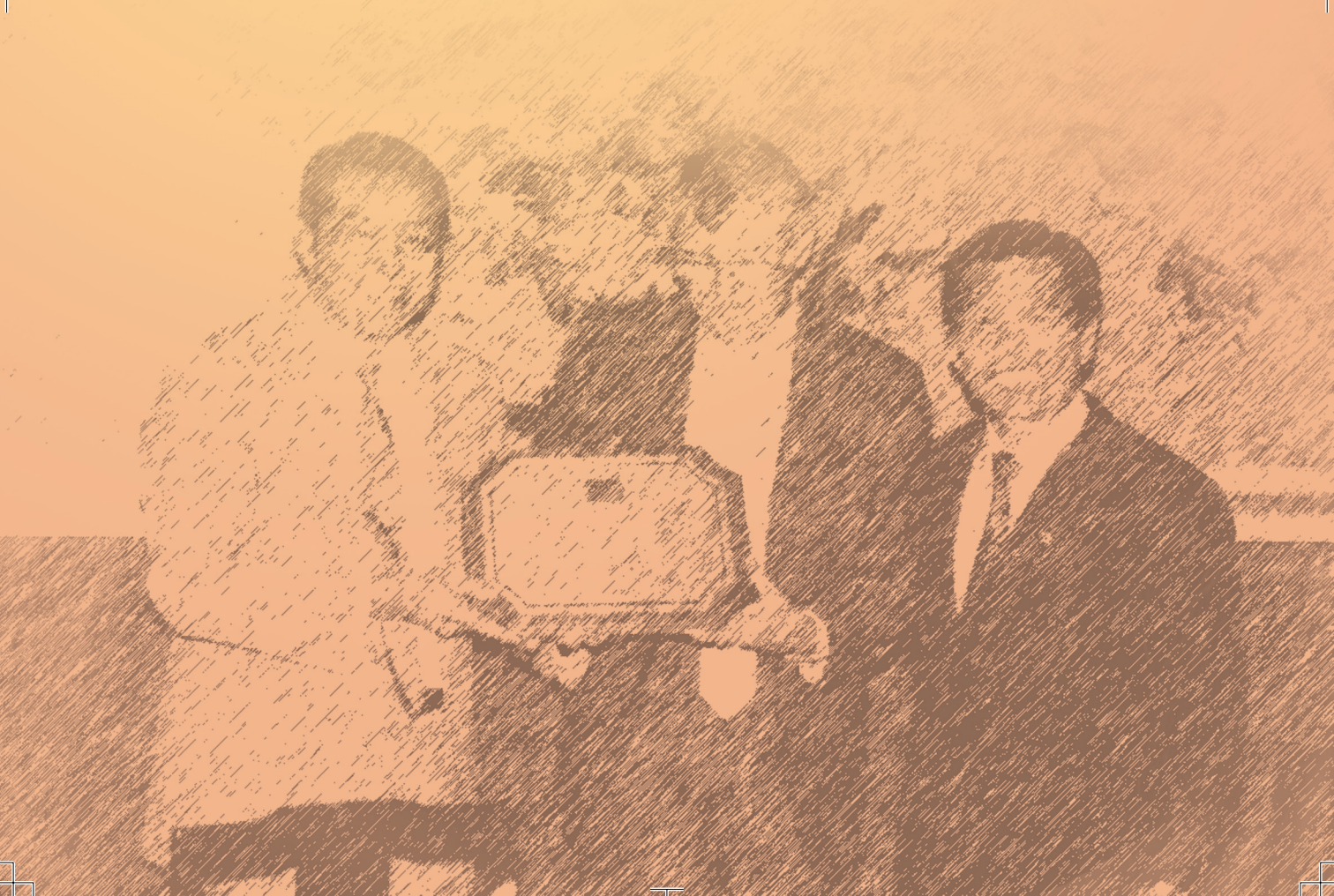
1. 愛的教育。
2. 教育研究是教育發展的原動力。
3. 秉持實用、安全、經濟、美化、衛生、創新原則規劃校園。
4. 看書才會發現「開卷有益」，只有不斷研究才能「與時俱進」，更進而領導社會。



毛連塭（1938～2005）

特教先驅，創造思考教學之父

吳清山 撰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執行長



◆ 毛連塭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行政人才，更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從事教育工作達四十餘年之久，培育無數英才，參與各項教育革新，貢獻卓著，成就可觀，久為教育界所樂道。

壹 出身寒微，力爭上游

連塭先生於 1938 年 9 月 5 日在台南市安南十二佃出生，是個典型的農村子弟。童年時代時值戰後，當時全臺物質極為缺乏，生活相當困苦，身上衣褲係用麵粉袋製作，上學只能赤腳走路，夜讀則只能用煤油燈，度過沒有電燈和布鞋的童年。

身為農家子弟，放學課後或星期假日，仍需幫忙家務農事，下田工作或放牛餵草，成為童年生活一部份，因而從小就養成刻苦耐勞和務實勤樸的良好習性。

童年時代，不僅食物不足，各種娛樂器材更是缺乏，遊戲時只好就地取材，例如：龍眼籽、芒果籽....等自然物，都成為最好的玩具，這種善用大自然器物想法，多多少少也培養出創意的態度。正如連塭先生（2004）在《教育大道、牽手同行》一書所言「沒有電燈的日子怎麼過，我們都渡過了沒有電燈的童年、媒燈伴我夜讀，長凳是我的書桌，自然物就是我們最好的玩具。」（第 7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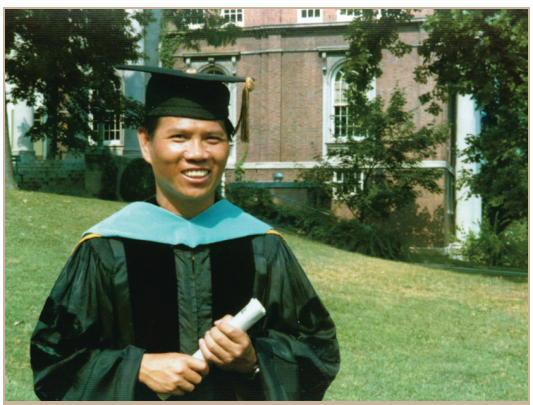
雖然家境困苦，但是並不以為苦，反而力爭上游，好學不倦，立志向學，堅忍不拔。求學路上從小學、商職至台南師範學校（即今國立台南大學），為力求精進，又至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修，畢業後實習期滿，奉令服役，並於擔任預官期間通過教育行政高等考試，奠定後來從事教育行政的基礎。

連塭先生公餘之暇，不忘進修，1969 年考取台灣省政府公費留學出國進修，並順利取得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of Northern Colorado，UNC）特殊教育碩士，後來深感學海無涯，有繼續深造必要，於 1973 年又再度考取台灣



省政府公費留學，並前往美國畢堡德師範學院（George 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攻讀博士學位（編按：該校 1979 年併入范德堡大學，成為教育及人類發展學院，是為畢堡德學院（Peabody College of Vanderbilt University）），經過二年苦讀，完成博士學位，返國後撰文發表一些特殊教育理論，如混合教育、回歸主流、標記和績效責任等，增進國人對特殊教育相關理論的了解。

先生力爭上游，毅力驚人，成就非凡，不管是師長或朋友都讚譽有加。正如他的老友蔡森煌（2005）所言：「毛老師毅力驚人，為人謙虛有禮、對父母非常孝順，曾擔任他小學老師的葉志雄（曾任東光國小校長）、還有擔任過省立台南商職訓導主任的張振文，其兩位長輩對毛老師稱讚有加。」（第 7 頁）



毛連塭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留影。
圖：鄭梅合女士提供

貳 教育愛心，成功源頭

連塭先生一生從事教育工作，能夠備受推崇的關鍵所在，可說在於教育愛心，凡是當過先生的學生、部屬或家屬，都可感受先生「如沐春風、宅心仁厚」的愛心。先生常言：「天生我材必有用」，「一枝草一點露」、「每個人頭上都有一片天」，所以先生的教育理念就是「不能放棄任何一個學生」，成為先生從事教育工作的準則。

先生的教育愛心，充分展現在教育工作和為人處事上。記得先生擔任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即今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校長時，就以「教育愛、責任感、榮譽心」作為辦學主軸，一則砥礪自己，一則勉勵學生，並無時無刻關切師生的福祉，同仁或學生遇到困難需要協助時，先生都會付諸實際行動給予關懷或開導。有一次，一位學生對於宿舍規定很不滿意，怒氣沖沖要找校長處理，經過先生幾分鐘開導，高高興興離開校長室（吳清山，2005），展露先生解決問題和和藹可親的一面。



60 年代，毛先生（左一）帶隊赴美參加盲人棒球賽。
圖：鄭梅合女士提供

先生負笈國外進修，鑽研視障教育，受其指導教授納皮爾（Grace.D. Napier）影響甚深。她是一位失明者，非常聰明仁慈，目不明心卻光，感覺靈敏，運用嚮導犬操作自如（毛連塭，2005）。根據黃昆輝（2005）在「特教推手盲生之友－毛連塭先生的教育志業」一文中曾談到：「關於盲人的學習能力，之前，我們兩人曾經有一次論辯，我認為盲人由於視覺的障礙，學習多少會受到限制，但他卻不表同意，而堅信如給予盲人適切的教育，其學習能力會跟一般明眼者無異，兩人爭得臉紅耳赤。可見，連塭先生所抱持的教育信念是何等崇高，更可以深刻體會到，他這種信念乃是根源於一種純潔的愛。」善哉斯言，先生愛的堅持，正是成功源頭。

其實，先生不僅於教育上表現教育愛心，在為人處事上，亦展現出「愛的關懷」。先生摯友賴文隆（2005）曾描述：「不論是在家庭相聚、運動、郊遊、甚至於數月的同居裡，讓我感受最深亦獲益良多的就是他的為人處事態度及言行風格，令非教育科系出身的我，真正體會到什麼是『愛的教育』....連塭兄晚年雖然失去身體健康，但是他的心靈還是很健康，從不怨天尤人，仍然秉持著『愛的關懷』面對一切親友，在有生之年善盡『愛的教育』的毅力令人欽佩，『薪火相傳』就是他一生的寫照。」（第 33～34 頁）

先生的愛心來自於先天本性及後天師長的薰陶，一生都在實踐「愛的教育」，讓教育發光發亮。



參 獻身國教，銳意革新

先生於美國榮獲特殊教育碩士後，旋即束裝歸國，經當時教育廳廳長潘振球先生指派為台東縣教育局長，到任之初，立下宏願，要辦好全縣教育，下定決心要跑遍所有學校，經過兩年半，完成心願，任內有多項創舉，包括改進學校行政組織，節省經費，提升行政效率；以及辦理公共造產，收入歸學校不必繳庫等，成為地方教育史上一大突破。

由於先生傑出教育表現，獲得上級長官賞識，1973 年當時教育廳廳長許智偉先生為改進九年國民教育和實驗生活教育方案，邀請先生擔任高雄市教育局長，任內勇於任事，積極推動實驗生活教育方案和闡揚特殊教育理念，深獲教育界肯定。後因深感學海無涯，乃毅然放下公職，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俗語說：「皇天不負苦心人」，二年苦讀終於完成博士學位。隨後即至省立高雄師範學院（即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任教，講授特殊教育、課程理論、教育研究法等課程，極獲學生喜愛。



1970 年毛先生擔任台東教育局長時留影。
圖：鄭梅合女士提供

雖然先生不汲汲於名利，但因風骨耿介、廉潔清明、負責盡職，長官賞識有加，1978 年，先生接獲當時教育部部長朱匯森先生指派擔任國教司司長，積極從事法令修訂、課程改革、制度建立及改善國教，頗具績效。尤其於任內訂定改進國教計畫，最為人所樂道，成為日後發展及改進國民教育六年計畫的藍圖。

在國教司任內，先生相當重視法令研訂，例如將過去的國民學校法，改進過去以機構為主體的立法原則，注入創思精神和現

代觀念，修正為「國民教育法」，確立「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國民教育目標，並將輔導制度納入國民教育法中，以後更擴及到高中及大專校院。此外，修訂「強迫入學條例」容許具有特殊需要學童可以在家自行教育，更是一大創舉。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任內奉部長指示積極研議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可行性，由於困難重重乃推出折衷方案，即「實施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十二年國民教育」，可惜後來部長更替，未能賡續推動，目前政府又開始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相隔已有三十年之久。


毛先生任教育部國教司長時與朱匯森部長合影。
圖：鄭梅合女士提供

先生任職國教司司長雖僅短短二年，但做了不少創新工作，除了前述之外，亦積極研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和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訂定國中評鑑制度和建立國中科學績優學生培訓制度等，對國民教育品質提升，幫助甚大。

肆 推動特教，造福殘障

先生不僅在國民教育有其傑出的貢獻，而且在特殊教育的成就，更是膾炙人口。

在民國六十年代，視障教育並未能獲得應有重視，視障學生學習相當辛苦，先生基於「悲天憫人」胸懷，希望提供視障學生學習天空，乃積極投入視障教育理論研究與實際推動。

1963 年 8 月，先生大學畢業返回台南師範學校服務，當時羅人傑校長要求先生到盲生師資訓練班協助班務，可說是先生第一次接觸特殊教育的開始。由於該班是台灣省盲生走讀國校計畫下，為訓練盲生師資而設立。教育廳為辦理盲生走讀國校計畫，特別撥款在台南師範興建一棟房舍，命名為「啟明苑」，它可說是我國現代特殊教育的發祥地，也是先生從事特殊教育的起點。先生在



美籍顧問卜修博士（Dr. standley E. Bourgeault）指導及同事張訓誥先生共同協力下，推動一種「特教理論」—「定向行動」訓練，造福無數盲生。而且先生根據「啟明苑」經驗，編寫了《如何在普通班級中輔導弱勢兒童》、《定向移動研究》、《學校社會中之盲童》等書，成為盲師班很有用的教材；後來更將《定向移動研究》一書拍攝錄影帶，提供師資訓練之用。全省盲生走讀計畫於六十年代全面展開，先生可說功不可沒。正如韓繼绥（2005）所言：「經過三年的努力盲生走讀計畫，被美國海外盲人基金會譽為亞洲實施盲人混合教育最成功的地區，毛老師居功甚偉。」（第 5 頁）可說名實相符。

特殊教育要能有效推動，法制建立誠屬關鍵所在。先生乃積極參與特殊教育法及相關子法的制定與訂定，使特殊兒童之入學、課程、安置及輔導等，能夠受到法令的保障。1995 年 6 月召開全國特殊教育會議，專責研討有關特殊教育興革事宜，先生亦積極參與和協助，會議所獲結論，對制定我國特殊教育政策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先生為研究及促進特殊教育，以及團結特教工作同仁，於 1968 年發起成立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並於該年 9 月 22 日成立，對加強特殊教學方法之研究與改進、蒐集編印特殊教育資料、設計研究及製作有關特殊教育之教學器材、鼓勵並協助特殊教育人員之進修、推行特殊教育實驗工作、喚起社會對特殊教育之重視與聯絡國內外特殊教育機關團體及社會慈善團體等方面具有一定貢獻，尤其先生還兩度擔任理事長，一時傳為佳話。



任台北市教育局長時獨照。
圖：鄭梅合女士提供

後來先生擔任台北市教育局長，積極推動特殊教育六年計畫，造福相當多的特教學生，績效深獲肯定。擔任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校長時，除了本身協助各中小學特教工作推動；同時也要求特殊教育學系和特殊教育中心，全力協辦台北市特殊教育業務執行，因而台北市特教工作績效，始終居於執全台牛耳地位。

先生喜歡特教，也樂愛寫作，在退休之前完成了百餘篇論文，數十篇研究論文和十本特教書籍。除了前述三本之外，亦先後完成《資優教學模式》、《資優教育課程與教學》、《資優教育綜合充實模式》、《生活教育與道德成長》、《特殊兒童教學法》、《創造力研究》、《如何辦理資優教育》、《特教行政》等書，不管是論文或專書，除了有助於特教實務工作推動，而且也成為研究特教參考重要文獻。

由於先生具有深厚特教學術造詣，所以特教工作規劃一經先生之手，都不會有任何差錯。正如吳明清（2002）所言：「…有關特殊教育規劃與推動，只要遵照毛老師指示去做，一定不會偏失，而且水到渠成，所以我們覺得最為輕鬆，在輕鬆的工作中，我們學會了特殊教育的概念與理論，也熟悉特殊教育實務。」（第 12 頁）

伍 倡導創思，激發創意

自古以來，人類為滿足需要或解決問題，必須善用其智力和創造力。創造可說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正如先生所言：「在此複雜多變的世界局勢和社會現狀下，人人必須充分運用智力配合其創造力以克服困難，解決問題，進而改善人民生活，提升生活品質。」（毛連塭、郭有遹、陳龍安、林幸台，2000，第 7 頁）先生感於創造力的重要，積極倡導「創造思考教學」。所謂「創造思考教學」係指教師透過課程的內容及有計畫的教學活動，在一種支持性的環境下，激發和助長學生創造行為的一種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方法，對學生創造力的激發具有積極正向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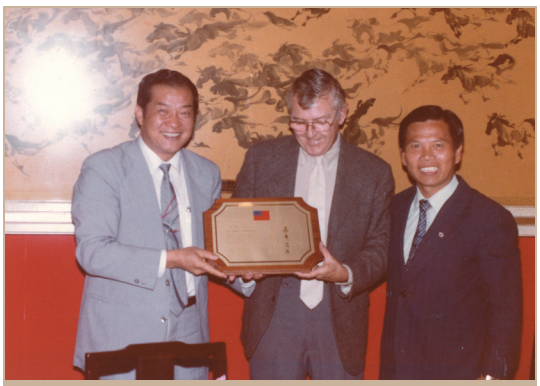
先生於 1983 年擔任台北市教育局長時，積極推展創造思考教學，受到威爾思（J. Wiles）影響甚大。根據先生所言：「我之所以提倡創思教育、多元學習，係受 ***Dr. Wiles*** 的影響，同時依據創造學家和多年海外留學、參觀、訪問和研究的經驗。***Dr. Wiles*** 是課程專家，設計有《創思技能叢集》（***Clustering for Creativity Thinking***）一套，對創造教育課程頗有研究。當他應邀來台訪問後，他認為台灣教育在奠基工作相當成功，惟缺乏創意，若能在基本能力之外，加



入創思能力，將會有較大的發展性。」（毛連塭，2004，第 96 頁）

為了有效推展創造思考教學，首先於 1983 年在台北市吉林國小召開創造思考教學研討會，由先生親自主持，全市各科輔導團、校長、督學參加並邀請創造思考教育學者參加，確立了台北市推展創造思考教學方向，這可說台北教育發展一件大事，隨即在各國小全面展開，並收到良好成效。後來先生擔任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校長時，推展創造思考教學及相關活動，亦不遺餘力，先後成立創造思考教育中心、出版創造思考教育期刊、創立中華創造學會...等，均可看出先生投入創造思考教學甚深。

由於先生的倡導，創造思考教育逐漸由國小、國中、高中職到大專校院；也由學校到家庭，父母開始接受創造思考教育，大學開設相關創造思考課程及學生撰寫博碩士論文愈來愈多，可見先生對教育發展的影響力。正如陳龍安（2004）所言：「台灣創造力教育之發展到今日成熟階段，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但真正倡導及落實創造思考教學，則從毛老師開始，所以我們尊稱他為台灣創造力之父。」（第 140 頁）綜觀先生對創造思考教育投入及其影響，尊稱他為台灣創造力之父，當受之無愧。



擔任台北市教育局長時與教育廳長黃昆輝（左）合照，中間受獎者即為美籍特教顧問卜修博士。
圖：鄭梅合女士提供

陸 培育師資，發展特色

民國七十五年先生卸下台北市教育局長職務，奉派接掌台北市立師範專科學校校長，當時師專尚不符大學水準，輿論紛紛呼籲改制為師範學院，以提高國小師資水準，教育部順從民意，乃將九所師範專科學校於七十六年改制為師範學院，先生以多年行政經驗，主導台北市立師範專科學校改制工作相當順利。

先生認為教育的成敗，師資是關鍵，這是先生離開台北市教育局長選擇市



擔任台北市立師院校長時留影。
圖：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提供



毛先生（右一）陪同教育部李煥部長（右二）巡視台北市立師院校園。
圖：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提供

立師範專科學校任職原因所在。先生受過完整學術訓練，又兼具豐富行政經驗，本身亦具有開放心胸，所以經營市北師期間，深獲師生愛戴與肯定。

先生經營市北師具有其正確教育理念和推動策略。先生經營市北師曾做如下的說明：（毛連塭，2004）

> 我接掌市師後，首先給學生開放，具創意的心靈空間，以「愛心、關懷、尊重」作為教育的共同目標。希望老師們給予師範生愛心，並關懷、尊重他們，期望他們畢業後到學校任教時，能給予學生們愛心、關懷和尊重。
>
> 其次改善學生的生活和學習環境，因此全力綠化和美化學校環境以與校外環境相配合，改善學生宿舍，使有安全合適的生活環境；又改善圖書館環境和特別教室，便於學習。（第 104 頁）

由於先生開放的教育理念，讓師生更有揮灑的空間，師生受益良多。正如張德銳（2004）所言：「進入北市師院後，毛校長很少限制我們，給了我們許多自由揮灑的空間，只是期許我們在教學、研究、服務能有一番貢獻、讓北市師院學生及教育界能受益。」（第 154 頁）。值得一提的是，在先生任內耗資二億多，興建的「勤樸樓」，更把市師空間變大了，也紓解長久以來教學空間不足的壓力，至今該棟大樓仍是市北教大的重要教學空間之一。「勤樸樓」不



僅代表市北教大有形的建築物，「勤」與「樸」二字，亦是先生一生人格風骨最佳的寫照，對先生而言，實具有雙重意義。

此外，先生對於提升市北師師資水準，極為努力，任內不斷向教育部和國科會爭取讓市北師教師有出國進修機會。由於先生的鼓勵和激勵，從當初先生初到市北師時只有三位教師具有博士學位，八年之後，已達六十餘位，整個學校的教學研究風氣煥然一新。

市北師經過先生八年努力耕耘，展現學校辦學績效，在當時的九所師範學院當中，不管是師資素質、教師研究能量或者學生參與校外競賽表現，都是屬於佼佼者。正如先生所言：「經營市師八年，情感深厚，見其壯大，自有一番成就感」（毛連塭，2004，第 104 頁）的確如此。

柒 掌理館務，創舉耀眼

1994 年 2 月先生承當時教育部部長郭為藩先生之邀，接任國立教育資料館館長，雖然先生極為捨不得他多年耕耘的市北師，但為了實現更多教育理念和提供更多服務，乃接受郭部長之邀。

當時先生在館長交接典禮致詞時曾說：「當郭為藩部長告知要他接掌國立教育資料館時，他毫無猶豫的欣然答應，銜命上任，因為國立教育資料館，是教育學術的重鎮，歷任館長如沈亦珍博士、組主任孫邦正教授等，均是社會知名的教育家，他們過去對台灣地區教育發展，貢獻殊多，能有機會繼任這些長輩的任務，繼續來為教育界貢獻心力，繼續接受新任務的挑戰，都是一件感到光榮的神聖責任）。」（洪文向，2002，第 21 頁）

先生初到任時，很快熟悉館務運作和洞察館務內涵，因而確立館務發展方向和重點。館務經營特別定位在打造一個充滿「教育專業」、「資訊科技」和「人文素養」新館所，經過八年努力，不僅展現先生的宏觀器識，而且也開創教育資料館新的氣象，建樹甚多，茲扼要說明如下：（王秉倫，2002；洪文向，2002；視聽組全體同仁，2002）

㈠建置全國第一個教育論文全文資料庫：隨着資訊科技發達，為促進知識分享及學術研究，資料庫建置頗為重要。先生乃策定「建置網路教育資源中心」五年計畫，其中教育論文全文資料庫為重點工作之一，開啟教育全文資料庫之先；此外，積極建置教育專案研究報告全文資料庫、國外教育訊息全文資料庫、教育新知免費訂閱系統等，這些資料庫的建置，自開放以來，深獲國內外人士肯定。

㈡開辦現代教育論壇：教育新知不斷更新，透過學術社群相互討論，有助教育實務革新。先生指示於 1994 年起委託當時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台北市立師範學院以論壇方式舉辦，邀請學者專家及教育實務工作者探討教育新知與實務，開辦以來，獲得極大迴響。

㈢創刊中華民國教育年報：教育部曾出版教育年鑑，但事隔數十年才編印一次，無法及時掌握教育發展最新狀況，先生乃指示寬籌經費，從 1998 年起，參酌美國、日本等國方式，每年出版教育年報一次，自發行以來，備獲海內外教育界人士肯定。


毛先生初任國立教育資料館館長，於館外荷花池畔留影。

㈣編印台灣教育探源：先生深感建立台灣教育發展各時期均有其特色，有必要加以整理，以供後人參考，乃指示編印「台灣教育探源」一書，內容包括 *1.* 第一篇：機構篇、*2.* 第二篇：人物篇、*3.* 第三篇：制度篇、*4.* 第四篇：活動篇、*5.* 第五篇：其他篇。本書是一本相當珍貴教育史料整理，自 2000 年 7 月發行以來，反應相當熱烈，索取該書者極為踴躍。



㈤設置大陸教育專室：先生接任館長之時，相當重視大陸教育書籍及電子期刊充實，乃編列經費購置大陸教育圖書，並成立「大陸教育專室」，目前大陸教育藏書已達萬餘冊以上。

㈥規劃出版教育家的話：先生深感國內甚多教育家充滿教育智慧，有必要將其工作體驗和智慧結晶加以整理，提供後輩學習，乃提議以口述歷史方式，訪談具德望教育家，編印出版「教育家的話」。該書雖然先生退休之後才出版，但從該書中仍可見到先生的智慧和心血。

㈦建置「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教育資料館典藏豐富的教學媒體，惟申請拷貝者偏重於北部，先生認為有必要擴及全國服務，普遍照顧偏遠弱勢地區，乃囑視聽組積極研發，並於 1999 年在國內率先完成開放性「教學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整合教育資料館各種自製與擁有授權之外購教學媒體資源，以數位化方式，透過網際網路提供各地使用者於線上依其不同需求選取觀看，此項措施獲得各校教師極大迴響。

教育資料館經過先生八年的努力，績效卓著，創舉耀眼，有目共睹，使教育資料館真正達成「教育決策的智慧站、教育研究的資料站、教育資源的補給站、教育資訊的推廣站」之目標。

捌 心性溫和，慈悲待人

先生一生歷經教育局長、國教司長、副秘書長、大學教授及校長、館長等多項要職，貢獻社會甚鉅。先生之所以備受讚譽，在於「負責盡職」、「宅心仁厚」和「悲天憫人」的胸懷，而且一點「官架子」都沒有。

先生之所以受到長官和部屬讚許，在於長官交辦任務，全力以赴，永不鬆懈，始終是長官的好部屬；而對待部屬，從不疾言厲色，總是慈悲待人，永遠是部屬的好長官。

筆者追隨先生多年，從他身上所散發出來的親切感和教育愛，感受良深。其實，不僅筆者有如此的感受，他的好友或部屬都有共同的體會。吳明清

（2002）曾言：「毛老師個性隨和，而且平易近人。我在國教司追隨毛老師做事期間，深刻感受那種『長者』的風範，所以不但學會做事，也學會做人。在我印象中，毛老師是一位不會發脾氣的人。在公務上，我不曾看過毛老師責備國教司同仁，在公務以外的人際關係中，我發覺毛老師是一位很受歡迎的人。」（第 12 頁）

曾經擔任先生秘書多年，後來亦擔任台北市教育局長李錫津（2005）先生亦有類似看法：「毛老師心性溫和和包容，強調觀念的導引、價值的轉化，在這麼多年的追隨學習中，未曾聽聞老師對誰說過重話、對誰有過尖銳的指責，他一直以德服人、以理化人，這種方式總令人覺得更能帶領同仁向前邁進。」（第 124～125 頁）

先生摯友廖慶峰（2005）對先生更有深刻描述「連塭的個性忠厚樸素，對世俗名利恬淡無爭，夫婦倆全投入教育工作，數十年如一日，對工作的熱心，對孩子的愛心令人感動。他對人親切隨和，行事常保一顆童心，處處為他人68想，好友說他是都市的鄉下人，連台北市凶悍的市議員都深受感動而禮讓三分。」（第 17 頁）

一個人的偉大，不在於他擁有多少財富；也不在於他擁有多少名位；而在於他對社會的正面影響。一位偉大的人格者受人景仰和懷念，就是在於他所散發出德業典範，足為後代表率。先生之偉大，亦在於此。

玖 結語

終其先生一生，馳騁在教育大道上，無論在國民教育、特殊教育、地方教教育或師資培育，都可看出他的全力付出與無私奉獻，他的教育成就有目共睹，他的一言一行，具有儒者風範與君子道行，論語云：「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第五）正是先生一生為人處事最佳的寫照。

先生關懷弱勢，開啟國內推動特殊教育先河，讓特殊學生受到重視，使其



潛能得以開展；又率先倡導創造思考教學，激發學生創造力。處在當前政府積極推動創造力政策的今天，可以了解先生的高瞻遠矚，不愧為創造思考教學之父。

《左傳》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就是講做人，立功就是做事，立言就是做學問。先生在做人、做事、做學問等備受推崇，真正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將先生尊稱為「偉大教育家」，可謂實至名歸。

參考文獻

毛連塭（2004）。**教育大道、牽手同行**。台北市：作者。

毛連塭、郭有遹、陳龍安、林幸台（2000）。**創造力研究**。臺北市：心理。

王秉倫（2002）。「教育專業」結合「資訊科技」——談國立教育資料館經營理念的推動與落實。**教育資料與研究**，47，30～31。

吳明清（2002）。教育志業的導師。**教育資料與研究**，47，11～12。

吳清山（2005）。生命中的良師。載於簡茂發等著：**毛連塭博士追思文集**（第129～131頁）。台北市：呈峰。

李錫津（2005）。一位人格者的隕落。載於簡茂發等著：**毛連塭博士追思文集**（第124～127頁）。台北市：呈峰。

洪文向（2002）。建置全國第一個教育論文全文資料庫—談毛館長的宏觀遠見。**教育資料與研究**，47，20～26。

張德銳（2004）。提攜後進利益眾生的毛校長連塭博士。載於簡茂發等著：**毛連塭博士追思文集**（第153～156頁）。台北市：呈峰。

陳龍安（2004）。懷念恩師——台灣創造思考教學之父毛連塭博士。載於簡茂發等著：**毛連塭博士追思文集**（第132～140頁）。台北市：呈峰。

黃昆輝（2005）。特教推手盲生之友—**毛連塭先生的教育志業**。台北市：未出版。

視聽組全體同仁（2002）。向毛館長說珍重再見。**教育資料與研究**，47，27～28。

廖慶峰（2005）。大教授小故事。載於簡茂發等著：毛連塭博士追思文集（第17～19 頁）。台北市：呈峰。

賴文隆（2005）。一位「愛的教育者。」載於簡茂發等著：毛連塭博士追思文集（第 33～34 頁）。台北市：呈峰。

蔡森煌（2005）。追思孝順暨謙虛力爭上游的毛連塭老師，啟明苑通訊，52，7～8。

韓繼绥（2005）。憶恩師 毛連塭博士。啟明苑通訊，52，4～6。

【鳴謝】

本書的完成，特別感謝以下單位及個人提供珍貴檔案及圖片：

王靜珠女士
王　鳳女士
吳昭婉女士
章林慧人女士
曹英芬女士
陳美芬女士
張博雅女士
張文英女士
張武男先生
蔡袁潤秋女士
劉　真先生
鄭梅合女士
錢　復先生
（依姓氏筆劃排序）

臺灣省諮議會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私立開南商工
國家文化總會
中國幼稚教育學會
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
李梅樹紀念館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中國廣播公司
國語日報
宜錄視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圖片出處】

數字為頁碼

張福興（p1~14）
張武男先生提供。

張雪門（p15~44）
17（左下）／翻攝自「張雪門先生紀念專集」
25（左下）／王靜珠女士提供
19（左上）、23（左）、33（左）、36（右下）、
39（右）／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提供
29（左上）／宜錄視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36（右）、40（右）／王鳳女士提供

林　本（p45~56）
章林慧人女士提供

趙麗蓮（p57~82）
65（左上）、69（左上）、70（右）、71（左下）、
72（上）、74（右下）／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提供
64（右下）／國立教育廣播電台提供
59（左上）／中國廣播公司提供
67（右）／國立交通大學提供

李梅樹（p83~94）
李梅樹紀念館提供

何　容（p95~124）
103（左下）、110（右上）、112（右）、120（右
上）、122（右下）／國語日報提供
100（右上）／曹英芬女士提供
109（左上）／臺灣省諮議會提供

劉季洪（p125~136）
127（右下）、131（右下）、132（右上）、133（下）、134（右下）、135（右）／國立政治大學提供
129（下）／蔡袁潤秋女士提供
130（右上）／劉真先生提供

陳有諒（p137~148）
138（左下、右下）、139（右上、右）、147（右上）／陳美芬女士提供
141（左）、143（上）、144（下）／私立開南商工提供

許世賢（p149~162）
150（右下）、151（左上）、152（右）、153（左上）、154（左上）、159（上）、159（上）／張博雅女士、張文英女士提供
160（右上）／宜錄視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錢思亮（p163~174）
164（右上）、167（右下）、170（左上）、172（右下）／錢復先生提供
166（右上）／宜錄視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168（右下）、169（右上）／國立臺灣大學提供

吳守禮（p175~186）：
177（上）、179（左上）、180（右上）、182（右下）、183（左上）、184（左上）／吳昭婉女士提供
185（右下）／國家文化總會提供

蔡保田（p187~198）：
蔡袁潤秋女士提供

毛連塭（p199~214）：
201（右）、202（右上）、203（左下）、204（右上）、205（左下）、207（左）／鄭梅合女士提供
208（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提供
210（右下）/本館檔案資料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教育愛：台灣教育人物誌 II ／ 國立教育資料館編. -- 初版. --臺北市：教育資料館, 民 96.09
面； 公分
ISBN：978-986-01-0889-7（平裝）
1.教育人員 2.台灣傳記
520.9933 96017897

◎著作權所有．請勿翻印◎

教育愛－台灣教育人物誌 II

發 行 人：王世英
編輯委員：伍振鷟、吳文星、吳清山、黃炳煌、溫明麗、歐素瑛（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出版機關：國立教育資料館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106）和平東路一段 179 號 8 樓
電 話：(02)2351-9090
出版年月：中華民國九十六（2007）年九月
版 次：初版一刷
電子出版品說明：本書同時登載於國立教育資料館網站，網址為 www.nioerar.edu.tw
定 價：新台幣 270 元
排 版 者：將軍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 話：(03)332-1673
印 刷 者：洪記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04)2314-0788

展 售 處：
教育部員工消費合作社（台北市中山南路 5 號）
電話：(02)2356-6054
五南文化廣場（台中市中山路 2 號）
電話：(04)2226-0330；網址：www.wunanbooks.com.tw
國家書坊（臺北市八德路三段 10 號 B1）
電話：（02）2578-1515；網址：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王東山律師

GPN：1009602477 ISBN：978-986-01-0889-7
隨附「台灣教育人物誌 II」DVD 光碟（光碟與圖書可分開購買）
光碟 GPN：4509602478 光碟定價：新台幣 300 元 視聽編號：EB-CD482